



◎林少川 著

烽火赤子心

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

新华出版社

烽烟故国难当头 海外赤子慨敌仇
青春无悔洱海月 别妻离子几度秋
奔驰日夜无停息 殷殷报国壮志酬
铁血三千滇缅路 不复山河誓不休





烽火赤子心

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

◎ 林少川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 / 林少川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166-1895-0

I. ①烽… II. ①林… III. ①华侨—抗日战争史—史料—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75532号

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

作 者：林少川

出 版 人：张百新

封面设计：肖 东

责任编辑：张 谦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钟铨工作室

印 刷：泉州市鲤城百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24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15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895-0

定 价：8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595-22370345

自序

30年前（1985年8月15日）正值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笔者时在国立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任职，经陈允敦教授、蔡若水先生介绍，一位名叫蔡汉良的泉州籍泰国南侨机工手持一些抗战史料、证件，前来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馆，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他于1939年响应陈嘉庚号召加入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史实。笔者当时就对南侨机工蔡汉良告别南洋、回国参战、出生入死、艰辛曲折的历史感到强烈震撼！

不听不知道，一听不得了，南侨机工当年轰轰烈烈回国参战的历史那么英勇悲壮，命运却又是那么曲折坎坷，仅仅在战后40年间就几乎被历史遗忘了，试问当时全国十几亿人能有几人知道“南侨机工”呢？作为华侨大学一名研究华侨史的教师，我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将“南侨机工”的历史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不应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淹没了！随即，我很快写成《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一文，并编入华侨大学《华侨史讲义》，作为当年华侨史公共课的教材。这是我最初接触“南侨机工”的开始。从此，我竟与南侨机工结下不解之缘。

为缅怀抗战史上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史实，经蔡汉良的介绍，1985年起，笔者开始在泉州侨乡调研南侨机工史迹，随后扩展到福建全省范围。后来，经母校厦门大学陈毅明老师将我的《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一文转呈陈嘉庚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引起陈先生的重视。于是，陈共存先生特地约我到厦门宾馆会谈，鼓励并资助我扩大至全国范围进行南侨机工专题调查研究。陈共存先生特地开具一张亲笔签署的介绍信：“全国各地侨联办：兹介绍华侨大学教师林少川同志，前往贵处调查了解南侨机工情况，以便记录当时南侨

机工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以便写成专集后拍摄电视教育片，启发年青一辈爱国思想，请大力协助为荷，谢谢。此致，敬礼！陈共存。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

1987年9月起，笔者背着简易的行装，带着录音、照相器材，持着陈共存先生致全国各地侨联的亲笔介绍信，只身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八省六十多个市县进行采访和调查，寻踪觅迹，访遍海角天涯，终于对当时（八十年代）国内幸存的一百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详细的专题采访，抢救并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现状实录及档案史料），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南侨慰劳团锦旗，还有华侨先锋大队别具一格的老式“结婚证书”及殉难机工的碑铭墓刻，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在当时如此全面、系统地搜集国内健在及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专题史料，并出版《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1994年8月，中国华侨出版社），是笔者向抗战胜利50年的一份献礼。

弹指一挥间，随后的20年也很快过去了。笔者变换工作岗位，先调到《泉州晚报·海外版》任主编，后又任泉州学研究所所长、《闽南》杂志主编，岗位虽变了，但是关注南侨机工的情结依旧不变、依然浓烈。

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笔者强烈感到，纪念抗战胜利，不能忘记我们的海外华侨！三千多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是70多年前华侨史上轰轰烈烈的一大壮举，尽管世事沧桑，岁月流逝，但南侨机工的事迹不能被遗忘。为此，笔者将20年前出版的《陈嘉庚与南侨机工》进行修订增补再版，以《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一书向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

本书的编辑出版，首先感谢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先生的鼓励与资助。还应感谢母校老师、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女士的提携扶助，多年来她对本课题加以关切指导，并且为本书作序，勛勉有加。还要感谢中国侨联主席林军的关心与支持，并赐题词。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今年本书的出版，得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

历史研究会会长林晓昌先生，中国侨联副主席、福建省侨联主席王亚君女士，泉郡昭惠庙理事会理事长赖传义诸热心人士的鼎立支持与资助，以及新华出版社张谦女士花费大量时间精心编辑，在此一并谨致崇高的敬意与由衷的谢忱！

中国泉州 林少川谨志

2015年7月7日

于华侨大学川流不息斋

序 一

陈共存

1986年，我们组团访问云南，同时也去滇缅公路走了一趟，慰问被历史遗忘了的一群参加抗战的华侨机工。他们的遭遇及可歌可泣的历史，在本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不多赘述。

三千多名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其中一千多人在抗战中为国牺牲，战后复员回返南洋的只及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一分散在国内各个省份，幸存者剩下一百多人。

1987年，见到华侨大学林少川先生所写的《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的蔡汉良》一文，于是特约他来会谈。林先生对南侨机工的专题特感兴趣，在福建省已访问了一些尚健在的老机工，我为了不使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湮没无闻，于是就鼓励和资助林先生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广东、广西以及海南，寻踪觅迹，访遍天涯海角，对一百多位幸存机工及部分家属，作详细的专题采访，收集资料。他经过了两年的奔波跋涉、四年的呕心沥血，终于整理出这部专著，把南侨机工为国牺牲所经历的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流离失所、痛苦悲惨的史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为教育后辈珍贵的历史教材。

此外，本书的付梓问世还要感谢在华侨大学陈觉万校长、郑民所长的推动与大力支持。

1993年9月

序 二

时任厦门华侨博物院副院长 陈毅明

移居海外的华侨及其后裔，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华侨是和平移民，是开拓者、建设者，与当地人民肩并肩，互相学习，携手合作，同甘苦、共患难，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使华侨备受屈辱，成了任人宰割的“海外孤儿”。华侨切身感受到弱者的悲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兴衰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华侨盼望中华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保障自己的合法地位。华侨情系故土，许多人倾其所有，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华侨有功于革命，被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华侨在这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亦尽其天职，功勋卓著。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海外华侨的无比义愤，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更是爱国热血沸腾，民族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抵制日货，出钱出力，源源不断地向祖国输送捐款、药品、服装、汽车、飞机，并把支援中国抗日的浪潮推向世界各地。

1939年，中国沿海港口全都被日寇占领或封锁，刚修通的滇缅公路成为保障获得抗战前线补给的唯一国际通道，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著名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为此发出号召，组织三千两百多名南侨机工分九批回国支援抗战。

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事迹令人感动，尽管各人的经历各异，但他们都是

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共赴国难的。几乎每个人回国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他们忠于职守，技术娴熟，工作相当出色。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他们从南洋回来，所经受的困难确实很多，包括工作条件差、水土不服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骤变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但艰难险阻何所惧？他们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汉，他们之中有一千多人为抗战的胜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约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滇缅公路是战时我国唯一的国际军事运输线，南侨机工的作用，不仅在于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本身，而更在于他们回国抗日建殊功的英雄壮举。

南侨机工的英雄壮举，雄辩地说明了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南侨机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其赤子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精魂。

然而，意想不到的，南侨机工满腔热情为抗日而归，竟遭到了当时有关当局的苛求苛待。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当局无视南侨机工抛家别亲回国效劳的实际情况，突然宣布解散，使广大南侨机工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非常关心南侨机工。他不仅亲自率领南侨慰劳团视察滇缅公路，调查机工情况，向当局提出保障机工能正常工作的要求，并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派刘牡丹、庄明理、侯西反向当局进行交涉，敦促善待机工。抗战胜利后，经陈嘉庚先生的有力交涉，才使一千多名南侨机工复员南返。

战后留居国内的南侨机工亦逾千人，不久就又陷入内战的痛苦之中。这些抗战救国的有功之臣，渐被遗忘了。新中国成立后，南侨机工和全国人民一样，当家作主，以火热的激情，投身于祖国的建设，过上了一段开心的日子。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他们因“南侨机工”的历史而受到不同程度牵连。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1986年11月，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考察团，在全国侨联、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陪同下，赴滇缅公路访问了留居云南的南侨机工。这一行动，代表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愿望，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我被邀请，本应随陈共存先生参

在陈共存先生率团考察滇缅公路的同时，华侨大学（泉州）青年讲师林少川先生，从已迁回福建的南侨机工史迹入手，进行专题调查。他不改初衷，坚持搜集、整理资料，研究华侨史，确实难能可贵。

同年11月，林少川先生背着简易的行装，带着录音、照相器材，带着陈共存先生致全国各地侨联的亲笔介绍信，只身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贵、川、湘等省城乡进行采访和调查，直至农历除夕才回家过年。龙年春节刚过，他又匆匆上路了，继续南下粤、桂、琼，终于对目前国内幸存的一百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详细的专题采访，抢救并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及现状实录），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南侨慰劳团锦旗，还有华侨先锋大队别具一格的老式“结婚证书”及殉难机工的碑铭墓刻，亦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了！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1993年9月

1、福建：泉州、晋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厦门、同安、漳州、龙海、东山、云霄、诏安、莆田、仙游、福州、武夷、建阳、南平。

004 | 烽火赤子心 | 序二

3、云南：昆明、玉溪、曲靖、沾益、路南、禄丰、楚雄、大理、保山、芒市、畹町、瑞丽。

4、四川：峨眉、成都、雅安、乐山、宜宾、泸州、重庆。

5、贵州：贵阳、安顺。

6、广东：广州、台山、深圳、韶关、英德、陆丰。

7、广西：南宁、柳州、桂林。

8、海南：海口、文昌、琼海（嘉积）、万宁、三亚、东方（八所）、儋县、琼山、定安、琼中、通什。

回国参战 功昭日月

——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五十周年

（1939～1989）

—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土沦亡、生灵涂炭。广大海外侨胞，同仇敌忾，不仅从精神上物质上全力支援祖国，而且直接回国参军参战。滇缅公路上三千多南侨机工的辗转战斗，浴血牺牲，就是其中突出的事例。

星移物转，半个世纪过去了，为缅怀抗战史上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史实，笔者在海外知名人士陈共存先生（陈嘉庚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和华侨大学校长陈觉万教授的热心支持下，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及海南岛，寻踪觅迹，访遍天涯海角，终于对目前国内幸存的100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比较详细的专题采访，收集、抢救和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及现状实录），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以及“南侨慰劳团”视察滇缅公路的锦旗等。这些珍贵文物史料（见本书《南侨机工图片集》）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由于抗战爆发，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1939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1938年动工修筑，1939年1月10日正式通车），

成为战时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内可联川、康、黔、桂四省，外可通曼德勒、仰光，成为我国与东南亚联系的纽带，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物和世界各国支援的军火武器均赖此路输入。新抢修的滇缅公路地势险恶、山高谷深、崖壁陡峭、山路崎岖，沿途要翻过海拔三千多米的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横跨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还要穿越亘古荒凉、人烟稀少的“烟瘴之地”。这样恶劣的行车环境，非熟练的机工难以胜任，因此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司机与修理工。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十分匮乏，从头训练这种人才，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致电“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企望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陈嘉庚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于1939年2月7日发表《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号召机工回国服务，共拯危亡。

机工招募的条件是：一、能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及修理工。二、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持有当地（侨居地）汽车驾驶执照者。三、略识中文，略会讲普通话，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四、凡应募者，须持该地筹赈会或商店介绍函，知其平素确具爱国志愿。招募广告附告：各地筹赈会负责征募，考验合格者报南侨总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立即得到南洋华侨的热烈响应。南侨机工赤诚报国的壮志情怀，是十分动人的。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据笔者到滇缅公路实地寻访，《南侨回忆录》所记载的这位机工，就是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誉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当时招募广告规定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而王文松却抛弃200坡币（折合国币近700元）的月薪，自甘牺牲，并带领一批伙伴，自备全副机修器具回国。由此可见，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操与奉献精神是何等高尚！王文松在滇缅路上任下关修理厂厂长，为抢修抗战军运车辆贡献殊多，不幸于抗战后期因车祸殉国。同伴中幸存者韩利丰、黄守琛老人向笔者追述半世纪前与王文松“青春作伴好还乡”的难忘经历，感慨万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贵州采访了一位将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而铁心参战的新加坡华侨机工许志光，他仍珍藏着1939年3月13日陈嘉庚先生亲笔签署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

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足钦佩。现伊母亲及其妻子，拟不日遄返原籍安居……希予以特别优待。”在这封历经半世纪沧桑的珍贵信件中，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机工队伍中，也有几位热血的华侨女青年。槟城筹赈会妇女部职员白雪娇（现为广州师院副教授），瞒着双亲报名参加机工队，临行才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此去虽然千山万水，未卜安危，但是，以有用之躯，在有用之日，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生无负于祖国！”信的全文发表在1939年5月19日的《光华日报》上，现在读来，依然令人振奋。另一位被何香凝题词誉为“巾帼英雄”的海南籍马来亚华侨机工李月美，女扮男装与弟弟李锦容一起回国参战，则更富有传奇色彩。有一次，李月美翻车受伤，幸亏及时被送到医院抢救才脱险，人们也才知道“他”原来是女郎。后来，李月美与一位对她精心护理的海南籍华侨机工杨维铨在患难中结成伴侣，一时传为佳话，被当时海内外报章誉为“当代花木兰”。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当时这些海外赤子，有的是放弃海外待遇优厚的职业而回国；有的年仅十七八，却虚报为二十岁才够条件回来；有的惜别未婚妻而奔赴抗日疆场，并约好胜利归来再相会；有的已经结婚却毅然别妻离子投报祖国；有的因家长不同意，则改名瞒着家庭秘密参加机工队伍……总之，踊跃报名的动人事迹，感人肺腑，无法尽述。仅在1939年的半年内，前后共有9批机工回国，总数达3200多人。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司机、修理工，又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等等，但都在爱国号召下不落人后，共赴国难。正如《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所报道的：“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二

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训练所的短期军事、业务集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处属下的十几个大队以及后来专门组建的“华侨运输先锋大队”（分第一、第二大队），奔赴滇缅公路沿线服务。修理工除部分随队维修外，其余都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的修理

厂。南侨机工开车的地方很广，四川、贵州、湖南、两广以及越南、缅甸仰光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滇缅公路上。据南侨总会《大战与南侨》一书记载：“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可见，南侨机工成为“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的一支主力军。

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副理事长王亚六回忆说，当年他们刚从海外回来，一下子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要闯过种种难关。首先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蜿蜒在横断山脉纵谷区，海拔自五百至三千多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险谷、深流，令人惊心动魄，满载军火物资的卡车行驶在如此险峻的路上，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有的甚至连尸体也找不到，南侨机工的无名英雄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次是“雨季关”：由于滇缅公路突击建成，路基未稳，路面狭窄，坑洼坎坷，一至雨季，泥泞粘滑，行车犹如老牛拖犁，裹足难前，塌方险情，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南侨机工早有精神准备，每人都随车带有厚木板，遇到险路段则随时铺垫，冒险通行。第三，还要闯过“瘴疔关”：由于滇西至缅北一带，是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对每位机工构成很大威胁。据《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病，平均每日死亡约计七八人。”此外，还有“空袭关”：日寇为了封锁滇缅公路，时常派飞机空袭、轰炸，尤其是1940年10月，“滇缅路重开之后，敌机的轰炸，愈演愈烈。但华侨司机们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们自动踊跃地参加华侨义勇抢运大队，在敌机机翼下拼命地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前仆后继，以加紧运输来为死难的同胞复仇！整个滇缅路的运输就依靠这些抗战英雄的壮烈牺牲来维持！”。当年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南侨机工却风趣地向海外亲人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表述了其革命乐观精神。

由于滇缅公路的运输不断补充了抗战实力，对日本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构成障碍，因此，日寇将切断这一国际要道作为重点目标。1940年，日本玩弄外交手腕逼英国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7月18日至10月18日）。消息传出后，南侨机工组织了一次突击“大抢运”，夜以继日，将大批军火赶在封闭前抢运入国境来，立了功勋。当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日机则更疯狂

轰炸功果桥与惠通桥，企图切断滇缅路的咽喉。据统计，自1940年10月18日至1941年2月27日的130多天内，日寇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的重点桥梁达20多次。其中严重的有，1941年1月23日，功果桥遭到9架日机的狂轰滥炸，有一半桥面坠入澜沧江中，敌广播“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然而，南侨机工却用144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将满载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使军运大动脉畅通无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东南亚。1942年2月，南洋群岛各地先后沦陷，日军由泰国入侵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根据中英协定，中国派遣10万远征军入缅与英缅联军并肩作战，但因种种原因，战事失利。3月8日，仰光沦陷；4月下旬，日军占领腊戍，随即以装甲车为导，用汽车载运步兵先遣队沿滇缅公路向中国境内推进；5月3日，日军占领我国边陲城镇畹町；4日攻下龙陵；5日挺进至怒江惠通桥西岸。为阻止日军东进，国民党军队自炸惠通桥，致使数百名南侨机工、近千辆汽车及数万名缅甸华侨难民未及过桥而被阻于怒江天险。这些南侨机工有的冒险渡过怒江，有的上山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被日军抓去惨遭杀害。至此，敌我双方隔江对峙，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终于被切断了，国内运输只剩昆明至保山之间的路段继续运行。

随着战局的恶化，南侨机工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三年多来（1939年1月10日至1942年5月5日）发挥过重要作用（抢运45万多吨军火）的滇缅公路一切断，西南运输处（此时已改为中国缅运输局）竟然对回国参战、屡建功勋的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一小部分被留用外，多数机工被遣散，突然间成为无业游民，生活陷入困境，而国民政府竟无一部门过问。当时南洋已沦陷，侨汇中断，有家归不得，许多机工无依无靠，只得四处飘零，流离颠沛，有的竟在贫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尽管处境艰难，但南侨机工仍不忘矢志报国的夙愿，积极做好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根据在东南亚开展敌后斗争工作的需要，有一部分南侨机工被盟军选派进行训练，然后潜往南洋日军占区担任地下情报工作，侦察日军动态，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新贡献。泰国华侨机工蔡汉良，曾于1944年被派往泰国，侦察拉温日军基地。由于他熟悉当地情况，深入虎穴，巧妙周旋，终于摸清敌情，配合盟军一举摧毁拉温日寇军事基地。另外，也有数百名机工奉命随盟军赴印度服务，他们协助盟军搞军运后勤，并为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的修建奉献了力量。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那些历尽艰辛流落在国内各地的南侨机工，他们都尽力参加收复滇西的战斗以及各地的对日反攻，坚持到最后。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亲历抗战征程的南侨机工欣喜若狂，其心情的亢奋，有如杜诗所描述的“剑外忽传收冀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抗战胜利了，南侨机工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于是要求复员南返。可是国民政府当局却拖延阻挠，致使机工迟迟未能南归与亲人团聚。

抗战刚结束，在重庆的潘国渠、庄明理、白仰峰等人，即多次向国民政府交涉南侨机工复员事宜，却无效果。据《星州日报》1946年5月30日载《庄明理谈华侨机工现况》称，庄明理曾向当局提出八项要求：1、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2、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3、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4、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5、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6、发给南返机工服装；7、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作为奖励，另一方面作为南返生活费；8、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此外，还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就是在抗战期间，或行动有失检点、或因怨谤而被禁锢的机工，请政府从速提审，分别轻重，迅速遣送回南洋。

庄明理向国民政府侨务部门提出上述要求后，1945年10月，侨务部即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后方勤务部等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所提要求极为合理，即席通过。但此次会议之后，直到11月底至12月初，当局仍未公布任何正式实施办法。到了1946年3月，庄明理再到侨务部交涉，当时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从答应请政府拨款国币一百万元，交华侨机工互助会负责人办理紧急救济。不久，庄明理返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请示协助机工南返问题。但两个月过去后，政府一百万元紧急救济还没着落，至于遣散机工事，更如石沉大海。

为机工复员事，设在云南的“华侨互助会”亦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进行华侨机工总登记。据华侨互助会《南风》半月刊记载，第一期总登记，机工人数共1203人，其中新、马有1061人，占87%，而后来获准遣返、享有奖

金及证书的有1144人。当年3200余名机工回国，胜利后登记入册者竟不足半数，其余的不是牺牲、病故就是失散，可见挫折是相当大的。为使劫后余生的机工早日南旋，1946年3月2日，华侨互助会派代表白清泉、邱新民，携带机工名册和公文从昆明飞往重庆，奔走了行政院、救济总署、侨务委员会、外交部、社会部等部门，甚至还跑到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请愿”，最后才由善后救济总署复示优先遣送华侨机工南返，但仍没着落。过后，华侨互助会又派代表一行四人（白清泉、邱新民、袁阿喜与龙历文），于5月21日启程南下，经越南、泰国抵达新、马，为机工复员南返做了许多工作。

与此同时，陈嘉庚先生为交涉机工复员之事，据理力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众所周知，华侨机工回国是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的，陈先生对机工的命运一向极为关心。早在1939年8月，他就派刘牡丹到滇缅公路调查考察，后又任命庄明理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1940年陈先生又亲率南侨慰劳团前往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后来在南洋沦陷、玛琅避难的三年间，陈嘉庚先生著有《南侨回忆录》一书，其中多次叙及华侨机工。抗战胜利后，他更强调原本为抵御外侮而回国参战的机工，决不能留下参加内战，应当复员南返，并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1946年6月16日，陈嘉庚先生在吉隆坡福建会馆主持召开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关于遣送机工南返事，交由驻新加坡伍伯胜总领事全部负责办理，并选出陈嘉庚及庄明理、陈可用、何炽祥、蔡伯祥五人于18日“晋谒”伍总领事，以策进行；2、遣送机工南返限期两个月办理完毕，另在昆明已登记的失业机工400人，应早日将他们遣送新马；3、以全马华侨筹赈会援助机工复员代表大会名义，通电行政院，请速遣送机工南返；4、一部分被扣机工，应请政府提早审讯，如无罪，立予释放；5、如两月内遣送工作未能完成，应请伍总领事返南京向中央请求力争。随后，6月19日，陈嘉庚先生一行五人，会见了伍伯胜总领事，提出三点办法，伍当场表示“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现。

两个月期限已至，仍未见机工南返，陈嘉庚先生又连续二次致函伍总领事，要求遵守诺言，“倘国内政府未能急切遣送，或至遣送徒成具文，应请阁下代表侨民回国交涉”。伍总领事先后于8月24日及9月3日函复陈先生，报告了经总领馆与国内政府有关机构接洽及与当地政府交涉的结果。至此，稽延了一年多的机工复员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华

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共1144人，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每人美金200元，订于1946年10月1日起发给。

为表彰南侨机工，侨务委员会特颁发奖状，内容是：“华侨机工□□□，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月□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荣誉证书，内容是：“兹证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月□日。”

为庆祝南侨机工胜利复员，1946年10月26日，也即启程之日，云南各界隆重召开欢送大会，并颁发“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会后，第一批复员机工219人，眷属202人（共421人）由昆明西站出发。接着，第二批机工71人、眷属85人和第三批机工177人、眷属129人，分别于11月15日和29日启程。总之，复员机工被视为民族英雄，所经之处，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迎送。机工南返，既有整批的，亦有零散的，时间前后也拖得较长，据统计，陆续有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属）几经辗转返回了南洋，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至此，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服务这项义举，总算是有始有终，没有辜负华侨父老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南洋华侨在祖国抗战史上写下令人难忘的光辉一页。

四

在整个南侨机工回国参战过程中，为抗日战争而牺牲宝贵生命成为无名英雄的达一千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复员返回南洋的也有一千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其余的三分之一，则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国内，人数将近一千人。这些留在祖国的机工，经过战后40多年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幸存的仅100多位。他们当中，最高龄的是海南岛宋扬才（杨材），年逾九十岁，最“小”的四川宜宾洪华民（18岁回国），也已年逾古稀。

战后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有的因已在抗战期间成了家，不愿或不能南返的；也有的因来不及办理复员手续而失去南返机会的。他们大都在云南一带落户安居。到新中国成立时，留在西南及滇缅公路沿线的还有300多人，其

余的则已回原籍闽、粤家乡，也有一小部分星散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南侨机工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各地机工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技术专长，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黄步云等，还光荣出席北京群英会，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55年，陈嘉庚先生到云南、贵州等地视察，看到南侨机工安居乐业，甚感欣慰。

毋庸讳言，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许多机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南侨机工们更因海外关系及参加国民政府抗战的经历而受尽折磨。在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多数华侨老机工都戴着各种不光彩的“高帽”，诸如“特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机工”、“海外关系复杂”等等，光荣的历史被抹黑。尽管各地机工们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仍不动摇，坚信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光荣史实终究会得到历史公允的结论。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华侨政策得到重申和落实，抗战史上这段曾被遗忘甚至被颠倒的南侨机工历史，终于得到公正的评价，冤案得以平反，名誉得到恢复。1986年9月，云南的70多位老机工在昆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南侨机工团体——南侨机工联谊会。这个“机工之家”为机工战友办实事，排忧解难，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同年11月间，陈嘉庚先生之侄陈共存先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率考察团到滇缅公路慰问考察，专程调查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史迹，给这一群把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给祖国的海外赤子、抗战遗孤以极大的抚慰和鼓舞。同年年底，我国政府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的待遇，以保障幸福的安度晚年。

五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3200余名南侨机工共赴国难，回国参战，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虽然是一些无名英雄，然而海内外炎黄子孙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

早在1946年7月7日，为了追悼回国参战华侨烈士和死难同胞，马来亚

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在升旗山与鹤山交界的山坡上，树立了一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三角形的纪念碑分成两段，下段有三面不同内容的刻石，一面是林连登书写的“浩气长存”，一面是刘玉水题写的“忠灵不朽”，正面是碑记，由黄严管撰、周曼沙书、蒋清室刻，碑记内容如下：

慨自滔天祸水，起于卢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切恨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之天职；无老无少，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募机工，大收驱驾辇车之利；技参军运，竞树蜚乌挽粟之功。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宜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布肃清之令，更颁炮烙之刑。公冶被诬，同羁縲绁；嬴秦肆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扬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所幸两声原子，三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第飞扬白旆，虽远竖于东瀛；而内烁青磷，尚游离于南廓。客过岷首，空怀坠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忠之竭。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极思掩盖，借安英灵。奈经处处搜寻，始得一丘之萃。兹者卜地旗山之麓，建立丰阡；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理石无忧；庶几取义成仁，亘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历万古而常昭。

这篇情真意切的碑文，寄托了对抗战英勇献身的机工的悼念，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

为表彰华侨机工的爱国精神，1947年11月30日，马来亚雪兰莪华侨筹赈会特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使机工参加抗战的忠勇事迹，长存人间，该碑刻下了以下的文字：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我国政府，颁发动员令，全面抗战，歼彼倭奴。南岛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沿海各地，均遭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为运输孔道，以资接济，唯战区辽广，辘重运输，急如星

火。驾车人材，须尽量搜罗，方克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遣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八年，沐风栉雨，备尝艰苦，幸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固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为可风，爰为之铭曰。

机工技术，驾轻就熟。机工勤劬，风尘仆仆。机工任务，滇缅往返。不畏天险，褒斜缩谷。祸生陡变，丧身寒谷。为国牺牲，谁不敬服。自来殉国，必有纪录。勒诸丰碑，良志芳躅。

1989年7月7日，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纪念之际，为了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特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树立起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纪念碑矗立在西山公园滇池之滨，碑身以汉白玉石砌成，显得飒爽英姿，浩气磅礴。碑前两层台阶均为七级，象征“七·七”抗战；碑的上端雕有“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四条墨石横带象征当年四万万同胞齐心抗日；碑的下面镌刻有“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十一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立”；碑身的两侧砌成两面旗帜形状，象征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旗帜上雕刻三个“七·七”纪念章，代表着回国抗日的三千多名南侨机工；碑身高九米，碑座高三米，以纪念“九·三”胜利节；碑座的正面刻着四个大字：“赤子功勋”，是对南侨机工和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高度赞誉；碑座的侧面和背面镌刻着碑文，碑刻全文如下：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河山。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沸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淋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病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奉献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 * *

综上所述，半世纪前，正当祖国民族处于最危急关头，三千多南侨机工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毅然抛弃海外较为优裕的生活，在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大规模回国参战，这是华侨史上的一大壮举。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方面。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

记载，从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这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的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2000吨；另据《华侨先锋》第2卷第9期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的水平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此外，他们还在其他军运线（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地）以及中印公路抢运军火兵员，并积极配合盟军对日反攻。总之，南侨机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不仅为抗战本身贡献力量，而且也以他们为民族存亡而献身的壮举，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意志和信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仍将继续激励与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1989年）

目 录

自 序	001
序 一	001
序 二	002
回国参战 功昭日月	
——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五十周年	006

第一部分 南侨机工图片集

第二部分 南侨机工采访录

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	
——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	071
新婚别，别离为救国	
——记永春南侨机工刘瑞齐	080
别具一格的《结婚证书》	
——“华侨先锋大队”机工李颀	
与傣族姑娘刘学义的“结婚证书”	083
难忘的经历	
——记炸断惠通桥目击者、南侨机工郑天赐	086
为了祖国踏上征途	
——记厦门南侨机工庄霖助	088
陈嘉庚故乡一位老机工的默默奉献	
——记南侨机工李荣竹	092

无悔的抉择	
——记莆田南侨机工余汉洲	095
悄然离家 为国奉献	
——诏安南侨机工张章胜参加抗战纪实	100
当代花木兰	
——记巾帼英雄李月美	102
一份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南侨机工日记手稿	109
烽火的岁月 血染的日记	
——记南侨机工张光旺	118
死里逃生 破镜重圆	
——南侨机工王云峰传奇经历	120
赤子报国	
——海南岛南侨机工刘源访谈录	126
中印缅公路上难忘的战斗	
——记由机工升为翻译官的黄迎风	129
一个华侨热血青年的追求	
——南侨“编外机工”蔡如秋访谈录	133
由纪念碑落成引出的一段难忘的回忆	
——广西南侨机工殷华生自述	137
从滇缅抗战到江汉建设	
——记葛洲坝南侨机工谢耀南	143
惠通桥虎口脱险记	
——成都南侨机工吴璋访谈录	146
一位改名“华民”回国抗战的日本混血儿	
——记马六甲南侨机工洪华民	149
赤子的奉献	
——记泸州南侨机工陈昌雄	154
赤子丹心 情系中华	
——记重庆南侨机工林广怀	158
一心为救国 奋战到胜利	
——记重庆南侨机工颜世国	162

从重庆到延安	
——记南侨机工程龙庆	165
有幸与八路军、新四军结缘	
——重庆南侨机工方川如回忆录	171
歌声激励我们上战场	
——南侨机工陈寿全回忆录	174
他珍藏着陈嘉庚先生的亲笔信	
——贵阳南侨机工许志光访谈录	176
辛酸的回忆	
——贵阳南侨机工李山河访谈录	180
青春无悔	
——曲靖南侨机工邝振声访谈录	184
冤狱不堕志 跛脚亦无悔	
——记玉溪南侨机工郑文通	189
及时最是龙陵雨 竟尔回生爱国人	
——记荷属华侨救护队员李伟庆	191
漾濞江声悲难友 高峰素月吊忠魂	
——林树容追忆夤夜孤身护送战友遗体的惊心经历	194
为了抗日救国 不惜抛妻别子	
——记保山南侨机工孙其文	198
把爱留在傣家	
——记芒市南侨机工蔡文兴	201
最年轻的机工	
——谢川周回国抗战纪实	204
为了父亲的嘱托	
——记芒市南侨机工谢金标	210
烽火运输线的回忆	
——记遮放南侨机工沈治平	214
弃高薪，别妻子，热血洒在运输线	
——记南侨机工楷模王文松	217

抛妻别子赴国难 散而复聚乐晚年	
——云南南侨机工韩利丰与两个妻子团圆的传奇故事	220
情系中华赴国难	
——南侨机工沈茂山的回忆	223
抢运，在敌寇机翼下进行	
——昆明南侨机工黄友镐的回忆	225
苦辣酸甜历沧桑 赤子之心永不泯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访谈录	227
他的心永远年轻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王亚六访谈录	239
执行特殊任务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邓文聪回忆录	243
一箱子弹的惊险经历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翁家贵回忆录	245
它陪伴我五十多个春秋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秘书长罗开瑚回忆录	247
赤胆忠心 无私奉献	
——记昆明南侨机工汤耀荣	249
滇缅公路上的难忘岁月	
——南侨机工林福来回忆录	252
抗战时期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纪实	
——南侨机工张智源回忆录	257

第三部分 南侨机工史料选

一、南侨机工大事记	267
二、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服务机工名册	277
三、南侨机工档案选编	297
四、南侨机工重要文献辑录	330

第一部分

南侨机工图片集





陈嘉庚先生像

馬·來亞華僑機工隊

返國參戰

神聖的民族抗戰，激動了每一個黃帝的子孫，不論他是居於國內，或遠離祖國懷抱的海外。散布於世界每一個角落，數目達一千萬的華僑，一向是最熱烈愛國，對於這一次開歷史紀錄的民族抗戰，自然是感到十分的震奮；他們本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一方面努力輸將，一方面更自動的回國服務。他們的忘我的英勇，造成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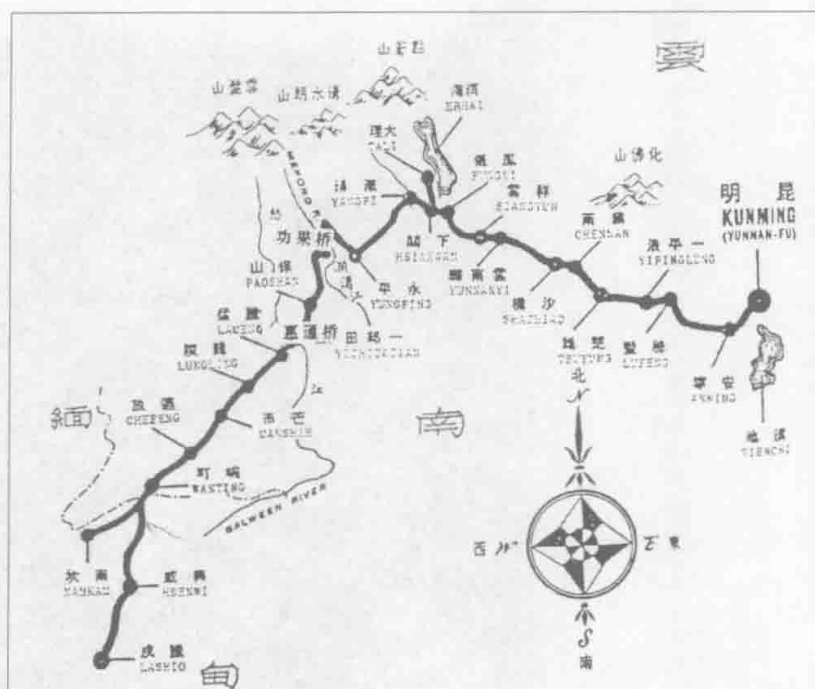
馬來亞的華僑也不落人後，在陳嘉庚先生等鼓勵之下，組織了回國服務團，分批返國，參加戰爭；他們一大部分是技術工人，回國後擔負機工的責任，可稱駕輕而就熟。他們犧牲小我的利益，願為祖國而奮鬥。

他們不愧是黃帝的子孫。（張文傑、梁錦耀攝）



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在新加坡集中的情景（1939年）

滇缅公路图



中国民工抢修滇缅公路（1938年）

滇缅公路是云南边疆20余万民众，用最简陋、最原始的工具，用八个月的时间建成。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运输沿线地形复杂，路险难行。图为贵州二十四拐处



贵州晴隆-云南昆明，抗战公路二十四道拐



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处长陈质平致总经理处函（1939年2月18日）

1939年第一批南侨机工“八十先锋”领队白清泉





1939年2月18日，八十先锋领队白清泉（前中）临别新加坡前其友人为他送别



1939年2月15日，白清泉回国参战前，在星洲华佗药房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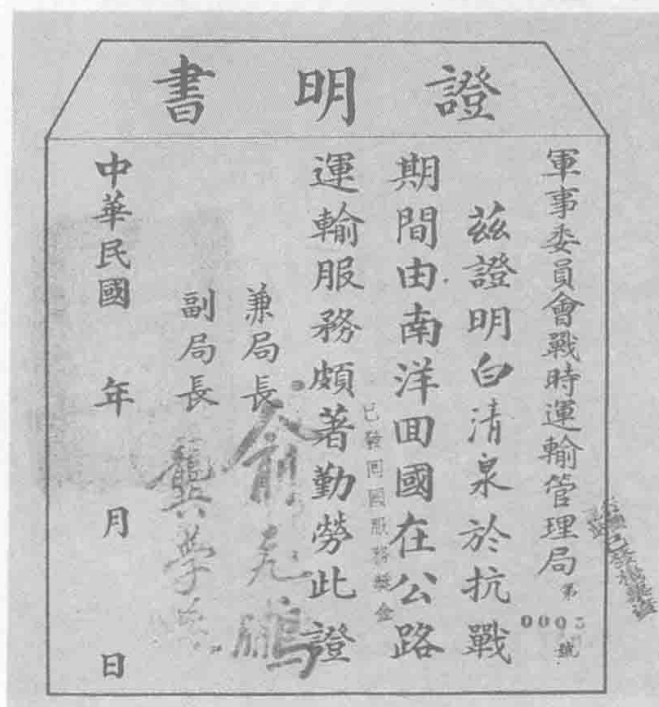
1941年5月滇緬公路中断后，一部分机工继续参军抗日，这是白清泉机工加入中国军队的修业证书



徐元鏜 証件影印

第十頁

第一批南侨机工徐元鏜的奖状



第一批南侨机工白清泉的抗战证明书



第一批南侨机工徐元鏜的抗战证明书



雪蘭莪華僑第二批機工（總第五批）回國服務團留影（第三排右五為翁家貴，第四排右三為李運星）（1939年）



柔佛州第二批機工回國服務團留影（1939年2月）

西南运输出口物资

第 二 页

航日	航数	等次	字数	航日	航数	等次	字数
18/4	799	等次	114	18/4	799	等次	114
时	分	秒	分	时	分	秒	分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85	65	45	25	85	65	45	25
90	70	50	30	90	70	50	30
95	75	55	35	95	75	55	35
100	80	50	40	100	80	50	40

西南运输出口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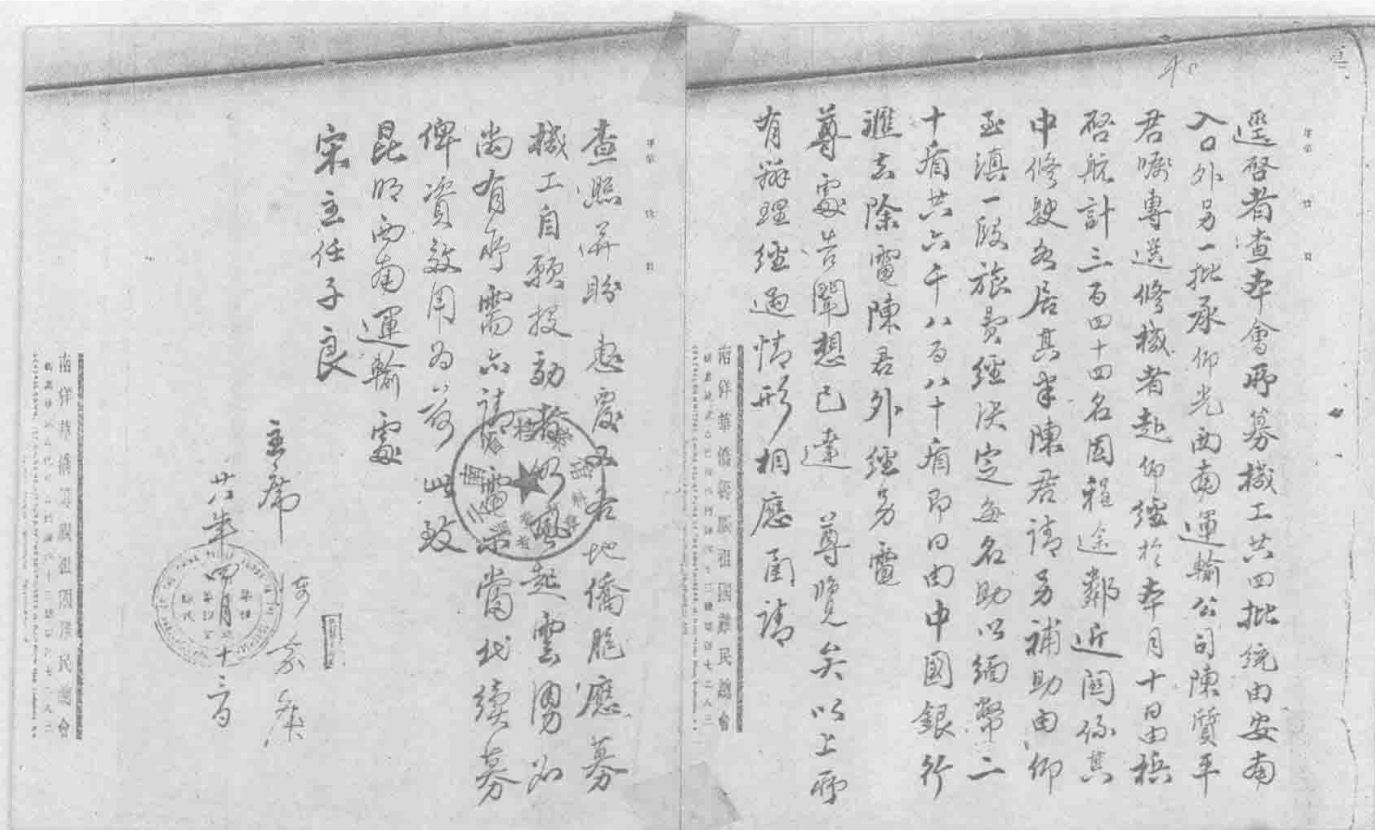
西南运输出口物资

第 二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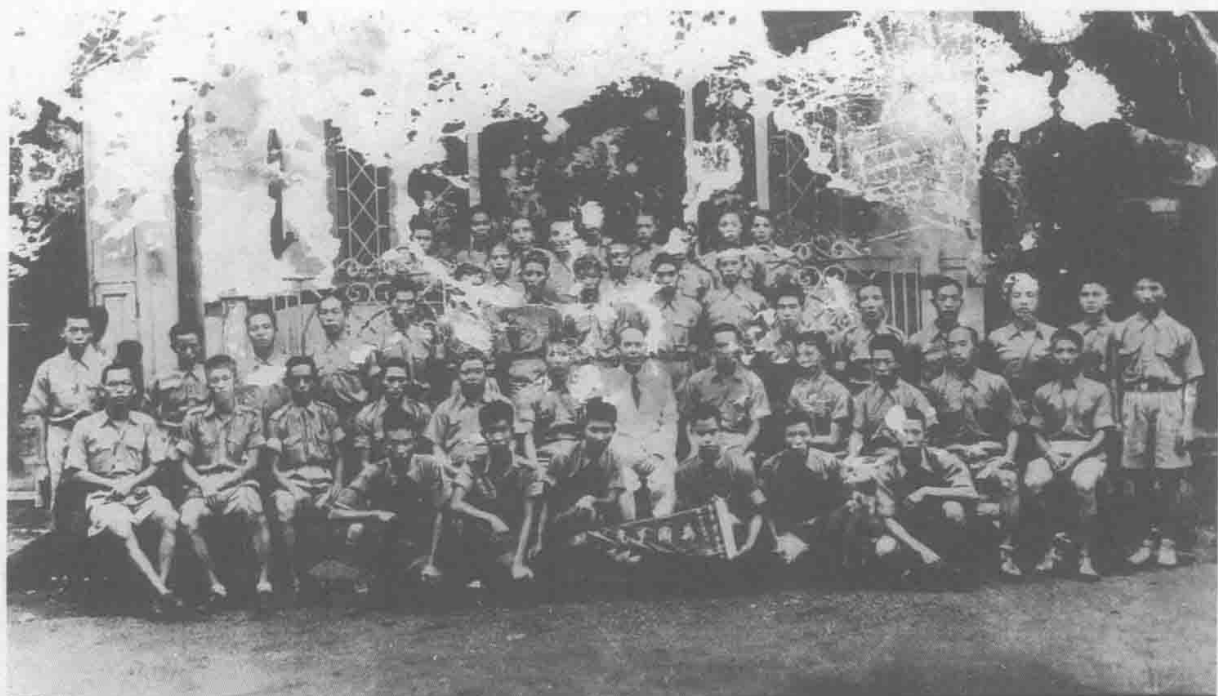
航日	航数	等次	字数	航日	航数	等次	字数
18/4	799	等次	114	18/4	799	等次	114
时	分	秒	分	时	分	秒	分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航路
85	65	45	25	85	65	45	25
90	70	50	30	90	70	50	30
95	75	55	35	95	75	55	35
100	80	50	40	100	80	50	40

西南运输出口物资

西南运输处关于第三批华侨机工的电报（1939年4月19日）



陈嘉庚先生关于第四批机工（赴仰第一批）由仰入滇事宜宋子良函（1939年4月13日）



紀念國友工批第四送歡友工批第三批工僑四月廿八日民國二十八年

第三批华侨机工欢送第四批机工回国留影（1939年）

福興二邑同鄉假座柔佛自由車商會舉行歡送鄭文尾李金鳳二位司機回國服務留影紀念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马来亚福兴二邑同乡欢送郑文尾、李金凤两位司机回国服务

回国服务司机于星洲在同济医院
内留影（1939年）



暹罗华侨机工抵达广州。前排左二为
方有，前排左四为吴家运，左一韩济
元、右一陈玉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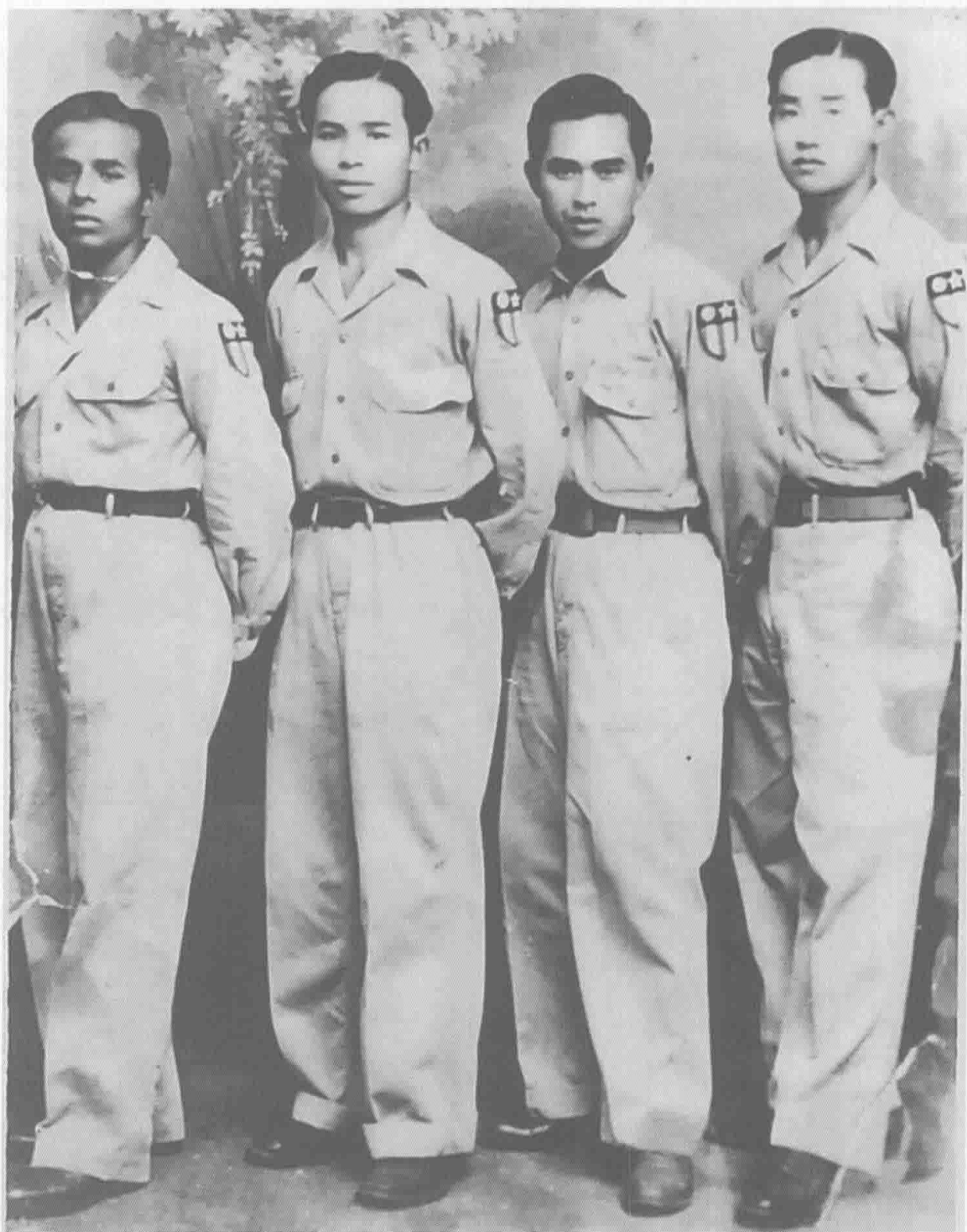
新加坡盟里南旅同乡会纪念“八一三”售花助赈及欢送回国机工大会摄影（第三排左九为
领队王诗伟）



旅泰華僑留校同學歡送泰屬機工回國留影（1939.8.8）前排左起：左四鍾炎祥、左五蔡漢良、左七邝天祥（邝振聲）、左八鍾道清、左九蔡高耿、左十陳潮海、左十一蔡惠文



歡送彭亨勞勿機工回國服務團留影（1939年）（前排右一為黃炎宋）



英姿勃发的南侨机工，左起李清海（印度人）、林福来与梁广昌（右一）

[illegible]

共年三百十百

時來廣

南屏華僑義賑祖國難民總會

稿處理經已於運寄物口出後商西七月委辦軍

[illegible]

必明
五元

176

東唐王貞長前銅全
正合經華傳載王固國版亦史心初處於廿一二三四
五批共附本阻常王批
楚心夢園不耕夢言
銅唐危个表吳以初來
附宋子叶有

016 | 烽火赤子心 | 第一部分 南侨机工图片集

02818

逕啟者茲據出資與六甲華僑籌賑會
編務主任黃志淵君來函并云該埠十在
昆明機工陳瑞君為華僑二名原屬多一
件據瑞君昆明多熟機工苦寒無衣之費購置
以玻璃巡防衣送瑞君防衛意欲機工果以無
衣禦寒多長瑞君函述如無刻防向亦原瑞君
已當面瑞君商請主官隊長督求連
務處當面供給或自外借出月新置備
若不能速道瑞君非止當面瑞君防衛
吳君瑞君連瑞機工等亦相應抄錄瑞機

南洋華僑籌賑委員會 謹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日

上奉函原文多件附函送達
執事即即設法妥予安置以免忘薄
弱機工身生階逃事件惡地後往瑞瑞
客多致生年如何之費并出而
惠愛另有以此致
陳質平 謹啟



主席 馮家康
廿年六月三日

南洋華僑籌賑委員會
新加坡坡底巴里門牌四十三號 電話七二八二
GENERAL COMMITTEE CHINESE RELIEF FORCE OF THE ROYALTY, 43, Raffles Place, Singapore, S. S.

陈嘉庚为机工生活苦寒无衣致陈质平函（1939年6月3日）

子良先生台鑒頃奉
賜書暨附來軍事委員會辦四魚代電一
件均經拜閱機工徵募略助微勞原屬國民
應盡天職茲承
執事呈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嘉慰弗
克當無任惶悚除將 蔣委員長勉勵
之語隨時刊以自勉外相應備文函請
察照順致謝忱謹啟并頌
政祺

弟 陳嘉庚 謹啟
廿年六月廿九日

南洋華僑籌賑委員會 謹啟
新加坡坡底巴里門牌四十三號 電話七二八二
GENERAL COMMITTEE CHINESE RELIEF FORCE OF THE ROYALTY, 43, Raffles Place, Singapore, S. S.

陈嘉庚复宋子良函：为招募机工及电令嘉慰事（1939年6月29日）

CHINA RELIEF FUND COMMITTEE OF HONG KONG
MIRI, S. 1844

砂越美里坡筹賑會关于资送
机工回国事宜致宋子良函（1939
年7月）

敬啟者前接南洋華僑籌賑會第十八號通告欣悉
貴會囑募機工資送回國事開救國要需自應協助辦
理茲得該半熱心愛國長於此技之僑胞張亞通郭華
明錫現沈志生許培陳德強靈海泉君七名願意應
徵故特資送至星洲諸籌賑總會考驗如及格者
即資送

貴會呈抄

接收編隊服務並希見復為荷此致

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主份

宋子良先生台鑒

按此為敝會第二期所選機工

會長 廖正興 啟

遵啟者現本會徵募之第八批機工三百四十名已
於今日抵星祥輪起程赴越過國查此次機工
具有特殊技能者計有兩位一為總領隊黃
景鎮一為機隊田德九黃君在此間為東
亞摩多車廠任技師職月薪為九元其人
與前批王文松同一具有優良技術今以不
能回國去請 給予技師以資獎勵甲君
他熱血勇兒富有機務常識此等子弟
九鐵路身學鐵路為汽車工廠大古航
廠北婆羅洲大車工廠應任裝置大車修機

機若電機及鐵道經驗豐富皆責任職證出
以資驗證今限于愛國熱誠情願棄家自
備資斧返國服務以此熱誠實難能
可貴敢請

貴會勉勵運用以宏其才而遂其願
實為至理至公此致

西南運輸處主份

主席

廿六年七月十日

陳嘉庚先生介紹第八批機工回國服務函（1939年7月17日）

查得者案查

貴處接獲署機工除多批募往外尚需一百二十名茲據
決定於本月十四日撥空慶輪由越前來其中尚加
有可作紅原係財部貿易委員會所託募要由
仰光入口此間需長途跋涉不便招接由安南
入口

貴處接獲署機工除多批募往外尚需一百二十名茲據
決定於本月十四日撥空慶輪由越前來其中尚加
有可作紅原係財部貿易委員會所託募要由
仰光入口此間需長途跋涉不便招接由安南
入口

查照為荷此致

西南運輸總處主任

宋子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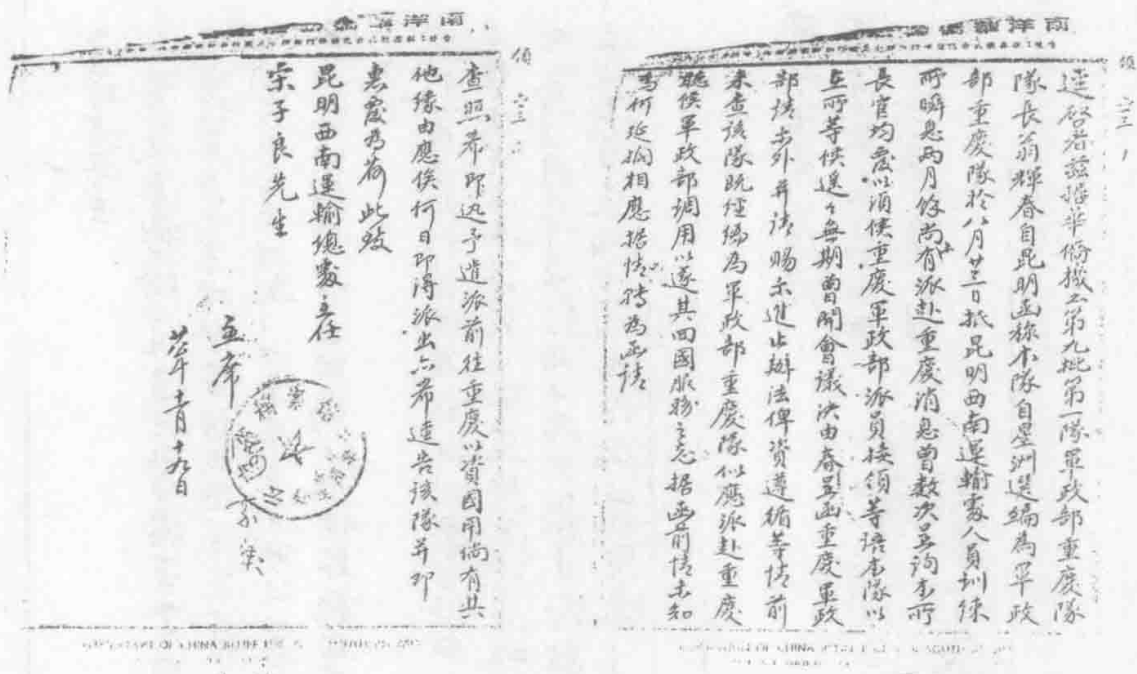
共年八月八日

陈嘉庚先生致宋子良函（1939年8月8日）

逕啟者此等單據部批募機工八十三名截至今
日尚未接獲署機工名單到一單是此其欠
類皆係陸續募但能召募款未款預定九
批返國機工（連自年政府所募在內）已於今
日（十四）乘豐慶輪首途由越北返越計五
百零九名除多靈慶輪外尚有約加二百
二名以此財部貿易委員會所託募要由
仰光入口此間需長途跋涉不便招接由安南
入口

無從往外詳集而尚未及愛國熱情可嘉
故特聲明請各僑胞踴躍參加查此等機工
除此輪有四百名外尚有約加二百二名
台察現此間對於徵募機工一事若國由
名機回越再來徵募從速此等機工一經募
定後即轉來美以上所有機工均須相立
備文函達
查照為荷此致
西南運輸總處主任
宋子良先生

陈嘉庚先生关于征募（九批）南侨机工经过情形函（1939年8月14日）



陈嘉庚先生为南侨机工重庆队请命函（1939年11月19日）



蒋中正关于檳榔嶼华侨机工事致西南运输处的训令（1939年11月27日）

貴事先生台鑒。接
 來教市及購買二噸卡車事。雖向此間英
 國洋行調查。名廢出。事。即。電。生
 中央行政院。請。主。為。復。同。意。而。後。方
 得。開。人。多。通。運。探。購。也。知。國
 務。院。及。此。奉。達。一。係。以。有。礙。實。情。息。當
 有。南。陳。也。此。請
 台。祺

何 嘉 庚 啓
 一九四〇年二月六日

南洋華僑籌賑委員會
 地址：新加坡大馬路門牌二二八號
 電話：二二八二

陈嘉庚致陈质平购车
 事函（1940年2月6日）

逕啓者。家。古。蘭。丹。居。籌。賑。會。前。海。關。國
 稅。之。江。北。崇。器。丁。費。五。元。賄。賂。等。未。由。出
 際。等。現。在。廣。西。河。地。駐。軍。輦。重。兵。汽
 車。三。四。八。連。服。務。目。下。天。氣。嚴。寒。想
 會。所。寄。機。之。室。衣。送。今。尚。未。發。到。等
 候。為。此。函。請。貴。會。迅。函。負。責。機。關。大
 速。為。查。以。免。延。誤。工。有。凍。死。之。虞。等
 情。據。此。查。機。工。奉。調。分。赴。各。地。服。務。向
 或。有。少。數。人。力。調。一。地。工。作。致。機。工。寒
 凍。通。過。查。勢。所。難。免。茲。據。該。會。函

陈嘉庚先生关心机工寒
 衣事致宋子良函（1940年2月
 9日）

前。情。相。知。特
 貴。處。迅。予
 查。照。以。理。無。致。以。誤
 此。致
 西。南。運。輸。處
 主任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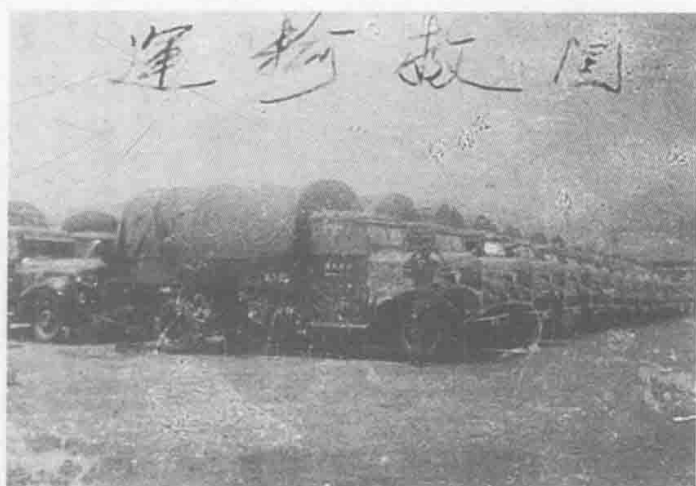
主。席 何 嘉 庚
 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

電代郵快會員委事軍府政民國		電代郵快會員委事軍府政民國	
字 號	共 字	字 號	共 字
由 編		由 編	
十 五 五 四 號		十 五 五 四 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發		發	

蒋介石令西南运输处注意华侨机工动态电（1941年3月21日）



在河内组装的大卡
车（19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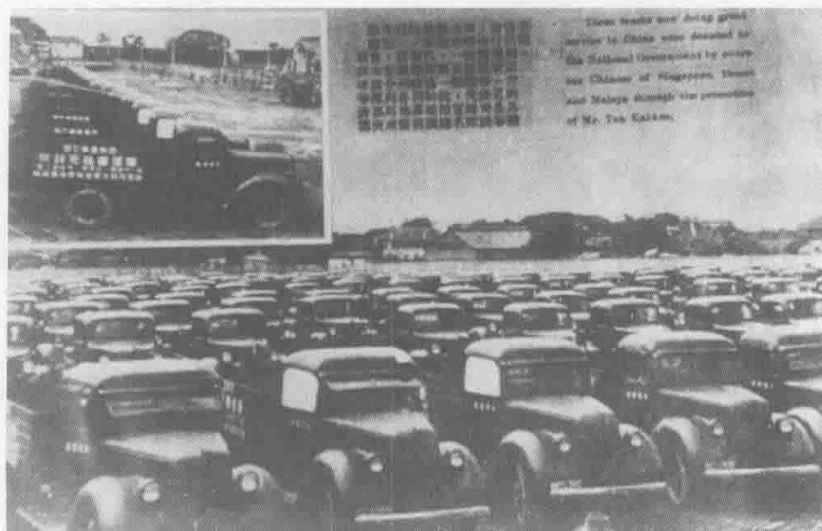


运输救国.



南侨机工车队在滇缅公路上（1939年）

“华侨运输先锋大队”
的车是由英属马来亚婆罗洲
华侨捐赠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处处长李克农代表八
路军、新四军在办事
处北郊驻地接受侨胞
捐献的救护车和锦
旗。

南侨机工
苏凤舞（中间
带墨镜高个子
者）与其战友





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国内

即将起运的拖车，车旁
站立者为南侨机工林春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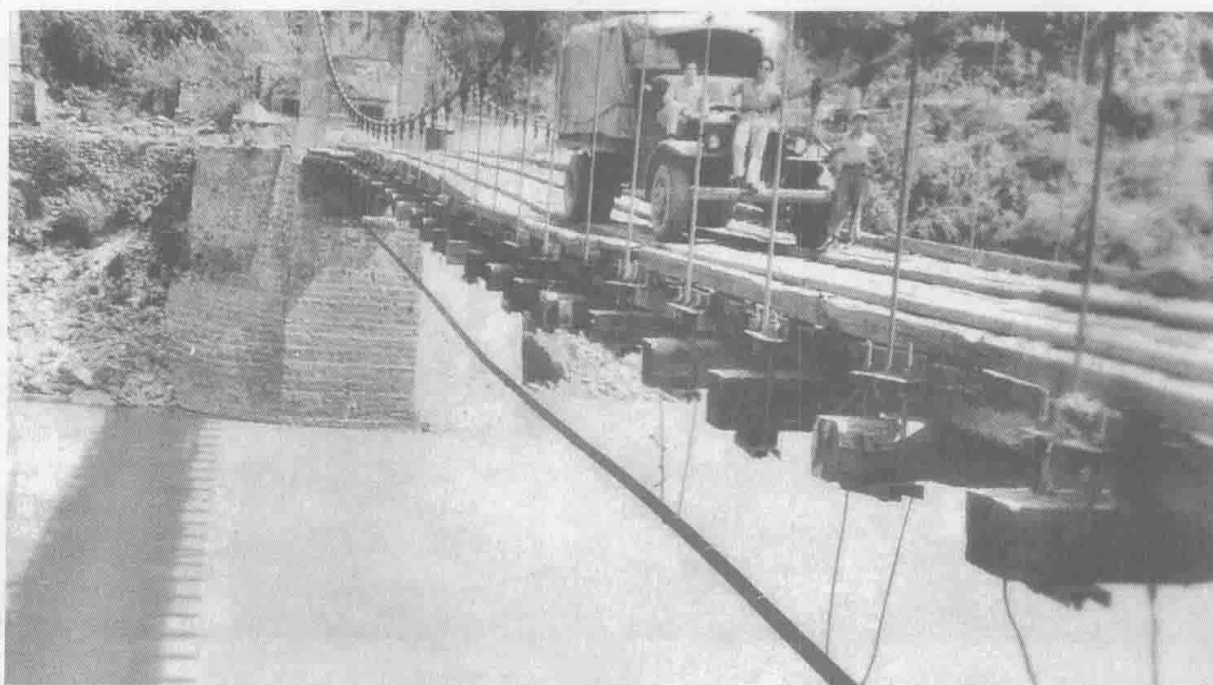


华侨义勇总队第二大隊全体出发留影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苏岛中华机工回国服务团合影（1940年）

机工驾驶的木炭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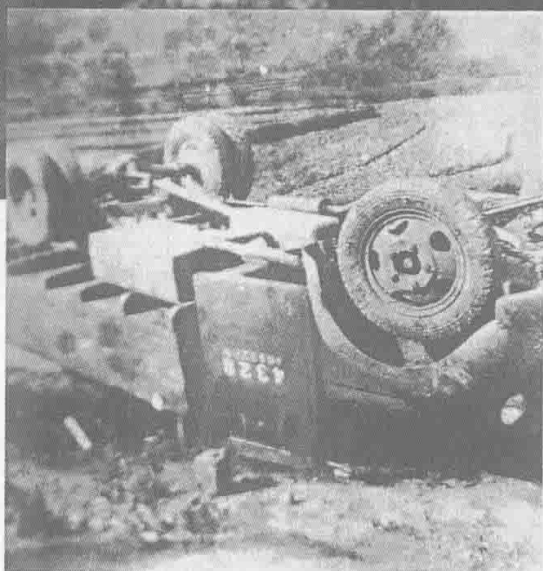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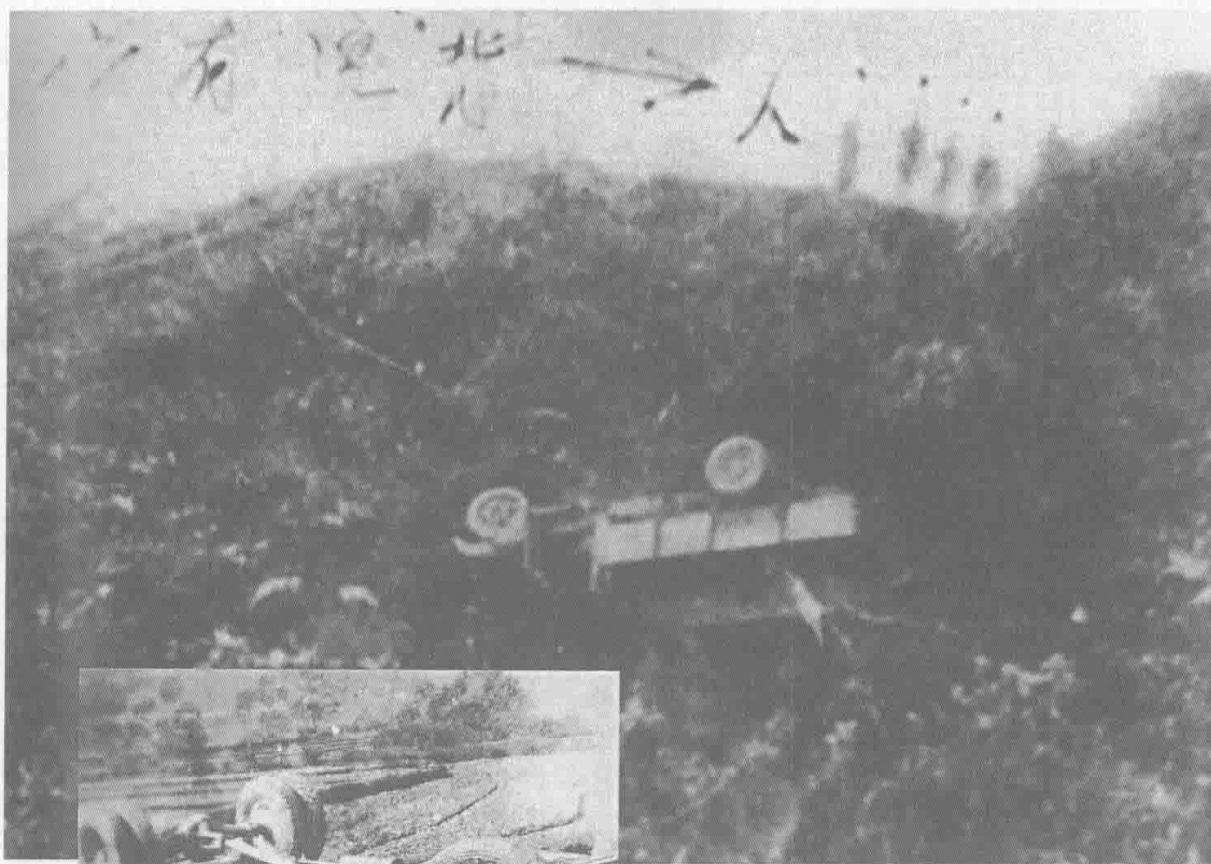


机工的运输车过惠通桥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图为滇缅公路有关单位赠送南侨慰劳团的湘绣“松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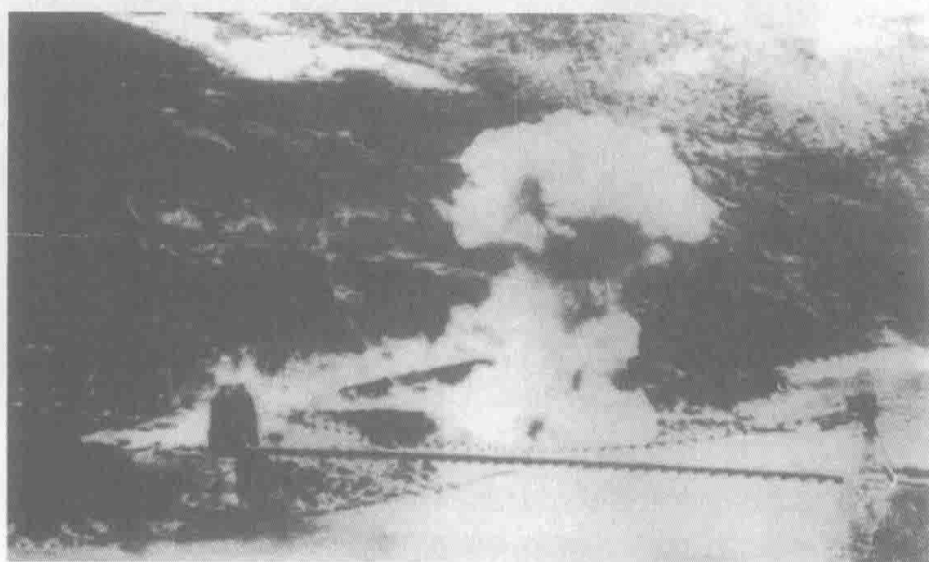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图为滇缅公路有关单位赠送南侨慰劳团的湘绣“虎啸图”



山高路险，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翻车事故

1940年10月28
日至1941年2月27
日，日军出动大批
飞机先后16次轰炸
惠通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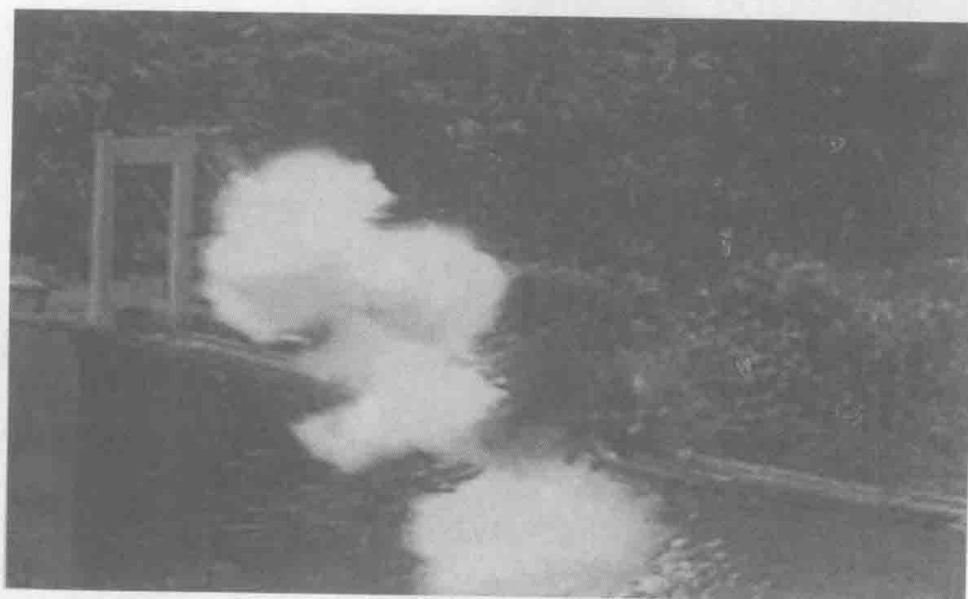


本年四月至十一月份華僑工駕車肇禍表

公報

姓名	車號	隊別	月日	地點	肇禍原因	損壞部位	人員死傷	其資損失	損失折	損失額	損失種類	備	考
黃清成	4086	11大20中	1 22	楚雄	方向盤失控致發	司機室前燈			4400	11 01	2	漢陽	
李珍榮	2210	11大20中	1 31	龍溪路	下坡時剎車致發	，電氣	司機室前燈		110 30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黃志強	4296	11大20中	1 31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機件損壞			1413	32 17	3	漢陽	
許官慶	4405	12大20中	6 19	龍溪路	天路路邊致發	車身			2177	14 80	2	漢陽	
吳武成	4492	12大20中	6 19	龍溪路	天路路邊致發	車身			2896	14 48	2	漢陽	
李儒	4238	11大20中	6 21	龍溪路	上山時排氣管熄火致發	車輛全毀	司機室前燈		85500			漢陽	
李順安	4400	11大20中	6 21	龍溪路	天路路邊致發	車輛全毀	司機室前燈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戴志夫	4261	11大20中	6 21	龍溪路	急轉致發	油箱損壞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黃澤生	4112	12大20中	8 7	龍溪路	下坡時剎車致發	水箱			410	4 10	1	漢陽	
叶亞味	4269	11大20中	8 27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機件損壞			10019	40 61	1	漢陽	
陳有光	4270	12大20中	8 26	龍溪路	下坡時剎車致發	水箱損壞						漢陽	
曹騰光	7003	12大20中	8 11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10800	89 62	9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龍學光	7229	11大20中	8 21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洪德芬	4734	12大20中	8 21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漢陽	
吳水晶	4471	12大20中	9 6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19000	76 00	8	漢陽	
羅明偉	4604	12大20中	9 27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11160	45 50	1	漢陽	
余亞水	7024	12大20中	9 12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16019	102 52	10	漢陽	
黃禮由	4612	12大20中	9 21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周祥	4162	12大20中	9 7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鄭心英	4429	12大20中	10 4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1000	1	1	漢陽	此車工牌非其所有
許崇安	4251	11大20中	10 22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8710	21 57	2	漢陽	
林海松	7212	12大20中	10 14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漢陽	
鄭登壽	7031	12大20中	11 12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漢陽	
鄭光前	7210	12大20中	11 19	龍溪路	不慎撞石上	水箱損壞						漢陽	

華僑機工駕駛車輛肇禍表（1939年4月7日）



1942年5月5日，侵華日軍逼近怒江西岸。在千鈞一發之際，我國守橋工兵用事前準備好的炸藥炸毀惠通橋，阻敵于怒江西岸，“一分鐘改寫了歷史”。

本處車隊華僑員工因公殞命姓名一覽表

姓 名	隊 別	職 別	亡故地	亡故日期	亡故原因	附 記
李 珍 榮	第八運輸隊	司機	湖南辰縣	28-5-31	覆車(2310)	就地埋葬
李 儒	十一大隊一中隊	"	雲南永平	28-6-25	" (2338)	"
吳金禹	一大隊一補隊	"	雲南保山	28-7-6	" (3938)	"
洪金山	四大隊四補隊	班 長	貴州貴定	28-9-29	車覆(4684)	葬貴定
湯 磐	十一大隊四中队	小隊長	廣西大連城	28-10-17	敵機轟炸	就地埋葬
車 健	"	"	"	"	"	"
符 義 簪	十一大隊二補隊	"	下關永平間	28-11-9	車覆	詳情及車號尚未換報
洪金猷	"	司機	"	"	覆車	"
梁登財	五大隊五補隊	"	雲南永平	28-11-12	隨7034子車翻車受傷致死	葬永平
鄭光前	十一大隊四中队	"	"	28-11-20	覆車(7350)	葬下關馬道地
共 計			10 人			

本處車隊華僑員工病故姓名一覽表

姓 名	隊 別	職 別	亡故地	亡故日期	亡故原因	附 記
劉 滿	十一大隊二中队	司機	通 放	28-5-10	病 故	葬通放
林 榮 長	十一大隊	機械軍士	保 山	28-6-13	斷烟身故	就地埋葬
胡 先	十二大隊	"	昆 明	28-6-24	病 故	"
吳再春	十一大隊二補隊	司機	龍 陵	28-7-17	"	葬龍陵
黃錦洲	"	"	"	28-7-19	"	"
陳春香	一大隊	機械軍士	芒 市	28-8-15	"	就地埋葬
黃 培	十三大隊	"	通 放	28-8-26	"	葬通放
蘇用球	十一大隊四中队	司機	永 平	28-9-5	積勞病故	葬永平
雷永成	"	"	下 關	28-11-6	病 故	葬下關

公路運輸組 28-1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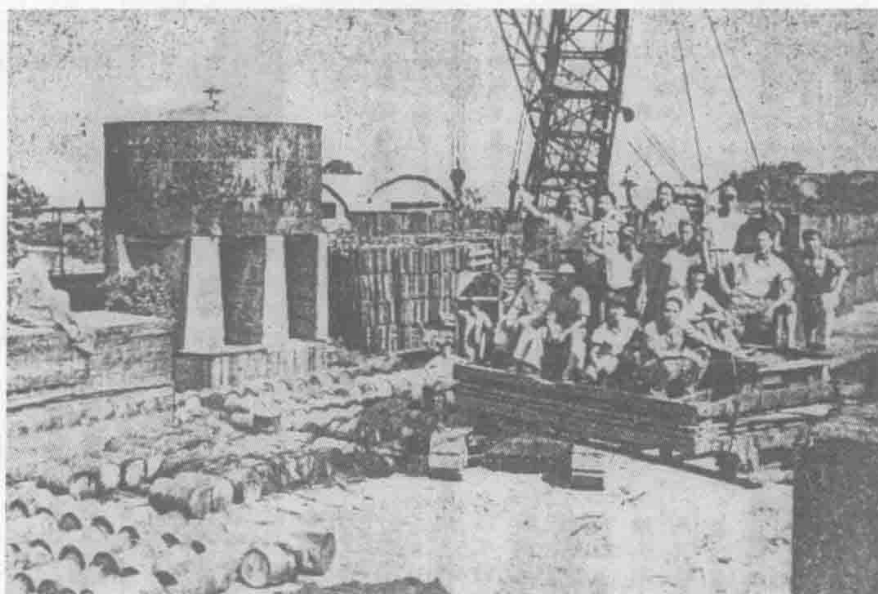
僑工因公殞命及病故姓名一覽表 (1939年11月30日)

惠通桥炸断之后，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陷入困境，图为部分南侨机工到收容所的情形



机工们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图为机工在吃饭的情形

南侨机工在印度起卸物资情形（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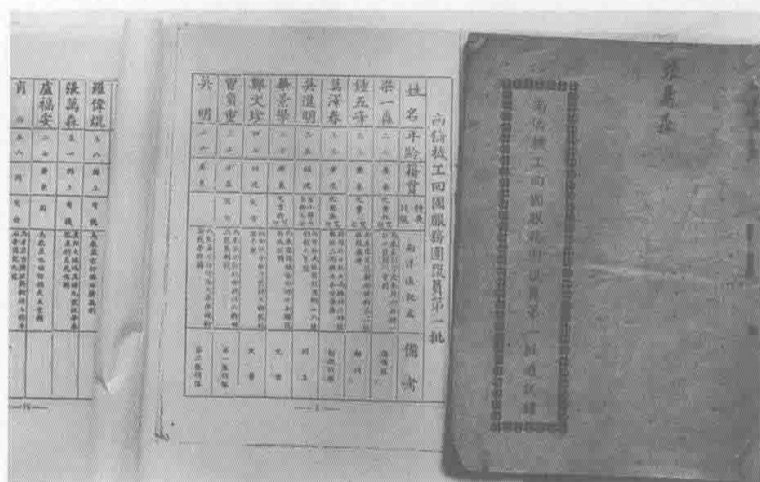




1946年5月16日，机工程龙庆等13人致函陈嘉庚先生请求敦促国民政府协助机工返回南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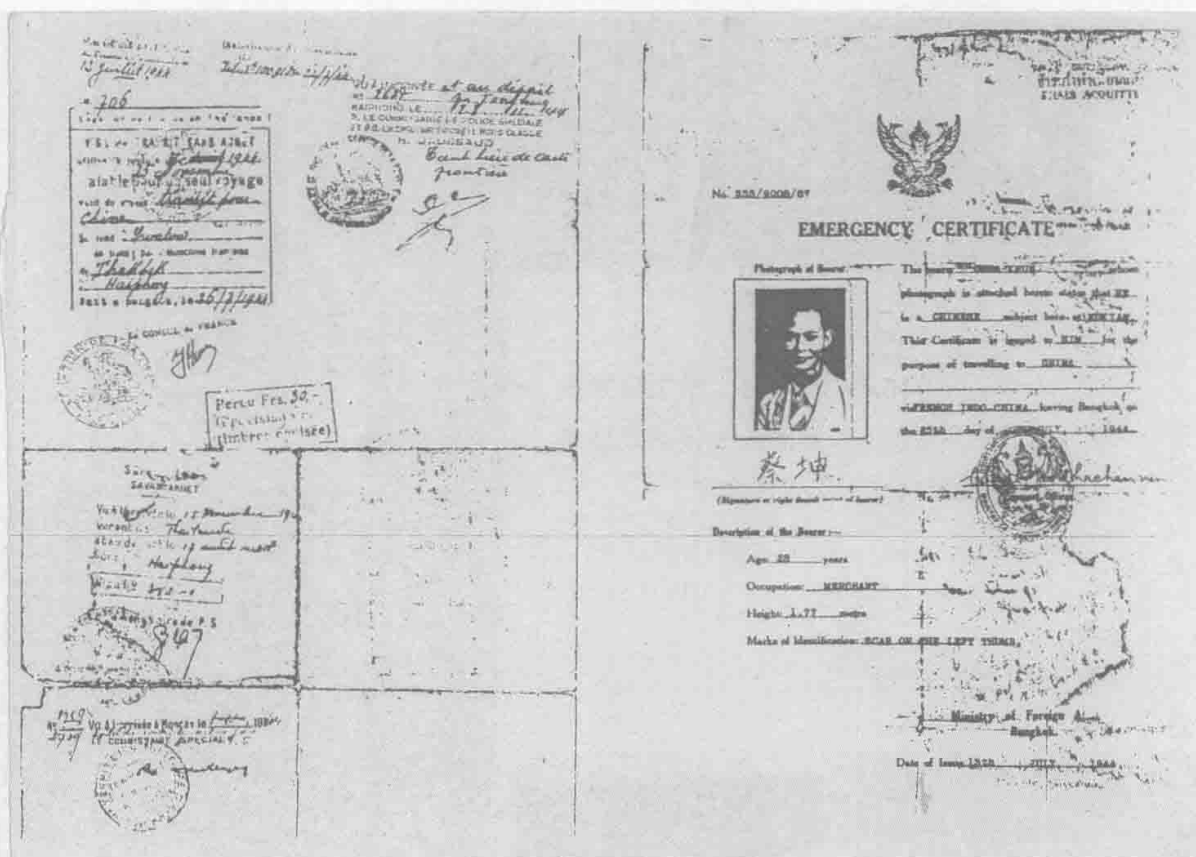


张光旺（又名张万森）珍藏的第一批南侨机工复员通讯录



复员回到侨居国的马来亚怡保机工





南侨机工蔡汉良受盟军总部派遣，化名蔡坤，潜入泰国侦察日军基地情报。图为当时的证件（19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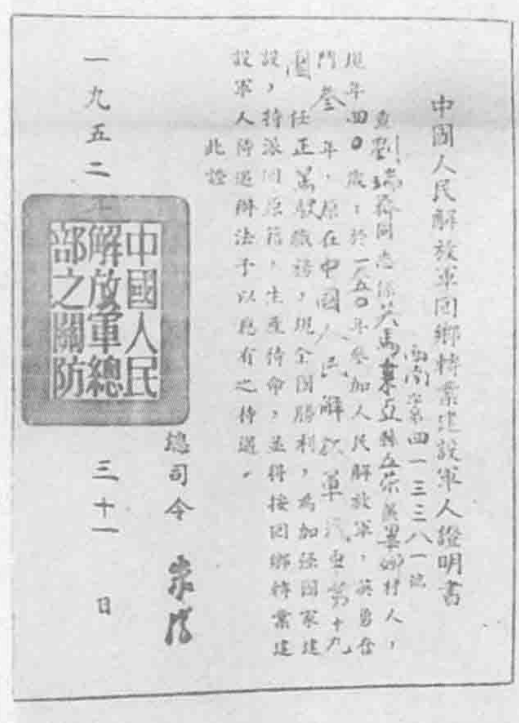
侨务委员会发给的奖状（1946年4月）



蔡汉良珍藏的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证明（1949年4月）



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1939年），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1946年）



刘瑞齐珍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证明书”（1952年）



安溪籍南侨机工白雪娇回国参战



“华侨先锋大队”机工李飒与傣族姑娘刘学义的《结婚证书》（1941年2月15日）



李飒证件

欢送连文瀛先生回国服务（前排右二、后来曾任华侨先锋大队副大队长）



华侨先锋大队长刘贝锦（永春籍麻埠华侨）（19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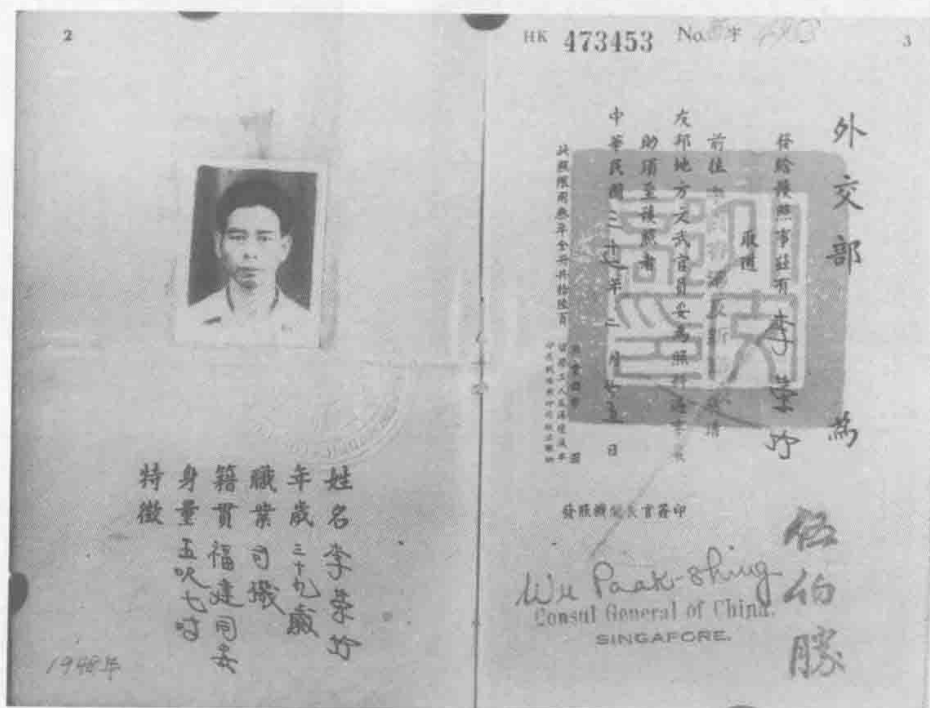
郑天赐回国参战时留影，1939年



檳城“萍羽球队”欢送南侨机工庄霖助（前排中）回国服务（1939年7月）



庄霖助（后排右1）与南侨机工战友合影，19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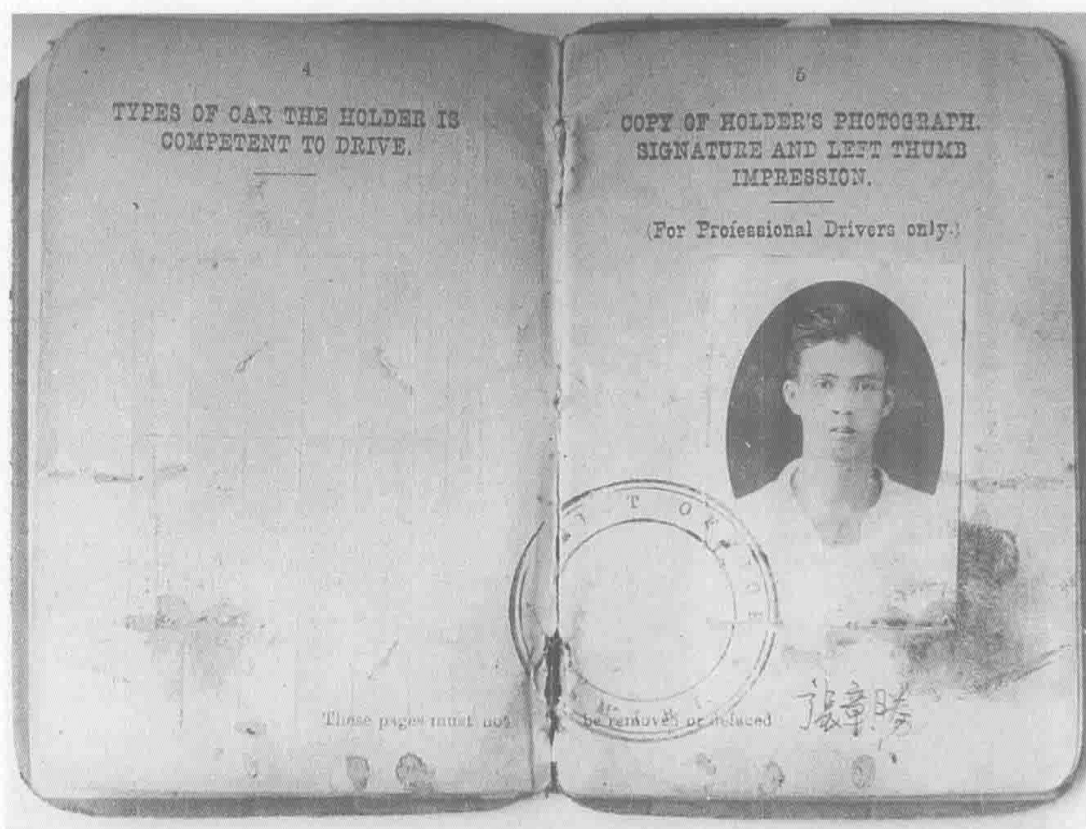
余汉洲奖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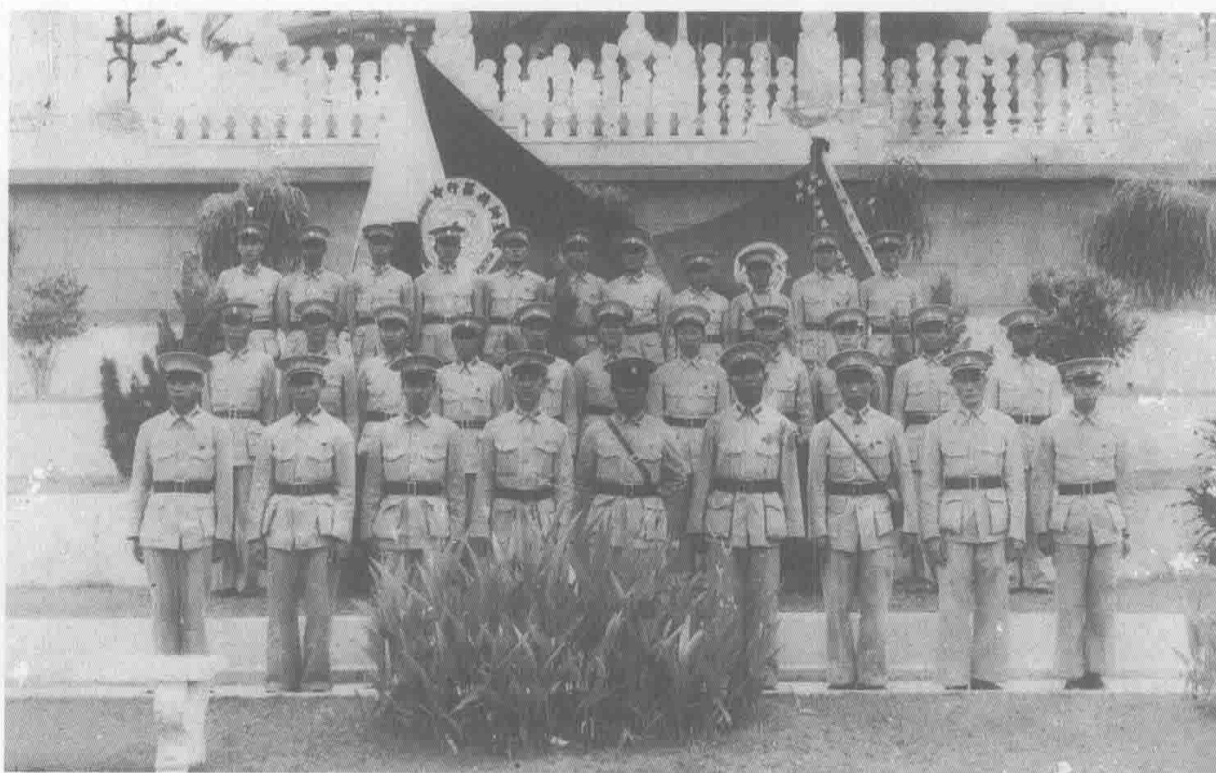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战胜利
复员返马留影。图为余汉洲
(194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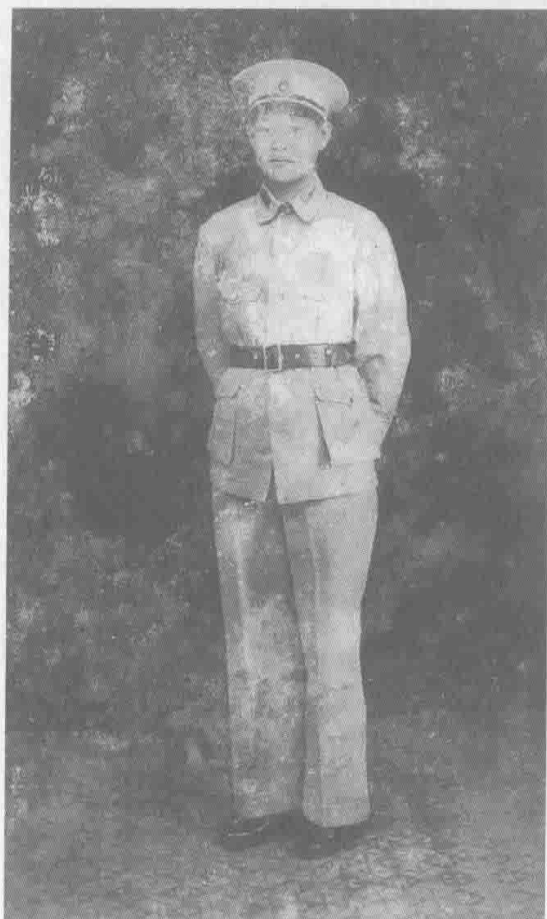
余汉洲证件



张章胜（留居诏安）珍藏的南侨机工证件（1939年6月）



当代花木兰——李月美（第二排左六）参加槟城机器行回国服务机工回国参战（1939年2月）



女扮男装的南侨机工李月美（1939年）



南侨机工李月美保存的证券



抗战胜利后，李月美（左1）与弟弟李锦容（后排右2，第八批回国机工）一起复员南返与家人团聚，（1946年）



李月美与孩子们



1939年，张光旺（右1）告别母亲，回国参战



张光旺保存的证书



广西南侨机工殷华生返马探亲时，在檳城华侨机工纪念碑前留影（1992年）

《南洋商报》刊载南侨机工洪华民的海外亲人启事（1984.8.3）

南洋商報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日

中國福建省洪華民 通過甲中華總商會 尋找海外親人下落



〔馬六甲二日訊〕福建省，同安縣，新厝公社東源村洪華民（現年六十三歲）函託馬六甲中華總商會代查其叔父洪水洪，胞兄洪德勝，弟兄洪金叔下落。

洪華民早年居住馬六甲荷蘭街洪紀盛興號，一九三九年回中國參加抗日救國隊，現任四川省宜賓市長途汽車站服務。生活很好，兒孫滿堂。不過一直惦念着海外親人。他希望中華總商會能服務精神，為他進行調查，使他可以同供數十年的親人重新勾通聯系，完遂宿願。

中國福建省洪華民
式款尋海外親人下落

馬六甲同安會館啟 仁人君子能知洪君家八個
況否，請即電告中華總商會，電話：二二三九〇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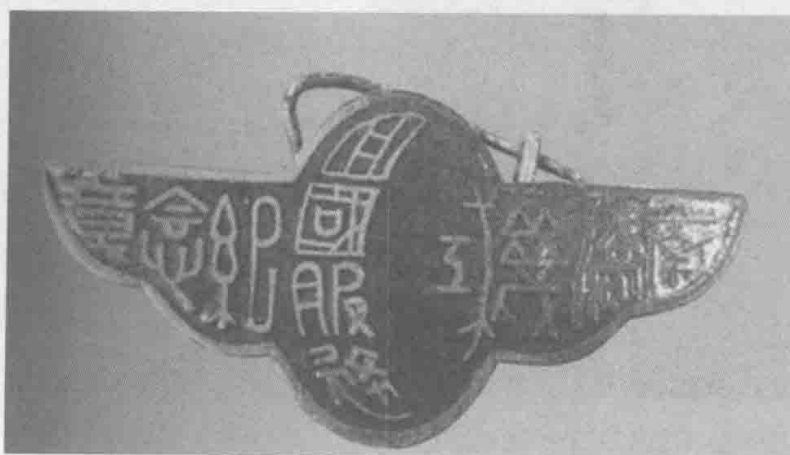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荣誉纪念章



星洲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章



南侨机工在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毕业纪念章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纪念章



南侨机工陈寿全（下）、邱松意合影



陈寿全的华侨互助会会员证



陈寿全（左）和李敏在滇缅边境

運啓者華僑青年許志光君熱心國家此次毅然犧牲原有職業回國服務司機工作幫助國家殊多欽佩現伊母及其妻子擬不日送返原籍安居所有沿途經過祖國關隘碼頭一切行李行李手續務希

軍政長官予以特別優待實為至盼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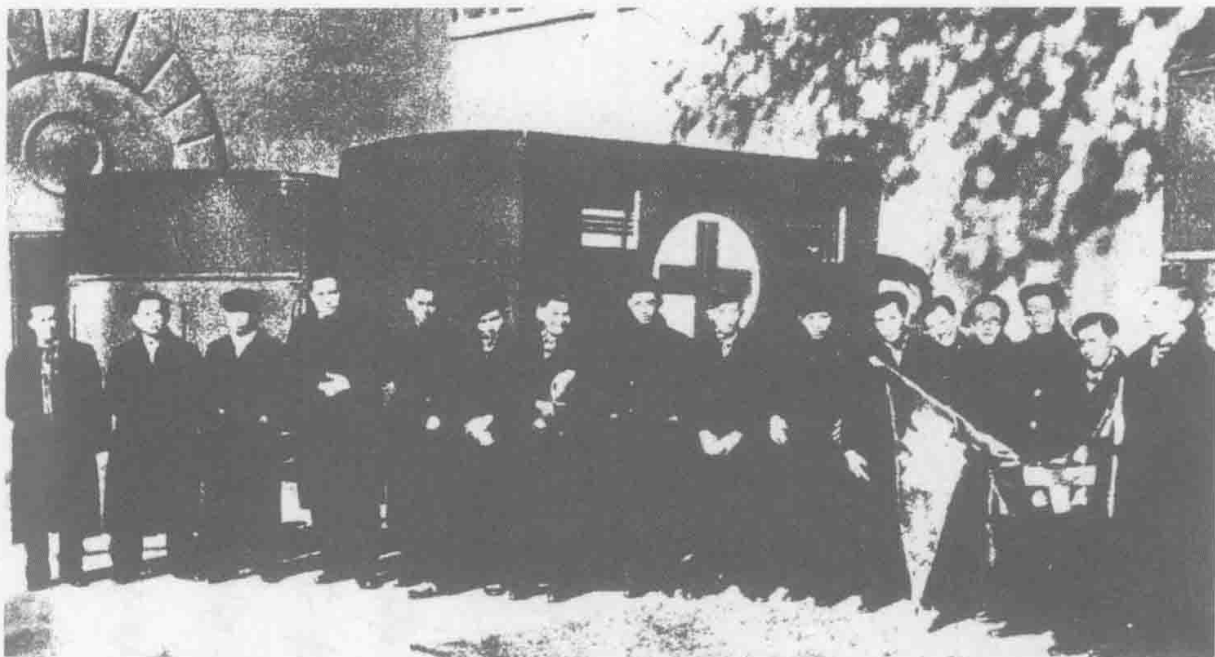


陳嘉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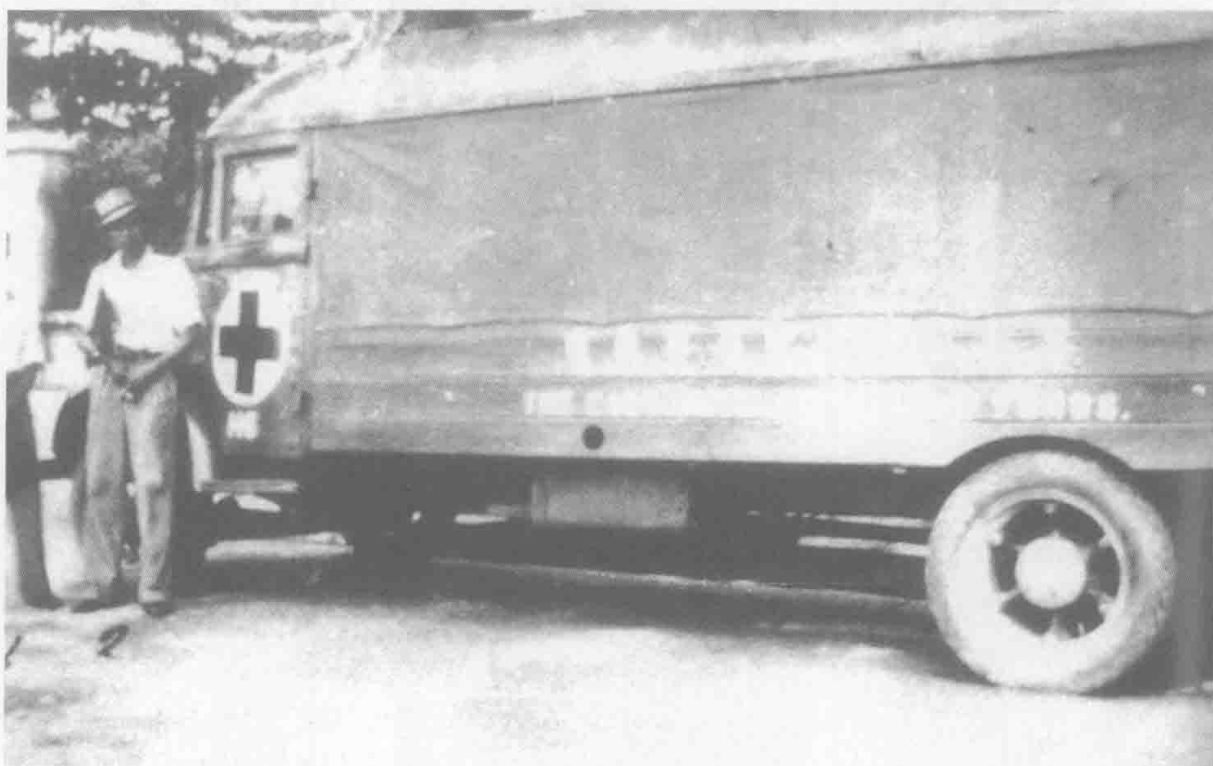
共年三月十三日

南洋華僑救災恤鄰會
新加坡大馬路巴里門牌四十三號電話七二八二
GENERAL COMMITTEE, CHINA RELIEF FUND OF THE SOUTH-SEA ISLANDS, 41, RAFFLES PLACE, SINGAPORE.
The Chinese Relief Fund, Singapore, 1939.

陈嘉庚先生介绍南侨机工许志光回国服务的信函，1939年3月13日



与南侨机工并肩战斗的“荷属华侨救护队”（1939年）



东爪哇华侨救护队捐赠的救护车。车旁站立者为机工李伟庆



谢川周保存的奖状



幸存的南侨机工在纪念碑前合影，左起：邓文聪、黎家明、杨保华、沈茂山、王亚六、张子霖（1989年7月7日）



南侨机工翁家贵



南侨机工龙庆



翁家贵珍藏的奖状（1941年）

留居昆明的
南侨机工汤耀
荣的机工证件
(1939年)

馬來亞檳榔嶼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大會發給



姓名	湯耀榮
年齡	24
籍貫	廣東南海
履歷	司機
技術經驗	司機
回國日期	廿八年九月八日
備註	

證書第 12 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月 日 給

湯耀榮 證件影印

第二十八頁

Handwritten form with a small photo of a couple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handwriting, but includes field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a date at the bottom: 中華民國卅五年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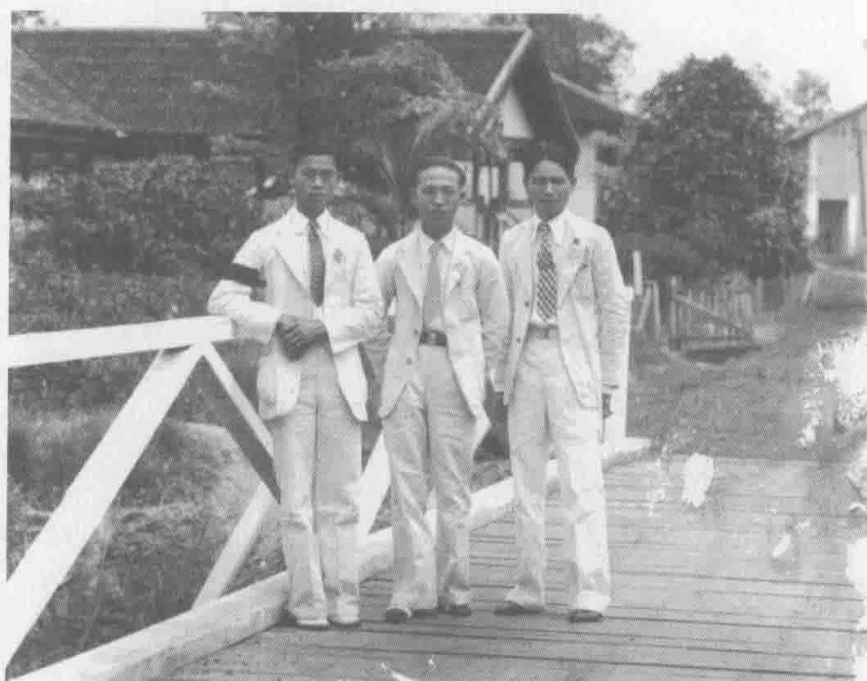
南侨机工林福来珍
藏的证件

本书作者林少川
(后排右2)在中缅甸
门晚町桥上采访南侨
机工林福来(前排右
2)和刘传授(后排右
3), 1987年





媒体报道张智源回国参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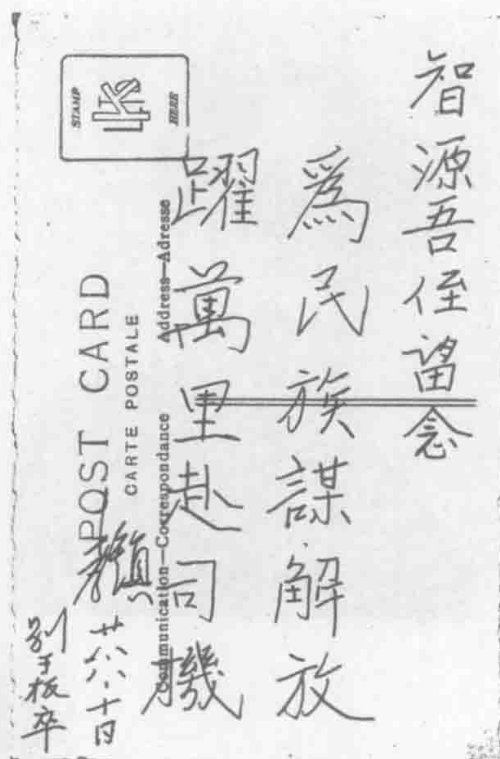


孝镇送别



张智源（右1）与
南侨机工战友合影

亲友给张智源的送别赠言



張智源 證件影印

第七冊

张智源的证件



南侨机工廖平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昆字第肆陸號

此證免費發給

姓名	廖平	年	二	月	四	歲
籍貫	廣東惠陽	職業	軍界政訓員			
原僑居地	英屬婆羅洲砂朥越					
在滬居地	民國八年十一月至十八年六月					
何時回國	民國廿六年六月					
回國原因	參加救國工作					
特來是否仍赴海外	仍赴					
回國住址	現在雲南文山縣軍部二四局陸軍					

第七批回国机工
总领队廖平的证件

華僑登記證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姓名 黃禮歸

字號 167577

1 姓名 Name: 黃禮歸

2 性別 Sex: 男

3 年齡 Age: 28

4 籍貫 Native Province: 廣東

5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廣東

6 現居地 Present Residence: 雲南

7 職業 Profession: 機工

8 僑居地 Establishment: 雲南

9 何時入境 Date of Arrival: 民國廿六年

10 配偶 Name of Wife or Husband: 黃氏

11 子女 Names of Children & Their Sex: 無

12 日期 Date: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第七批回国南侨机工黄
礼归的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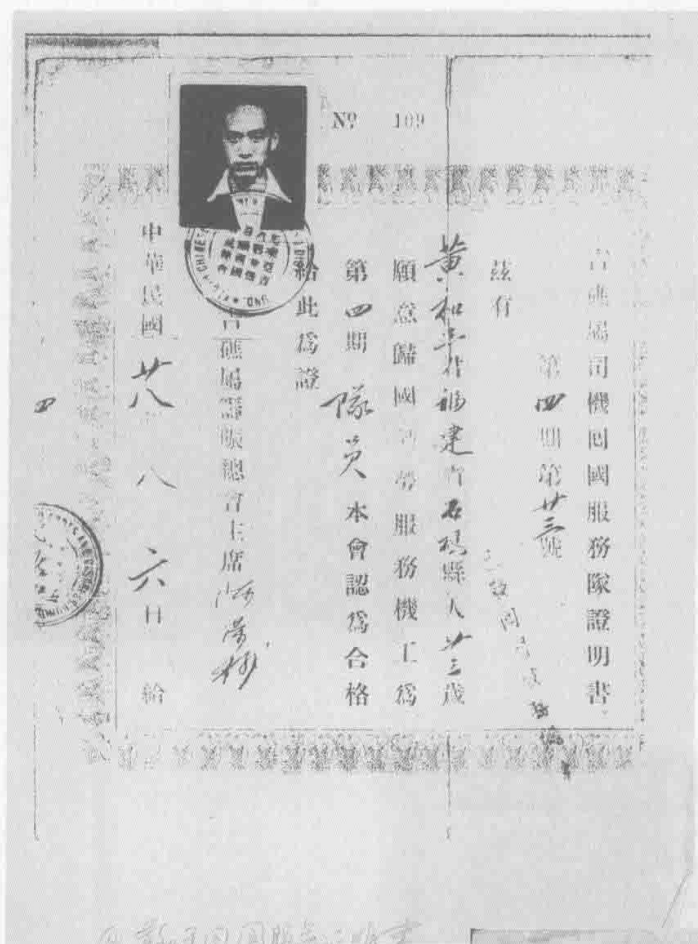
南侨机工朱松胜



内政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发给张天赐训练及格证书

南侨机工李亚留证件





留居漳州的南侨机工黄和平珍藏的吉礁属司机回国服务证明书（1939年8月6日）



留居雅安的南侨机工陈福安珍藏的司机员返国执照（1939年3月3日）

777

已制卡
清办

南僑籌賑總會機工回國服務團復員總登記表

總字第 號

姓名	鄧作寧	籍貫	廣東東莞	年齡	33	批數	8
回國日期	28年7月13日	原僑居地	檳城				
家庭狀況	周氏	擬往何處					
學歷	小學畢業						
經歷	西南十二大隊十二補元隊 川滇東路第一大隊三中队						
南洋地址	檳城牛車水街439號			現在通訊處	貴州畢節威西路三十號		
詳細地址				失業或就業	就業		
備考	1. 家庭狀況欄係指國內家庭填寫時務希詳細。 2. 相片欄如有家庭者須連同家屬合影。 3. 填寫字樣務求清楚總字號不必填寫。 4. 如有其他意見函五助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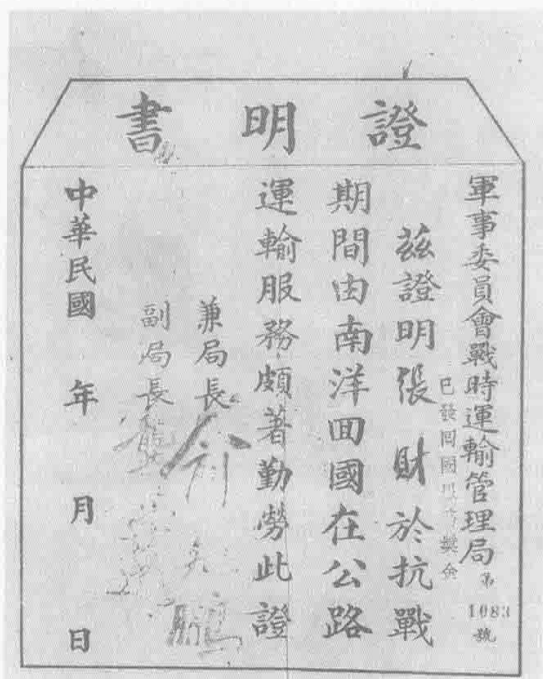
102

中華民國卅五年 2 月 7 日

南侨机工邓作宁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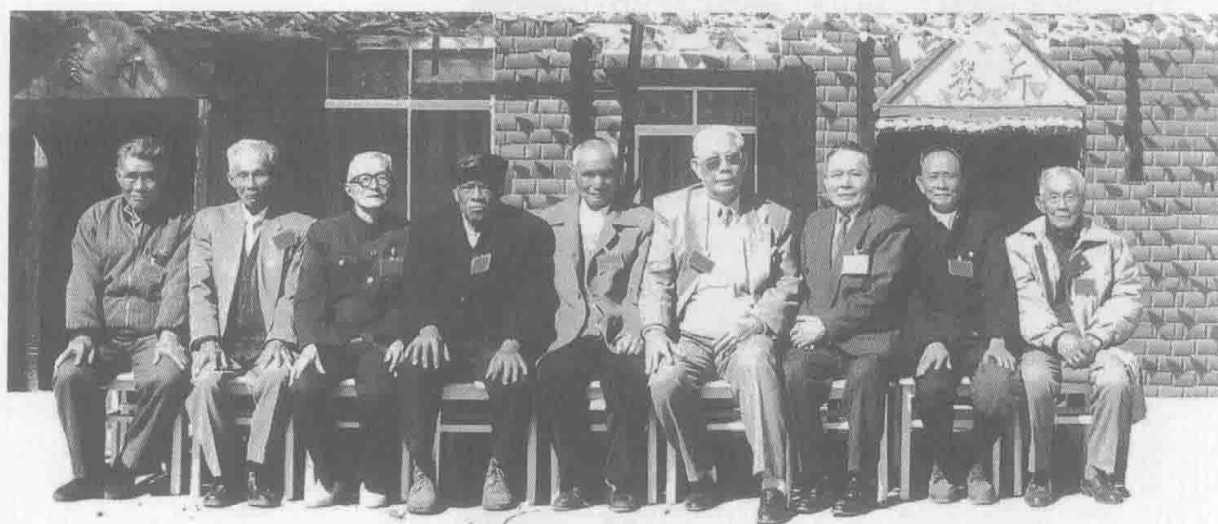


南侨机工廖榮耀珍藏的回國護照及僑務委員會獎狀



军事委员会临时运输管理局发给机工的证书说明

南侨机工黄守琛复员之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签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1951年）



1999年，在昆的部分南侨机工合影，从左至右：李大勋、符树丰、罗开瑚、张家发、王亚六、杨保华、翁家贵、林英保、邓伍浩。



建于1946年7月7日的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抗战殉难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1947年11月30日的马来西亚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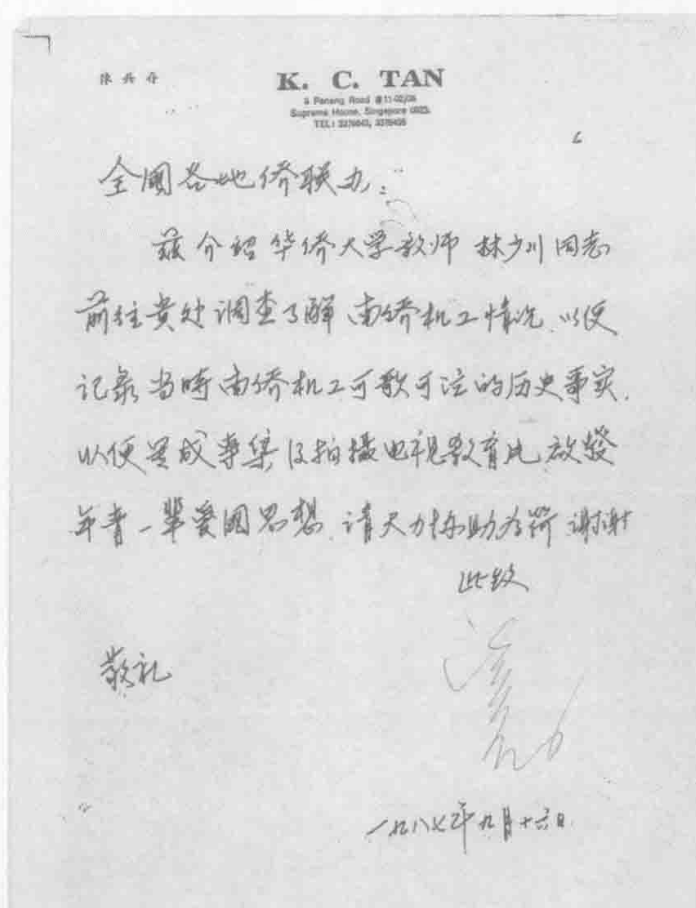
记载着赤子功勋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巍然屹立在昆明西山公园。该碑于1989年7月7日建成揭幕



2005年8月竣工的云南畹町南侨机工纪念碑



建于2013年1月海南海口市滨海公园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雕塑



陈共存先生为本书作者采访南侨机工致全国各地侨联办的介绍信



陈共存向本书作者讲述南侨机工历史



南侨机工油画

緬懷華僑抗戰英烈
共筑民族復興之夢

乙未年荷月於北京 林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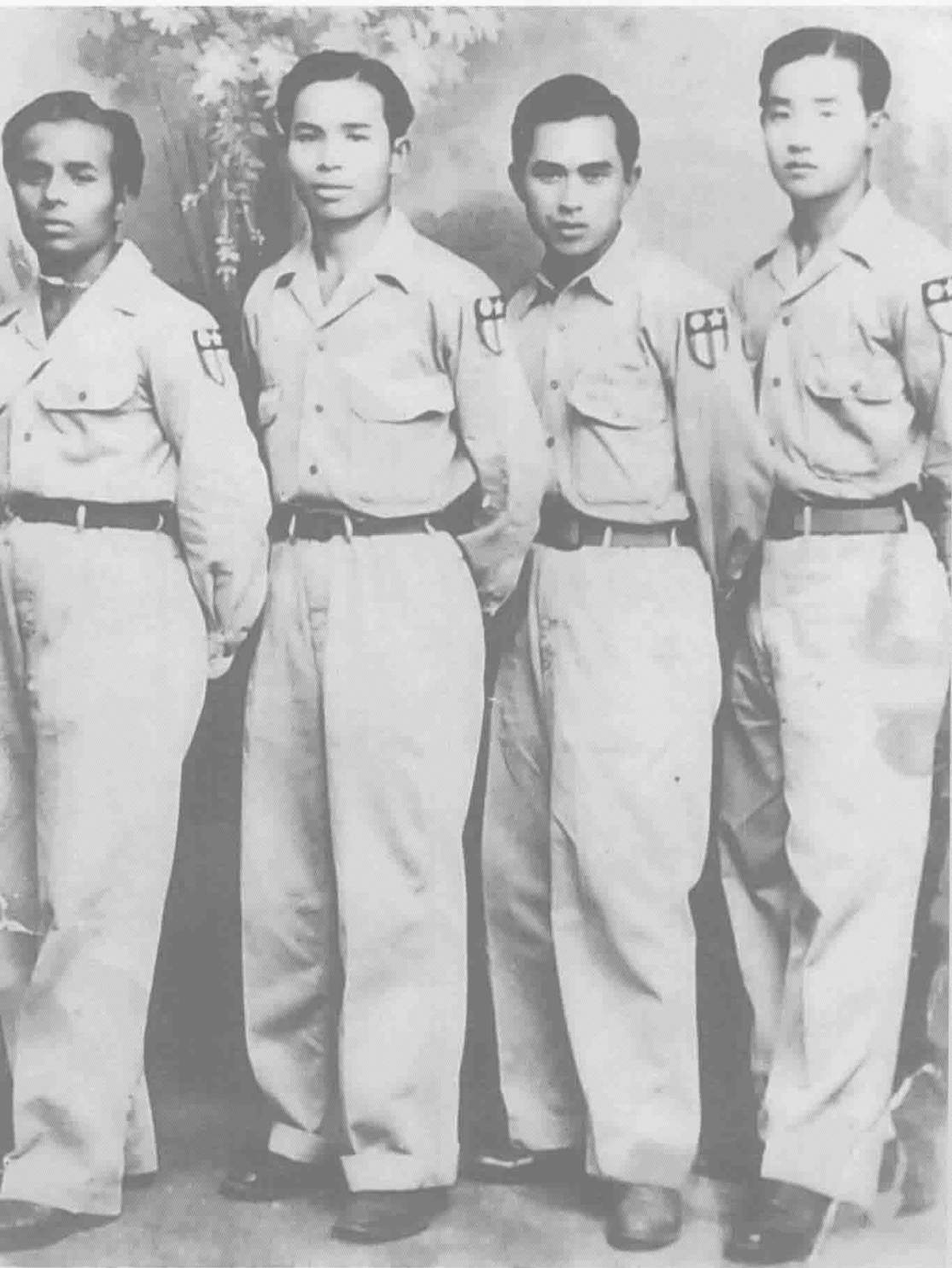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委員，中國僑聯主席林軍先生題詞



梁披云先生题词

第一部分

南侨机工采访录



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

——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

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关头，有众多的海外赤子自愿抛弃侨居地安稳舒适的生活，毅然回国参战。现居住在泉州的泰国南侨机工蔡汉良，便是其中的一员。

番客生涯

蔡汉良，原籍福建南安。民国初年，南安山区土匪出没，民不聊生。汉良5岁时曾被土匪绑票，其父倾家荡产花了450元银圆才将他赎回，结果背了一身债，无力偿还，日子难熬。在汉良7岁时，父亲便服毒自杀了。由于家贫上不了学，他刚8岁就得帮人放牛，尝尽了艰辛。幸亏闽南一带是著名侨乡，有海外关系，不少人在家乡活不下去就出洋“过番”，蔡汉良的家族也是这样。他父亲有兄弟9个，就有8人到泰国谋生，其中八叔蔡铁民，靠经营锡矿渐渐发迹，后来在乃佛及弄宜拥有“吉兴”、“吉利”、“泉南”、“铁民”四个矿务公司，自己铺筑铁路运输产品，还开办酒厂、火礮厂、大戏院、百货公司等。到抗战前夕，蔡铁民已跻身南安县大富侨之列。

1928年，蔡汉良10岁了，五伯父蔡兴普从南洋回家探亲，便将他带到泰国读书，上午学华文，下午学泰文，读了6年，小学毕业后便在叔父蔡铁民的吉兴矿务公司开火车及修火车。当时他的生活费用全由叔父供给，因此月薪50元便可全部寄回家赡养母亲。在1934年~1937年的四年间，月月如此。

可是，正当他家日子开始好转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民族灾难降临了。当时，南洋广大侨胞虽然安居海外，心中却时刻惦念着祖国和家乡，大家每天最关心的是抗战新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

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七·七”以来华侨社会最普遍的口号和行动。蔡汉良在泰国弄宣，也参加当地华侨商会组织的“人民抗日军青年宣传队”，经常上街卖花筹赈，抵制日货，还积极投入当地筹赈分会的活动，并将月薪捐出10%，直至回国参战为止。

报名回国

1939年，由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批熟练机工，经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总会登报招募，极大地激发起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在新加坡，报名参加南侨机工的青年非常踊跃，有的机工已经“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在泰国，华侨热血青年也跃跃欲试，大家不愿当亡国奴，急着回国抗战。蔡汉良觉得自己符合条件，既是熟练司机又是机修工，更应发挥特长回国效劳，于是下决心报名回国。

可是，考虑到家庭大概不会同意，该怎么办呢？十多年来，叔父的养育之恩，蔡汉良铭记在心，现在要说服叔父让他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觉得不好开口。但他爱国心切，且血气方刚，干脆就来个先斩后奏，便偷偷地由弄宣乘车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去报名。在董里什呈，竟遇到一段小小的插曲，差一点被留下而被改变命运。原来，在报名时，偶然被叔父的一位老朋友王联辉（惠安籍）看到。王是个开店的侨商，一向对蔡诸多关照，并且早就有意将其读中学之女许配给蔡，因此当得知蔡要回国抗日时，便设法挽留，于是好意地让他选择几条路：1.让蔡留下与其女成亲；2.若暂时不结婚也不勉强，可租一间店铺让蔡独立开店，做收购橡胶的生意；3.若是喜欢开车，可将其16部汽车让蔡挑选，自己去经营一个客运公司。尽管上述几点都是合情合理和可行的，然而，强烈的爱国热情使蔡汉良认识到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于是婉言谢绝了叔父的这位老友的一番美意，铁下一条心：报名回国！

与蔡汉良同时报名的有30多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走不了。经过一番周折，才由当地筹赈分会的一个负责人自费带领他们一行人到槟城，加入第九批回国机工队伍。在离泰前夕（1939年8月8日），蔡汉良才给家中伯父、婶婶（叔父铁民已于1938年病逝了）及王联辉各留下一封告别信。三

人接到信后不约而同地追到槟城。婶婶（是泰国人）对蔡说：“今天是特意来追你回去的，你若不回，今后就永不相认了！”王联辉随后也赶到槟城，见挽留不住了，便在“天天酒家”设宴为其饯行。后来，当伯父托着拐杖匆匆赶来时，船已离开槟城了（这是1944年蔡回泰侦察日军基地时，一个堂兄告诉他的）。

当他们由高头廊乘车到达槟城时，受到在槟城留学的泰国华侨学生的热烈欢迎，并合影留念。现仍珍藏着这张近半世纪前的照片。蔡汉良一行7人分别为：前排左四钟炎祥、左五蔡汉良、左七邝天祥（后改为邝振声）、左八钟道清、左九蔡高耿、左十陈潮海、左十五蔡惠文。除蔡汉良与陈潮海为闽籍外，均为粤籍。

1939年8月12日，他们由槟城启程，到达新加坡又受到隆重的欢迎，14日开始由新加坡搭“丰庆号”轮船出发，17日到安南（即越南）西贡，20日改乘火车，尽管车厢内闷热难受，但大家都有一股爱国热情，心情是舒畅的，一路高唱着激昂的抗日歌曲，终于在8月23日到达昆明。

滇缅路上

第九批的华侨机工一到昆明，先被西南运输处安排在潘家湾进行短期军训，因战事吃紧，很快被分配到各个运输大队，蔡汉良被分配在第15大队45中队。1939年10月，南宁战役危急，他与南安同乡洪本霖同被抽调编入第十六兵站，赶到南宁投入前线运输。经过激战，南宁不幸于11月24日失守，他们随即又投入昆仑关战役。其时白天战火激烈，只得改在夜间出发运输，每夜赶开三趟直至天亮。不久昆仑关亦沦陷，只得退入武鸣，又被包围了三天三夜，幸而援军打开了一条血路，他们才退入柳州。后又转移到安南境内的高平。西南运输处在安南设有分处，在安南的最初几个月内，他们突击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回国。后来，由于日寇占领安南（1940年），他们在安南整个特别大队的车全部被封，百多人全被集中在安南的“南生旅社”，然后分三批返回昆明，他属第二批回来的。

当滇缅公路被封三个月重新开放后，蔡汉良被编入第二大队，行驶在这条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线上。

闻名中外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由昆明直达缅甸腊戍，沿途要翻越高山（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穿过大河（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行程七八天，特别是需经一段原始森林中的“烟瘴之地”，毒蚊袭人，疟疾时有发生，再加上日机常来盘旋轰炸，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可是广大华侨机工，自甘吃苦，苦中有乐，有的人还风趣地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整天奔驰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对祖国河山大加赞美，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蔡汉良在滇缅公路期间的经历，值得一提的大致有这么几件：

一、被推为机工代表，两次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特地到滇缅公路慰问华侨机工。当时，蔡汉良被保山第二大队“华侨互助会”推选为三位代表之一，两次见到了陈嘉庚先生，并用闽南语当面汇报了华侨机工的情况。第一次是汇报“南侨总会”发给华侨机工的物品被贪污之事。因当时陈先生曾组织“南侨总会”向每个华侨机工赠送九件物品（包括蚊账、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奎宁等）。可是竟被一些贪官污吏加以克扣，到华侨机工手上有的只剩两三件，有的甚至连一件也没有，为此他据实向“南侨慰劳团”反映情况。第二次是向陈嘉庚先生汇报华侨机工与第五军冲突之事。起因是由于第五军严重危害群众利益，见鸡抓见菜摘，还到市场随便压价买猪肉，致使当地群众叫苦连天，这引起华侨机工的愤慨不平，于是仗义执言，与之发生争吵。可是第五军自称他们横行七八省，从无人敢管，在滇缅公路竟被这群“番仔兵”（华侨机工）来教训？于是，双方打起群架。经陈嘉庚先生的调解，此事得以平息。

二、接送远征军，参加入缅作战的运输

日寇偷袭珍珠港之后，分兵进犯东南亚，并直指缅甸。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失利，远东又兵力薄弱，因而希望中国出兵共同防御滇缅公路。于是，根据中英协定，中国组织远征军入缅。在第五军、第六军出兵进缅作战期间，蔡汉良担任分队长，直接运送兵员、军火及其他补给品进缅。可惜远征军入缅过迟，处境被动，指挥不协调，战事不利，致使一部分退入印度，一部分溃退回国。后来情况更加危急，当日军攻至滇缅线的要冲惠通桥时，1942年5月5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兼局长俞飞鹏不得不下令自炸惠通桥，将日军切断在怒江西岸，而华侨机工队也有不少被截在那边，仅蔡汉

良这一中队，就有6辆车不能回来。这些机工大都遇难，仅剩一个潮州籍华侨机工奇迹般地逃回来。原来那些人被俘后被派去当杂役，他有一次在杀牛时被差出来挑水，第一担水先挑回去，而挑第二担时就趁机跳入江里，从惠通桥边泅水过江归队。

三、“五·四保山惨案”历险

在5月5日炸断惠通桥的前一天，蔡汉良还亲身经历了“五·四保山惨案”。那天上午，他的好友钟少伟（粤籍华侨机工）特地邀请蔡一块上街赶墟，因为钟妻刚生一女孩才三天，准备买鸡做“月子”。而蔡汉良刚好有任务，需去领车队的蓄电池，于是与钟少伟分手，不料竟成永别。当天中午12时，日寇飞机突然来炸保山，蔡汉良与另一老华侨机工邱建和（此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从驾驶室下来，就近疏散到田岸沟里，幸而脱险，而在赶墟的钟少伟却被炸死了。这一天，正逢举行“五·四运动”纪念集会，学生、难民与无辜百姓被炸死数千人。蔡汉良他们将华侨机工车队疏散到大理之后，又奉命回来掩埋死难者。其时成千上万腐尸遍野，臭气熏天，惨绝人寰。这是他有生以来目睹的最大惨剧，直至今日，犹有余悲。

四、滇缅公路切断后，华侨机工竟被草率裁减，放任自流衣食无着

1942年5月，滇缅公路在发挥了三年多“抗战输血管”的巨大作用之后，终于被日寇切断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当局竟草率地将华侨机工裁掉了事。其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南洋沦陷，海外侨汇断绝，许多华侨机工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甚至沦为乞丐。当年冬天，就有十多位老弱华侨机工，贫病交加冻死在昆明。蔡汉良的一个同乡侯合意，走投无路，也只好当乞丐。与蔡汉良同一批从泰国回来的邝天祥，失业后只好蜷缩在小西门防空洞里过夜。汉良本人在车队疏散时还代理副中队长，可是几个月后在石塘山“整训班”时，也被裁掉，失业三个多月。后经友人介绍到西南运输公司开客车，走下关至昆明这一线。当时汽油奇缺，只好开“木炭车”，林新李（华侨机工）还当过蔡的助手。

后来，还有一部分华侨机工，被盟军总部昆明分部选调去进行特种训练，潜往东南亚日军占区做侦察工作，蔡汉良便是其中的一个。

出国侦察

蔡汉良原先侨居泰国，熟悉当地情况，经选调并进行一番严格训练之后，于1944年5月被盟军总部派往泰国，任务是侦察日寇在泰的拉温军事基地。他先乘专机到南宁，再步行由东兴进入安南，经芒街、海防、河内等地，然后经老挝湄公河到达沙湾拿吉，雇小船渡到泰国边境穆达汉，在那里办理入泰手续。其时有个华裔官员对他严加盘问，并用泰语表示怀疑，好在另一泰官员却认定蔡是个乡下佬，说他不懂礼貌，进门不懂脱鞋脱帽，也不会鞠躬，后来终于办理手续让他入境。

当他从乌汶乘火车赴曼谷时，车上就有特务前来盘问，被他巧妙周旋应付过去。来到曼谷，他先在过去熟悉的耀华力大街歇脚，当夜便住进“大华百货商店”楼上的“东亚旅社”。第二天，当蔡在街上行走时，忽然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衣角，示意进小店喝咖啡，他便警觉地跟进去。奇怪的是那人留下自己的“大白笠”，而顺手将蔡相同的一顶“大白笠”戴走了。蔡觉得这里必有奥妙，随即溜至僻静处取下大笠仔细看看，里面果然有一张字条，内容是提醒注意该旅社有三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登记处的，一个卖眼镜的，一个是按摩师。蔡判断此人大概是奉派暗中对他进行保护的，于是随即设法离开旅社。

当蔡汉良辗转来到离侦察目标——拉温基地还有93英里处的春蓬时，这里开车出入的全是日本人，每五公里便设一个检查站，难以进入。他只得暂时到附近一个堂兄那里再想办法（此时，堂兄才告诉他，他回国之时伯父曾追至槟城而船却开走了的情况）。在堂兄家中待了一个月，一个难得的机会终于来了。原来，有个曾在叔父厂里做工的泰国侨生郑阿隆，时下正给日本人当杂货采购员，蔡通过他介绍进拉温当杂役。蔡汉良与郑阿隆一起乘日本人的卡车进入了拉温，并在一家日本人开的菜馆找到一份杂役差事。在这家菜馆工作，消息灵通，可以趁机了解基地的有关情报。原来这个军事基地是设在一片原始森林里的，武器弹药一堆堆垒成三四层楼高，并用篷布遮好，日军驻在地道里，几千名被抓来的华工及土著在修筑工事。蔡汉良还混进禁区与民工聊天，边走边用脚步测量并故意对一个民工说：“我们在这里做工，又是军事基地，飞机一来，那可无处跑了。”可是那人却说：“你可能

初来不知，没啥可怕，这里及对面山上都有高射炮，飞机一来，高射炮就会响起来。”交谈当中，问者有心，答者无意，便探听了不少情况。经过几次侦察，他利用日文旧报纸绘制成秘密图纸，然后准备离开。可是进来不易出亦难，他只好对老板说在此被蚊子咬得受不了，要回家拿蚊帐及衣服。老板便派一人跟踪并交待要“快去快回”。那人是槟城土生华人，跟踪蔡一天一夜才被甩掉。那夜他们同住进春蓬一家旅店，次日清晨4点，蔡刚起来，那人马上追问：“天未亮干什么？”蔡连忙说昨夜着凉拉肚子，并故意从箱子里取手纸上厕，还留下箱子迷惑他，然后从后门溜出来，立刻雇了三轮车赶至火车站，买了一张抵万伦的长途车票，而实际上只乘两个小站就下了车，以躲过那家伙的追踪。

他回国途中，又经历了种种风险。在途经安南海防时，适逢滇越铁路的桥梁被盟军派机轰炸，日寇因此进行大搜捕，见生人先抓起来再说。蔡在一家海南华侨开设的“大同旅社”也被捕了。幸亏他懂得海南语，冒认是该店老板的同乡，经老板的尽力营救，终于获释。

可是刚离开“大同旅社”，第二天在海防轮渡码头又遇上了麻烦。这里日本宪兵搜身很严格，蔡汉良便将写有情报的日文报纸当作废纸包裹着皮鞋置之箱底。日兵开箱一看是臭皮鞋，便顺手扔出老远。待搜身之后，他才匆匆捡起报纸包住皮鞋，顺利地过了关。

当抵达安南芒街与我国东兴交界的国境线时，他却被边防军检查站扣留了，被送到东兴镇公所。经他说明后，镇长马上给他松绑并向他作了解释。此时，正值南宁第三次失守，归途再也无法乘飞机了，钱又花光了，只好暂时困在东兴一段时间，并向总部发电求援。不久，总部汇来安南币一千元，寄在芒街办事处。东兴镇公所派人掩护，蔡汉良到芒街办事处从一位五条杠的法国军官手中领了款。过后，又有几位派出侦察的华侨机工回来，蔡也帮他们通过这条途径领了款，然后七八人结伴步行回国，先穿过大山，再步行十六天到广西百色，然后经贵阳回到昆明，这时已是1945年5月了。

蔡汉良将出国侦察所得向盟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经过核实之后，盟军总部从昆明和印度调了大批轰炸机，将拉温基地的军火仓库、火车站、电台、高炮阵地、停港战舰全部摧毁，大火燃烧达六七天之久。轰炸前后，均拍有照片证实。总部特地让他看两张照片：一张是炸前拉温基地全景，另一张则是炸后整个基地变成一片浓烟火海的景象。

出国侦察任务完成之后，总部又派他去印度当空降兵，但因病未能去成，便留在战时运输局开车，直至抗战胜利。

胜利复员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这些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终于亲眼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给蔡汉良一张奖状，内容是“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蔡汉良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日”。此外，他还荣获两枚珍贵的南侨机工纪念章，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赠的，号码是1457号；另一枚是云南各界欢送大会赠的“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号码为266号。在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华侨对抗战的历史贡献，蔡汉良特将这些珍藏了40多年的荣誉证书、纪念章等宝贵实物及照片捐赠给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展览，引起了海内外参观者的关注。

在抗战结束之初，华侨机工纷纷要求复员，可是由于政府当局的拖延，致使他们迟迟未能返南洋与亲人团聚。后经陈嘉庚先生多次出面交涉，并亲自为机工复员之事致信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终于使华侨机工在1946年获得复员南返。复员时，每位华侨机工发给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蔡汉良这批复员时的领队是白清泉，行程由昆明经香港回南洋。沿途受到热烈的欢送，情景十分动人。这时，因接到母亲的急电，蔡汉良便从香港转厦门回到南安老家，从此定居国内。

战后沧桑

战后，蔡汉良复员回到原籍，在泉州“泉安汽车公司”当驾驶员，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工会活动，接受分配护车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即被派为新工会骨干，参加接管工会工作。接着，他又奉派随军加入支前运输，由南

安向同安、厦门推进，并参加大、小嶝岛及金门战役，到停攻金门才调回泉州，编入“泉州支前运输大队”。其后，1953年参加东山岛战役，1955年转入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在祖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安居乐业，继续为祖国贡献力量。蔡汉良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工作，技术精益求精，坚持节约用油，做好“四勤”保养，保障安全行车，超额完成任务，在运输生产上创造了许多好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生产能手”，很多奖状被保存至今。

可是，“文革”期间，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光荣经历，却被歪曲为“历史污点”。蔡汉良参加南侨机工到西南运输处，是国共合作时期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支援抗战军事运输的，却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别是他曾受盟军总部的派遣往泰国侦察日军基地，是国际反法西斯的特殊战斗，却又被打成“国际特务”，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热爱祖国赤子之心，从不动摇。

粉碎“四人帮”之后，蔡汉良恢复了名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1986年，国家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的退休金待遇；1989年，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之际，云南人民政府特在昆明建立一座“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1985年初稿，1989年二稿）

新婚别，别离为救国

——记永春南侨机工刘瑞齐

刘瑞齐的新婚别，是南侨机工可歌可泣英雄事迹中鲜为人知的真实而生动的例子之一。

刘瑞齐，1914年出生于闽南侨乡永春东郊留安塔下留安村。据传说，该村虽小，但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五代清源节度使、晋江王留从效，南宋连任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宰相的留正，都是该族显要人物。后来为避政迫害，不得不改“留”为“刘”（据族谱记载，宋末元初被迫改“卯田留”为“卯金刘”）。该村村民出洋“过番”的历史亦悠久，谱载明永乐年间，该村族人刘孟福即随郑和下西洋，后卒于印尼苏门答腊。刘瑞齐生于民国初年兵荒马乱时代，3岁丧母，12岁又失去了父亲，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幸亏堂兄从南洋回乡探亲，便将他带往马来亚谋生。

刘瑞齐起初在大山芭割橡胶，后来在一家永春籍华侨商店当学徒。由于为人敦厚，刻苦耐劳，渐渐赢得店主的信任，让他学开汽车，为店里运载橡胶及各种货物。有一回，街邻失火，殃及该店，刘瑞齐不计个人安危冲进火海，冒死抢救出一箱箱货物和账簿，保住了店里的财产，而他却被无情的火焰烧得遍体鳞伤而入院医治。为此，店主颜先生深感其德，将次女许配给他，并拨出部分业产（包括商店一间、卡车一辆以及橡胶树一千棵等）由他独立经营。

1939年春，报上传来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抗日的消息，南洋各地血气方刚的青年都踊跃报名。刘瑞齐也有一颗爱国的心，他被星马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决心报名参加。可是此时，他已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

小家庭，温柔贤慧的妻子当然舍不得让新郎奔赴烽火连天的战场，岳父的四间商店也正需要他继续帮助经营。怎么办呢？刘瑞齐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认为“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下决心瞒着家人，“先斩后奏”！

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刘瑞齐不在本埠报名，而是悄悄开车到另一埠头芙蓉筹赈分会报了名，待体检、驾驶考核以及一切手续办好之后，于启程回国之前夜才回家。按照要求，他与机工同伴集体理了光头，顺便在街上买了顶毡帽带上。当他跨进家门时，新婚妻子见从不戴帽的丈夫突然带上个毡帽，上前好奇地掀开，顿时露出一颗闪亮的“和尚光头”引得岳父母以及小姨子们的哄堂大笑。岳母关切地探问原因，他只好临时撒了个谎，说是因治疗头疼，让番仔医生敷药时剃掉的。但细心的妻子似乎从他神秘的举动中猜出了什么，当夜悄悄地问他：“莫非你想回国？”为了明天能够顺利启程，此时他仍不敢以实相告。半夜里，刘瑞齐起身把自己的手表、结婚金戒指和一些贵重东西连同写给妻子的告别信凑成一包，放进妻子的大衣柜里，只取走一套衣服，把钥匙放在梳妆桌上，默默地离开了温暖的家。此时此刻，妻子仍然在温馨的睡梦中。不想，这场“新婚别”，竟成了他与妻子的终生别离！

偕刘瑞齐同行的还有永春籍的林广怀（领队）、颜世国等人，他们由芙蓉埠出发，前往新加坡，被集中编入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陈嘉庚先生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机工，用闽南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大家回国后应好好拼搏，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第八批机工队伍三百多人回国后，先集中在昆明进行军训，经考试合格便陆续分配到滇缅公路沿线服务。刘瑞齐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44中队，开赴广西前线。队部驻扎在镇南关附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到安南将汽油等军用物资运回南宁，同时，从国内运出桐油、猪鬃等物资去安南。

1939年11月底，南宁失守，刘瑞齐随车队退入安南高平，编入特别运输大队，日夜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军用物资，在海防至广西靖西、东兰、河池一带穿梭行进。日寇占领海防之后，特别大队撤回昆明。经过重新整编，西南运输处集中力量投入滇缅公路抢运，刘瑞齐被调到“华侨先锋大队”。

在滇缅公路抢运期间，岳父从海外给齐瑞齐来信说，自从他不辞而别回国以来，其妻日夜思念，忧郁成疾，终于病倒在床。老岳父急切盼望他能有

一个机会南返团聚，无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可立即汇来。读着海外来信，刘瑞齐流泪了，预感妻子将发生不幸，但为了民族大义，他只好擦干了泪水，在回信中写道：“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

接下来，太平洋战争很快爆发了，日寇疯狂南进，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刘瑞齐奉命运送远征军入缅，经历了一段最艰难的战斗岁月。

后来刘瑞齐才得知：妻子病危时，老岳父关掉商店特意回国寻找他，因遇太平洋战争爆发，回不了南洋，便辗转回到老家永春，滞留至战后才重返马来亚，可是其妻早已病逝了。

(1985年)

别具一格的《结婚证书》

——“华侨先锋大队”机工李飒与
傣族姑娘刘学义的“结婚证书”

这是一张南侨机工李飒与傣族姑娘刘学义的“结婚证书”。它见证了海外赤子与云南少数民族姑娘神奇般的爱情故事，也是南侨机工李飒回国参战的纪念。

这张“结婚证书”颇具特色，它既有龙凤呈祥的图案，展示了百年好合的祝福；又有爱神丘比特红箭，象征千里姻缘一线牵，可谓中国古老传统与西方神奇传说相结合，真是“中西合璧”，别具一格！

结婚证书

民国□□年十二月初二日生，福建安溪县人

民国□□年四月初四日生，云南省龙陵县人

今由刘攸齐陈东山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 日
上午十二时，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举行婚礼
恭请

连文瀛先生证婚。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

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乐炽。

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结婚人 李 飒 刘学义

证明人 连文瀛

介绍人 刘攸齐 陈东山

主婚人 李清倩 刘仁书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五日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婚书”标明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举行”，时间为1941年2月15日，即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畅通期间，使这张“结婚证书”更成为不可多得的华侨抗战历史见证。

“华侨先锋大队”，是由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于1940年组建的一支军事运输车队，全大队200多辆各式车辆全部由海外华侨捐赠，200多名成员，从大队长至驾驶兵，清一色由海外侨胞组成。大队长为麻埠华侨机工刘贝锦（永春籍），该“华侨先锋大队”是“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朝气蓬勃的一支抗日队伍，被誉为“抗战建国运输战线上的神行太保”。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滇缅公路畅通期间，每日平均输入军事物资不下300吨。“婚书”上的证婚人连文瀛，就是“华侨先锋大队”的大队副，系莆田籍新加坡第四批回国机工；介绍人刘攸齐、陈东山，亦均为南侨机工。

新郎李飒，又名李石飒（李屑），是马来亚吉隆坡热情奔放的侨生，原籍福建安溪龙涓乡。1939年，他呼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毅然抛弃海外舒适安稳的生活，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团，回国服务，分配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当驾驶兵，每天满载着抗日军火穿梭在滇缅公路的下关（常刮大风）、祥云（有美丽的茶花）、苍山（终年积雪）、洱海（明月逗人爱）之间，被南侨机工戏称为“风、花、雪、月”之境。而新娘刘学义，则是云南龙陵县的傣族姑娘。正是由于抗战期间在滇缅公路上的奇特遭遇，使万里之外归来的海外赤子与傣族姑娘在烽火弥漫的战斗空隙中喜结良缘。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前夕，笔者来到泉州汽车运输总站采访了年逾古稀的李飒、刘学义老夫妇。据他们的追忆及退休在泉州的几位古稀老华侨机工的补充介绍，举行婚礼的那天，数百名南侨机工战友欢聚一堂，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里，大家举杯痛饮，载歌载舞，把婚礼办得喜气洋溢、热火朝天。

抗战胜利之后，李飒复员回到家乡安溪，并参加了当地地下党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50年代中期转业至福建省汽车运输总站工作，直至1975年光荣离休。如今，李飒、刘学义夫妇正在泉州安度幸福的晚年。

(1989年)

难忘的经历

——记炸断惠通桥目击者、南侨机工郑天赐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于1942年4月由缅甸入侵云南，沿滇缅公路进逼惠通桥。5月5日，国民党守军下令自炸惠通桥，将日寇阻拦在怒江西岸，结果使大批南侨机工车队以及无数难民陷入敌手，幸存者寥寥无几。笔者有幸在福建泉州汽车运输总站采访了当年炸毁惠通桥的现场目击者——南侨机工郑天赐，他是断桥之夜泅渡怒江天险归队的幸存者。

年逾古稀的郑天赐，个子矮小，红光满面，行动举止敏捷，记忆力很强。他原籍福清，1918年出生在新加坡，后随父母迁居马来亚柔佛居銮，小学毕业即在自家开设的修理行修车，20岁开始开车。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参加第四批机工团，并将自家的修车工具也一起带回国。他被编入西南运输第14大队，行驶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

郑天赐回忆说，在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惊险遭遇，而他至今印象最深的则是惠通桥炸断之夜泅渡怒江天险的经历。

那得从1942年滇缅公路的大撤退说起。由于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寇入侵云南，抗战大后方突然变成抗日最前线。滇缅公路作为抗战期间我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进口物资由缅甸输入，其中以军用物资汽车、汽油、轮胎、兵工器材等为最多。当日寇入侵缅甸之后，南侨机工抓紧抢运，力图将大量军用物资撤运入国门畹町。此处物资堆积如山，仓库满了就沿路边堆放。从畹町到保山、下关一带，沿途成千上万的汽车，往来不绝，紧张抢运。迨腊戍仓惶失守，所有的车辆载物资、难民撤退，接踵于道途，争相逃难，惊惶混乱。5月3日，日寇占领畹町国门，战局突然急转直下，这些重要

军用物资已无法抢运，又不忍心把它留给敌人，于是南侨机工就放火焚烧。

郑天赐一行四人，小队长陈文芳、南侨机工王亚十，以及一个姓李的广东人（被称为李广东），行车由缅甸回国，遭空袭时陈文芳被炸死，只剩三人随着溃退的车队撤退出畹町。此时，日寇穿着中国军装夹杂跟踪而来，利用我们的混乱，企图跟着大批撤退车辆偷混过惠通桥。

5月5日上午，郑天赐一行从腊勐盘旋下山，临近惠通桥时，已经传闻要炸掉惠通桥以阻敌，大家急着抢超车，有时几辆车挤在一起，进退不得，结果互相阻塞，走走停停，欲速不达。当时车子过桥是一辆一辆地过，人拥车挤，行动非常缓慢。大约上午9点左右，敌军占领腊勐，发炮将怒江东岸老鲁田的车子打翻并燃烧起来，把路堵住，惠通桥两头的车辆停满在公路上。郑天赐的车子在桥西几百米处挤不动了，从驾驶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惠通桥上两个中国士兵，已将炸弹摆在桥板上，正在忙于摇发电机的接线操作。同时，守桥部队挥舞着旗子，催促人们尽快跑步过桥，慌忙当中，忽闻枪声，混在车队中的日军先头部队以为被发觉，当即抢占有利地形，开枪向东岸射击。守桥部队立即炸毁惠通桥，“轰隆”一声，整座惠通桥坠入江中，连桥上的汽车行人也掉入江中，车毁人亡，凄惨万分。郑天赐记得，时间是5月5日的中午。

惠通桥炸断了，郑天赐匆忙离开驾驶室，躲进山林中，等到天色已黑，才撬开汽车轮胎，用口吹气，与王亚十、李广东三人合抱着这个“救生圈”横渡怒江。怒江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底下还有漩涡，三人冻得浑身打颤，直起鸡皮疙瘩，大约漂了近一小时，登上对面沙滩时，已经精疲力尽了。

郑天赐三人泅水过来，又急忙爬山上了公路，走了一程，到了“老鲁田”，对岸日军阵地开炮过来，很危险。原来此处地形呈一U字形大弯，从惠通桥至老鲁田相距数公里，敌人在腊勐山炮击桥东岸并封锁老鲁田西边的一个拐弯处公路，只要弯内的车一露头，炮就打过来了，致使挤在弯内的汽车无法通过这一封锁线。郑天赐三人好不容易绕过这段路，在路边看到一辆军车，驾驶兵已被打死，就拉开那个死者，发动一下，车子还可以开，便开着车子朝昆明撤退。半路上，有一宪兵连长拦车，让郑天赐将他从缅甸带来的一个部属载回昆明。郑天赐向那人开了一张证明，便于路上通行，就将车子开回了昆明黄土坡。

（1986年）

为了祖国踏上征途

——记厦门南侨机工庄霖助

厦门的退休驾驶员庄霖助，是福建南侨机工幸存者之一。他原籍惠安，1920年出生在马来亚槟城的一个华侨家庭。在他读小学时，父母因事回国，他被安顿到槟城大姐家中。小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工厂学修车。出师后，当了汽车驾驶员。在当时，司机的待遇较高，月薪足够维持小康生活水平。

“七·七”事变后，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祖国大地。庄霖助身居海外，深知华侨与祖国的依存关系，深感一旦祖国被日寇灭亡，华侨将一个个成为海外孤儿。激于爱国义愤，17岁的庄霖助积极参加槟城筹赈会的工作，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并参加青年歌咏队，上街义演、卖花筹赈，以激昂的抗日救亡歌声，唤起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笔者专程前往录音采访之时，他追忆难忘的往事，竟情不自禁地唱起悲壮的抗战歌曲来！

1939年，滇缅公路建成之后，急需大量驾驶人才，陈嘉庚先生发出爱国号召，立即得到南洋华侨青年的热烈响应。按规定应20岁才符合条件，而瞒着家人前往报名的庄霖助年仅19岁，他便多报了一岁。经过体检、驾驶考核并办好一切手续之后，直到回国前夜他才悄悄地告诉大姐。这可把姐姐急哭了，因为父母回唐山时，就将他托给姐姐照料。姐姐培养他上学读书，又帮他谋到司机职业，正期待他好好工作，成家立业，可现在却突然要回国参战，此去安危未卜，当姐姐的实在不放心。可是庄霖助认为，国难当头，眼看祖国军事运输正急需熟练的司机，自己又具有这项特长，理应回国报效。姐姐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最终只好同意，并连夜帮他整理行装，但附加一个条件：抗战一胜利，必须立即回南洋。

启程前，槟城回国机工队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送，槟城筹赈会主席刘玉水发表讲话，筹赈会总干事、汽车司机公会主席庄明理（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亲自授予南侨机工队旗。槟华抗敌后援会赠给庄霖助一面“为民先锋”的锦旗以及绣着“杀敌光荣”、“为了祖国踏上征途”字样的绢绣。庄霖助至今仍珍藏着一张当时的回国纪念照片，上面写着“槟城萍羽球队欢送回国抗日机工民国廿八年七月五日。”

庄霖助一行在《再会吧，南洋！》的悲壮歌声中告别了亲人，从槟城乘轮船到新加坡，加入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机工，他用闽南方言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鼓励华侨机工回国后勇敢战斗，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给每位回国机工以莫大的鼓舞。

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计330多人，乘“丰祥轮”先到西贡，然后转火车抵达昆明。经过军训之后，1939年10月，庄霖助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第45中队。当时大队部设在广西凭祥，而中队部则设在镇南关的一个寺庙里。南侨机工车队的主要任务是从安南的谅山、同登运汽油等军用物资至南宁、柳州前线，从国内则运出桐油等。该运输线山路崎岖，且时常遭敌机突袭，沿途处处是险境。

1939年11月14日，庄霖助从安南运军火至广西龙州，回途中车子被敌机炸坏了，等了好久才搭上同大队华侨机工李则权的车子回队。由于路基不固，加上雨天路滑，在一急转弯处翻了车，庄霖助头部被撞伤流血，右手肘部，李则权也受重伤。幸亏后面的车队战友及时抢救，分队长林己茂（厦门籍南侨机工）连夜开车将他们送往南宁美国教会医院治疗。三天之后，庄霖助虽然脱了险，但手臂崩折却接错了位，疼痛难熬。此时因战事吃紧，眼看南宁朝不保夕，美国医生考虑到日本人打过来后连自身也难保，只好让庄霖助裹着绷带匆匆出院离开南宁。南侨机工林己茂平素喜欢摄影，这一天还特地为庄霖助抢拍了一张断臂挂着绷带的纪念照片，上面写着“翻车后第四天，1939年11月17日摄于南宁”。庄霖助从南宁撤至柳州，住进一位民间武林高手的诊所治疗，断臂很快就接正了。没过几天，便传来南宁沦陷的消息。

1940年春，庄霖助伤愈后，立即去找车队，可是原来的车队因南宁、昆仑关、武鸣等地失守而退入安南境内的高平，另组成特别大队。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大队部，随即投入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军用物资，主要

路线是由海防至广西的靖西、东兰、河池一带，然后转运至国内各地。日寇占领海防后，该路被切断，特别大队撤回国内。经过重新整编，1940年7月，庄霖助被编入“华侨先锋第二大队”，开赴滇缅公路。“华侨先锋大队”两个大队的大卡车全是由海外华侨赠送的，装备新士气旺，成为滇缅公路军运线的一支生力军。此时，恰逢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到滇缅公路慰问，陈老先生亲切勉励南侨机工坚持到底。庄霖助作为华侨机工代表，还当面向陈嘉庚先生表示，南侨机工一定不辜负海外父老的殷切期望，坚持抗战到底，为华侨争光，为祖国争光。

南侨机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据庄霖助回忆，当年战斗在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每个人都必须闯过种种难关，他曾亲睹许多机工战友或因险路翻车而牺牲，或因瘴疠侵袭而病逝，或因敌机突袭而殉职。庄霖助本人虽以娴熟的驾驶技术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险阻难关，但因过度劳累而患了严重胃病，也只能咬牙坚持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入侵缅甸，按照中英协议，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庄霖助奉命运送远征军，在入缅的途中因胃出血而被送回昆明惠滇医院治疗。不久，远征军战事失利，日寇沿滇缅公路攻至惠通桥，中国守军自炸此桥，以阻抑日军的进犯。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至1942年的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万多吨，即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达300吨以上，可见南侨机工在抗战运输线上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惠通桥炸断后，中缅运输局（原西南运输处）竟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留用一小部分外，其余均放任自流。庄霖助从昆明医院出来后，原来的南侨机工车队已解散了，幸遇一位在华侨中学读书的好友，便一起到侨中继续读书。后来，侨中亦遭到突袭，他又失学了，在抗战后期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与许多华侨机工到处颠沛流离，直到抗战结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庄霖助回到厦门市立医院开救护车。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2年被选为厦门市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同年被选为厦门第二届人大代表。1954年，他响应政府的号召，赴云南参加支援边疆运输，在沾益汽车站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8年转到同安县汽车队后，这位当年的抗日南侨机工就一直默默奉献，直至八十年代才退休。

庄霖助退休后，为解决自己居住的厦门危楼搬迁之事，曾以一个老南侨

机工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很快得到陈先生的复信。陈共存先生1988年特地致函厦门统战部，指出：“庄老先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响应‘南侨总会’征募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呼吁，为爱国热情所驱使，甘冒生命危险从事抗战物资运输工作……他所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希望贵单位在可能范围内给予协助，解决他的困难，是所企盼。”在福建省和厦门市侨务部门及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1990年，庄霖助的搬迁得到了落实，照顾搬进一套新房，地址就在华侨博物院旁边。现在，庄霖助正安度幸福的晚年。

（1987年初稿 1990年二稿）

陈嘉庚故乡一位老机工的默默奉献

——记南侨机工李荣竹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滇缅公路新开辟通车之际，三千多华侨热血青年响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毅然抛弃海外安逸的生活，奔赴祖国大西南烽火漫天的抗战疆场，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来自陈嘉庚先生家乡或队嘉庚公司的人员，现居住在集美郊区后溪乡的李荣竹，就是当年积极响应号召起表率作用的南侨机工幸存者之一。

李荣竹出生于同安潘土村，今属集美郊区，自小就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小学读书。1928年前往新加坡，起初在陈嘉庚创办的橡胶制造厂当学徒，后来转学开车，当了驾驶员。由于他性情敦厚，刻苦耐劳，勤奋上进，得到公司的赏识，屡被加薪，待遇优裕，过着小康生活。

抗战爆发之后，新加坡华侨在陈嘉庚先生及“南侨总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热潮。李荣竹居安思危，挂念着祖国抗战的命运，积极参加新加坡筹赈会的募捐活动，上街卖花义演，宣传抵制日货，并坚持捐出月薪的10%，集中交南侨筹赈总会汇回祖国，支援抗战。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动和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李荣竹便带头热烈响应。与李荣竹同为第五批回国的南侨机工计530多人，如今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但他仍叫得出许多机工战友的名字：李亚三（与他同乡同厂）、林水咸（厦门籍，任领队）、刘志仁（厦门籍，今在云南）、陈武烈（今在泉州运输总站）、郑天赐（今在泉州运输总站）、邓文聪（南侨机工联谊会副理事长，今在云南）等。此外，他还记得同来自陈嘉庚先生故乡而先后回国的南

侨机工：许成瑞（同安籍，任第二批机工团副总领队，已在抗战中牺牲）、洪华民（同安籍，今在四川宜宾）、林己茂（厦门籍，战后留居成都，已逝）、陈友国（原籍集美，第九批回国机工，战后复员返新加坡）等。

据李荣竹回忆，当时由南侨总会统一组织的南侨机工共有三千多人，先后分九批回国，经过昆明集中军训之后，便陆续编队调往各个战区从事抗战运输工作。南侨机工先被编为西南运输处第11、12、13、14等大队，后来，又专门组建了“华侨先锋运输大队”（分为第一、第二大队）。此外，有的则混编于第1、3、5、9、15大队当中。车队均按“三三制”编队，即三班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外加一个补充中队）为一大队。每一个大队约有200多人，配备150多辆卡车。南侨机工的车队，组织军事化，纪律严明，被誉为“抗战运输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

李荣竹经昆明军训考试合格之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14补充中队任驾驶兵，奔赴滇缅公路抢运军火。初到滇缅公路，使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该路之险要，令人咋舌。滇缅公路横跨横断山脉，途中高山峻岭，迂回重叠，连绵延布，其海拔高达三四千米，而低谷则深五六百米。两峰之间相望近在咫尺，而汽车盘旋上下要花大半天。车队盘旋上山巅，只见层峰叠嶂，云雾迷蒙，一侧悬崖峭壁，一侧深谷大川，沿途陡坡急弯，令人惊心动魄。在这条路上抢运军火，随时随处都有翻车的危险。李荣竹曾亲眼看到许多南侨机工战友车毁人亡的惨景。但是，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再陡再险也难不倒。为了战胜险路关，南侨机工想出许多办法，譬如最陡处上不去时，后面车的司机便下车用垫木垫住后轮，然后继续往上爬。又如上下陡坡又碰上急转弯的窄路，他们就在急转弯处架上渡板，前轮过后，后轮靠外边的轮子正好可以从渡板上滚过，避免后轮悬空翻车。

由于滇缅公路这条国际运输线不断为中国抗战“输血”，因此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出动大量飞机重点轰炸功果桥及惠通桥，企图扼断咽喉。有一次，李荣竹开车到功果桥，目睹日机轮番俯冲轰炸，江面水柱冲天，桥面被炸断了，但南侨机工却用汽油桶扎成大浮筏，用钢丝拉到西岸，冒险将满载军火的车队运过江，日夜不停，保持这条军运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李荣竹与南侨机工战友们在滇缅公路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抢运任务，曾受到上级的嘉奖。他至今仍珍藏一份民国三十年（1941）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汽车运输第十四大队奖状（奖字第037号），上面

有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两边是孙先生的题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奖状内容为：“查本大队第十四补充中队驾驶士李荣竹，品技兼优，服务勤谨，应予发给奖状，以资鼓励，此状。发给李荣竹。大队长陆绍康、大队副冯翠富。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

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侨机工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李荣竹复员南返新加坡，受到陈嘉庚先生及海外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陈嘉庚先生赞誉他们为祖国争了气，为华侨争了光。

1948年，李荣竹再次回国，在老家定居。1949年，他在家乡积极参加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荣立三等功。1950年福建军区给他颁发奖状，同时，还荣获“支前光荣证”。1959年，李荣竹参加杏林建委材料运输工作，任驾驶员。1961年下放回家参加劳动。1986年，我国政府特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的待遇。目前，李荣竹在家幸福地安度晚年。

(1987年)

无悔的抉择

——记莆田南侨机工余汉洲

原马来亚新山南侨机工余汉洲，是1939年参加第九批机工团赴滇缅公路服务的，战后复员南返。上世纪50年代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长期从事侨联工作，直至1978年退休。

余汉洲于1913年出生在莆田山区一个小村庄，因其父患病不能下田劳动，靠母亲辛勤操劳，难于维持生活。5个姐妹不得不先后送人，4个兄弟最后也留不住，不得不将最小的弟弟送人。余汉洲只念了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便跟人学制棕衣手艺，18岁时到涵江一家客栈当杂工。21岁时（1934年），他向亲友借了路费，前往南洋投靠二哥。他二哥是早几年到马来亚的，在柔佛新山开了一间理发店。他由二哥介绍，找了份修补车胎的工作。不久，他跟朋友学开车，考取驾照之后，生活开始好转起来，能汇款接济家用。

经过几年的辛勤积累，正当他准备与朋友合股做生意时，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海外华侨的极大义愤，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余汉洲也热心参加卖花募捐等爱国活动，并且愿捐出工资的一部分，统一交由南侨总会汇回祖国。

到了1939年，抗战进入危急关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登报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余汉洲看到好几批华侨青年参加机工团回国的动人情景，也产生报名回国的念头。可是，他又想到自己是借路费南来的，如今有了司机职业，安稳舒适的好日子才刚开始，还可以经常汇款帮助家用。回国要吃苦，甚至流血牺牲。他思想斗争确实很激烈。但后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日军侵华暴行，得知祖国同胞遭受蹂躏，他再也按捺不住对日寇的愤怒，便下定决心报名回国。

余汉洲拿定主意后，便到柔佛振林山黄梨厂找当地筹赈会报名。但按规定还要商店担保。因原来拟办的合伙商店还未开张，他第一次未能报上名。于是，他回来找一个朋友介绍请振林山振兴食品公司作担保，由该公司老板带去办理报名手续。接下来，他们集中在黄梨厂进行训练，不久，全体到新山医院进行体检。

体检一关一关顺利通过了，可是，最后一位医生却突然通知余汉洲留下，其余的先回去。这使他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妙，于是忐忑不安地望着医生。医生问：“家里还有兄弟吗？你为什么要回国？”余答：“兄弟有三个，我属老三，回国为了抗日救国，虽然有危险，但家中有兄弟，没有关系！”医生听后，高兴地说：“好，有志气，你合格了，回去救国吧！”说着，又从裤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余汉洲觉得奇妙，走出门口就打开一看，原来是二哥余玉清写的，目的就是阻止他回国。二哥早几年来南洋，赤手空拳谋生不易，如今已开了一间不小的理发店，他曾多次劝弟弟不要回国，希望弟弟珍惜时机多赚些钱寄回家赡养父母，做个孝顺儿子。可是余汉洲偏偏听不入耳，哥哥只好写信请求医生留人。信是这样写的：

医生：我只要求您说一句话就好，余汉洲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回国，附上二百叻币给您吃茶，谢谢！余汉洲之兄弟托！

当天晚上，余汉洲带这封信及二百叻币去找二哥，讲明回国的决心，至此，二哥亦不再强留了，只是抱着弟弟大哭一场，然后交代今后应自己保重，抗战胜利应及早回来。

告别了二哥，余汉洲等一行集中在振林山黄梨厂待命，等待南侨总会通知返国日期。他们这一小队，选出队长陈友国（原籍同安集美），副总长陈聪明（同安籍），队员是李祥发、陈仁坛、林兆坤等20多人。

余汉洲等一行由新山到新加坡统一编入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这批人数最多，达500多人。1939年8月14日，他们由新加坡启程，数天之后抵达昆明。

余汉洲刚到昆明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感到很不习惯。首先是伙食差，但华侨机工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还比较容易克服；其次，觉得军训内容枯燥无味，机械死板，华侨机工普遍反映，回国参加军事运输，只要能熟练驾驶及维修就行了，不必那么呆板地操练；此外，还有打架的问题，机工曾与昆明军校的学生在街上因口角而发生过几次斗殴事件。

1939年12月训练结束后，余汉洲分配到第5大队13中队当班长。当时第五大队的运输路线主要从昆明到贵州、湖南、广西等地，运载的都是抗战军用物资。敌机时常在上空盘旋扫射，曾有一个时期，白天不能开车，改在傍晚出发，第二天早上又停车，全靠夜间抢运。

有一天，余汉洲出车到贵阳运桐油，车开出桐油站三公里处，突遇敌机突袭，汽车后门板被射穿了十几个洞，幸亏人未受伤。还有一次十分惊险：余汉洲一组三车由毕节装军用棉衣回昆明大坂桥附近，敌机扔的炸弹在车边爆炸，车被气浪震翻到公路边的水沟里，余汉洲与莆田老乡林亚田都落入沟中，浑身都是泥土，汽车报废了。

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几乎每一个华侨机工都有一段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余汉洲也是这样。他除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外，还亲眼目睹了许多的惨剧：

第12大队的新加坡南侨机工杨金清，原籍莆田大洋乡。1941年由保山开车来昆明，停车在西站修理，因紧急警报由车场开出避突袭时，在西山公路急转弯处撞车死亡，遗体由西南运输处就地埋葬。

第5大队补充队有个新加坡南侨机工，土名叫黄番仔，亦是莆田籍。1941年5月间由贵州运钨沙出发，车经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地方，被云南平彝弯检查站哨兵开枪打伤，因流血过多无人抢救而死亡。经第5大队13中队发现，报告大队派人去处理，结果只好就地掩埋。

12大队的新加坡机工陈玉蕊，也是莆田人。1942年4月间，由下关出发去缅甸八莫抢运汽油回国，因该路是单程线窄路，从八莫开夜车的途中不幸翻车，掉入深谷，连车带人不见踪影，加上天黑无法抢救，连遗体也无法找到。

后来，西南运输处改为中缅运输局。下关第二大队的新加坡机工方九十，原籍福清，1943年12月间，由下关出发往贵州毕节，经过“替天高”险路时，翻车身亡，大队部派人前往收尸就地埋葬……

仅余汉洲记忆所及，车毁人亡的南侨机工，现在还得叫出名字的就有十几人，还有更多的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他们都是为抗日救国而英勇献身的无名英雄！历史是不会将他们遗忘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新加坡南侨机工陈亚清，祖籍莆田，属第9大队。有一次由保山出发到腊戍运武器返回，行驶至惠通桥边，不幸由半山翻入深谷，幸而及时发现，经抢救头部缝了21针，从死神那里夺回了一条命，这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战后他留在云南，直至不久前逝世。

1942年5月，由于日寇入侵，滇缅公路切断了，余汉洲与广大南侨机工一样，度过了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进入滇西收复失地的反攻战斗中，南侨机工继续投入运输工作。1943年底，重庆派卫立煌为总司令负责滇缅反攻指挥，南侨机工又归入十一集团军统一领导，负责协助运兵员、武器奔往前线。在紧张的松山反击战中，余汉洲曾连续十几天日夜抢运。夜里没有机会睡在床上，只好在驾驶室打盹。有一次，余汉洲的车出故障，暂停放在保山修理，搭别人的车回下关队部，在离保山30公里处，因车开太快转弯时翻入路边，四轮朝天，他的脚受了伤。幸好治疗及时，康复后能继续开车。

1945年8月，余汉洲出车到昆明，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车子交昆明中缅车场，便到昆明华侨互助会，准备等候办理复员手续。但是好事多磨，复员工作被拖了一年多，经陈嘉庚先生在海外奔走呼号，国内机工代表多次到重庆交涉，最后才办理复员手续。

余汉洲是第一批复员机工，由昆明出发，取道贵州，经广西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乘轮船经安南抵新加坡。在新加坡登岸时，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不久，南返的机工在陈嘉庚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正式组织建立“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余汉洲作为首批基本会员，担任该会交际职务，积极奔走为复员机工谋福利。此时，他还参加兴安会馆、司机工会、柔佛州理发总会等各种社团的活动。为了开展各地交际工作的方便，他开着一辆小轿车四处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在海外联络各界人士热烈庆祝，并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引起世界的关注，更给海外华侨以巨大的鼓舞。祖国，像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无数海外

赤子回归到她的怀抱。一批批青年学生回国求学，一批批科学家、技术人才从世界各地冲破重重封锁回国报效。余汉洲亦决心回国，继续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5年3月22日，余汉洲启程回国。回国之前，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写了四封信由他带回。一封致北京中侨委，一封致陈嘉庚先生，另外两封分别给汕头海关及莆田侨委会。其中致陈先生的信，是全体南侨机工职员写的，拟组织发动一批海外华侨技术人员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船到汕头，边防部队派人前来，余汉洲取出致北京中侨委和陈嘉庚先生的信，他们立即与北京通电话，得知陈先生近日在福建集美，便送余汉洲到集美。

余汉洲到集美见到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说，海外拟组织南侨机工等技术人员回国参加工作，现时对这批人不大适宜，因这批人年纪都大了，解放军队伍是十八至廿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叫汉洲写信给南洋，不要组织机工回国，理由介绍给他们听就可以。陈嘉庚先生又问：“你要回南洋，还是要留下？”余汉洲说，要留下来工作。陈老先生便对他说：“好，你先回去休息，今后本地政府会通知你的。”

余汉洲回国后，定居在故乡莆田，1955年7月间，他到县政协报到，担任华侨组工作，并任莆田华侨新村筹委会委员，省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县侨联会选他为华侨代表，连任华侨代表至今，又当选为历届侨联委员，并选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1970年10月，余汉洲调到县干部招待所，直至1978年退休。

回忆起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经历，余汉洲老人感慨地说：“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青春无悔。最近政府又专门下文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还在云南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这不仅使我们这些幸存者心满意足，而且更可以告慰那些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在天之灵了！”

(1989年)

悄然离家 为国奉献

——诏安南侨机工张章胜参加抗战纪实

现居诏安县梅岭乡玄钟村年近八旬的张章胜，是目前国内唯一幸存的砂朥越南侨机工。他6岁之时随母亲到砂朥越，少时即进华文学校读书，课余则帮家庭收燕窝。小学毕业后到美里坡“亚细亚煤油公司”学开汽车。经过磨炼，不论是驾驶技术，还是机修都很熟练。1939年，陈嘉庚先生代表南侨总会登报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在南洋华侨社会中激起冲天巨澜。张章胜与一群热血华侨青年热烈响应，认为国难当头，正是报效祖国的时机，理应将自己的技术专长为国效劳，于是下决心报名。为避免家庭的阻挠，他索性不告知父母，悄悄地跑到古晋坡姑妈家中，打听到设在轮渡码头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报名处”，然后改名为“张志强”报名应征。他走后，家人不知其下落，直到1957年夏，才知他尚在人间。

报名的第二天拂晓，张章胜举着一面题着“华侨抗日回国服务团”的大旗来到码头，与方亚力等16名应征者一起登船赴新加坡集合。几天后，等候马六甲、爪哇等地的人员到齐后，才启航回国，当时全队计117人，组成第七批回国机工队伍，领队是广东惠阳籍的廖萍。队员当中印象较深的有现留居福建龙岩的黄礼归等。

张章胜一行到达昆明后，在潘家湾训练所仅受训十余日，即转到贵州唐家山培训近半年。他被编入“后方勤务部辎重第三团第三营第八连”，驾驶一辆两吨半的福特牌卡车，车号为：19445。八连是个“华侨连”，人员主要由南侨机工组成。他们奉命开赴滇缅公路及各个战区从事军事运输。张章胜还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南宁之战、昆仑关之战等，他与战友们一起冒着

枪林弹雨为前线运输弹药和军粮等，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张章胜作为机工代表在柳州晤见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代表南侨总会向劳苦功高的机工致以亲切的问候。当陈先生听到南侨总会送给机工们的一批慰问物品（每位机工可得九件）被某些国民党贪官污吏鲸吞时异常气愤。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之后，张章胜与同营机工陈玉水（星州一富翁之子）就流落在江西会昌一带，数月之后又辗转到湖南衡阳、广东韶关、广西桂林。在桂林五华山，他拜访了宗亲张贞（诏安人，时任军委会战区风纪第四巡察团上将主任委员），汇报了回国为抗战服务的详情，得到嘉许。由于张贞的介绍，他被安排在桂林“江南盐务联运处”开车，后来该处改设在江西赣州，即随之抵赣。因他技术高超，被特别安排为处长宋毅华（福州人）驾驶福特牌小轿车。抗战胜利后，“江南盐务联运处”被撤销，张章胜再度失业，只好到处替人临时开车。最后辗转回到诏安老家。

（1987年）

当代花木兰

——记巾帼英雄李月美

(一)

抗战期间，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数千名南侨机工毅然抛弃海外安逸舒适的生活，奔赴祖国烽火弥漫的抗日疆场，在华侨史上谱写出气壮山河的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中，竟然有女扮男装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便是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人物之一。

李月美已于“文革”中逝世，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笔者于李月美逝世20周年之后的阳春三月，前往广东英德华侨农场采访她的几位女儿，承蒙提供第一手资料及珍贵的历史照片，谨以此文献给这位“当代花木兰”的在天之灵！

(二)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1918年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华侨家庭，原籍广东台山。父亲李荣基是一名华侨商人，为人豪爽正直。母亲梁凤蝉，善良贤惠。李月美兄弟姐妹计九人：锦伦、锦全、月明、月美、锦容、锦和、锦圆、月琴、月平，她居第四。

李月美自幼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文学习成绩优异，幼小的心灵向往祖国。随着年龄的递增，她长成一米七多

的高个子，像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兴趣广泛，尤其喜爱文娱体育，能歌善舞，吹口琴、弹吉他，样样拿手；更爱好游泳、打球、骑马、赛自行车，还学会了开汽车。正因为她会驾驶汽车，参加了机工团回国，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

“七·七”卢沟桥的枪声，宣告祖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亦震惊了海外华侨的心。战争初开，日寇咄咄逼人，长驱直入，祖国的锦绣河山大片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难，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忧心如焚。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李月美和同学们热血沸腾，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宣传队进行义演，上街卖花，抵制日货，还组织女篮球赛，将募捐到的款项交给筹赈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

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1938年底，广州沦陷，香港通道被阻，积存在港的大批军火，除部分改由安南运入广西外，大部分移往仰光，准备由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运入云南。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奇缺，因此，西南运输处致电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求援。陈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广大华侨青年踊跃报名，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李月美被这股爱国热潮所鼓舞，也兴致勃勃地前往筹赈会报名，却被拒绝，因为不招收女机工。怎么办呢？难道女人就报国无门吗？李月美心里不服气。她想起在华侨学校读到的中国古代“木兰从军”的历史故事，自古就有女扮男装上战场的巾帼英雄，千古流芳，难道不值得后人效法吗？

终有一天，李月美瞒着家中父母，穿上弟弟李锦容的衣服，到一个不熟悉的埠头报名应征。她的体魄和声门，她对于运动的嗜好和泼辣个性，谁也没觉察到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侨工。

她终于以一个中华铁血男儿的身份，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来。

李月美没有把回国的事告诉家人。为了祖国的亿万人不受倭寇凌辱，不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苦，李月美横下一条心，悄悄离开家门，踏上抗日救国征途。

(三)

1939年2月，李月美一行经过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在安南上岸，又经过陆上几天几夜的颠簸，乘火车到达祖国大西南重镇——昆明。在昆明经受军训，被分配到总部设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

(四)

1940年某日，李月美因公在滇缅公路一急转弯处不慎翻车，身负重伤，脑部震荡。幸亏过路的南侨机工车队及时发现，海南籍南侨机工杨维铨奋力抢救，把她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地送往医院急救。

杨维铨是个朴实的汉子，论个头，比李月美要矮一截。而当他人危急时，他奋不顾身地帮助别人，显得精力过人，神采奕奕。他与李月美素不相识，他救下李月美，又亲自送“他”入医院。救人救到底，他甚至留下来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终于，李月美再也没能隐瞒住真相，向这热心仗义的男子汉和盘托出，并要他为之保密。杨维铨满口答应下来，仍像哥哥一样护理她，而且更加尽心尽力。

一个月后，李月美康复了，她对杨维铨的诚实和善良深有感触，也渐渐理解了他的真挚感情。他们终于相爱了。当杨维铨带着身穿“女儿装”的李月美来到队长面前，队长和南侨机工战友们无不称奇。这一段滇缅公路巧结的传奇姻缘，这一位花木兰式的巾帼女子，被传为佳话。

星马报界曾以“当代花木兰”为题，详细加以渲染报道。

廖仲恺夫人、著名社会活动家何香凝女士为她题写了“巾帼英雄”四个大字，赠李月美作永久纪念。这面红绸锦旗，李月美一直珍藏在身边，视为至宝（可惜在1966年红卫兵“大破四旧”时被抄，至今下落不明）。

从此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白衣天使”。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心护理、照料为国负伤的抗日将士，以热情的歌声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凡是经她护理过的南侨机工伤病员，即使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日，对她依然记忆犹新。从一张保留下来的照片看，上面题的正是：“白衣天使李月美”。

李月美的弟弟李锦容，亦于1939年7月参加第八批机工服务团回国，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十五大队，在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姐弟俩有机会经常会面。夫妻恩爱，姐弟重逢，那是李月美最幸福的岁月。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亲身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姐弟，与幸存的南侨机工战友们，怀着无比欢乐的心情热烈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为表彰南侨机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了奖状：“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也发给荣誉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李月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

1946年，李月美复员回到槟城。当年她乔装打扮不辞而别，曾使母亲老泪纵横。而今“花木兰”重着女装奏凯南返，全家团聚，欢天喜地。

战后复员与家人团聚之后，李月美便与丈夫杨维铨带着孩子定居缅甸，开设一间咖啡店。数年之间，她连续生了十个孩子，把精力倾注在培养孩子方面。

(六)

李月美永远不会忘记，1954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缅甸时，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缅甸侨团介绍她是当年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周总理连连称赞：“巾帼英雄！”周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叮嘱：“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们回祖国读书吧！”李月美把总理的教导铭记在心，为此，她计划将孩子培养成为出色的翻译人员，为中缅文化交流和友谊贡献力量。于是，她有计划地开始实施培养子女学习中、英、缅多种文字。

1965年，李月美首先将四个较大的孩子（次女玲华、三女玲玉、长子善国、六女玲美）送到广州侨校补习。结果，善国和玲美双双考上北京外语学院。消息传至缅甸，李月美非常高兴，提出将家中另外四名小孩也送

回国读书。

可是，在继续将子女送回国读书的问题上，李月美与丈夫发生了争执。杨维铨希望留几个在身边。而李月美则坚持全部送回国。最后，李月美说服了丈夫，并决定由她本人带孩子全部回国定居，以培养子女读好书。1965年11月，李月美带着另外四个小孩（七女玲莉、八女玲茜、九女玲蕙和幼子善中）又回国了，只剩丈夫留在缅甸。

（七）

没有想到，李月美回国才几个月，即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迅速地卷入漩涡。她初住广州，却很快被下放至山区英德华侨农场。

“文革”一开始，农场开始对归侨划分“成份”。以下是一次让她极为伤心的对话：

“工作组”：“李月美，你知道你在海外是什么成份？”

李：“不懂得。”

“那么你小时候是干什么的？是否给地主放牛？”

“我小时候在南洋读中国书，没有给地主放牛。”

“那么你小时候生活很好？”

“是的，我记得小时候生活很好。”

“那个时候（1949年以前）生活很好，肯定是资产阶级。”

“？”（李月美一愣，不懂如此“逻辑”，没有回答）

“你长大干什么？”

“我长大时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日，参加滇缅公路西南运输处军事运输和‘红十字会’工作。”

“西南运输处是国民党的，你知道吗？你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就这样，李月美被划为“资本家”成份，再扣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开始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

下田劳动就下田劳动，李月美二话没说。可是，奇怪的是当时全国流行“政治评工分”，身强力壮的李月美拼命出工出力，出了十分力只能评五分工分，她想不通了。接下来，有人竟怀疑海外亲友寄来给八个孩子读书的钱是“特务经费”，迫得子女没权利读书，也得下田劳动，每天挣正常劳动力

工分的1/4。海外经济来源断绝之后，李月美一家生活发生困难，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阶段，挣工分所得却填不饱肚子。为此，李月美写了一封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接到处于困境中的一位缅甸归侨的来信后，亲笔回信指示要加以解决。接到总理复信的李月美，这位一向具有男子汉坚毅性格的巾帼英雄，泪水湿透了枕巾。

有了总理的亲笔信，照理问题该好解决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那是非颠倒的特定年代，给总理写信反而也成了李月美的罪名。

(八)

造反派抄家时，所有海外带回的信件、书籍、南侨机工历史照片等，全部被搜去，连何香凝题的“巾帼英雄”红绸锦旗、周总理亲笔的信，也不例外。其中能证明“好人”身份的何香凝题词和周总理亲笔信则被弄得下落不明了；而穿着西南运输处南侨机工制服的照片，却又作为“坏人”的罪证。

没多久，李月美的身体垮下来，再也经不起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的折磨。

1968年8月28日深夜。

经过数月的政治喧嚣，疲惫了的批斗者和挨斗者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个刚烈的女子，以最后的母爱环视睡熟中的八个子女，然后自杀了。

这是一个无限执着的爱国“巾帼英雄”的悲剧！

(九)

李月美死后，殃及子女。定量口粮早已吃光了，自留地种的一些菜又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孩子们走投无路，从墙角边拣起抄家时遗漏的一张信封，上面写着父亲老家的地址：“海南岛琼海县福田公社埠头大队。”于是，在一个深夜，八个孩子悄悄向母亲坟墓最后磕了头，抄山路步行几十公里到英德县城，因无钱剩车，只得继续步行，饿了就咬几口辣椒配路边的凉水，经几天跋涉，来到广州车站，准备投奔海南故乡。

在汽车站，最小的孩子善中手持信封向陌生人打听海南路途，幸亏遇上信封上所写地址的乡亲。这位乡亲听说过同乡杨维铨及李月美的名字，就出车船费将八个孩子带回乡。

当地政府及众乡亲，伸出援助之手，安置了这群孩子。小的继续读书，大的则进厂或下田参加生产劳动。

1979年10月23日，中共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召开了为李月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平反通知书全文如下：

《关于为李月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1966年我场四清运动后期，亦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在归侨中全面进行评划阶级成份，李月眉同志被划为资本家，并扣上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为了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根据英德县革命委员会（1978）第197号《关于取消原驻英德华侨农场四清工作分团给归侨评划阶级成份的通知》精神，现决定：

一、公开为李月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强加于李月眉同志的所谓“资本家”、“国民党残渣余孽”应予推倒，有关评划归侨阶级成份的材料应予销毁。

三、通知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有关亲友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原发出的有关材料应予收回销毁。

四、李月眉同志因以上原因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八日被迫害致死，已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三日召开追悼会。

中共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四日

（1988年）

一份珍藏了半个世纪的 南侨机工日记手稿

在广东陆丰，我循着友人提供的线索，寻访年愈八旬的南侨机工张光旺（又名张万森）。他参加第九批机工团回国，曾在滇缅公路翻车负了重伤，头破血流，右眼暴出，耳朵震聋。经抢救得以死里逃生。我起初猜测，这位负过重伤的老机工，或许已经迟钝，担心能否记得往事了。可是在访谈中，我惊奇地发现他记忆力非常好。他不仅能如数家珍地讲述当年回国参战的全过程，而且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时间点的回忆，能够精确到几时几刻。例如他回国的日期是1939年8月14日，早上6时在同济医院集中，10时全体507人出发到丹絨百葛四号码头登船，下午3时“丰庆轮”正式启航，8月23日抵昆明。对胜利复员这件事，他清楚记得他们第一批复员机工220人，连家属计421人，于1946年10月26日启程，12月3日回到新加坡，历时39天。这与我从云南档案馆查录的有关史料丝毫不差。我惊叹不已，一再表示敬佩。张老笑着说：“好记性不如勤笔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写日记。当年从回国参战到胜利复员南返的全过程，我都写在日记上。”他转身回卧室从箱子里取出一本珍藏了半个世纪的日记本。

这是一本泛黄的日记簿，从深浅不一的墨迹及断断续续的记录，可看出主人坚持写日记是费尽心力的。尽管作者文化程度不高，但他记录真实，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史迹佐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侧重摘录“回国参战历程”和“胜利复员南返经历”两段手稿，以飨读者。

(一) 回国参战历程

(新加坡—昆明, 1939年8月14日~23日)

民国廿八年(1939) 八月十四日

今天, 我们五百余司机同志, 全体早上六时整到同济医院集中, 准备上船开往中国打日本(侵略者)。到了十时许, 全体由同济医院出发, 到丹絨百葛四号码头。人山人海的同胞兄弟姐妹等候着我们登船。一队一队登船。同胞们鼓掌欢送。同时, 我们“青年抗敌后援会”到来一车同志, 欢送并请我到码头摄影留念。在码头上, 各位侨胞不愿散去, 他们在码头上受太阳(曝晒)。下午三时整, “丰庆轮”将开了, 欢送者唱起抗日歌曲, 我们皆唱歌答谢。船开了, 再会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八月十五日 离星加坡的第一天

下午七时许, 本船因有人中毒身亡, 情形未明, 结果检查本船小贩(即水手), 在厦门办有各色酒: 三星酒、五加皮、玫瑰露、红米酒、白啤酒, 当场查出(有问题)。全体司机同志气愤地要打倒汉奸走狗, 将小贩处包围, 想将小贩丢落海。总领队追来, 警笛一吹, 将五种色酒交队长转给本船库房化验, 然后本队即派纠察队维持, 结果查清是日本制造的毒酒。被毒死者送落海, 事情由船主去办, 然后将情形呈星加坡南侨主席办此案。

八月十六日 第二天

今天, 我们就离开了可爱的马来亚, 在船上顺风而漂。上午十时半, 天色已变, 大风大雨, 船身摇动, 物件乱翻。同志数百, 同时没有一人晕船, 皆是铁胆铜人。至十二时十五分, 风波更厉害, 但是大家都不害怕, 一队一队唱歌、做游戏、吹口琴。直到下午二时, 才得见风平浪静, 只见海中凸出一片大山, 海里鲨鱼游来游去, 每条都有数十斤。过了好久, 天将晚矣, 大家准备安睡了。

八月十七日 第三天

上午一时, 抵安南海, 停泊一刻, 马上查关, 电船驶过来带路。早晨七时四十分抵安南岸。当地政府不许我们司机同志登陆, 大家感到失望。我

们总领队亲自到中国领事馆，请问当地政府是否许可我们登岸，得到答复：

“登岸可以，但要住他们的机关，不准出街，若要上街，衣帽徽章要先交当地政府，要离开时才交给你们。”大家得知这一消息，一概不愿登岸。

八月十八日 第四天

丰庆轮仍停泊，本来今天要开往香港，因司机未有登岸不得离开。船主与总领队再到领事馆交涉准后，马上打电到河内，特请专列火车运送我们到云南省，结果下午三时十五分，我们一队一队登陆。经过检查关口查毕，中国旅行社派大罗里车送到火车站。而我们带来的大帆布廿二张并药品一箱，被关口扣留，报告中国旅行社转由领事交涉矣。罗里车驶由安南街道经过，安南人穿的服装中国式，男女都穿长衣，没有领子，裤头是白的。言语安南话，口食藕菜，牙齿完全乌黑。车马均靠右边行驶，与新加坡不同。马路边全部种树，电车行铁轨，商店低矮。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安南华侨战地服务团派数十人来维持秩序，以免汉奸混入。旅行社送来供几百人食用的干粮，是订做的长面包，共千余条，罐头鱼二千余罐，中国茶叶数十罐。直至下午六时一刻，快车启动了。华侨战地服务团唱《全国总动员》的歌曲，高呼口号：“打倒日本东洋鬼子！中华民族万岁！”再会吧，我们专车前进矣！

八月十九日 第五天

火车开了一夜，今天上午五时半抵“芽庄车站”休息。八时又向前行进，此地山太多，又进三座暗洞才抵“大岭车站”，再过五座暗洞，十二时半，方到平原。此处一望无际皆是禾田，居民房屋皆是草盖的，或是一种风俗。又经“东作车站”，再过一座吊桥面，有三四英里长，然后抵“溪和车站”。这个车站房屋商店都没有，只见四周都是铁道，没有停，继续前进，得见大山。火车进入暗洞经五分钟才出山洞口。下午五时抵达“瑶池车站”，此地的警察皆穿中国装，脚打绑腿，穿黑鞋，头戴安南雨笠，背着长枪，立在车站旁。晚间十时五十分，火车又向云南方向前进矣。

八月廿日 第六天

今天我醒来时已六点廿分了，连过两座铁吊桥，每座都有同新山（柔

佛)一样长。七时三十五分到达了“土轮车站”，八时四十五分又到达一车站，增加一节车头(助推)，过了一段危险山路之后，后面的火车头就撤下来了。十一时安抵“化化车站”，有粤南顺化救国会欢迎我们华侨青年司机，赠送“保卫祖国”的锦旗，并送中国茶、各种果品，鼓励上前线多杀敌。天气不景，下起毛毛雨，又穿过暗洞、铁桥……到了晚上八点，没有再记，各位同志安睡了。

八月廿一日 第七天

今天六时四十五分，我们的快车到达河内，转换火车又前进。天下着雨，附近有乡村，完全被水淹了，不过每家都有一小舟可以避灾。这一路低洼处，都是被水淹的。下午六时半到达“安沛车站”，站上很多热心华侨欢迎。站上有警察维持治安，一位安南警察写有法国文字给我们看，说要同我们回到中国去出力。想此警士明白中日战争的情形。忽然就快到十时半了，我们的火车就要开了，他向我们告别、行礼。留在我的日记簿上的这行文字是法国文字(略)，是在安沛车站警察写给我们的。意为：祝你们回到中国的时候要达到最后的胜利！再见，再见吧！

八月廿二日 第八天

今天早上四时半到达河口的法国关口检查站，这边是法国国旗，那边是中国国旗。我们全体司机同志皆穿上军装，戴着军帽，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和走狗！”“我们的领土决不能丧失！”然后，火车分开两列，每列拖六节。早上九时半即开车，穿过许多山洞与急弯，下午四时才到达“芷村车站”。因前面的铁道山高路险，又增加一节火车头(助推)，直到后边的路较好，接上的车头才撤下来……下午六时十分，到达“大庄车站”，逗留一刻，又向前进。七时廿分到达“开远车站”，自大庄到开远经过十六个暗洞。火车停于开远站时，各位同志从未看过云南省的风光，都下车往市内游览。因抗战期间没有建设，街道商店不成样子，街道边都有种树木，不过一丈余高，街道两边非常阴凉。市内的东西百物高涨，但米酒不贵，因本处多出产粮食。忽然时间已到八时半，我们全体同志返火车安睡矣。

八月廿三日 第九天

早上七时由开远站动程。在车站边的居民房屋是用竹木建的，外面以泥浆涂之，也是一特色。但此地的平民百姓穿着大都破烂，好比难民一样。我们见了，将面包从火车上掷下去给这些同胞，他们非常喜欢。接着，又经过“巡检司”车站、“拉里黑”车站、“西扯邑”车站、“盘溪”车站、“糯租”车站、“禄丰村”车站、“徐家渡”车站、“宜良”车站、“可保村”车站、“水塘”车站、“呈贡”车站，直到晚上八时整才到达昆明车站。从“巡检司”到昆明站，共入暗洞四十二个。到达昆明车站时，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派来很多大架罗里车，将我们送到潘家湾司机训练所。

自民国廿八年（1939）8月14日离星，23日抵滇，历时整九天。

（二）战后胜利复员南返经历

（昆明—新加坡，1946年10月26日~12月3日）

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廿六日 胜利复员第一天

今天是我们胜利复员的日子，第一批复员同志都到西站第四区车场集中。各机关长官、各团体欢送大旗甚多，整个车场都挤满了人，共数千人。八时开会，各长官训话及赠旗。十时完毕，马上开车由武成路经正义路、金碧路、拓东路向车站行进。下午六时抵马龙县，岗哨卫兵说：“曲靖有土匪，你们车子不要前进了。”我们立即交出“委令”，官长看见之后，马上派兵护送至曲靖县，幸平安无事，九时三刻抵曲靖矣。

十月廿七日 第二天

我们很早就起来，整理行装，上车待发。命令一到，车子就开，一路平安，下午四时抵达盘县。

十月廿八日 第三天

清早全体集中，因一位同志不小心，护照被茶房盗去。我们立即向当地追究，将老板扣留，令其将护照及证件交出来，然后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贵州境内下了很大的雨，大家都受了大雨之苦，下午五时多才安抵永宁镇。

十月廿九日 第四天

今天很早就起来，由永宁镇出发，抵达贵阳市三桥时，我们十二辆车子集中排队出发，浩浩荡荡由大街行至车场。

十月卅一日第 五天

因有一辆车抛锚未到，大家就逗留贵阳市。伙食每餐要1000元，房租每晚1300元。

十月卅一日 第六天

我们六时起床，全体去参加大会。到会者万余人，贵州省主席杨森向我们全体赠旗：“为国为民”。十时多散会。下午一时半，由杨主席率领全体华侨机工到贵阳市运动场、抗战门、胜利门等地游览。在中小学大礼堂，杨主席向我们演说，并问及回来服务情形、经过，会毕全体合影。

十一月一日 第七天

今天全体向杨主席献旗，锦旗绣着：“惠我侨工”。杨主席说：“明天请你们看戏，太太小孩都带来。”

十一月二日 第八天

看戏的时间到了，同志们带太太小孩一起到新声大戏院。“贵阳市各界欢送侨工复员大会”由周市长主持，各界人士赠旗：“胜利荣归”。周市长演讲：“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能达到最后的胜利，运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你们华侨同志担任运输抗战，辛苦八年，今天最后胜利，工作完毕，光荣南归矣。不过今天贵州省没有好好招待，请各位多多原谅吧。敬祝各位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会毕，立即演戏：《薛平贵征西》。十二时演毕散场，回旅馆交四天房租，共5200元。从昆明至贵阳计四天路程，在贵阳逗留四天，总计房租伙食50000元。

十一月三日 第九天

早上我们将行李搬至车场，十二辆车子排列甚齐，马上出发，下午六时到了马场坪。

十一月四日 第十天

今天特别早，五时四十分由马场坪动身，经过都匀县，那个地方日本鬼子到达过，变成焦地，十二分可怜。下午五时半到达南开县。

十一月五日 第十一天

我们很早由南丹出发，天气很好，大家感到很舒服，梦中就到了宜山县。

十一月六日 第十二天

全体五时到车场，先派两辆到柳州通知救济总署，十辆随后，到达大塘查车站，要我们交现款养路费，否则扣留司机。我们华侨复员司机要找站长交涉，卫兵见我们动怒，马上提枪出来威胁。我们不服，发生冲突。结果，站长只好向各位说好话，放车通行。十时一刻抵达柳州城。

十一月七日 第十三天

今天到柳州“联合国救济总署”办手续及领路费，由柳州至梧州路程五天，每天发给国币1000元，共计5000元。

十一月八日 第十四天

当局又派新道奇车十二辆送我们，十时由柳州出发，下午六时到达宾阳。

十一月九日 第十五天

各位很早起床，大家都想赶快到达目的地，下午五时抵容县。

十一月十日 第十六天

天未亮四时许就开车出发，一路顺利，天气甚佳。下午三时半抵达龙圩县，在岭南大酒楼住宿。房租每天2500元，伙食每餐1200元，每天平均要花几千元才够矣。包一船去梧州，每位500元。

十一月十一日 第十七天

今天到“联总”办手续去广州及领路费，每天500元，三天共1500元。

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八天

天亮后，全体将行李搬至“珠江码头”，从第一至第十二队排列整齐，顺序搬上船，验关，下午三时才正式开船。

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九天

天未亮，四时四十分船抵肇庆，停留一刻，继续航行。晚上十一时四十分安抵广州，仍未登岸。

十一月十四日 第廿天

早上七时许，全体登上同安码头。总领队及顾问先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办理手续，直至下午二时派车来送我们到三元里村，即广州市私立中德中学，内设临时招待所。

十一月十五日 第廿一天

今天休息，因身体有病到广州取药及打针，仍未好。

……又连续停留四五天，每天旅馆费3500元，连医治病用10余万元才愈矣。

十一月廿二日 第廿八天

今天七时三刻火车由广州开发，十一时一刻安抵九龙车站，验关后由电船送到香港海口，登丰庆轮前往南洋。

十一月廿三日 第廿九天

各位同志都在丰庆船上休息一天，因运南洋的货物未装完。

十一月廿四日 第卅天

在船上休息无事，登香港一游。下午未到三时马上返船，等待启航。想不到四时十分船头货仓发生火灾，英人消防船及时赶来，火灾马上被扑灭无

事。六时整船开了，向安南水域前进。

……

经过三天，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安南海口，停泊休息。

十一月卅日 第卅六天

我们的一位华侨机工同志在途中生病，医治不愈，抵安南时一命归西，结果交法医生开刀检查，办理安埋。他的名字叫——“陈荣”（第四批回国的雪兰莪南侨机工）。八年艰苦抗战他都坚持过来，可是南返与家人团聚只剩三天航程，却来不及了……

十二月一日 第卅七天

七时一刻船开至九十九湾，突发生危险，方向盘铁链断了，船身转头，马上落锚停泊，换新铁链。修毕继续前进。出了安南港进入大海，大风大浪又起，二层舱窗皆吹入海水。复员机工同志们的家眷及小孩子，没有见过这种情形，叫苦连天。

十二月二日 第卅八天

今天天气好，风平浪静，机工同志与几天来被风浪吓坏的太太们，都起来看海景。早上七时许，得见星加坡海口。七时三刻抵港，停泊验关。

十二月三日 第卅九天

下午，船才泊丹絨百葛码头，天又下雨，前来码头迎接的有“华人机工工会”、“琼州会馆”、“三民主义青年团”、“男女服务队”等团体。总领队看见今天我们这些打不死的南侨机工回来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很少，就将我们由昆明出发一路各机关团体赠送的锦旗挂在船上。忽然，观众越来越多，整个码头全满了……伍总领事亲身抵码头欢迎，脱帽向各位招手，登船慰问。然后，这批男女服务队帮助搬行李带小孩，用罗里车送到后港五条石亚答厝暂住，天色已晚矣。自十月二十六日由昆明出发，到达星加坡为十二月三日，计三十九天。

我们终于胜利复员南返了……

烽火的岁月 血染的日记

——记南侨机工张光旺

1940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一辆救济车风风火火地由保山驶向惠通桥边。据车队报告，晚上九点多钟，有辆从腊戍满载汽油回来的卡车，未知何故而翻了车，车上两名南侨机工翻入山沟底。该救济车就是奉命前来找尸体的。

救护人员在现场发现，一位驾驶员脖子被玻璃割伤，因流血过多已经牺牲了，查看证件，死者邓丁元是从泰国回国服务的机工。另一位司机受重伤，右眼暴出，脑壳和头皮破裂，浑身冰冷，但还有一口气，查看证件是“第9大队第6中队班长张万森”，当即用毛毯包裹起来，连夜送往医院抢救。到达保山医院时，天快亮了，经紧急施行手术，暴出的右眼被装了回去，脑壳和头皮缝了好几针，但伤势严重，大小便不通，仍处于昏迷状态。

一星期之后，伤员才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只见医生和护士在晃动。向护士了解之后，才知道翻车的过程和抢救的情况，才知道是医护人员把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这位伤员原名张光旺，祖籍广东大埔。他14岁只身到马来亚谋生，后来在柔佛州士乃埠当裁缝师。抗战爆发之后，报上登载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他便与“青年抗敌后援会”的伙伴们一起去报名。可是，南侨总会要的是汽车司机，他不懂开车，怎么办呢？他毅然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掉，买了汽油拜一位姓杨的师傅学开汽车。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突击训练，他终于学会了开车。为防止家人反对，他化名“张万森”，报名回国，赴滇缅公路服务。

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封锁了三个月之后重新开放，南侨机工立即投入紧张的大抢运。由于敌机日夜狂轰滥炸，晚上行车都不敢开灯。那天晚

上，在惠通桥畔的险要地段，由于刹车出故障，而发生了本文开头那惊险的一幕……

为了进一步治疗，张万森被送往下关医院，住院达18个月之久，直至1942年仰光告急时，虽然伤未痊愈也只好出院回昆明。抗战胜利之后，张万森于1946年复员南返新加坡。1948年再次回国，定居于故乡大埔。从1958年起，他一直在陆丰华侨农场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张光旺（万森）还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他用那架老式照相机拍摄的数十张记录机工生涯的历史照片，仍珍藏至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年抗日烽火岁月之中，他能够坚持写日记，忠诚地记录了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史实，为华侨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88年）

死里逃生 破镜重圆

——南侨机工王云峰的传奇经历

南朝时，陈国驸马徐德言因兵荒马乱与妻子乐昌公主各持一半铜镜而走散，后来凭着信物——两片破开的铜镜夫妻团聚，世称“破镜重圆”。这是一千多年前传奇式的故事，被历代传为佳话。在当代，也盛传着破镜重圆的真实传奇故事。它的主人公是王支峰和阿莲。

下面是南侨机工王支峰的录音记录：

我叫王云峰，1916年出生，今年70多岁了。青年时我参加过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抗战，起初主要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军火，1942年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在炮兵团服务。1945年回国，仍在炮兵团，1948年淮海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时，在金堂岛火线入党，随后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美援朝，1952年复员回海南岛工作。“文革”期间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落实中央关于南侨机工政策，享受100%退休金待遇。

我的老家在海南岛琼海县一个乡村，家境中平，属于小康之家。1934年，我在家乡与阿莲结婚，次年生下一个男孩。我俩男耕女织，孝敬父母，和睦美满。我的家乡是侨乡，每年都有不少人出洋过番。20岁那年（1936年），征得父母的同意，我买了一张船票（100元光洋），离乡出国。

我告别了妻儿，由海口搭船赴新加坡。在海上五六天的航程中，首先碰上一场霍乱风波，差一点被丢入大海。原来初次离家出远门，家中硬给多带一些月饼，不知不觉中竟染上霍乱，吃了饼之后，又吐又泻。幸亏一位医生

极力抢救，而同船中竟有人染上霍乱被抛入大海葬身鱼腹的。

到了新加坡，我首先学割橡胶，埋头苦干，经济收入还不错。不久，我积下一笔钱，打算过一段时间把阿莲及小孩也接来新加坡。

正策划着，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华，烽火漫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我虽安居海外，可是胸怀祖国，关心着抗战时局。我觉得，祖国一旦被灭亡，我们海外华侨就无脸见人，难以立身世界。因此，我积极参加筹赈分会的活动，上街卖花，参与义演，踊跃募捐，竭自己绵薄之力支援祖国的抗战。

1938年，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中国海上对外交通被日寇封锁隔断，因此，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即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当时国内正缺少熟练司机和修理工，西南运输处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求援。陈嘉庚先生立即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各地的华侨都积极响应。有一位海南籍的华侨王文松，是新加坡一家英国公司的工程师，月薪达200多元，亦自愿放弃优厚待遇，带动一批徒弟并将自备全套设备回国效力。我当时虽不会开车，但激于爱国主义热情，也前往筹赈会报名。可是，筹赈会要招的是能够从事抗战运输的司机，没有技术的不录用。第一次报名就失败了。难道报国无门吗？我不甘罢休，想立即学习驾车，争取机会投报祖国。

不久，海南岛沦陷的消息传来，我怀念家乡的父母、妻儿及乡亲们，眼前呈现一片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呻吟的情景，我恨不得立即飞身回国参战，亲手痛歼敌寇，驱敌于国门之外。于是，我与几个好友，凑了一笔钱，合租了一辆小包车，到公园草场上学习驾驶。我们请了一个马来人当教练，大家轮流学开车。由于大家胸中燃着抗日烈火，憋足了劲头，争分夺秒，结果学得很快，收效大，短短时间大家都“出师”了。

学会了开车，我再去报名，经过体检，驾车考核，终于被批准参加了南侨机工第九批回国服务团。

1939年8月，我们从新加坡启程，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乘“丰庆轮”，在海上航驶了三天三夜，经安南上岸，转火车到达昆明，进了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

经过短期的军训，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开赴滇缅公路，从事抗战军火的运输。当时的滇缅公路，可以称得上世界最惊险的运输线。道路

盘旋于原始森林与陡峭山岩之中，坑洼不平，尘土飞扬；雨天山洪横溢，泥泞难行。南侨机工驾车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在滇缅公路的艰难历程，每一个华侨机工都很难忘。我们车队要穿行“烟瘴之地”的原始森林，毒蚊横虐，有一次我被叮上了，随即发生严重的“寒热症”，幸亏战友们用“金鸡纳霜”及时抢救，才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

我真正的死里逃生应该是1942年5月——滇缅公路“大撤退”时的遭遇。当时，仰光已经沦陷，西南运输处尚有几百辆卡车，奉命日夜不停地向国内抢运大量积存在中转站腊戍的物资。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上人车混杂造成堵塞，南侨机工驾的车像蚂蚁在爬行，慢还不打紧，最可怕的是一经阻塞就得停下车来，拨开人群，挤出一条缝，车轮刚刚滚动几圈又被人群堵住了。临近惠通桥，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勐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的两侧已布满了炸药，随时都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击。我刚把车开过惠通桥不久，就传来炸毁惠通桥的爆炸声。当时，许多机工战友与无数难民，来不及过桥都落入日寇魔爪，少数人侥幸泅水过江，大多数惨遭杀害。我有幸脱险，但汽车出了故障，只好徒步绕道回昆明。

惠通桥炸断了，虽然将日寇阻拦在怒江天险的西岸，但是，在抗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滇缅公路中断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西南运输处（已改名为中缅运输总局），竟然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有的机工失业了，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沦陷，外汇断绝，有家难回，致使南侨机工陷入困境。我在云南举目无亲，便与海南籍机工王亚昌等一起报名前往印度。由于滇缅公路中断，中国失去了与英美等西方盟国的陆路交通联系，美英等国供应中国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只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输送。然而，这些在印度的军用物资，同样需要先用汽车运往机场，这又需要一批司机，为此，盟军便在昆明招募一批机工到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我怀着继续抗日的决心，应召前往印度协助盟军搞运输工作，后来，还参加过炮兵团。

1945年，我由印度返回昆明，又调到贵阳等地，继续从事抗战运输。同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我们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南侨机工，都盼望着复员回南洋过和平生活。可是，我又被编入国民党部队的炮兵团，抽调上内战战场。过去我们是为抗战而回国的，枪口对外，共同打日本侵略者，身上有劲；日本投降后，让我们打自己的同胞，心中难受，不想干了。后来，机会终于来

了，在淮海战役中，我们炮兵团被解放军包围时，我与几个华侨机工悄悄开车与解放军联系，终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后，我通过政治学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解放军炮兵部队中担任了教官。当人民解放军进军舟山群岛时，在解放金堂岛的战斗中，我在火线上入了党。我至今仍清楚地记住入党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是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把我从一个爱国华侨机工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我随着解放大军南下，正准备解放海南岛时，突然接到命令北上，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了国门，投入抗美援朝的正义战斗。在志愿军中，我继续在炮兵团中开汽车，还担任副排长的职务。有一次，在战斗中被敌机炸伤，于1952年回国治疗。养好伤之后，同年6月正式复员。当我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故乡时，油然而产生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感。这也许是海外游子归来时的共同感受吧！

那天旅途乘船转车，回到家乡已是晚上了。当我踏上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椰林道路时，不由思绪起伏，浮想联翩，一草一木都显得特别亲切，家乡起了很大的变化，旧时的记忆已有些模糊。走走停停，终于摸到自家门口了。我轻轻叩着家门，门好久不开，正觉奇怪，突然，门打开了，老母亲刚一探头见到我，顿时“啊”了一声，她惊呆了！母亲上下打量着我，迟疑地问道：“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见母亲惊恐不安的样子，连忙跪下说：

“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是云峰！我回家了！”这颤动的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堂亲叔侄们都围了过来，终于看清是我，于是迎进了家门。老母亲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拨开众人，只见她双手颤抖地把为我设置多年的“灵牌”打碎了！（后来听说这是我们乡村除凶祈吉的一种举动）原来，家中早认为我已死了，今天突然“复活”回家，又惊又喜：惊的是我的“鬼魂出现”，喜的是我终究“活人回家”！这可真是悲欢离合传奇式的一幕！

原来，1942年5月5日炸断惠通桥的时候，我已经侥幸过了桥，后来因车子出故障而徒步翻山绕道回保山，再辗转参加盟军赴印度。而同伴当中确有许多南侨机工在惠通桥殉难，幸存的人找不到我，便以为我牺牲了，于是给家中捎信。既然我已经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了，家中便为我“引魂”，建了坟墓，又请和尚做了“功德”，母亲还特为我设了“灵牌”，每逢祀日便烧香祭祀。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母亲不知为我流了多少

泪水。

我“死”了多年，又活回来，这是传奇。我能破镜重圆，更是传奇。

原来，我20岁出洋到新加坡时，留下阿莲及未满周岁的小孩在家中。1939年，日寇占领海南岛，阿莲带着小孩乘船出逃，从此杳无音讯。我复员返乡后，母亲悲伤地告诉阿莲走失的情况，对此，她抱着莫大的遗憾。我与阿莲婚后十分和睦，对于她的走失，我有揪心之痛。她的景况如何？十几年了，杳如黄鹤，那当然是凶多吉少了。日复一日，我只能当她早已离开人世了。

可谁也没料到，在我复员不久的一天，一位从新加坡回来探亲的乡侨，听说我大难不死特地登门访问。当他证实这一切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场宣布一条特大喜讯：阿莲现时还在新加坡！

原来当年阿莲带着孩子，乘船往香港辗转到新加坡。她到处打听，企望能找到我。没有料到我已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了。在新加坡，她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的同乡华侨收留了她。随着战局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疯狂南进，新加坡也沦陷了。后来，又传闻说我在抗战中牺牲了，阿莲在悲痛之余，不得不嫁给那位好心收留的乡侨，又生下一男一女，连同她从海南带的去男孩，已是二男一女了。

听了这个消息，我悲喜交集，悲的是日寇侵华害得我家破人亡，喜的是阿莲她还活在人世。说实在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要活下来已经是多么不容易了啊！既然她已在海外成了家，我也为她有了依靠、能在新加坡安居乐业而放了心。我并不奢望能再见到她。

可是过了不久，奇迹又出现了：

有一天，阿莲突然带着三个小孩（二男一女，其中只有长子是我亲生的）回家了，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原来，那位回乡探亲的华侨返回新加坡之后，将我的传奇新闻告诉了阿莲。这可给阿莲出了一个难题。从感情上讲，她听到消息后，就立即想回到我的身边。可是，那位乡侨，念在乡亲的份上，在抗战最艰辛的岁月中收留了她们母子，结合之后又生下一男一女，现在怎能忍心抛下人家呢？如今，这一妻二夫的尴尬局面使阿莲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真不知如何是好！

至于我呢，我当然不敢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是从抗日烽火到朝鲜战场过来的人，多次负伤大难不死，能活到胜利的今天已很侥幸了，而且

赤子报国

——海南岛南侨机工刘源访谈录

1988年4月，笔者前往海南岛拜访了十几位南侨机工幸存者，其中定居在东方（八所）的刘源，是战后复员南返的重要成员，曾任新加坡“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主席。刘源老人已年逾古稀，个子不高，精神矍铄。虽然饱经风霜，但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心直口快，真诚坦率。

提起难忘的往事，老人不禁感慨万分。他说：“我原籍海南岛文昌县龙马乡大惠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家。5岁便失去了父亲，母亲被迫改嫁。我自小就是由姐姐抚养的，到十几岁才上小学，因考试名列前茅，新加坡的叔叔知道了，资助我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后，于1935年前往新加坡谋生。”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到新加坡后，最先当学徒，勤快好学，又肯吃苦，不怕脏累，几年功夫，白手起家，开始有了积蓄，正准备开创自己的事业。然而，“七·七事变”爆发，激起我的民族义愤，我不愿当亡国奴，于是加入新加坡茶业工友互助会，又加入抗敌后援会，积极投入抵制日货、筹赈救国的工作。

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毅然报名参加，决心回国报效。我当时是个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凭着自己的一股爱国热情，说回国就回国，于1939年7月回到昆明。经过集训之后，我被分配到贵阳后方勤务部，编入汽车六团三营八连。这是一个著名的“华侨连”，司机都是海外归来的健儿，连长是梁志坚。队部驻唐家山，专门从事抗战军事运输，冒着敌

人的枪林弹雨，将部队给养运到前线。

1939年底，南宁失守，为了收复失地，我们华侨连也积极配合，穿梭于前线与后方之间，主要走柳州、宜山、河池、三旺、东兰、靖西、百色一带，负责运送兵员粮食和武器。当时拉锯战异常激烈，我们穿行在这条新开的运输线上，时常遭到日军炮火的袭击，不少华侨机工为国殉难。

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之后，日寇从广西桂林一直打到贵阳。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汽油，我们就改用木炭车。在1943至1944年反攻阶段，盟军开始配合反击，美军用飞机运载汽油起落于云南的沾益与陆良两个机场，我们华侨机工继续驾车运送汽油至各前线。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准备复员返回南洋。由于国民党当局有意阻挠，使复员工作拖延，进展缓慢。海外陈嘉庚先生则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呼吁，终于促使机工复员南返。但个人情况不同，有的已在国内成家了，有的不想回南洋了，有的则因失去联系而留下，我则抓住机会，办理复员南返。复员时，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一张奖状，文为：“华侨机工刘源，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也发我一份证明书。此外，我还荣获两枚珍贵的纪念章，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另一枚是“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

1946年底，我们复员回到新加坡，受到侨胞父老的热烈欢迎。战后的新加坡，百废待兴，生活艰苦。我继续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人与英殖民当局斗争。1954年被选为新加坡司机工友联合会副主席、新加坡电车工友联合会副主席。我们还于1947年成立了“新加坡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公众推我为互助会第四任主席等职。50年代中，新加坡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罢工频繁。我因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于1957年被新加坡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共党暴乱分子”，囚禁一年零三个月之久。关禁期间，电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1958年，我全家四口被驱逐出境。

祖国派船把我们接回，从此，我在国内安居乐业，积极工作，多次受到表扬。1946年，调到海南岛东方盐场工作。

后来“文革”开始，灾祸降临，我因参加南侨机工的历史而挨整。由于南侨机工隶属国民党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因此被戴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又加上华侨“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关进“牛棚”。

值得庆幸的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华侨政策得到落实，南侨机工的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和肯定，我的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

(1988年)

中印缅公路上难忘的战斗

——记由机工升为翻译官的黄迎风

1939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黄迎风，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还参加过远征军入缅作战，由驾驶兵提升为少校翻译官。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在缅甸会师之时，他分享了胜利的喜悦，奏凯归来，受到热烈的欢迎。

弃家赴国难

黄迎风，又名黄万全，祖籍海南文昌，自幼与父亲到泰国，12岁时随外婆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努力读书，以英文为主，也学马来语、福建话和广东话。为适应当地的生活，他在语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1930年，黄迎风到马来亚吡叻州太平埠一家罐头食品公司当学徒。公司的顾客大都是欧美人，因此，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与洋人一起工作和接触中，英语水平迅速提高。他的工作受到好评，1933年成为售货员。从此，他经常随车送货上门，还学会了开车。由于平常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为公司赚了不少利润，他个人待遇也随之提高，家庭生活得到改善。

当南侨总会征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黄迎风在是否报名的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他为抛弃目前堪称满意的职业而感到惋惜，因为年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弟都要靠他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但同时又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能坐视祖国于危难而不顾。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何在？当一个没有祖国的侨民，怎能立足于世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毅然报名，弃家赴国难。

出发前，公司为他们特制了金质纪念章，勉励回去之后要为国立功，为华侨争光。送行的队伍中，有老一辈亲友，也有依依难舍的知己。但是为了抗日救国，他终于挥泪而别了。

1939年7月3日，黄迎风参加由廖萍领队的第七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于7月11日抵达昆明，经潘家湾西南运输处短时间学习后，便整批地分配到后勤部汽车第31团第八连，驻扎于贵阳唐家山。这是在荒山坡上搭起的草屋营房，离贵阳十多公里，离村落亦远，其住宿之简陋和生活条件之艰苦，是他们在南洋时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大家为了抗日救国，家都弃了，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为收复南宁而拼命运输

八连的连长梁志坚是广东梅县人，是早些年从南洋回国、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军人。他带领全连驾驶员，安顿了生活，再领来了新车，大伙驾车往返于广西前线，运送军用物资和生活补给品。1940年，日军占领了南宁，企图侵入贵州，切断川滇运输线。我军组织兵力反攻，集中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八连在内，抢运兵员，奔赴前线。双方争夺异常激烈。1941年，我军收复了南宁。在这次战役中，不少华侨司机光荣牺牲，为祖国献出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华侨司机勇敢赴敌的精神，上级特发给奖状，以资鼓励。

运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南洋各地，并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企图切断滇缅运输线。为了保卫这条运输线，我国组织军队入缅，协同英缅联军作战。谁知英军战斗力不强而被包围。此时，我国第38师前往救援解围，击退了日军，救出了以亚历山大上将为首的英军7000多人，还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美传教士500多人。这次战绩，使中国军队的声威大振。为了表彰战功，英国女王向第38师师长孙立人授了勋章。

八连在远征军入缅时，承担了运输任务，因此，也一度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协同盟军反攻缅甸

远征军在缅甸的胜利，仅是昙花一现。由于英军不顾大局，再次撤退，会战的计划破产了。中缅战区司令部只好部署退却，一部分撤入云南，一部分撤往印度。

1942年，为了协同盟军反攻缅甸，我国扩充了驻印军事力量，八连被调入汽车六团入驻印度，经常要与英美军联系，从领车到领料，从修车到装配运载，从问路到去市场购物，都需英语翻译。黄迎风早年学习过英语、广州话和厦门话，在这里竟派上了用场并被重用。不久上级批准他为三级英语翻译员，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校官，并领校官在印度服务的津贴待遇。

中国人印远征军是由前从缅甸退入印度的38师与22师为基础，外配两个工兵团、汽车六团、高炮营和坦克营组成的。经过近年的休整、充实与训练，并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1943年，驻印远征军开到上利都，在野人山原始森林的掩护下筑路前进，美军两个机械化工兵团、一个步兵旅、一个宪兵团及后勤部队协同行动。

开辟中印公路是项艰苦而伟大的工程，它既要预防敌人的袭击，又要与蚊蝇、蚂蟥、毒蛇、猛兽作斗争。当时环境恶劣，许多人因染霍乱和伤风等疾病而丢失了生命。尽管如此，官兵们仍日夜辛勤地施工，还铺设了一条油管沿着公路向前延伸，隔一段距离就设一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厂。

当时，汽车部队经常要与油站、修理厂打交道，为了方便司机们与美军交往，黄迎风教司机们用英语讲汽车的各种零件和油料的名称，以及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方便了司机们的工作，受到司机们的欢迎和称赞。

1943年年底，公路通过野人山进入缅甸境内时，这里已被日寇封锁。为突破封锁线，每天天一亮，美军飞机便一批批飞来前线，在日军阵地上轰炸扫射，我国的炮兵也随之向敌人开炮轰击，此时士兵们勇猛地冲上去，用冲锋枪、喷火器射击，一个一个地把据点夺下来。

前线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在后方工作的官兵更为振奋，个个摩拳擦掌，要求上前线杀敌，以发泄久积心中之恨，报仇雪耻。

打通中印公路运输线，是盟军在亚洲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战略。随着中印公路的打通和缅甸战场的胜利，中国远征军在美军的协同战斗下，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直下密支那、八莫、南坎和腊戍，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1945年春，远征军与盟军在滇缅路上会师。这时，外援的汽油源源输入昆明，成百上千辆汽车又开动起来，每天都有成百吨的物资运入祖国。

这时，第38师升为新一军，继续向南追击穷寇。人们欢欣鼓舞，期待着最后胜利的到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时汽车六团尚在缅北执行任务。消息传来，人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它是无数英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这时，盼望已久的回国时间到来了。各营、连都把车辆重新整理换新，以备几千公里行车之用。1946年春，汽车六团550多辆十轮大卡车和20多辆中小吉普车，排成几公里长的纵队，浩浩荡荡地由中印公路开入老滇缅路，经过昆明，安全到达贵阳。在祖国大道上，受到沿途市镇、村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和迎接。其时的激动自豪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解甲为民

回到祖国后，上级要把黄迎风留在部队，继续当军官，但他探望母亲心切，便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办理了复员手续，告别了战斗多年的部队。后来因其母亲病逝，加上其他原因，黄迎风在长沙开商业汽车，直至海南解放才回到海南家乡。

返回家乡后，由于人们对黄迎风这段经历不了解，他竟受到“管制”处理。后来，在土改划分阶级时，他被划为贫农，人民政府还批准他考取驾驶员执照，并介绍他去海南劳动局分配工作。从此，他犹如枯木逢春，重获新生。黄迎风怀着高度工作热情，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从1953年初开始，他相继在海南汽车运输公司、海南建筑公司、东方县商业局、东方县建筑公司、东方县综合厂和东方县农机厂任汽车驾驶员，直至1979年光荣退休。

（1988年）

一个华侨热血青年的追求

——南侨“编外机工”蔡如秋访谈录

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华侨农场，凭着友人提供的一丝线索，我找到了蔡如秋先生——一位鲜为人知、当年自费从泰国回来参加抗日运输的南侨机工。尽管岁月无情地将他的鬓发冲刷得雪白，但从老人坚毅的脸上，我仍能寻找到当年热血青年的身影。

与众多南侨机工统一组织回国服务的经历相比，蔡如秋的经历更为独特些，他是目前硕果仅存的自费回国的南侨机工。

蔡如秋，原名蔡美光，祖籍海南，1919年出生于泰国。1937年卢沟桥抗战的炮声，在海外侨胞中引起巨大震荡。1938年就有许多旅泰侨胞纷纷回国请缨。

“当看到别的华侨青年满怀壮志地回国参加抗战时，我也坐不住了”，蔡美光告诉我：“1939年从报纸上看到新加坡陈嘉庚先生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我们非常激动。当时滇缅公路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为了报效祖国，应该有一技之长，因此，我便与同学文永丰去学习汽车驾驶技术。”由于当时泰国尚在銻披汶高压统治之下，华侨抗日救国活动不能像新加坡等地那样公开。蔡美光等人苦于报国无门，于是求助于当地《华侨日报》主编老丁，询问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方法和路线。在弄清前往昆明的路线并筹足旅费之后，他与文永丰又邀集了五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郑庆光（郑亚泉）、沈世成、吴镇初、陈如陵和章文育，按照老丁介绍的路线，于1939年8月3日离开曼谷，途经柬埔寨金边、安南河内，于8月15日抵达昆明。一问，才得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第9批人员也是近日到达昆明后驻扎在西

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的。他们一行当即前往要求参加，遇上了值星大队长郭清。在说明来意之后，郭大队长答应去与该所的教育长张炎元及总队长联系。他们很快被接纳，顺利地编入第9批机工服务团集训。

在潘家湾训练所，他们与南侨总会集中组织回国的机工队伍一起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他们7人当中，章文育是搞机修的，安置在修理厂，其余6人编在第二大队。蔡美光与文永丰同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是孙仲汉，印尼棉兰华侨、第9批机工总领队吴福华任中队副。除了一般的军事训练之外，他们还投入适应山区崎岖道路的驾驶训练。三个月之后，蔡美光与文永丰经驾驶考核合格，文被分配前往广西，他则被分配到安南海防的西南运输分公司。在海防，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码头抢运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运回广西镇南关，然后由其他车队接运至昆明。

1940年10月，蔡美光一行奉调回昆明，此时正值滇缅公路封锁三个月之后重新开放，第9大队即将开赴芒市，他们便被编入第9大队27中队出发了。这回的任务是接“大道奇”新车，从缅甸分段将军用物资运回国内的遮放仓库，再转运至芒市、保山等地仓库。这一时期，是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的高峰期，南侨机工全力以赴，闯过滇缅路上的各种险阻难关，穿梭往来，为“抗战运输管”的畅通作出重大贡献。

接下来，西南运输处改为滇缅公路运输局，第9大队与12大队合并为第15大队，驻扎在保山，此时的运输路线，主要行驶于保山、下关、昆明之间。

1941年，蔡美光又转至缅甸腊戍西南运输处分公司车队。谈到在国外的运输生活，蔡美光说：“在腊戍的任务主要是赴仰光将外援就地安装的各类汽车驶回国内遮放、芒市一带。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局势一天天严峻起来，为了赶在沦陷前尽量将军用物资运回国，南侨机工再次掀起抢运热潮。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但局势并未挽回，仰光很快失陷，日军沿滇缅公路进攻云南境内。当日兵追到惠通桥时，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断此桥，凭借怒江天险固守，滇缅公路从此中断。“随着战事的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我也失业了，只得靠早些时候撤回昆明的旧友文永丰、沈世成等人的接济维持生活，这是相当艰难的一段日子。”

与多数南侨机工的遭遇一样，蔡美光开始四处飘零。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到柳州考取了驾驶执照，于1943年进入捷和钢铁厂开车。后来，由于日寇进攻湘桂，柳州紧急疏散，许多工厂迁至河池、独山，一时无法复工，工厂

编队并与其他华侨学生一律待遇呈请备案由。

拟办：准予备案。

公文内容如下：

窃取所准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理事会介绍司机郑庆光、吴镇初、陈如陵、章文育、沈世成、文永丰、蔡美光等七名来所受训，已于八月十五日到所，十六日即行编入华侨第二大队第七队训练，并与其他华侨学生一律待遇，所有接编该生等经过情形，理合呈请

钧处鉴核备案，实为公便。

总经理处主任 宋

副主任 龚、吴、刘

兼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 宋子良

兼副所长 龚学遂、吴琢之、刘吉生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二十八日

由纪念碑落成引出的一段难忘的回忆

——广西南侨机工殷华生自述

1989年“七·七”之夜，在祖国广西山明水秀的一边陲古城，一位年逾古稀的马来亚老华侨，打开电视按键忽然一愣：突如其来的电视镜头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老花眼了，连忙呼来夫妻一同“证”“视”现实。他揉了揉双眼，定神仔细一看，“对了，全是真的！绝不是做梦！”老人乐了，饱经风霜的脸上绽出久违的笑容。

这是由“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落成剪彩镜头引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下面请听本文的主人公——南侨机工殷华生的自述：

今年7月的一天，我偶然从电视中看到南侨机工纪念碑在昆明落成剪彩的镜头，这对我这个“被遗忘”的原南侨老机工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记得在抗战时期，我们就希望能为死难的南侨机工战友建一座纪念碑。半个世纪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能有这一天，是我们在“文革”时被关在“牛棚”里所不敢想象的。我仿佛一下子又年轻了20岁，高兴得彻夜难眠。半个世纪来的悠悠往事，如同电影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蕉风椰雨的外洋风光——如火如荼地筹赈救亡热潮——报名参加机工团的狂热情景——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的惊险镜头——抗战胜利之时的狂欢场面——战后的风风雨雨以及坎坷的人事沧桑——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一起涌上了心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老妻匆忙登程，前往省城南宁，找侨务部门谈我的南侨机工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南宁市侨务部门非常重视我的来访，不但

查到南侨机工名册档案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殷华生”三字，而且还查出三年前（1986年）国务院侨办、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发出的侨政会字第23号关于给予南侨机工生活补贴费的文件。

为了落实政府对南侨机工照顾享受100%退休金的政策，南宁地区侨办特别致函我所在的林业汽车运输公司，给本人补发了从1986年以来的补贴费四百多元，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喜事。回到家，我买了一串鞭炮放得震天响，引来周围人们的围观。一些熟人得知缘由后，亦为我庆幸。为了重温我过去的光荣，我和老妻便决定到昆明去瞻仰纪念碑。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与老妻怀着回娘家的兴奋心情，风风火火地来到当年战斗过的故地重游。如今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昆明变化太大了。在昆明，我们受到“娘家”——侨联及“南侨机工联谊会”的热情招待，工作人员陪送我俩来到西山公园，瞻仰纪念碑。当我下车抬头一看，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矗立眼前，比在电视上匆匆一瞥的印象高大多了。望着“赤子功勋”四个大字，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感到一股强劲的暖流从身上涌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限光荣，无比幸福！我觉得有了纪念碑就是对我们南侨机工的爱国之心的最充分的肯定。

时间回溯到半个世纪前，由于日寇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祖国大地燃遍抗日烽火，远在海外的华侨，亦出钱出力，掀起抗日救国热潮。那时，我随祖父母和父母在马来亚谋生，在彭亨文冬埠的一家公司开车，过着舒适的生活。当陈嘉庚先生号召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唤起了我立志报国的决心。当时，我也想过，父亲有一辆40座位大客车，有60亩果园，都很需要我，而且我已结婚并有了女儿，祖父母、父母和妻子是不会同意我走的。如果在本埠报名，家里肯定会发觉，我就悄悄地跑到吉隆坡报名，瞒着家里。等至出发日期，我才悄悄地离家去新加坡。当父亲发觉后开车追到新加坡来阻止时，我已坐上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轮船了。父亲没有找到我，我们就这样连最后的一面也没有见上，生离竟成了永别。我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之下，毅然不顾家中年迈的祖父母及疼儿心切的父母，甚至割断了朝夕相处的夫妻情。时至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做了祖父，才能切身体会到当年我的祖父母、父母、妻子该是怎样的心情！假若时光能倒流，我真愿意再次跪在祖父母及双亲面前，再说一声“再见！”然后互道

一声“珍重”而别，不至于给他们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古语云，忠孝两难全。当年我满腔热血回国抗战，一片忠心可对天！如今，只能求我祖父母、父母的在天之灵原谅吧！

1939年4月，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途经安南抵达昆明，编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龙陵第12大队，大队长是谭江柏，分队长谭英祥。从此，我就在滇缅公路上日夜开车搞运输，满载枪支弹药由遮放运回昆明。当时滇缅公路刚从高山险谷中开辟出来，路基不坚固，道又窄，坡又陡，弯又急，下起雨来成泥坑，出太阳时变“搓板”，崎岖曲折，坎坷颠簸，难走极了。来往的车又多，都是赶任务，稍一疏忽，就出事故。天上还常有敌机来轰炸，沿途常翻车，令人惊心动魄。我曾亲眼目睹许多机工战友翻车滚下百丈深谷，有的连尸体也找不回来……我告诫自己，为了安全完成运输任务，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开起车来，专心致志，不超速，不超车，看准路。碰到对面车，主动让道。平时爱护车，常检查。加上我从来不抽烟，出车不喝酒，我做到了在滇缅公路上安全行车几十万公里，没有出过任何一件大小事故，表达了自己报效祖国的一片心意。

1939年11月，我驾车从重庆返回昆明，正值广西昆仑关战火纷飞。我们奉派立即驾车转赴南宁，在宾阳——柳州之间，救运伤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出生入死抢救伤员。任务完成后回昆明，学习了两个月，熟练驾驶英产8吨大卡车后，被派往下关，抢运军需物资回昆明。

有一次，队部派我们两人运载步枪子弹赴亦龙。车开到马龙山间，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土匪，扬着手枪堵车。车停了，车门打开了。土匪逼着我俩立即交出钱来，否则开枪。我吓了一跳，随后陪笑回答：“对不起老哥，我们穷司机没有钱。”“没钱，立即把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不然，要你的命！”“好，好，我们脱。”我俩边脱边交换一下眼色。我脱下大衣，在交接的一瞬间，突然出其不意，张开大衣，往土匪头上蒙盖下去，随即连衣带人紧紧死抱住他，我的助手随即冲上来，夺下土匪手里的勃朗宁手枪。可是山上还有几个匪徒，还在挥枪指着我们大骂，向我们冲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运送新兵的车子刚好到来，山上土匪见势不妙，只好逃之夭夭。我们把匪徒连枪交给新兵连带走。

1941年，有一次队长派我专车运汽油去重庆，车上装了21桶汽油，我

小心谨慎地运送到重庆南岸，才松了口气，还未卸货，敌机突袭的警报突然响了。只见男女老少慌乱躲避，我就地隐蔽起来。空袭警报解除之后，我卸完了汽油，搭渡船过江，到重庆市区观游。走到一个防空洞附近，只见街道两旁三步一岗地站了两长排宪兵，阻挡着不许通行。我随人群涌到宪兵背后向前看去，只见防空洞口停着几辆大卡车，许多人在忙着从防空洞里抬出尸体，一具具往车上丢，车装满了立即开走。不久，开来了两辆小车，从车上下来了十几个人，走向防空洞口，走在前面的那个全副军装，光头没有戴军帽，另一个身穿长袍，胡须很长。他俩看了一会儿，问了几句，穿军装的铁青面孔，说了几句，挥了几下手。我旁边的人议论着，说那两个就是蒋介石和林森，宪兵还回头瞪了一眼。我还听他们议论说，防空洞可装几万人，里面空气缺氧，平常警报解除，立即打开洞口大门。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警报已解除好久了，大门还不打开，结果，造成窒息大惨案，除了近洞口的一部分人，里面的男女老少，大部分窒息死亡。从尸体上取下的手表、戒指、手镯、钢笔等，堆积多少箩筐，旁边的人还说，蒋介石说的大概是，把管门失职的人立即抓来枪毙。这就是重庆防空洞的大惨案，真是惨不忍睹，这也是日寇在我国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1942年5月，日寇由缅甸入侵滇西，守军炸毁惠通桥，将日军阻隔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被切断了。西南运输处改为“滇缅公路管理局”，实际上只管惠通桥以东至昆明的军运。而被遗弃的怒江西岸的数百辆卡车和南侨机工，则陷入敌手。他们大多惨遭杀害，只有小部分泅江归来。管理局军运任务锐减，车辆残破，车队瓦解，南侨机工人员星散。失业、饥饿、贫病交加，不少南侨机工露宿街头，冻死巷边，暴尸荒野。我看到形势如此凄惨，也动了思乡之念。有人劝我趁早回马来亚。我想念家里高龄的祖父母、年迈的双亲，还有妻子女儿。我也盼望着有机会回去一家三代团圆。但是，摆在面前更使人揪心的是，保山遭日机轰炸的大惨案、滇西日寇的大屠杀，国土未复，日寇未灭，我怎能回家？我记得陈嘉庚先生的叮嘱：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抗日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我深感报效祖国的任务尚未完成，决不能打退堂鼓，而应咬牙坚持下来。但是，我还能干什么呢，此时，已无汽车需要我驾驶了。

1943年，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参加了“美国陆军炮兵游动修理队”在昆明干海子修理各种大炮。我既会修理汽车，也可把修理技术用到修大炮上。

经数月完成了任务之后，随即出发到保山，分成两个分队，每队十多人，分头开展工作。我编在第二分队，队长徐汉生，也是海外归来的技师，专门修理望远镜及指南针，兼当翻译官。我则负责专门修大炮。有的大炮炮筒炸烂了，就换一个；撞针断了、秃了，要换，要磨；炮身因弹簧失灵，无法进退运转，要调节；瞄准器失调失不准，要调整。经过我们抢修完毕，立即当场实验。官兵们都很满意。我们先后到了下关、大理、凤仪、弥渡、巍山、云州、祥云等处，为第5军、第6军、第71军、独立炮兵营、36师等部队修理各类大炮。到处都有专车接送，很受重视，每次修完他们都要颁发给我们纪念奖状。我们到处抢修，大概搞了四五个月，主要都是在怒江以东工作，条件方便。此后，由于工作需要，就进一步向西挺进。

第二分队有五个美国人，由一个名叫克罗纳的中校带队，中国人中挑选出我们四人，一共九人，每人配备卡宾枪、子弹、食宿用品等美军军用物资，由骡马驮着，向西步行，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在山林里，天黑了就在两棵树间挂起睡袋，远离地面，能避蛇蝎野兽，又能防止蚊蝇叮咬，还不怕雨淋。

到了怒江边上，我们早有准备，拿出了橡皮艇，顺利渡过怒江。又经四天跋涉，到达了象达。前面三四公里处，就是同日军作战的阵地。日夜炮声隆隆，前线把大炮拖回来，我们就马上抢修，修好立即就送回前线。有时，前线作战紧张，或者大炮太重，不便拖来拖去，我们就赶到前线抢修，一边修理，一边作战，截断了日军的退路。当时日军企图由龙陵向畹町撤退，我国在印度的新一军，巧妙地包抄过来，两面夹攻，炮火震天动地，打得日寇死伤惨重，尸横遍野。我们九人小组不断修炮，痛击日寇，不觉过了三个月。这时已是1945年8月，突然传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的消息，抗战八年终于最后胜利了。我们欢天喜地，喝酒放炮都难以表达胜利的豪情。记得胜利的那一夜，我们狂欢到天亮。我们在潞西，加紧把打坏的大炮统统修理好后，然后高兴地开车回到保山，把积存在保山地区的大炮、机关枪等修好，交回军部，这样才算最后完成任务。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军中美军民合作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当美国人要转道昆明飞回国时，我们就在保山依依惜别。临别时，美军中校特别颁发给我们一张奖状，并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说：“这不仅仅是一张奖状，而且是一张美国特殊通行证，只要你拿着它到美国大使馆，任何时候都可以到美国

来，后会有期。”可惜，这奖状连同其他奖状，在“文革”期间，全部被付之一炬了。幸亏我的老伴胆大心细，把三枚纪念章保藏下来。第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第二枚是“华侨互助会会员证章”，第三枚是“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纪念章上刻着：“保卫祖国”、“捍卫祖国”，今天看起来，倍觉珍贵；闪闪的金光，更显示了我们海外赤子的赤诚之心。

(1989年)

从滇缅抗战到江汉建设

——记葛洲坝南侨机工谢耀南

抗战胜利之后，除了复员回南洋之外，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主要分布在滇缅公路沿线以及闽粤家乡，但还有部分星散在祖国的天南地北。现居住在湖北葛洲坝的谢耀南，就是其中之一。

佩带“抗日救国”金质纪念章踏上征程

193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吉兰丹的各界华侨在聚春酒家隆重举行宴会，这是专门为欢送南侨机工回国参战而举办的。当地中华总商会负责人马奇杰站起来讲了话，他勉励南侨机工回国之后，要不畏艰难，不怕流血牺牲，为国出力，为华侨争光。说完，他将两块特制的铸有“抗日救国”四字的金质纪念章分别挂在谢耀南和何纪良胸前。

欢送宴后，谢耀南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而最使他闹心的是母亲从泰国的来电。原来他是瞒着唯一的亲人——母亲，报名参加机工团的。

谢耀南原籍广东惠阳，1919年出生于泰国北大年，1934年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到吉兰丹益昌百货商店当学徒，后来学会了开车。这次他没征求母亲的同意，就与好友何纪良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当他母亲从华侨报纸上看到“谢耀南”的名字时，便从泰国来电，要求儿子回去见面。谢耀南回到泰国见到母亲时，母亲泪飞如雨，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深怕他回国后在烽火漫天的战争前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实在放心不下。但是，谢耀南回国抗日的决心已定，无论母亲如何劝说，他总是不动摇。他耐心地等母

亲把该说的话说完，然后恳切地向母亲保证：抗战一胜利，就马上回家团聚。母亲通情达理，终于同意了。

告别了母亲，谢耀南加入南侨机工第二批回国服务团的行列，被委为该队文书（总领队为钟运熙）。这一批共207人。1939年3月13日，乘“丰祥轮”经安南西贡，然后转乘火车直奔祖国西南大门——昆明。虽然连日来旅途上车船颠簸劳累，特别是启航后的第二天早上，曾遇到一艘悬挂日旗的舰船，为防止其袭击，全船上下都紧张了一阵；然而大家都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心，精神仍然十分饱满。

无私无畏，在日寇机翼下抢运抗战物资

谢耀南经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第11大队33中队任分队长，住在云南保山，担任滇缅公路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他和战友们跋山涉水，穿梭险路，备尝辛苦，历尽艰险。1940年，时局紧张，当时在安南境内有一批军用物资急需运回国内，他带领33中队，开赴广西整编，成立了“红牌车”大队，住进平马，车队往返于安南的海防、谅山等地。这条公路路面狭窄，桥梁简陋，每往返一次，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一进入国境线，又随时可能遭到日机的突袭。一旦有空袭警报，车队就要迅速分散隐蔽。记得曾有一次警报后，日机已经临空，有两位司机来不及驾车隐蔽，汽车被炸毁，司机也因此牺牲。另一次，车队到了平马，司机把汽车隐蔽在郊外，然后到平马镇吃饭，敌机在上空找不到汽车目标，便对平马镇进行狂轰滥炸，虽然车队幸免于难，但平马镇几乎被炸成废墟，百姓伤亡惨重，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就在日机经常空袭的情况下，大家仍精神焕发，勇往直前，坚持了数月的突击运输，终于完成了任务。

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安南，封锁了我国通往安南的公路。谢耀南带领的第33中队又回到云南保山，担任滇缅一线的运输任务。但保山也连续遭到敌机的轰炸。有一次，他们的车队刚离开保山不久，住保山的部队和惠通桥便遭敌机的轰炸，许多房屋被炸毁，伤亡很大。在滇缅公路上行车更为艰险。这条公路的许多地段是从高山密林中穿过的，有的地段悬崖峭壁，路面狭窄，坡陡弯急，加上敌机时来骚扰，稍有不慎，就有车翻人亡的危险。他们除运汽油、药品之外，每天还要运输其他军用物资和生活补给品。在这坎

坷不平、硝烟弥漫、风云不测的运输线上，大家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越战越勇，一直坚持到抗日结束。

抗战胜利后，西南运输处交由云南输公司管理。谢耀南被分配到中国柴油公司开车，后来调到重庆劳工协会任司机。1946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筹划南侨机工复员，他被指定负责重庆市的登记工作。在领取了新加坡的入境证件和旅费后，谢耀南等复员机工到昆明集中，分乘三架运输机经桂林到广州，再由广州经香港乘海轮回新加坡。到达时，受到新加坡以及原侨居地吉兰丹各界华侨人士的迎接，并发一笔“胜利奖金”和生活费。随后，谢耀南被安排在南洋烟草公司修理车间工作。

情系神州，再次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谢耀南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建设正在飞速发展的报道，不由得怀念起他为驱逐日寇而浴血战斗的祖国，怀念起在大西南共同生活战斗的父老乡亲。当时，他在新加坡领的工资胜过国内好几倍。但他想，日寇侵华八年，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践踏破坏了。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正需要人才。于是，他放弃优厚的工资待遇，放弃舒适的生活，再次投入祖国的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谢耀南再次回国，受到人民政府的欢迎，被分配到武汉水利局工作。他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工会组织委员、华侨组组长。1958年，武汉支援“三线”建设，他被调往丹江水电工程局修配厂工作，先后担任检验员、车间主任。1973年，谢耀南又调到国家重点工程葛洲坝工程“三三〇技工学校”任教员，培养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直至1979年退休。他常说：在祖国工作，钱虽不多，但生活可过得去，且领导信任，同志关心，心里十分舒坦。

(1989年)

惠通桥虎口脱险记

——成都南侨机工吴璋访谈录

1988年1月26日，笔者在成都访问了被誉为“八十先锋”的第一批回国机工幸存者——吴璋。吴老先生祖籍福建南安，是在新加坡出生的，现虽已年逾八年，但身体硬朗，记忆力很好，讲话声音洪亮，只是患哮喘症未愈，谈话过程不时被咳嗽声打断，却仍十分健谈，兴致极浓地讲述了当年参加机工团的难忘经历。

1939年，本来在马来亚福兴汽车公司开车的吴璋，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参加了峇株巴辖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该埠中华商会暨各社团、各热心人士资助下，他们一行48人，于2月17日由峇株巴辖启程，浩浩荡荡开抵新加坡集合。当时在新加坡《星州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对华侨机工返国服务给予高度赞扬，在他发表的《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一文说：“这48位勇士，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半个世纪过去了，吴璋至今还记得该机工团48人的名字：正团长廖国雄、副团长刘谭福，以及团员叶修青、徐元镗（今在昆明）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亦集合了第一批南侨机工32人，正队长是白清泉，副队长是傅瑞生。新加坡和峇株巴辖两地机工共80名，共同组成南侨总会统一正式遣送的首批回国服务机工团。吴璋还清楚地记得，当天下午，陈嘉庚主席在怡和轩俱乐部召见了全体机工，并发表演说。陈先生说：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劳

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无愧。”

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八十先锋”正式启程，他们乘搭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赴法属安南，途经西贡，由海防登岸，再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胜利抵达昆明。然后编入西南运输处赴滇缅公路服务。

吴璋回忆说，滇缅公路是西南大后方最重要的抗日运输线。他们天天在滇缅公路险恶的路段与死神打交道，与瘴气斗，与毒蚊斗，还得与日寇的飞机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经常处于死亡边缘。其中最惊险的经历，则是大撤退时惠通桥虎口脱险之事。下面，就是吴璋的讲话录音：

1942年5月初，我们车队一行9人，到芒市运汽油。当时因日本占了缅甸，大量难民回国，我们也奉命一起撤回。滇缅公路上挤满了各式车辆，两旁尽是逃难的侨民，他们扶老携幼，秩序混乱。车子走走停停，有的开不动了，就被推下旁边的深谷。日本兵也化装（穿第五军的军装）尾随而来。到了惠通桥边，检查站查到了装在卡车里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于是当局下令自己炸断惠通桥，把日寇阻截在怒江西岸。

我们的车子开到临近惠通桥边，突然听到“轰隆”的爆炸声，惠通桥随着爆声被炸断了。走在桥上的难民以及拥挤过桥的卡车都掉入江中，惨不忍睹。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我们连忙煞车，躲到旁边山上。又一想，汽车上装载的汽油不能落入敌手，于是，又回来点燃汽油烧毁卡车。我们正在烧车，日本兵看见了，就包围过来，一看我们是驾驶兵，也许认为对他们有用，就抓了起来，关在一间破篱笆墙的屋子里。我们9个人被捆在一起，遭到一顿毒打。第二天，日本兵开始分配我们作苦力了，有的被派去砍柴，我则被叫去挑水，到了晚上，又将我们捆了起来。外面留一个日本兵站岗。我悄悄与大家商量，应抓住机会连夜逃跑。半夜，日本兵抱着枪睡着了。我们挣断绳子，互相松绑，就朝江边跑去。不知是哪个驾驶兵碰到东西，碰出了声音，日本兵醒了，马上开枪射击。我们分散逃亡，只有我与李五安跑到惠通桥下游处，其他人被冲散了，至今不知死活，也许都牺牲了。

滚滚的怒江横在前面，水流湍急，虽已是五月初了，依然冰冷刺骨。但

为了逃离虎口，我俩还是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只将驾驶证含在口中，跳入江中泅水归队。江流很急，又有漩涡，把我俩冲散了，我只好随着江流漂，大约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漂到下游斜对岸。

泅水过江后，已经精疲力尽，被岸边我国驻军发现了，以为我是身份不明的危险人物，另眼看待。我连忙说我是华侨机工，刚从日本兵那边逃回来。驻军人员检查了我的驾驶证之后，指着一条山路说，那里有一座庙，里面有逃难的。于是我吃力地攀登着前往。当时又冷又饿，再加上刚水泅时严寒的刺激，一直咳嗽，结果，留下了气喘后遗症。在这座古庙里，住满了逃难的缅甸华侨，大多是福建、广东人。我用闽南话与他们交谈。他们得知我是南侨机工，一位老华侨马上拿出一套西装给我穿上，并给了一些饼干充饥。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结伴一起徒步回昆明。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脚底磨出了血泡。走了两天，路上没有东西吃，只得在路边喝凉水。结果染上了痢疾，一边走，一边拉，病得快走不动了，才到达了保山。

当时，保山城已被日军炸得一塌糊涂，电线杆上还溅挂着同胞们的血肉，触目惊心。我忙着找过去住过的机工车队，但已经撤退了。再到过去的加油站看看，还有一些抛锚的军用卡车，我就去挑选，将几部破车零件拼凑起来，终于“组装”成一辆可以开动的汽车。于是，我载运同路回来的难侨，一起返回昆明。

从保山开着破车一路颠簸，走走停停，开了两天半才到昆明。回到西南运输处，再也无人管了。于是，我随着几个机工朋友开始四处飘泊……后来，到四川、贵州等地谋生。抗战胜利后，我在四川结婚，便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四川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到过岳池、南充、泸州、雅安、甘孜等分公司，直至1979年才退休。

(1988年)

一位改名“华民”回国抗战 的日本混血儿

——记马六甲南侨机工洪华民

1989年7月7日，在昆明西山风景区内举行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揭幕仪式上，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健步登上台阶，深情地抚摸着石刻碑文，两眼情不自禁地流淌着泪花，沉浸在回忆之中，以至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走过来与他握手时，他竟还反应不过来……这位老人便是当年马六甲南侨机工的幸存者之一——洪华民，是专程从四川自费赶来的。

这是个颇有传奇经历的人物。不久前，笔者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宣传，专程对他作了录音采访。洪华民原名洪六爻，“华民”这个名字是他1939年回国参战时取的，目的为着激励自己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

洪六爻祖籍福建同安县新店乡东坑村，但他却是个中日混血儿，父亲洪启昌是个侨商，母亲宝玉子是个日本人。1926年，洪六爻5岁时，父亲突然病逝，母亲只身返回日本，他成了孤儿，被叔父带往安南抚养，在河内读至小学毕业。12岁时，四叔父又把他带往马六甲并收为养子。

在马六甲，洪六爻在一家英国人办的道奇汽车大修厂当学徒，白天做工，晚上与堂兄学文化。养父曾在泉州少林寺学武术，到南洋继续练武，以弘扬国术。见洪六爻诚实可靠，养父便将全部武艺传授给他。由于少年时代

的勤学苦练，他不仅练就了“童子功”等少林功夫，而且培养了良好的武德，他那不沾烟酒的习惯及宽容刚毅的性格，为日后的成长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岁那年，他转入英商亚细亚货运公司开汽车，月薪40元叻币，过着安稳舒适的日子。

二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祖国遭难，也给洪六爻平静的生活投下了阴影，他深感故土的安危与华侨的境遇密不可分。于是，他积极上街卖花、募捐义演，投入当地筹赈会的活动。同时，盼望有机会回国参战，报效祖国。

有一次，洪六爻出车到新加坡，正逢夏之秋、项堃率领的中国“武汉合唱团”赴新义演。那凄婉悲壮的歌声，那激昂慷慨的召唤，使全场侨胞的心中燃起熊熊烈火。尤其是“救亡三部曲”，更令人热血沸腾，使得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回国抗日的决心更为强烈了。

回马六甲不久，又看到报上“南侨总会”招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洪六爻感到这正是天从人愿、报国有门了，随即跑到筹赈会报名应征。

养父得知洪六爻要报名回国抗日，深怕他年纪太轻，难以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便多方劝阻。养母更是泪如雨下，苦苦劝留，甚至托人物色一个18岁的姑娘准备从速为其成亲，却被他婉言谢绝了。洪六爻认定，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养父见此，只好肯定他回国抗日的良好愿望，但又表示救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我们华侨多出钱也是支援抗战的表现，并愿意立即出一笔钱给他成家立业，实业救国，仍不失为爱国之举。总之，养父母为了不辜负六爻已去世的父亲的嘱托，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平安地留在身边。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实话，洪六爻也有些舍不得离开亲人，不忍放弃海外安稳自在的生活而孤身回国，到战争环境中过意料不到的艰苦生活。但眼看祖国有难，作为一名具有驾驶技术的华侨热血青年，理应挺身而出。于是，他恳托筹赈会侨领协助动员说服。经过一番波折，养父母终于同意了，不过，还再三叮嘱一条：抗战一结束，必须立即返回。就这样，年仅18岁的洪六爻，为达到需20岁才符合条件的规定，多报了两岁，才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地辞别海外亲人，踏上了抗战的征途。

谈及这段历程，洪老先生记忆依然清晰，他激动地回忆说，与他同一批回国的马六甲华侨机工有20多人，其中原籍同安的许成瑞，已在抗战中牺牲了，还有戴新菊（今在四川）以及余英沛（今在昆明）等人。他们一行乘船抵新加坡加入第三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他还被推选为领队。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接见了全体机工。他说：“我虽与陈先生是同乡，还有亲戚关系，对于陈老的崇高声望早有所闻，但直接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当时陈老已经60多岁了，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留着胡子，戴一副眼镜，显得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从他敏捷果断的言谈举止中，给人一种刚毅坚韧的印象。陈嘉庚先生用浓重的同安口音演讲，他对我们说“祖国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抗战运输线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这次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救亡，是非常光荣的，希望大家高兴而去，胜利而归，为祖国争光，为海外侨胞争光！”陈先生的慷慨陈词，使全体华侨机工激动不已。为表达这种爱国心情，我当即将自己的名字洪六爻改为“洪华民”，以示报国之志。

第三批回国机工共590多人，总领队是麻埠侨领刘贝锦（永春籍，后来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许成瑞任副总领队，洪华民任马六甲支队长。1939年3月27日，他们从新加坡启程，乘轮船抵西贡，后转火车到达昆明。在西南运输处经过几个月军训之后，洪华民被分配到第12大队第10中队（谭江柏任大队长）从事“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

三

滇缅公路由昆明通往缅甸腊戍，沿途要翻越苍山、怒山、高黎贡等高山峻岭，穿过漾濞江、澜江、怒江等大江天堑，不但迂回曲折，坡陡路险，而且有些地段属于单行道。在这条路上抢运抗战军用物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消息传到南洋时，海外亲友都为南侨机工担忧。洪华民的表哥从安南寄信寄钱来，劝他回南洋，叔父还寄来入境手续，以便机遇不顺之时能有退路。但洪华民却抱定必胜信念，即日寇一日不除，便一日不返南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扑在抗战运输工作上。他给海外回信，总是对滇缅公路军事运输充满信心，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海外亲友放心。这些信件及照片在海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鼓舞了不少机工又陆续回国抗战。

在机工生活中，足令洪华民感到骄傲的是一段义演活动。1940年，云

南芒市一带发生特大水灾，难民流离失所，南侨机工为此组织了文艺义演，筹赈救灾。自幼练就南少林武功的洪华民，在义演中竟大显身手。他表演了“汽车过人”的硬气功，惊险的场面博得热烈喝彩。在集体表演叠罗汉节目中，又是他运用轻功跃到最上面。他还与马来亚机工莫才合作，成功地表演了被日寇“活埋”后获救的气功节目，在当地义演中引起轰动，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在滇缅公路经历的许多惊险事件中，洪华民至今印象最深，也最感痛心的是1940年四月间的遮放军火仓库爆炸事件。遮放是靠近我国边境畹町的一个小镇，西南运输处在这里设立仓库，存放着大批由仰光抢运入境的军工弹药和器材。那一天，洪华民刚卸货离开仓库不久，便发生了大爆炸。这些兵工署急需的军火物资，是华侨机工经历千辛万苦抢运来的，却由于当局管理不善，使千余吨弹药毁于一旦。对此，所有机工无不扼腕叹惜！

随着战局的恶化，1942年5月初，侵华日军沿着滇缅公路直逼国门，南侨机工车队奉命东撤。洪华民目睹了最恐怖的战乱场面，至今，他仍记忆犹新：“当时滇缅公路上，各种车辆首尾相接，互相超越，走不动的车子就被推下深渊，两旁逃难的人们，肩挑手提，扶老携幼，络绎不绝，不少行李衣物散落在路上。日寇追兵在后，我随着混乱的军队刚驶过惠通桥，随着一声“轰隆”巨响，桥被国民党守军炸毁了。日寇虽然被阻拦在怒江西岸，但未及过桥的南侨机工车队以及无数难民则沦入敌寇的魔掌。

惠通桥一炸断，三年多来（1939年1月至1942年5月）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滇缅公路国际军运线终于断了。此时西南运输处（已改名中缅运输局）竟然不管南侨机工的死活，南洋又已沦陷，机工们有家归不得。洪华民不得不四处漂泊，辗转各地，最后到云南盟军机场当苦力。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结束。

战后，为表彰机工，当时的侨务委员会发给奖状，军事委员会也发给证明书，并颁发“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及复员奖金。在洪华民家中，洪老先生还展示了他精心保存的40多年前的奖状及证件。

四

新中国成立后，洪华民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他被分配到重庆运输公司当司机。1950年，洪华民奉命随军支援进军西藏的战斗，在领队运送军用

航空汽油途经四川资中县时，突遇土匪围追，由于他当机立断，沉着指挥，率领车队避免了一次汽油大爆炸事故，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军部的记功嘉奖。

长期以来，洪华民在汽车运输岗位上，对技术精益求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不过，在极“左”路线的冲击下，与许多留居国内的南侨机工一样，洪华民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文革”浩劫中，他因曾参加抗日南侨机工在西南运输处的经历，被诬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关进“牛棚”，受到残酷迫害。尽管如此，他那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仍不动摇。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洪华民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他当选为四川宜宾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此后，又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6年，洪华民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发给安全行驶一百万公里以上驾驶员的《荣誉证书》，该证书写道：“洪华民同志，截至一九八四年底安全行驶116万公里，特予奖励”。1984年退休后，洪华民还担任宜宾侨联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继续奉献余热。

(1989年)

赤子的奉献

——记泸州南侨机工陈昌雄

原籍海南的吉隆坡华侨陈昌雄是第八批回国的南侨机工，在抗战结束复员时，因交通受阻等原因而滞留大陆，现居四川泸州兰田镇，是一名退休驾驶员。尽管年事已高，但只要一提起在滇缅公路从事抗战运输的往事，老人的情绪立即高涨，谈着谈着，有时竟激动得情不自己。

他说：“前年十月份，省侨联召开‘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川人员座谈会’，接到通知后，我激动非常，按期搭车去成都。不巧的是汽车沿途抛锚，身体不适，不得不中途折回，未能到会与昔日同伴相会叙旧，实在遗憾！”

陈昌雄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清澜乡良友村（原名友河村），14岁时由堂兄陈昌珉带来马来亚，找到了在吉隆坡给一个英国商人当厨师的父亲。在那里，父亲将他送入尊孔学校读书。父亲虽是个厨师，但见多识广，尤其崇敬孙中山，常给他讲述当年在新加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情形。父亲常说：“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主义不断地用武力侵略我们。”希望他努力学习，将来为建设祖国出力。可是，因家里负担太重，陈昌雄小学未毕业就停学了，到宗叔陈家耀的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从此开始了当汽车机修工的生涯。4年后，在他21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他随同三叔陈家灼，到新加坡七马路联友电器公司当工人。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空前高涨，陈昌雄也卷入新加坡华侨抗日募捐热潮，脖子上挂了一个“救国箱”的箱子，到处募捐。每天晚上把捐满钱的“救国箱”送到筹赈会，第二天又背着箱子四处

募捐去了。1938年，“武汉合唱团”来新加坡义演募捐救国，新加坡华侨一致捐出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但遭英国当局的阻挠。华侨非常愤怒，大家团结一致，工人罢工，商店罢市，公共汽车停开，经过好几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当局同意华侨捐献活动。陈昌雄也参加了这一斗争，当即将45元叻币月薪，除留下9元作伙食费以外，其余的36元全部捐献出来。

24岁那年，陈昌雄奉母命回文昌与同乡姑娘黄玉花完婚。新婚之际，时局紧张，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海南岛，保长要来抓壮丁，陈昌雄告别了新婚两个月的妻子，搭船返新加坡。在新加坡，他进了德国人开的“美邻闽电器公司”，学习柴油汽车修理技术。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陈昌雄报名参加考试，电工技术考的是实际操作，同时也检查身体，结果他两项都合格，便被录取，参加第八批机工队伍。回国前，他们在广肇会馆，由南侨总会派人来训练，每人发给一套黄色制服、一顶大盖军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7月17日，南侨总会派黄景镇来当领队，机工们都清一色穿上黄制服，威武雄壮，前面还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横幅，每人拿着一面三角旗子，大家在“保卫祖国”、“回国抗战”的口号声中前进，沿途受到成千上万华侨的热烈欢送，其情景十分动人，机工队伍登船出发了，码头上欢送的人群还久久不愿离去……

经过几天的颠簸，当轮船驶到安南堤岸时，当地的华侨早已在码头等候、欢迎了。可是，法国当局不允许靠岸。经过当地侨领与法国当局交涉，第二天才让船靠拢码头，此事引起机工们的极大义愤。他们整队举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高呼口号雄纠纠地开进西贡。然后转乘火车，经河内直抵昆明，住进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

在训练所开始进行集训，每天早上集队操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并通过技术考试合格后，陈昌雄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7大队。当时每大队有3个中队，1个补充中队和1个修理班。每个中队有50部车，全大队有200多部。他所在的大队，都是崭新的3吨“GMC”和2.5吨的“小道奇”。他的修理班主要负责修理，起初都是新车，修理工作不太忙。后来，战事一天天紧张，汽车日夜奔驰，损耗很快，修理任务也繁重起来，连夜突击抢修，更是家常便饭。虽然工作辛苦，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都精神振奋，毫无怨言。

在昆明工作了半年之后，17大队奉调西南运输处重庆分处，住在黄山路口。此时运输任务更加繁忙，日本飞机又不断轰炸，几百部汽车摆在一个地方，目标很大。为避免挨炸，机工们想出了许多办法，汽车一进站立即调去运货，需要维修的抓紧维修，修好后立即开走。夜间修车也不开电灯，只用修车的小电瓶灯照明，以免暴露目标。

机修班的工作地点，紧靠一片坟地，石砌的古坟成了机工们天然的防空洞，警报一响，就往坟地里钻。有一次，敌机连续七天七夜轮番轰炸，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死伤巨大。一天，陈昌雄正埋头修车，三道警报拉响了还来不及跑开，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子弹嘎嘎扫射在机器上，他连忙从抑制板上滚进了水田里，浑身沾着泥糊，死里逃生。回头一看，修理班的工棚被炸中了，许多汽车包括刚从香港买来的新轿车都被炸坏了，他从新加坡带来的那箱工具也毁了，到处燃着熊熊大火。但警报一解除，大家又毫无畏惧地朝各自的岗位跑去。在重庆修车近一年之后，17大队又奉调到泸县，修理班住在三岩的一座庙里。不久，又调到宣威、毕节等地。最后，他又调到18大队，住在兰田坝。

1941年，陈昌雄从逃到重庆的侄儿陈时炯的来信中得知，妻子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对此他悲痛欲绝，未想到新婚的暂别竟成了永别！大家纷纷前来安慰他。第二年，在大伙的介绍和催促之下，他与四川姑娘金先凤结婚。她是初中毕业生，抗战时的中学生在泸县还是不多的。金先凤被陈昌雄的遭遇和爱国情怀所感动，给他以很大的安慰与照顾。

1944年，陈昌雄调到川滇东路第四区运输处，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往往未到月底早就囊中告罄。但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抗战终于胜利了，传来南侨机工复员的消息。陈昌雄与新加坡机工蔡志强一起赶到昆明，登记复员，并领到200美元（折67万国币），陈昌雄把5万国币捐赠给昆明侨光学校。在昆明，他未赶上头两批返南洋的队伍，但听说复员南返的道路曲折艰难，十分不顺，“华侨互助会”的人就劝他待平静之后再南返。就这样，一等再等，一直拖延未能回南洋，直等到新中国成立。

解放军派军代表对他们说：“中国解放了，今后的建设还需要您们这样的人才，您们就留下来吧！”于是，陈昌雄便留在了四川。与他同时留在四川的还有：福建籍的张天赐，在四川省运输公司任驾驶员；洪华民，在宜宾

运输公司当驾驶员；海南籍的符利华，在四川省轻工业局，已逝；广东籍的陈苏，“文革”期间逝世；郑志南，调去南充任驾驶员；还有潮州籍的卢国龙，前年在兰田坝交通机械厂病逝了。

1972年，陈昌雄收到文昌县老家的来信，告知95岁的老母病逝，他回老家治丧，才得知道玉花牺牲的详细情形：海南岛沦陷之后，从新加坡返回文昌的陈时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玉花积极参加妇联抗日活动。一天，游击队在乡里的一座庙里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引来日本鬼子包围袭击，玉花在突围时牺牲了。

昌雄老人1972年退休之后，在家安享晚年。与老人交谈，令他梦萦神牵的事，还是与滇缅公路有关的人与物。至今，他仍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西南运输处发给的一枚“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他对纪念章的图案尤其熟悉，连纪念章的编号都清楚地记得：1453号。

另一件却是憾事：1939年离开新加坡回国前夕，在宗祠文昌会馆与欢送宗亲的纪念合影，上面写着：欢送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这张照片他一直随身带着，直到“文革”时，有人要抓他的“尾巴”，他才忍痛烧掉。谈及此事，老人连声说：“可惜，实在可惜！”

(1988年)

赤子丹心 情系中华

——记重庆南侨机工林广怀

现居住在山城重庆的马来亚华侨林广怀，原名林江海，“广怀”这个名字，是他1939年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时为瞒过家人避免阻拦而改的，并包含着“心怀祖国”以激励之意。

1919年，林江海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一个小山村（土角楼），未满周岁就由父母抱着“过番”到南洋，侨居在马来亚丹绒马林开杂货店的祖父家里。当时，祖父开了几间商店，家境殷实，父亲协助经营，生意更加兴隆。后来，祖父逝世，父亲便接手经营“成美”号，而叔父则在实叻务经营“谦美”号，若论财务，叔父在当地华商中还可以摆在前几位。江海自幼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全家弟妹八九人，他居长当“孩子王”，在华侨学校读书时便对体育运动特别兴趣，还组织了一个“小篮球队”。他刚满15岁时，其父不幸病逝，全家便和祖母搬迁到实叻务叔父家。他开始在叔父的“谦美”号学习经商，帮助处理财务，让弟妹全部上学读书。

“七·七”事变之后，祖国军民的浴血抗战，进一步唤醒了海外侨胞的民族意识，报纸上也天天报道国内的局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各地筹赈分会的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星马一带还流行用青纱做袖章，上面写着“毋忘国耻”四个大字，每个爱国侨胞都争先佩带。当时林江海组织的“日光篮球队”队员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大家都带上青纱袖章走上街头游行宣传，卖花筹赈，还通过篮球比赛进行募捐，先后共募捐二千多元，悉数上缴森美兰筹赈分会，统一汇往祖国支援抗战。

1939年2月，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林江海立即响应，兴冲冲地赶到芙蓉筹赈分会报名参加首批回国机工团。不料当地报纸马上登出了林江海的名字。年迈的老祖母便赶到筹赈会阻拦，她说：“你父亲不幸病逝了，放下一群弟妹八九个，你是长子，要好好维持这个家庭！”筹赈会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只好将他留了下来。第一次报名没有达到目的，林江海在失望之余，还与家庭斗气，不回叔父的公司工作，自己到巴刹做菜摊生意，并另租铺面开设糖果店。由于商务关系，他经常去吉隆坡、马六甲和波德申等地，看到南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深受鼓舞。尤其是短短的几个月内，各地报名参加南侨机工的青年已达数千之众，再一次激起他“弃商从戎”之决心。有了上次家人阻挠的教训，他便不用原名，而改名“林广怀”，再次到芙蓉埠报了名。经过考核，芙蓉埠计有20多人合格，其中有永春籍的刘瑞齐、颜世国、林财（林广怀之堂弟）等，大家推选林广怀为队长。这一回，家里要反对也来不及了。老祖母为他的决心所感动，鼓励孙子回国后要好好效力，不要半途而废，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抗战一胜利，就要马上回来，老祖母等着最后见你一面！”就这样，林广怀高高兴兴地辞别海外亲人，踏上了回国征途。

在林广怀的带领下，芙蓉埠的20多名热血青年，乘船前往新加坡加入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接见了全体机工，勉励大家要团结一致，尽忠报国。这批回国机工共330多人，编为七个中队，林广怀被任命为第三中队领队。

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集训之后，林广怀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7大队华侨补充队，当即奉派前往腊戍等地接运军车，然后运送武器到广西柳州前线。接着，又奉命运军需品上迁江前线。行车途中，无论白天黑夜，常遭敌机袭击。为了安全，车队规定，夜间运行不准开灯，只能摸黑前进。在此期间，前线炮声不绝于耳，满载军火的车队行驶在险要的山路上，这对海外归来的南侨机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毫无怨言。林广怀回忆说，当时运送部队兵员及武器到前线，然后又运载伤员回后方治疗，往返过程，历尽艰险，南侨机工总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至于饥饿口渴，就更置之度外了。

1941年，林广怀随车队调往宣威，运送军需物资到泸州、贵阳等地。经过叙永训练班的培训之后，林广怀奉派回昆明，在第三大队任少尉分队长。

1942年，林广怀又奉派前往仰光抢运，殊料刚到腊戍，仰光已告沦陷，便改在腊戍转运华侨难民回昆明。这时滇缅公路沿途车辆拥挤，无数难民扶老携幼，饥寒交迫，有的惨死在路边。一路上，机工车队与各式车辆因抢道而互相堵塞，走走停停，有的车辆走不动就被推下深谷，情景令人心寒。日寇在后面步步紧逼。林广怀刚撤过惠通桥不久，即传来该桥被炸毁的声音，一同回来的堂弟林财以及一批未撤过桥来的南侨机工车队成员不幸罹难。

惠通桥炸断之后，滇缅公路无法通行，众多南侨机工只好在昆明待命。林广怀回到石塘山司机训练所，但该所一片混乱，没人负责，比难民收容所还不如，失业机工便四处星散。在失业、生活断源的困扰下，林广怀跟着友人来到重庆，找到原西南运输处第三分处，经熟人介绍得以到兵工署汽车运输处开车，运输器材，往返于昆明、贵阳、湖南等地。1944年，日寇大举进攻贵阳时，林广怀参加战斗运输，夜以继日地运送第九军、十三军部队兵员到独山前线。有一次，车队被日军包围，他守在车上两天两夜，度日如年又吃不上饭，第三天早晨才奉命调头运送伤兵回贵阳。

抗战胜利结束后，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陈嘉庚先生的大力促成下开始复员南返。林广怀却因执行运输任务到湖南长沙，待他回到重庆时，已错过南返机会。林广怀只领到“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及复员奖金。他把这枚历经抗战血与火洗礼的纪念勋章寄回南洋，让家中亲人们分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

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在祖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安居乐业。从1951年起，林广怀一直在重庆国营运输汽车公司开客车，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对技术精益求精，出色地完成各项运输任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特级驾驶员”的称号。

岁月匆匆流逝，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1984年，林广怀与妻子双双光荣退休。退休后仍得到单位领导的关怀照顾，在落实华侨政策中，又安排他们搬进公司新宿舍。1986年，林广怀与全国各地幸存的南侨机工一起，享受国家专门制定的新政策，领到百分之百的退休金。1987年8月，林广怀申请前往新加坡探亲，作为战后留居在中国的南侨机工南返代表之一，受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的亲切接见。在陈共存先生的关怀下，8月16日，新加坡《联合晚报》记者李永乐专题采访了林广怀。10月23日，《联合晚

报》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大特写《久违了，南洋！——留居中国的机工近况实录》，介绍了这位抗日南侨机工的事迹。

(1988年)

一心为救国 奋战到胜利

——记重庆南侨机工颜世国

现居住在山城重庆的公交公司退休驾驶员颜世国，是永春籍南侨机工之一。不久前，笔者在嘉陵江采访了这位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参战的幸存者。

颜世国于1914年出生在永春。5岁时便随父母前往马来亚怡保，先在当地华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即学会开汽车。16岁开始在其父朋友的“春成”布店当司机，月薪优厚。后来，应叔父之邀，到马口埠叔父开设的“成发”杂货店协助经商。在他的努力经营下，“成发”商店生兴隆，盈利颇丰。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海外华侨群情激昂，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当时颜世国在叔父的“成发”杂货店经商，个人虽然安稳舒适，但他情系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筹赈活动。除了带头将该店每月盈利的10%捐出之外，他还将筹赈分会成员组织起来，主动向当地的橡胶园包工头及各商店开展卖花募捐，将筹集的义款交给南侨总会统一汇回祖国。

1939年春节，颜世国在马口埠举办婚礼，他与妻子双双将结婚金戒指捐献出来，连同喜宴所节俭下来的一笔钱款交给当地筹赈会，表达了海外赤子爱国之心。当地华侨报纸对其爱国行为作了褒扬。

不久，陈嘉庚先生在报上发表了《南侨总会通告》，号召华侨青年机工回国服务。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正急需大量熟练司机。颜世国认为，自己刚好有这项特长，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于是产生了报名应征的念头。可是考虑到刚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妻子已有了身孕，他又感到已经不能像其他无牵无挂的单身汉那样说走就走了，怎么办呢？他设法先将妻子送回槟城岳

母家中安顿妥当，然后瞒着母亲和弟妹前往报名。他考虑到本地马口埠熟人多，一旦声张出去家人会来阻拦，便特地赶到芙蓉埠筹赈会报名，待一切手续办好之后，才回家悄悄告诉弟弟，连母亲也没让知道，就与芙蓉埠的机工队出发了，前往新加坡加入回国机工团。

颜世国随第八批机工团回国后，于1939年底分配到重庆黄山路口的西南运输处分处任驾驶兵，主要任务是从事重庆至柳州之间的军事运输工作。当时柳州已成前线，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颜世国与机工战友们冒着炮火投入抢运，当日军由柳州头塘攻至二塘时，他们已将大批抗战物资移入四川了。不久，独山失守，颜世国则随机工车队调到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是举世闻名的险要路线，该路是战时紧急抢修的，许多地段不合标准，山高路陡。颜世国在滇缅公路上历经了无数艰险，亲眼看到许多华侨机工不幸翻车殉难。有一次，颜世国与战友们运载一批军火到达滇缅公路的咽喉——功果桥边，突然遇到日机轰炸，桥面已被炸得坠入江中，但南侨机工却用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将军火运过江，使这条军运大动脉畅通无阻。

在这段戎马生涯中，让颜世国印象最深刻的是1942年5月滇缅公路大撤退之惨状。当时，仰光已经沦陷，西南运输处奉命日夜不停地向国内抢运积存在中转站腊戍的大量物资。尽管几乎每天都有车辆在翻越陡峭急弯的山路时坠入深谷，但整个车队没有退却。司机们机智而勇敢，前仆后继，战胜艰难险阻，战斗在运输战线上。

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沿途哀鸿遍野，无数难民扶老携幼，饥寒交迫，有的甚至惨死路边。整条公路上人车混杂堵塞，南侨机工车队走走停停，不断地按着破喇叭，有时还得跳下来往前拨开一条缝，才勉强让车轮滚上几圈。临近惠通桥时，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勐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上两侧已布满了炸药，随时都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兵。颜世国刚把车开过惠通桥不久，就传来惠通桥断毁的声音。

惠通桥一炸断，滇缅公路便被切断了，中国失去了与英美等西方盟国的陆路交通联系。美英等国供应中国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就只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然而，这些在印度的军用物资，同样需要先用汽车运到机场，仍旧需要一批司机，为此盟军便在昆明招募一批机工到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颜世国与200多名华侨机工，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毅然应征前往

印度，参加盟军反法西斯战斗。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南侨机工曾在滇缅公路开过车，技术很高，救国心切，因而入印不久就受到盟军的赞赏。颜世国在印度阿山省地普罗加飞机场工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运输汽油、军用物品以及大锡锭等，他们经常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坚持抢运，直至1945年胜利才回国。

抗战胜利结束后，颜世国荣获了侨务委员的奖状，继续留在重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被分配到重庆公交公司开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评定为一级驾驶员。颜世国退休之后，仍然继续发挥余热，他担任区政协委员、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89年，正值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之际，四川省侨办、侨联特为全省十几位劳苦功高的南侨机工颁发了《荣誉证书》。颜世国也获得了这一殊荣。证书上写道：

颜世国同志响应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半个世纪以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发此证，以资表彰。

四川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四川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一九八九年九月

荣誉证书既表彰了以颜世国为代表的幸存南侨机工的特殊功勋，也褒扬了数以千计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海外赤子的奉献精神！

（1989年）

从重庆到延安

——记南侨机工程龙庆

第五批返国南侨机工中，来自新加坡的程龙庆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在他脑海中，不仅有滇缅线上的烽火，更有重庆红岩村终生难忘的回忆！

1939年，年仅18岁的程龙庆，在一股爱国热潮的推动下，经过一番曲折的报名过程终于搭乘上第五批回国机工团的轮船，踏上回国参加抗战的征程——这是1939年5月22日，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新加坡红灯码头格外壮观，回国机工团登轮启程，各界华侨人山人海，热烈欢送。启锚时，岸上口号声震耳，机工队伍唱起《告别南洋》的雄壮歌声，但见无数人激动得热泪横流，无数的礼帽被抛向空中，抛向海里，蓝色的海面上，顿时漂浮着好多好多帽子，帽子代表着亲人的心愿——陪伴机工队伍一道回国！

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四个昼夜，才到达安南西贡。在安南，属于西南运输处的机工团先乘火车直抵昆明，而程龙庆一行17人，却又搭原船驶向香港，因为香港还有一批属于“海员工会”的华侨等在那里，在香港上船的归国华侨约40多人，多数是机工，也有回国赴延安求学的华侨青年（其中一位是后来成为新华社名记者的王唯真，当时年仅17岁）。途中经过海南岛时，听说海南岛已被日寇占领，船长在大家的要求下同意绕道，可是就在快要绕过海南岛时，却与日本舰相遇。船上通知旅客准备接受日军检查，大家赶紧把身上穿的中山装脱下来藏在煤堆里。不知什么原因，日本人并没有上船来，这才闯过了危险的一关。

轮船驶至安南海防，程龙庆一行便转乘火车、汽车进入离镇南关不远

的广西边陲重镇凭祥县。在树林中，那里早有二十几辆汽车等着他们了。这些汽车，有的是美国、加拿大华侨送的，其中一辆德国制造的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车身上标有“宋庆龄送”字样，尤为引人注目。在新加坡，程龙庆和方川如（方毅同志的堂兄）等十几人就已确定分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香港由办事处派龙飞虎科长接洽，所以，次日便分别驾驶着这些汽车直驶重庆。

凭祥到贵阳的公路也是运输各种物资的咽喉要道，但路面狭窄破烂，坑坑洼洼。当时没有防空设备，常遭日机狂轰滥炸。一天，在南宁附近躲敌机轰炸时，车队一辆汽车钻进了国民党军的高射炮阵地。蛮不讲理的士兵，硬说是刺探军情的汉奸，将司机五花大绑，关了一天一夜，随后押赴南宁市，扬言要杀头。正当紧急的时刻，办事处的龙飞虎同志赶到，经过一番交涉，才救回了人和车。

经过一番艰辛历程，1939年10月，华侨机工车队终于抵达重庆。当山城的万家灯火出现在眼前时，海上的风波、日机的轰炸、通路的坎坷，霎时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一个个笑出声来。

按照事先安排，回国的华侨机工大部分都分在西南运输处，只有程龙庆等人去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报到，暂住土湾的办事处仓库。五六天后，即出发到离西安六十里处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训练班，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训练班对青年学员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学习一些革命理论，并开展丰富多采的文艺活动。1940年3月，程龙庆等九个华侨司机返回了重庆。

当时车队临时组成，所在地四周都是农田，宿舍和车库都是用竹子和篾席搭架起来的，相当简陋，修理间是茅草棚。这地方吃水困难，煮饭、洗东西都是用田里的水。一至炎夏酷暑，田里干涸了，吃水更加困难。由于水土不服，华侨机工经常生病，甚至于打摆子，冷一陈、热一陈，成了家常便饭，但大家从不叫苦叫累。

办事处坐落在化龙桥的一个山沟里，同志们很注意勤俭节约，自己挖地种菜，男女同志都是一色的军服，每月生活费很少，给华侨机工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在处长办公室闲谈，程龙庆说起钱不够用时，刚好周恩来同志从外面走进来，听了大家的谈话，风趣地说：“是啊，我们处长每月也才

五块钱哩，你们华侨同志每月发三十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想办法解决嘛！”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当时回国的大部分华侨青年，只是为了抗战，爱国热情很高，但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区以及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缺乏认识，总想几年以后再回南洋去。由于生活艰苦，加上家中音信杳无，因此也有些不安心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办事处领导的一言一行，使他们深受教育。一次，一个华侨司机开着小车送周恩来同志，汽车发动不起来，周恩来同志立即下车去亲自推车。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养伤回来后，在办事处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还让华侨同志一起去听，给程龙庆留下很深的印象。

程龙庆在办事处的两年多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那时重庆是陪都，日本飞机常来空袭。起初，车队一听到警报，就把车开到郊外躲起来，后来，跑警报跑厌了，有时索性待在屋里。不料，在一次轰炸中，程龙庆正在屋里，听到“丝丝”的声音，才急忙趴在乒乓桌底下，右脚被弹片划了一个大口子。

程龙庆受伤的消息一传到办事处，医生很快赶来，周恩来还派另一位华侨机工来专门照料。幸亏没有伤着骨头，半个多月即痊愈了。有一次程龙庆去办事处看球赛，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人群中一下子就认出他，连连招呼道：“小鬼，又来了！伤好了吗？”并嘱咐他好好休息。

程龙庆回忆说：“两年多时间里，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了共产党人对归国华侨的热情关怀和对参加抗战的归侨青年的热情鼓励，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作风和为人，更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服务的两年多时间里。程龙庆除了到西安等地出远车，还三次直接到延安。车队每次出发少则五六辆，多则十来辆。运输任务除了国民党政府拨给十八集团军的给养外，还运送各界进步人士捐送的药品、汽油等急需物资。另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运送一批批去延安的地下党员、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并秘密捎带党组织从港澳及各地转来的材料、文件、电台等。

由于重庆到延安这条公路，是当时我边区与国统区联系的唯一地面交通线，十八集团军重庆、西安办事处的车队是这条线上引人注目的共产党车队。为保证行车安全，周恩来同志操了不少心，每次出车之前，都是他亲自与有关当局交涉，办理手续；出发时，他要一一清点人数、物资，还对我们

华侨司机和修车工再三叮嘱。

当时，国民党一路上层层设卡布哨，每道关卡都配有军、警、宪、特人员。由西安通往延安的路上，检查哨就更多了，车队每到一个县城或大镇，都得停下来接受检查，甚至连汽油桶也要伸进细棍搅一搅。即使如此，车队还是在他们的眼皮下运送秘密物品进出。办事处的同志巧妙地将文件单本和电台部分紧紧夹藏在大油桶底下，装满了汽油的桶太重，检查人员是不会抬下来查看的。

历尽艰难险阻之后，每当车队一进入陕甘宁边区，车箱里的沉闷空气就一扫而光，大家心情大快，精神为之一振。在这两年里，程龙庆他们的车队就曾运送几百人次去延安。

车队每次到达延安，都受到边区军民的热情接待，每次总在宝塔北面的兵站里休整一二十天。因延安太冷，滴水成冰，华侨司机每人都得到一件羊皮袄，这是从封锁区来的礼物，得之不易，温暖了华侨的心。程龙庆不由对比刚来重庆时的情况，由于刚回国未带寒衣，陈嘉庚先生发动南侨总会向每位回国机工赠送一批寒衣及其他生活用品，竟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华侨机工连一件寒衣的影子也未见到，结果被冻了好些天。两种情况一对比，大家对延安的感情更为亲切了。

在延安，程龙庆他们还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为毛主席开车的司机，也是位马来亚华侨，姓梁，海南籍的。毛主席乘坐的那辆老式的黑色雪弗莱小轿车，是美国洗衣馆的华侨工人捐赠的。

抗战胜利后，程龙庆留居山城重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阻挠，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一事一拖再拖，为此程龙庆与其他19名机工联名致信陈嘉庚先生。陈先生将该函转载于1946年5月31日的《南洋商报》上，全文如下：

返国服务机工

致函陈嘉庚先生

请求敦促我当局办理遣送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

〔按：当我国抗战之初，热心机工回国服务者达三千余人，服务至今，经已多年，入伍者多已复员，惟一般机工，因种种关系，尚未能南旋。在失业贫苦中，兼以物价飞涨万倍，屡次请求，均遭

拖延，其中有程龙庆者（原住马六甲街）本月六日与其同事联函致其友人洪水星，转托本报记者呈交陈先生。］

嘉庚先生大鉴：抗战胜利，万民腾欢，遥悉先生安然返星之息，无任欣慰，弟以关山阻隔无以言达为憾耳。

民等均系抗战初期受先生伟大爱国精神所感召，激于义愤热忱，不畏艰难困苦，毅然舍离妻儿，参加回国服务团回祖国服务，其时悲壮之情绪迄今仍映眼前。回国之后，民等莫不以秉忠竭诚之本志努力工作，周遭处境，最不免有令人灰心之处，总以一忍度之，皆盼抗战早日胜利，俾使凯旋海外，度安谧和谐之日子。如是一日终于到来，诚足庆幸，奈胜利迄今，将届一载，国内复员工作殆已完成，独民等此回国服务机工仍滞留内地，度失业穷苦之生活。据民等所知，前次太平洋战事后归国难侨，政府尚且发给每人二百美元之旅费，而民等回国服务者则阒无所闻，似此未免令人心灰。以数年来之努力献身祖国，而今在海外父母子女度凄苦之日子，其报答竟是如此。现民等滞留重庆，生活穷苦，莫不思归心切，虽经数度向当局请求，每次均答以候拟，力予拖延。数月已逝仍无消息，似此恐无返归之一日。先生乃侨界之宿望，素以关心侨民一切苦况□□，且此事又直接与先生有关，诚盼能予协助，或敦促政府当局迅速办理遣送事务，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以先生在国内之硕望，必能达成佳果，殷望之至，恳祈速予指示免再受痛苦，不胜铭感。赐复寄“中国重庆小龙坎第廿四号信箱程龙庆”，专此

敬祝康安

星洲华侨回国服务团机工：张荣生、程龙庆、黄金水，第九批卢松深、林渊元、杨木深、张永隆、林金狮、曾杏存、严亚国、伍书旺、伍瑞添、林英侨、蔡成贵、黄金堆、黄□□、江咏源、方俊卿、张木隆同上，三十五年（1946）五月六日。

当时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遂答应解决护照和办理复员手续。恰在此时，程龙庆的岳母不幸病重，为了照料她，只好留在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程龙庆被安排在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连年被评为

先进生产者、安全行车标兵。1956年，程龙庆递送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他“海外关系复杂”，被一拖再拖，但他毫不气馁，坚信理想一定会实现。直至1983年终于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现在，程龙庆先生退休在家，经常参加市、区侨联的活动，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幸福的生活。

(1988年)

有幸与八路军、新四军结缘

——重庆南侨机工方川如回忆录

我是三千多南侨机工中的一员，由海外声援抗战到亲身回国参战，在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中，至今依然铭刻在脑海中的有如下几件往事：

募捐慰劳八路军将士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消息传来，广大华侨人人为之震惊，个个义愤填膺。当得知故乡厦门沦入日寇魔掌时，我更加怀念故土与亲人，积极参加星华各业工人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抗敌后援会在郑青剑的领导下，组织了星华木业工人互助会筹委会，经民主选举，我被选为主任委员。为了表示对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我们以木业工人互助会的名义向筹赈会共捐箱三个，并将卖花所得之钱交筹赈会。以后，我们又将老板认购救国债券的钱，以星华木业工人互助会筹委会的名义寄回祖国，支援抗日，慰劳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将士。事后，我们收到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十八集团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两人盖章的收条。

分配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1939年5月，我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5月22日，我们第5批机工从新加坡红灯码头出发，计500多人，大部分将赴西南运输处跑滇缅公路军

事运输，仅十几名被分配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我是其中一员，同行的还有程龙庆（现仍留居重庆）等人，领队是李振华同志。

我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安南西贡时，属西南运输处的南侨机工先下了船，转火车去云南。而我们一行17人，继续搭原船去香港。途中，为了躲避日寇军舰的搜查，绕道经菲律宾才驶到香港。在香港，又有40多个机工以及回国赴延安的华侨青年（其中有菲律宾的王唯真，后来曾任新华社副社长）上船，然后驶向安南。

在海防，我们办好入境手续后，转乘车进入广西凭祥。紧接着，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开着海外华侨捐赠的二十多部汽车，日夜兼程，历尽艰辛，冲过一道道关卡，出南宁，翻独山，经贵阳，终于在1939年10月抵达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亲驾新车送给新四军

到重庆后，我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任中士驾驶员。当时，祝华同志（后在北京商业部任职）是我们车队的直接负责人。他在重庆给周恩来同志开车，并负责处理车队的日常事务。我曾驾车在重庆延安之间往返几次，还为新四军送过车。

1940年春，我和余枝同志由贵阳到桂林办事处去接香港运来的卡车。那两辆卡车是叶挺军长的弟弟押运回国的。当时敌机频频出动封锁公路，只能夜间行车，结果在离南宁不远的八塘，一辆卡车翻了车，叶挺之弟失事身亡。我们在桂林得到消息，连忙赶去救援。我把另一辆卡车开回了桂林。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处长命我把车开到安徽省岩寺新四军办事处。我们一行三人（其中一个是新四军的副官，另一位是《新华日报》的记者），驾着卡车，冲破种种封锁，终于安全到达岩寺，亲手把车交给了新四军。第二天，我和新四军副官乘军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回桂林办事处。

运物资赴革命圣地

在重庆办事处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曾多次运物资、送人到延安。而令人难忘的是最后一次赴延安。

1940年底，抗战进入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公路运输线封锁得更加严密。那次我们五辆卡车、两辆小车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走到川陵交界处的宝城时，国民党检查站借口查武器号码与持枪证是否相符进行刁难，强逼我们把车开到汉中。到了汉中，又胁逼我们把车开回宝城。宝城检查站无事生非，要扣押车队的的一个军医（该军医原在白崇禧部队做过事），几经交涉才准许离开宝城。途中的一个检查站又故意找麻烦，在扣押一个参谋后，才让车队继续前进。几经波折，车队才进入边区。当我们远远望见延安宝塔山时，大家都高兴得唱起歌来。

我们刚到延安，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我从延安返回重庆，龙飞虎同志随车同行。我们再次冲破重重关卡，才达到目的地。回重庆后，办事处及汽车队人员多已解散，南侨机工队员中我是最后的离队者。离队前，祝华同志带我去见办事处钱之光处长。钱处长非常关心我离队后的生活，给我发了路费。斯时，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1988年）

歌声激励我们上战场

——南侨机工陈寿全回忆录

我叫陈寿全，可是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所属南侨机工服务队里，大家都叫我“歌全”。这是为什么？话还得从当年苏门答腊码头说起：

那时，刚满21岁的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报名参加了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为了抗日救国，我不忍告诉年老体弱的父母，我知道这一次飘洋过海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以后还有没有相见的日子是难以预料的。我悄悄从家里跑出来，在邦加岛客属公会的保送下，来到苏门答腊码头，准备登船回国。码头上簇拥着无数送行的同胞，个个脸上流露出眷恋惜别的表情。乐队奏响雄壮的欢送军乐。我悄悄地看了四周，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孔！这下我放心了，随着队伍大步登上轮船。

“呜——”告别的汽笛拉响了，船慢慢离开了码头，前方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随着海浪一阵阵的撞击，我的思绪随着巨浪翻腾起伏：今晚，当爸妈发现我再也不回家时，他们该怎么为我担心呢？还有那一直跟在身旁的弟弟呢？……正在这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孔忽然闯入眼帘，我拼命睁大眼睛捕捉它：就在那里，是他，是我那12岁的弟弟！一见轮船已离开码头，小弟弟便扑跪在码头上，一边呼唤着“哥哥！”，一边放声大哭。

“小弟，小弟……”我也声嘶力竭地喊叫他，我叫他赶快回去告诉爸妈，我回唐山^①去抗日救国，请他们原谅我的不孝！等赶走日本侵略者，我

^①华侨称祖国为唐山。因唐朝强大，华侨自称为唐人。

会马上回来的！……可是，海风吹散了我的话，小弟仍然跪在码头上痛哭！渐渐地哭声听不见了，他的身影也看不见了！我心情沉重地回到舱里，看到同伴们和我一样，仍然沉浸在别离的伤感中。我呆呆地望着大家，心想：难道就这样带着眼泪上战场吗？怎样才能让大家高兴点呢？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仿佛听见空中飘来了为我们送别的雄壮军乐声，不由精神一振，引吭高歌起来：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强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
我们决不能接受！
祖国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丢！

唱着唱着，我看见有的同伴眼里露出刚毅的光，有的同伴已在轻声跟唱。慢慢地，变成了全船机工的大合唱。

这首歌，激励着我们从印尼到新加坡，又领着我们踏上国土，奔向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因为我常常领头歌唱，鼓舞了同伴们的斗志，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我“歌全”。

(1989年)

他珍藏着陈嘉庚先生的亲笔信

——贵阳南侨机工许志光访谈录

贵州之行前，我读到南侨机工许志光的一份史料，颇具传奇色彩，他在决心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同时，将其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莆田安置。他本人的爱国举动，以及老母和妻儿的如此深明大义，实在难能可贵，十分感人。至今他仍珍藏着一封1939年陈嘉庚先生介绍他回国参战的亲笔信。

循着这一线索，在贵州省侨联的帮助下，我在贵阳公园路44号找到了许志光老人。见到有人专门收集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资料，老先生显得十分激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录音采访，话题就从海外家世谈起。他说：

“我是1914年出生在新加坡的，祖籍福建莆田，6岁时开始在兴安会馆创办的宏文小学读书，13岁时到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厂当学徒，学习机修，维修制鞋机器。15岁时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16岁开始学开汽车，领到驾驶执照后开了几年车，20岁就自己买了一辆‘的士’。当时在新加坡，司机的收入较高，我经过几年的奋斗，经营出租车，还建立了小家庭，家境逐渐好起来了，抗战爆发后，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我将出租车让给了别人开，自己出来义务做一些救亡工作，参加筹赈会的募捐活动，上街宣传筹赈救国。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南侨机工回国赴滇缅公路服务，我就下定决心回国参战。”

当我问起他是怎么把全家老小送回国而独自轻装上阵时，许志光笑了笑说：“当时我已26岁了，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一家五口，我已不能像其他快乐的单身汉那样屁股一拍就走，我必须将家属妥善安置才行，于是，决定把他们送回莆田乡下老家。母亲深明大义，妻子贤惠通达，她们都非常支持

我参加机工团回国，当时我又动员妻弟陈光明（潮州籍），一起报名参加机工队，他也非常乐意，并愿意将其母（即志光之岳母）送回国内老家。这样一来，我与内弟可以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了。”

“得知我打算将全家老小送回国而铁心参加机工团，陈嘉庚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叫南侨总会秘书写了一封介绍信，并亲笔签了陈嘉庚三字……”听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问：“后来陈嘉庚先生这封信呢？”

“还在！还在！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在身边！”许志光说完转身进入内屋，取出一张虽已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完好的信件。信的全文如下：

迺启者：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令钦佩！现伊母及其妻子，拟不日遣返原籍安居，所有沿途经过祖国关隘码头，一切行李检查手续务希军政长官予以特别优待，实为至盼。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公章）

主席陈嘉庚

廿八年三月十三日

当我取出照相机翻拍下这张不寻常的信件之后，许志光继续说：

“我们是第二批回国的机工队伍，总数200多人，总领队是钟运熙，我被任命为副总领队，兼任新加坡中队负责人。回国时，新加坡《星洲日报》派了随团记者李志达和我们一起出发。启程那一天（1939年3月13日），码头上彩旗如林，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一片热烈景象。新加坡‘和丰’轮船公司派出海轮送我们踏上征途，同船回国的母亲、妻子及两个孩子，亦享受特别铺位免费同行。她们后来转车回到福建莆田定居，我则随机工队伍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

“在训练所集训之后，我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一大队的补充队当班长，从事芒市到保山之间的军运任务。随后，又调到第9大队27中队当中队长，驻扎在保山。滇缅公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初是险路和疟疾。当时该路刚抢修完工，遇到雨季，使我们尝到了‘山大王’的滋味；有时待在山上两三天，没有吃的，只好上山采野果子充饥；又时常被‘疟疾蚊’咬叮，患上‘打摆子’，发冷时即使盖上重被、裹着毛毯也无济于事。幸亏机

工战友献出印尼筹赈会送来的‘金鸡纳霜’（奎宁丸），才转危为安。”

许志光回忆说：“我们南侨机工团是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回到祖国的，大家怀着共赴国难的壮志，离开了海外温暖的家庭，许多人还抛弃了原来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前来报效祖国。我们回国后，按照当时的货币核算收入，月薪远远不及在南洋时的半数，而且衣、食、住、行、工具及药品都十分缺乏，工作条件极差。但是，无论在运输线上还是在机修厂里的华侨机工，大家都毫无怨言，自觉地勤奋工作。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滇缅公路上每日平均运入三百吨军火，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可是，华侨机工的爱国热情，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冷遇，分配到的尽是一些老掉牙的杂牌车，行车路线也多为环境恶劣的危险地段。加上当时滇缅、滇桂黔一带气候多变，疾病流行，使回国华侨机工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少人因翻车事故及疾病献出年轻的生命。鉴于这些情况，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9年8月派发交际委员刘牡丹前来慰问，并将了解到的有关实际情况向总会报告，总会立即着手改善回国服务人员待遇。1940年初，在海外侨胞的资助下，南侨筹赈总会首批将一百辆美制‘GMC’牌新货车运到仰光，我们组织机工把车接回来，并按照总会的意图，组成了华侨先锋运输队第一大队，事隔不久，南侨总会又将一百辆美国新制的‘大道奇’货车经仰光运来，于是又成立了华侨先锋队第二大队。两个运输队的人员全部都是华侨。后来，由于时局发生变化，总会原定分批给运输队送车的计划被迫中断。1940年底，华侨先锋运输一大队和二大队在缅境腊戍、八莫一带执行任务以后合并，原一大队队长刘贝锦任大队长，连文瀛任大队副，我担任了第三中队长，继续在中缅边境的遮放至保山一带担任紧张的运输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2年初，日寇由缅甸进逼云南边境。许老先生回忆起这一时期，心情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中队奉命由遮放撤回昆明，一路上塞车难行。我于5月4日天亮时开过惠通桥，当晚刚到保山时，‘五·四保山惨案’的被炸尸体惨不忍睹。事后得知，仅我们中队就有十几辆卡车在龙陵一带遇敌后下落不明，有的被阻隔在怒江西岸，可能牺牲了。”

“滇缅公路断绝后，在混乱的时局中，南侨机工团的成员四处流散，许多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白天外出自行谋生，晚上就住在防空洞中。本人也历经一段失业流浪的生涯。尽管如此，机工队的大多数成员，仍在极其艰

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与困难作斗争，坚持到抗战胜利。”

当我问及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的境遇如何时，许先生说：“抗战胜利后，已改名为中缅运输局的原西南运输处移交给云南运输公司。南侨机工纷纷要求返回南洋与家人团聚，但遭到国民党政府别有用心的阻挠。为此，陈嘉庚先生于1946年6月在吉隆坡召开‘支援华侨机工复员大会’，要求政府做好机工复员工作。随后，各地机工来到昆明登记，截至当年年底，只剩一千多名机工前往登记，陆续返回南洋者仅千余人。遥想当年共有三千多人回国参加抗战，如今已有三分之一牺牲了，我们虽然为此伤心落泪，但也因为替祖国作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新中国成立后，尚有数百名机工留在云贵高原一带。而如今，贵阳只剩下三人，且都年逾古稀，已垂老矣。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战斗经历，常常又觉得回到了热血沸腾的青春时代。”

(1988年)

辛酸的回忆

——贵阳南侨机工李山河访谈录

在贵州，有一位为了“驱除日寇，还我河山”而改名“李山河”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他是第九批回国服务的，曾在滇缅公路立下汗马功劳，不料却遭受冤狱磨难。下面记录的是这位机工的辛酸回忆：

我原名李成业，祖籍海南岛。1927年共产党在家乡闹革命，我也参加了儿童团。不久，地主还乡团回来了，革命受到挫折。1928年我13岁时随亲友到新加坡。而父亲与二叔留在家乡，不幸于1932年被反动派枪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侨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在新加坡加入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社（社长为吴伦），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每逢星期天或假日，总是参加南侨总会举办的卖花募捐筹赈活动。当时，南侨总会在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援助祖国抗日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南侨总会宣传委员侯西反的宣传演说特别吸引人，鼓动性极强，每次演讲，我总是到会聆听。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起号召，南洋华侨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战。为了表达“消灭日寇，还我山河”的壮志，我改名“李山河”，满腔热情地去报名。可是，南侨机工团要求有开车技术，我不懂开车，结果报名未被批准。但我没有泄气，下决心学开车，终于通过了考试，加入第九批机工队伍回国。8月14日，我们乘轮船经西贡回国，在昆明潘家湾集训，考试合格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不久即参与了南宁战役的军火运输。当年11月底，南宁第一次失守，我们奉命撤回昆明。此时，陈嘉庚

先生派南侨总会刘牡丹前来慰问南侨机工，我们才得知南侨总会送来给南侨机工的大批物品（衣服、药品等），都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得知之时，我们非常气愤；但为了抗日救国，也只好忍受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为抗日军事运输上，无暇去计较。

后来，第九大队被调往滇缅公路抢运，大部队设在芒市。我们行驶在芒市至下关一线，有时直接到昆明。经常冒着敌机的空袭，闯过多少次滇缅路上的风险。我亲眼看见不少机工战友翻车牺牲。但大家抱着抗日救国不怕牺牲的决心，埋葬战友的尸体后，又悲愤地投入新的战斗。

谈起本人在滇缅公路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冤狱：

1941年4月，我在保山与当地一个女青年小王（保山中学生）订了婚。有一天，未婚妻的哥哥王富民（保山师范学院员工）搭我的军车去下关参观大理花会，车子刚开到保山大板桥就被稽查站扣留了，说我捎客带货违反军令，属于贪污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关了起来。我怎样解释也没用，就被关押在保山两个月之久，然后转送昆明看守所。西南运输处军法处不进行调查核实，就判了我两年六个月徒刑，送入昆明钱局街第一监狱，含冤坐牢。我被带上脚铐，受尽折磨。

当我被送进监狱时，还看到几十位南侨机工也被捕入狱，其中有九大队的陈家标，十二大队的吴国栋、符和明、林宏英、戴新菊等，有的现在已记不清名字了，他们也带着脚铐。当时国民党的监狱里，有所谓“四大金刚”、“八大天王”。他们是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犯人，这些恶棍凶得很。我们这些海外归来抗日的侨工，含冤入狱，竟要受这些恶棍的欺凌。他们要索取什么东西都得给，不然就得挨揍，有理也说不清。这些人在狱中横行霸道，反动当局从不过问。一间牢房只有十平方米左右，要关十多个人，只能挤在地板上睡，又脏又臭，还得受“四大金刚”的敲诈。我们侨工原来每月只有30元国币补贴，生活费用大都靠侨汇。被关入狱后没钱了，就更受欺负。每人一天只吃两餐，每顿只有二小碗带沙的糙米饭，没有菜。当初大家为了抗日救国，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而回国，如今却落个悲惨的下场。

许多南侨机工都想不通，就在狱中开展斗争。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侨工向看守要求工作，于是弄来一些布鞋来纳，每双一角钱，每天可纳两双，便可以买一些菜来配了。令人痛心的是，日机常来空袭，警报一响，看守人员就逃跑了，竟不顾我们这些为抗日救国而来的南侨机工的死活！牢里的铁窗

生活是暗无天日的，生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只得听天由命，能活下来是侥幸的。与我同牢的九大队陈家标，就在1942年患霍乱症死于狱中，只有20多岁。这一次，狱中“犯人”因得不到医治，5天内就死了100多人。死了人还要叫我们抬出去埋葬。抬尸者也有染上疫症，死于非命的。我亲眼看见外面有三间专门放置死人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尸体，有的机工今天还被派去抬死人，明天则由别人抬出去埋葬掉。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曾写道，“华侨机工无罪被关在暗房”，写的就是我们的情况。陈嘉庚先生还曾派侯西反到监狱里看望过我们。我在新加坡时就认识侯西反了，他是一个爱国侨领，热心抗日，宣传鼓动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抵制日货。他的爱国行动惊动了英国殖民政府，1939年底被驱逐回国，在重庆中侨委继续做抗战护侨工作。当他看狱中看望我们时，安慰我们说：“您们是爱国华侨机工，是含冤坐牢的，我要去重庆向政府当局交涉！”后来他为机工之事到重庆交涉，不幸在返昆明时飞机失事殉难。我们每个南侨机工都放声痛哭，并为侯西反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我于1943年出狱，此时，惠通桥已被炸断，滇缅公路断绝了，许多机工都失了业，我只好到昆明同仁街友联荣店当工友。其间曾亲眼看到有的机工战友贫病交加，冻死在昆明街头，而我本人也自身难保。1945年2月，我转到美国陆军执行所当工友。抗战胜利后，经熟人介绍，我到后勤总部汽车连当驾驶员，调往重庆，与我在一起的还有侨工刘瑞齐（永春籍，今在福建）、周学锦等人。1949年，我在四川参加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我转到贵州汽车运输总站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时光流逝，转眼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当年参加南侨机工的经历，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是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回来的，尽管受到一些挫折，但仍不违初衷，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一个南侨机工幸存者，我有责任将这段亲身经历写下来。同时，我还有责任将所熟悉的已故南侨机工战友的无名英雄事迹记录下来：

· 南侨机工符平，有一次运军火回来，因病将车停在龙陵站，结果死在停车站上，年仅27岁。

颜振生，也是南侨机工，病死在永平站。那时大家推运繁忙，他生病时我们都不知道，等到病死了，站上才通知我们去为他埋葬。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侨工战友黎锡宽，他也是海南籍。他没有死在日寇的炮火下，倒是被国民党第五军开枪打死在云南马龙。当时，他开车跟在军马之后，慢慢地走了几公里路。军马不让路，黎锡宽性急，按了一声喇叭，军马惊跳一下，他及时刹车。头刚伸出驾驶室外一看，“砰”的一声枪响，正好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年仅26岁。他的坟墓还留在马龙。

南侨机工抗日有功，纪念碑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1988年)

青春无悔

——曲靖南侨机工邝振声访谈录

在曲靖沾益汽车站，我拜访了当年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邝振声。当我说明来意之后，老人面对沙沙转动的录音机，略一沉思，便滔滔不绝地讲起40多年前的往事。夕阳从窗台上透射进来，在老人饱经沧桑的脸上涂上一层古铜色。

“我原名叫邝天祥，现名‘邝振声’则是1942年滇缅公路断绝后，因失业不得已而冒名顶替的。”

“我出生在泰国董里什田埠，祖籍广东，从小就亲眼看到华侨在国外受到各种歧视和压迫。11岁时，一次见到卖鱼的华侨商人因事与当地入吵架，泰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华侨拖出去，如拖死狗一样。那件事给我很强烈的刺激，我感到祖国不强盛，海外华侨便会受到如此歧视。祖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泰国华侨反应强烈，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但由于当地政府禁止华侨进行抗日的政治活动，因此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是秘密进行的。许多人自费悄悄回国，如林犹兴、岑金洪等人，都是历经曲折自费到昆明的。而我们一行七人，则在筹赈会许先生的资助下回国，1939年8月8日启程。临行前，董里华侨团体给我们送了一面三角锦旗，然后由许先生领队，从什田乘汽车到高头廊，再转乘国际快车前往槟城。在槟城，我们受到在此留学的泰国董里华侨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该校师生带领包车游览了槟城的一些名胜古迹，还与留槟泰华师生一起摄影留念。”

说到这里，邝振声转身到房里取出一张珍藏了近半世纪的发黄照片，前排七个机工为：左四钟炎祥、左五蔡汉良、左七即本人邝天祥（后改名为邝

振声）、左八钟道清、左九蔡高耿、左十陈潮海、左十一蔡惠文。

接着，老人继续回忆：

“8月12日，我们到达新加坡集中，加入第九批回国机工队伍，受到隆重的欢迎。陈嘉庚先生接见了机工团，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8月14日，满载华侨机工的‘丰庆轮’起航，三天后抵安南西贡，受到当地侨团的热烈欢迎，送来了路上吃的面包和罐头食品。8月23日，终于到达昆明，驻进潘家湾训练所。经过短期军训后，我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6大队18中队，驻扎在贵州关岭场。”

谈及回国后的首次行车经历，老人对所走过的路线与地名的记忆，竟是如此清楚：

“那次我们由贵州关岭到昆明接柴油车之后，转运军用物资到重庆。因为头一次远程行车，对国内公路不熟悉和不习惯，从昆明到重庆竟走了一个多月。返回时，队部已经搬到广西柳州了，驻在马鞍山。由于南宁告急，上级命令我们突击抢运浮石兵工厂机器，转移到柳州。任务完成之后，南宁已失陷，我们车队就搬回六寨。此时，大塘到南宁的公路已被切断，改由车河新开一条公路，由车河到东兰，经田东、福昌、天保，靖西到岳圩。该线连接安南国境，从境外的同登、重庆府一带，抢运外援军用物资入广西，我们队部奉命调驻东兰，穿梭行驶在中越运输线上，经常受到敌机的猖狂空袭。南宁沦陷后，敌机从南宁起飞，每天都来轮番轰炸，企图扼断该运输线。为了避开敌机空袭，车队被迫改为夜间行驶，白天将车停在树林中隐蔽起来，太阳落山后才出动。有时候任务紧张，只得冒着敌机轰炸，白天也出车。好几次，我们的车队在行驶中被日机追上了，便迅速将车开进山洞躲起来，敌机追至洞口，无可奈何，只扔几个炸弹又飞走了。幸亏广西的天然山洞很多，有利于躲避敌机的空袭，所以我们的队部驻地都选择靠在山洞边。”

“从田东到福昌过河需搭渡船，每当等候过渡军车摆成长龙之时，敌机总要趁机来轰炸。没有轮到过渡的车上人员，只好先离车寻找躲藏的地方。接下来，队部又搬到安南边界，抢运境外转运来的军用物资。当时不知是谁的主意，在安南境内支起一匹很大的白布，上面用英文字样写着‘安南地界’，日机空袭时见到安南地界就不炸了。有一次我曾见到敌机来了，只好转开回安南境内，竟保平安无事。1939年底，当日军准备在安南登陆前夕，我们驻岳圩的队部已经撤退了，当我由越境重庆府装运汽油回交界处时，该

路已被民工挖了半边，一段一段地破坏，我们艰难地驾车撤退，稍一不慎，则可能翻车爆炸。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一路上小心翼翼，开过遭破坏的公路，退回六寨待命。”

1941年，在贵州甘巴哨新成立第10大队，其中156中队是清一色的华侨机工，中队长是林君凯，中队副是白清泉。当时长沙再度告急，我们奉命将湖南晨溪兵工厂的全部机器搬迁至四川东溪，前后将近运了一年，才全部运完。第二年，整个大队调往昆明，住黄土高坡保养场。主要任务是继续到畹町、遮放等地抢运，跑滇缅公路运输。由于西南运输处驻缅甸办事处中印大队缺驾驶人员，印籍王亚能任大队长，于是我们由林经光带队加入中印大队，开赴腊戍。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日寇入缅沿滇缅公路进攻云南，我们奉命撤退。在撤退时，有许多华侨难民要求乘我的车撤退，于是我除了载汽油，又搭了20多人连夜开车，天亮时开到畹町。当时退回昆明的车队摆成长龙。过惠通桥到达老鲁田吃饭时，抬头望见一群日机飞往保山方向，当天下午我们到保山时，只见保山已被炸成废墟，有人大腿被炸飞到电线杆上挂着，真是惨不忍睹。这便是举世震惊的保山‘五·四惨案’，发生在1942年5月4日。

“我将车子开到保山站报到，要求卸货，而车站一片混乱，根本无法卸，只好开到下关才卸了。随后，我们奉派到凤仪乡下疏散，待命一个多月。接着，我们接到通知，中印大队的车全部开往昆明西站停车场。交车后，当局便撒手不管了，因为惠通桥已断，滇缅公路被切断了，许多华侨机工竟失了业。”忆及此事，邝老先生至今仍心情激愤。

“刚开始，我们还有点钱，而钱用完了，便卖衣物，衣物卖完了，连每天吃一顿饭都成问题了。夜间只好蜷缩在昆明小西门城脚的防空洞里。每洞有一米宽，可勉强容纳二人，盖的是稻草和麻袋。白天到金碧路和祥云街，见到熟人讨点钱，但见到的多数都是失业者。有的机工就因连讨几角钱吃饭也讨不着而饿死。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同我一同第九批回国的雪兰莪机工邝松登，与我同住一个防空洞里，睡到半夜又冷又饿，就双脚一蹬悲惨地死去了。”

“这是南侨机工史上最艰难的一段，度日如年，究竟死了多少人，都没有准确的统计。那种艰难日子是怎样度过来的，至今回忆起来，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对于多数南侨机工来说，这也是最难捱的时光。情急之中，我

跑到黄土坡请求大队长王健存、胡凯军、白清泉相助，在白清泉的帮助下，被暂时收留下来。过了个把月，中队长胡凯军对我说，查到队上空了一个名额，此人开小差离开了，名叫‘邝振声’，于是，我就顶了这个人的名，把原名邝天祥改为‘邝振声’了。谈到此，邝老先生惨然一笑：“我这个冒名顶替的假名，竟一直保留到现在，可是，查南侨机工的档案，只有‘邝天祥’才是真正的我啊！这是不得已的事，当日若不去顶名补缺活下来，也许早已饿死在防空洞了！”

“在此期间，我给华侨机工朱松胜（后留居在广西）当助手，开的是‘木炭车’（当时缺乏汽油，只好靠烧木炭发动），帮他摇木炭炉，路线主要由小西门至黑林铺。过后，又跟另一个机工黄和平开客车，也是木炭车，跑昆明至下关一线。”

“1944年底，有关当局调集部分失业机工到晋宁盘龙山集训。集训所所长为葛丰，副所长杨友柏，大队长是马风岗。在盘龙山主要是修路，也听听技术课。几个月之后，又回黄土坡156中队，然后分到昆明巫家坝滇缅运输局空运站驳运飞机运来的物资。有一次，敌机轰炸巫家坝机场，新加坡一个南侨机工遇难。我们在这里坚持到日本投降，飞机场工作结束之后，才调到曲靖开大道奇车，从四川泸州运盐巴到曲靖。不久，我又被去跑滇缅路。”

“1946年南侨机工复员，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发给每位机工200美元（折67万国币），我捐出7万元国币修理福建会馆。当时复员来去自由，我便继续留在昆明，驾车行驶下关、保山一线。后来，在华侨机工黄辉庭的帮助下，自制卷烟售卖，也做一些小本生意，一直度到昆明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侨务处特别关怀华侨机工的失业人员，尽快地向各单位联系，安排工作。”录音机磁盘在继续转动，老人的声音里充满着兴奋和喜悦。

1950年10月，侨务处通知失业机工人员到黄公西街川藏公路报考司机，邝振声被正式分配到黑林铺小团山工作，整修旧万国车，修好之后，就装运筑路材料到下关等地。在以后的工程建设中，他积极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52年光荣地出席云南省第一届工农业劳动模范大会。1955年，他调到沾益运输总站，工作十分出色，连续得过许多安全先进工作者奖状。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老人也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但他坚信祖国最终会了解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得以平反昭雪。现在，我虽已年过古稀，退休在家，但我心情舒畅，继续贡献余热。单位领导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参加抗日的南侨机工，最近还分配给我一套新宿舍，宽敞明亮，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满意。看到我们为之奋斗过的祖国一天天强大，我们这些老人可以说青春无悔了。”

(1987年)

冤狱不堕志 跛脚亦无悔

——记玉溪南侨机工郑文通

现居住在云南玉溪火车站的退休驾驶员郑文通，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叫“黄亚涛”呢——说来话长，那还得从50年前讲起。请听他的讲话录音吧：

我原名郑文通，祖籍福建莆田，“黄亚涛”这个名字，是为了避开家人的阻挠，完全是为着抗日救国，参加新加坡第五批机工团回国而改的。

1939年，祖国抗战进入最艰难岁月，急需大量熟练司机从事军火运输。南洋华侨青年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组成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新加坡起程分批回国抗战。在广大侨胞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我也报名应征。大哥知道后，向筹赈会捐献了500元，却不让我参加机工团回国。当时大哥要我为郑家后代着想，认定此去必九死一生，故千方百计阻止。我与大哥争辩，他却说：“大道理谁不懂，为了抗日救国，每次募捐，我们从不落人后，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华侨主要是有钱出钱嘛。”说完后硬是要把我留下，让我去学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可是，我的决心已定，不到黄河心不休，一气之下，和我的老板商议，将自己的姓名郑文通改为“黄亚涛”，祖籍福建改为广东，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第五批回国机工团。当我大哥见我剃了光头，换上军装，要再阻拦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变态度支持我回国。

1939年5月22日，我们由新加坡启程回国。在昆明潘家湾集训后，我被分配到芒市接车。当时滇缅公路刚开通，滇西芒市一带路况最差，坡陡路险，更糟的是汽车运输需经原始森林的“烟瘴地带”，毒蚊成群，恶性疟疾不断

夺去华侨机工的宝贵生命。当地流传的民谚“要上潞江坝，先把老婆嫁”，就是滇缅公路险恶的真实写照。有一次，我从保山到芒市，顺便带了一位熟人，当晚因风雨大作无法行车，在龙陵住下，结果被检查组查出，随后被押往昆明五华山拘留所，被法院判了两年半徒刑。其原因是军车不准带人，带人则违反了军令，也不管是不是熟人。我怀着抗日救国的赤子之心回来，却被卷进监狱受折磨。幸亏同乡华侨的鼎力相救，我只蹲了半年牢。所剩下二年徒刑以每天一元折算，付出很高的代价，才把我赎了出来。

吃了这次大亏，出监之后，我吸取了教训，又到下关华侨十四大队报到，把憋了半年的劲头全都投入抗战军事运输中去。为了多拉快跑，我们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虽然吃不好睡不好，但为了抗战胜利，谁也没有怨言。

由于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火，增强了中国抗战的实力，被日寇视为眼中钉。于是日军出动飞机重点轰炸惠通桥和功果桥，企图炸断该路的咽喉。有一次，我经惠通桥回下关，行驶途中遭敌机轰炸，我前面那辆车上的机工陈天生不幸牺牲，而我右脚也受了伤，鲜血直流。但我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先把牺牲的战友拉在车厢后，继续将汽车发动起来，开到旁边隐蔽处，并通知后面随车人员继续将该车开回，然后才开着自己的车子前进。到了老鲁田我才抽空包扎伤口。车到“七〇七”时，由于我的右腿流血过多肿胀发麻，后面赶来的分队长发现后，当即将我拉上别的车送往昆明治疗。

我在昆明金碧路陆军医院治疗时，医生知道我是华侨，就说治疗要花很多钱，否则要把整条腿给锯掉，其意要我多花钱。恰好此时南侨慰劳团到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侯西反先生来医院探望侨工伤病员。我把情况反映给侯先生，经他出面疏通，医院才对我进行认真诊治。经一个多月的治疗才出院，但留下了后遗症，直到现在还有些跛脚。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断之后，我们许多机工失了业，我回到昆明南强街华侨互助会，因生活无着，到处打工。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我随500多名机工及其家属复员返回新加坡。由于生活环境改变了，处境不好，因此五十年代我再次回国定居云南，在玉溪汽车站工作直至八十年代退休。

及时最是龙陵雨 竟尔回生爱国人

——记荷属华侨救护队员李伟庆

在风景如画的云南大理，我登门拜访了一位被机工战友们称为“无名英雄”的南侨老机工——李伟庆。原来，“李伟庆”的名字并不是直接记录在南侨总会统一组织回国的一至九批南侨机工名册上，而是收录在民国历史档案馆的“荷属华侨救护队”档案中。年逾八十的李伟庆老人，根本不在乎他的名字收录在“荷属华侨救护队”（1938年）档案还是南侨机工名册（1939年）档案有何区别，反正都是回国参战，并肩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他说：“赤子报国，回国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下面记录的是这位老人的回忆：

我叫李伟庆，原籍广东梅县，因祖父参加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遭到清政府的通缉。父亲只好逃到印尼谋生。我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明古肆。

1938年，我告别了老母亲，参加“荷属华侨救护队”回国服务。这个组织是由巴达维亚养生院院长、著名医学博士柯全寿等侨领发动的，带着印尼华侨捐赠的大量药品、救济品和救护车，来到祖国的抗战疆场。我们一行40多人，是乘轮船经马尼拉、香港回国的，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我们这批救护队员被分散到各个战区去救护、运送伤病员。因此两湖、两广、川陕都有我们救护队的足迹。我和林坤良被分配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部”。当时，必须绕道安南的海防，经广西才能转到贵阳。为了避开敌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将救护车进行了伪装，昼伏夜行。用了五天时间才到达图云关。图云关设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是新加坡著名医学

博士林可胜（侨领林文庆之子）。

1938年，武汉、广州失陷之前，我带领七辆车组成一个救护车队，往返于贵阳和海防之间，运送各种物资。1939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总队”把驻在湖南的救护车队部分车辆调回图云关，准备派往刚开辟的滇缅公路去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由于该车队的驾驶员都不会说普通话（通常只讲英语、印尼语等），于是我受命带领这支车队前往云南畹町。

滇缅公路是应抗战急需而建成的泥巴路，穿越滇西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峻岭。其惊险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由于路基不固，时常塌方，尤其遇上雨季，泥泞路滑，车子陷下去便难以自拔。为此，在龙陵地段原始森林处，两旁都备放一些大树杆。如果车辆陷下去，就将这些木头作为枕木垫上去。如果再陷下去，又铺上枕木。我们作为滇缅公路首批运载军事物资的车队，被称为“开路先锋”，历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和意料不到的险境。

1939年雨季的一天，我过了惠通桥，汽车在一处急弯险路上翻车，左大腿被汽车大梁下一颗5寸长的螺丝穿入，至今仍留下一处伤疤，这次危险的经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那一次，我们的车队刚从畹町运载一批药品到贵阳，随即奉命再次抢运一批重要物品。于是我们不顾疲劳连续出车，出车时特从贵阳运载桐油出口。我们红十字车队一行五部车子，每辆车载18桶桐油。我当领队，带车殿后（四辆在前）。当时由于敌机轰炸，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惠通桥只能在下午3时到第二天上午9时前才准通行。我们车队来到惠通桥边，便排队等到下午3时才通过。当时桥面只能容单部车辆过桥。我们约定当夜在腊勐车站集合，于是前面4辆先过桥了，我在后面办理公文手续（检查通行证）。当我开过惠通桥之后，刚刚爬上一道陡坡，由于路基不固，车子突然倾覆，翻了几滚，在距离江边几米处被一块石头挡住了，车门自动打开了，我被甩出车外，压在大梁底下，被汽车底盘一颗大螺丝钉穿进左大腿，血流不止，昏迷过去。大约过了半小时，我才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被压在车底下，一颗特大螺钉穿进我的大腿，螺钉又顶在底下一块石头上，动弹不得，我才明白已经翻车了。此时天快黑了，过路的车辆也不易发现我翻车在深沟底，成群的毒蚊嗡嗡嗡嗡轮番来乱叮乱咬，我也无可奈何，只盼望着同事们开车至腊勐之后回头来找我，那也得几个小时，我还能挺得住吗？我隐隐预感到这回难免一死。但抗战未胜利，我不能死！我咬紧牙关，提醒自己要坚持住，同志们一

定会来救我。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老天爷助我也，下起了一场及时雨。“下关风，龙陵雨”，这里的气象变化莫测，瓢泼大雨说来就来，多亏这场大雨的冲刷，使得原来顶住我大腿下面的那块石头渐渐松动了。我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用手一直扒开周围泥土，终于使这块石头掉下去。我的左腿才从螺钉穿压之下拔了出来。

这时，大约是晚上7点多钟了。我的助手彭莲贵（下关复兴村民，当时在红十字会车队当勤杂人员，现住大理州汽车总站）与其他同事开车赶来救援，我远远看到他们提着汽灯在叫喊，我担心翻过来的汽车及车上的桐油爆炸，马上叫他们不要提汽灯下来。于是他们只好摸黑下来，把我抬上车，急忙开往腊勐一个卫生所。医生察看之后说伤势严重，于是立即转送到龙陵县医院。当我在滇缅公路惠通桥翻车受伤的消息传出后，附近的老百姓都来探望，有个小脚的老大婶提着一篮鸡蛋送来，口中不住地祝福：“先生您命长，老天会保佑抗日将士的！”第三天，我因伤势太重，只好转到昆明白龙潭医院诊治。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伤口终于痊愈了，只是在左腿上留下一处螺丝钉穿过的大伤疤。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云南成家立业。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大理州汽车运输总站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1945—1985）之际，我珍藏的一张“荷属华侨救护队”的照片，被送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展出。1986年，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亲自到大理与我们这些南洋华侨机工座谈，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还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随后，国家制定了政策，照顾我们这些尚健在的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目前，我正在继续写一些回忆录，贡献余热。

（1987年）

漾濞江声悲难友 高峰素月吊忠魂

——林树容追忆夤夜孤身护送战友遗体的惊心经历

1988年1月8日下午，笔者在滇缅公路大理段的清华洞汽车保修厂下车，按照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提供的档案名单和有关线索，径直来到厂区宿舍采访了退休在家的75岁南侨机工林树容。

林树容是海南岛文昌人。当他尚在母亲腹中时，父亲便往泰国谋生去了，一去未回，后来病逝在南洋。6岁那年，母亲又不幸病亡，他便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幸亏堂兄从海外回乡探亲，就将他带到新加坡。先在华侨小学读书，12岁时就入修车店当学徒，15岁时学会了开汽车。起初为一个英国人开车，月薪50叻币。三年之后，他自己筹集了一笔资金，买了一辆汽车载客，收入还不错。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新加坡学生们上街卖花义捐，筹赈救国，他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每次用车子接送学生上街义卖，都不收钱，尽自己的一份爱国情义。

1939年初，报纸传来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林树容满腔的热血沸腾了。他得知祖国滇缅公路军运输线正急需司机，便前往筹赈会报名，经体验及考核之后，被批准参加机工团。他将自己的汽车送给朋友，并特别交代那位朋友：送学生上街卖花不能收费。然后加入了第五批回国队伍，于1939年5月启程，抵达昆明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14补充中队。

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军火，几乎每一个南侨机工都有一段惊险而悲壮的经历。林树容当时主要行驶保山至下关地段，这是滇缅公路最险要的路段之一，沿途一边是高山峻岭，另一侧则为峡谷深渊，他曾经历无数的惊险，多

次死里逃生，身负重伤，至今仍留下许多顽疾。可是林树容不愿意多谈自己的事，他说，我们这些人回国参战，出生入死，能活着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易了；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摧残，现在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国家还制定政策照顾南侨机工安度晚年，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比起那些为国殉难的机工战友，算是值得庆幸的。

我特地问他，在滇缅公路印象最深刻、终身难忘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是战友！是一位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吴世光！”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林树容夤夜护送机工战友遗体归队的事迹，虽然时隔近半个纪世，但他接受笔者的录音采访时，仍然感觉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按下录音键，记录了林树容的口述：

那是1940年夏天一个炎热的黄昏，我刚完成军运任务由保山开车回队部下关，途经永平加油站时，站长对我说：“林树容，你把这位翻车牺牲的华侨机工运回队部。”

我连忙问道：“是谁？”

“是吴世光！”

一打听，原来是海南籍南侨机工吴世光，今天下午在永平一公里处翻车滚入悬崖深谷，当场不幸身亡。附近的修路工沿着峭壁下去抢救，竟无法将遗体抬上来，只好想出一个办法，用长绳子捆住尸体拉了上来，然后将尸体停放在加油站旁，等待着过路的机工车队运回队部安葬。

吴世光，是我的机工战友，与我一同编入第五批回国的，在老家海南岛还有妻子儿女。他青年时旅居新加坡，当了汽车司机，激于爱国义愤，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

吴世光殉职时大约30来岁，而我仅21岁。我在南洋，从来未接触过死人，而这天傍晚时分去抬尸体，难免增添几分胆怯。但想起战友，想起世光与我的友情，事到如今，容不得我犹豫与害怕，硬着头皮也得上了。说来奇怪，我突然鼓起了勇气，仿佛已经向谁借了胆子一样，虔诚地把吴世光的遗体用毛毯包裹着，请人帮忙抬上了车。安顿好之后，我开始开车，此时已天黑了。永平距下关不到100公里，如果一路顺利，大约几个小时就可归队。

可是，事不凑巧，当我开出几公里之后，爬上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峭壁陡坡路时，车子却抛锚了。原来刚才忙于折腾，竟忘了加水，由于天气炎

热，水箱又没水了，烫得直冒烟，若不及时添水而继续开车，则有爆炸的危险。可是，在这段险要路上上哪儿去加水呢？一边峭崖绝壁，一边是百丈深渊，虽然漾濞江的江水滔滔奔流，然而无路下去取水。如果冒险去找水，万一碰上毒蛇猛兽，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怎么办呢？在这寂寞的夜晚，在漾濞江畔的滇缅公路上，周围的群山在银色的月光下仿佛在为海外赤子的孤魂默哀，偶尔还传来猫头鹰凄凉的叫声，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守着一位为国牺牲的战友遗体，心里怦怦直跳，悲恐交集。我素来胆小，在南洋时常听老人家讲鬼故事，脑海中残留着一些恐怖的幻觉，什么“妖魔鬼怪”啦，“无常鬼”啦，“勾魂鬼”啦，“催命鬼”啦，还有什么“阴间十八地狱”啦，刹时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一浮现……要是在往常，还有机工战友们作伴，心中不会害怕，而今晚却独自与尸体同车，说实在话，心时确实害怕极了。我无可奈何地把车门关紧，坐在驾驶室里，望着窗外悲凉的月色，听着松涛江流的交响声，只好默默地向我身边的“上帝”——“吴仙人”祷告：“吴世光呀，我的好兄弟！我俩是同一批回国的，又分配在同一中队，如今您不幸先归天了，小弟有责任把您护送归队安葬，以慰您的异乡孤魂，将来也好向家人交代。吴世光呀，您可要保佑我，让我驾车平安顺利地回队！”我恭恭敬敬地与死者对话，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以壮自己的胆子。

过了一会儿，摸摸水箱还在冒热气，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一条了：那就是让发动机水箱自然冷却，然后再开一程另找水源加水。此时，夜更深了，滇缅路上更加谧静了，我一边与战友尸体对话，以爱国的浩然正气将过去残存在脑海中的妖魔鬼怪、恐怖幻影驱散，一边焦急地等待水箱早点自然冷却。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原先发烫的水箱终于冷了下来，总算可以勉强地开一程了。可是开了不久，水箱又发热了，车子又开不动了，附近还是找不到水，只好再次停车等待冷却。

过了一段时间，又勉强开出一程，水箱又冒烟了，我急中生智用自己的小便给水箱“加水”。然而，“杯水车薪”，仍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再停下来。就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至临近下关的地方，在一处桥边好不容易痛快地加了水。当我赶回部队时，已经是下半夜二三点钟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难以意料的，有时一件事情的偶然发生，虽是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当时仅21岁的我，由于

受怪异故事的影响，一向是怕“鬼”的。然而，在抗战烽火中夤夜护送战友遗体一事，却根本改变了我的概念，只因心中有了爱国正气，有深厚的战友情谊，自然而然就压倒一切“鬼祟邪气”。我想，这也许是海外赤子为国捐躯的忠魂在感召吧！从此，本来胆小的我，竟然成为一个胆大出奇的人。归队时，由于天还未亮，我为了不惊动这位长眠的机工战友，便将其遗体留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开始筹办明天早上的治丧事宜。

第二天早上，我向14大队的大队长汇报了昨夜的经历，大队长说：“我们要为这位为国牺牲的华侨机工立碑，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随后，他又问：“小林，你一个人深夜运尸体，还怕不怕？”我说：“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山路上，本来是恐怖的，可是有战友的忠魂相伴，就由可怕变为不怕了！”

为了悼念这位为国殉难的机工战友，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特举行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追悼大会。是日，连老天爷亦有情，下起一场细雨，苦雨凄惨，充满无限哀悼情绪。我们抬着吴世光遗体，把他安葬在下关附近的董家庄。在坟前，华侨机工献上了自己动手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记得当时，我们还特意为吴世光立了一块墓碑，这是一块60×40厘米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

“归国抗日南洋华侨机工吴世光之墓

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立

一九四〇年 月 日。”

我立在墓碑前，默默地哀悼着，泪水像雨点滴在碑石上，吴世光为抗日救国在运输战线献身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1988年）

为了抗日救国 不惜抛妻别子

——记保山南侨机工孙其文

1986年11月7日，陈共存先生率领新加坡赴滇缅公路考察访问团来到保山，在访问原南侨机工的座谈会上，有一位从马来亚回来的南侨机工老人——孙其文，他以沉重的心情，讲述了当年隐瞒着父母与妻儿参加机工回国抗日的动人经历之后，泣不成声，噙着老泪痛述了他至今仍不被海外亲人所谅解的一段近事。老人说，不久前，他经辗转托人与马来西亚的妻儿去了一封信，但遭到妻舅回信痛斥，说他无情无义，拒绝再与他通信和联系。在座的陈共存先生甚为关注此事，当即向他问清了其妻舅的通信地址，表示回去后要协助做其妻舅的工作，以求得谅解。

时隔一年，当我采访南侨机工史迹前往保山，拜访寓居仁寿门3幢203室的这位孙其文老人时，孙先生已75高龄，这时因患病正在家治疗。我登门探望，只见他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提起往事，老人不禁感慨万千。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痛楚悲伤地叙述其经历，很快就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不平凡的岁月。

孙其文说：“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但是，在个人的经历中，有些事与国家、民族的历史事件有关，那就是终身难忘的。”四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了，但老人说到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往事，仍像述说昨天的事一样。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南洋后，激起了侨胞的无比愤怒。

“那时，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在马来亚的一家工厂开车，为了不当亡国奴，我积极参加筹赈会的抗日活动。我们常常带领着学生走上街

头，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揭露日寇屠杀祖国同胞的滔天罪行。在宣传活动中，我们高唱《张老三我问你》、《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唤起侨胞的抗日爱国热情。”

“到了1939年，南侨总会号召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那时，广大的华侨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爱国热情极其高涨。当看到同伴们一批又一批参加机工团回国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知道自己若报名，家庭肯定会千方百计出来阻拦的。因为我的父母从永春来麻坡定居后，只生我一个独子，而且我又是已经娶了老婆，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必须承担照顾老人、养活老婆孩子的责任。我若一走了之，这个家庭怎么办呢？”

老人沉浸在回忆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之后，搓了搓双手，又继续谈到报名不但要过家庭关，而且首先是要过自己的思想关。“说实话，当时我在报名还是不报名的问题上，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首先，我想到自己已有一个温暖的家，还有一份满意的职业，回国后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庭由谁管呢？不过，再想一想，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保。国难当头，爱国不爱国，要看实际行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以报效自己的祖国。”

“主意一定，我便瞒着父母，也瞒着妻子，独自一人离开麻坡，直接来到新加坡报名。”

“由于我是悄悄离开麻坡的，没有声张，不敢宣扬，也没有像其他人在当地登报，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全家没有一人知道。”老人讲到这里，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像在对我说，又像在问自己：“你看这是否太过份了吧？是的，我想这是太过份了。”

显然，老人在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情是何等复杂，而心潮更是起伏不已。他看到我深表同情的目光之后，又点点头说：“这就是妻舅至今还记恨的原因，难怪他说我无情无义，至今还不原谅。”但紧接着，老人又连忙摇了摇头，自我申辩地说：“不！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更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爱国无罪，我是为了爱国而回来的。如果当时让全家人知道，那我还能回得来吗？”

老人发自肺腑的这一席话，道出了当时海外一千多万侨胞赤诚爱国的心声，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据了解，去年（1986年）新加坡访问团来到保山访问，孙其文请陈共存先生帮忙打听马来西来的家庭情况，现在得到了可靠的信息：孙其文回国后，其妻就气疯了，不久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后来他父母相继去世，他的儿子被舅舅家收养，起了舅舅家姓郑的名字。

老人继续回忆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是由新加坡红灯码头上轮船，经安南转火车到昆明的，然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13大队39中队，奔赴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驻扎在遮放一带。我先后参加过三次接车，第一次接大道奇，第二次接GMC，另一次是接小GMC。第三批车接回后，我参加了‘华侨先锋运输大队’，被提拔为少尉分队长。先锋队的任务是从八莫、腊戍一带，抢运盟国支援的抗战军用物资回保山。自1939年至1942年5月，我们亲手运载了大量的军需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南洋沦陷，孙其文无法南返团聚，加上惠通桥炸断后，他滞留保山，经机工战友的撮合，在保山又成了家，并生有一个女孩（名孙惠云，现在保山工商管理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孙其文到过西藏、四川等地从事运输工作，1962年回保山工作，直至不久前从芒宽糖厂退休。最近，又接到上级通知，为关心每位南侨机工安度晚年，国家特照顾享受100%退休金待遇。

当我踏着月色告辞时，老人再次表示他的最后心愿：愿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留在南洋的儿子，并能够得到海外亲人们的谅解。我默默地为老人祝福，祝福他身体健康，热切盼望见到儿子的心愿能够实现！

（1987年）

把爱留在傣家

——记芒市南侨机工蔡文兴

南侨机工陆续回国服务后，陈嘉庚先生于1939年8月派南侨总会交际委员刘牡丹前来滇缅公路视察，调查战勤运输和机工生活情况。当时任《南洋商报》记者的张楚琨（现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随行报道：南侨机工都是这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与云南少数民族姑娘的爱情故事是机工运输生活的外一章。他在《南洋商报》上如此报道过：“华侨机工中有不少漂亮的青年，他们体格好，富于情感，会唱动人的英文歌和马来歌。此外，还有一张棕色健康的脸……这些多情的女郎，就往往把我们的机工当作丘比特的对象。”

在我所采访的留在云南的南侨机工中，就有一段因答谢傣族姑娘帮助而结成的良缘。他就是祖籍惠安的马来亚华侨蔡文兴先生。

蔡文光又名蔡大头，出生于马来亚太平埠，自幼在华侨小学读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唐山”有深厚的感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到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爱国之情油然而生。由上街宣传、组织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卖花筹赈，到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9年3月，蔡文兴加入第三批机工团由新加坡启程回国，集中在昆明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战事紧张，训练提前结束，蔡文兴与队友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6大队第16中队当驾驶兵。当时，广西、贵阳一带军火奇缺，运输力量严重不足，第6大队即调往贵阳、广西一线抢运军火。此间生活相当艰苦，地形极其复杂，日夜兼程，还常常遭受敌机空袭。

1940年，第6大队调回云南，从事滇缅公路的抢运，蔡文兴被编入“华侨先锋大队”。该大队有200多辆车，全部是华侨捐赠的。全大队200多个成

员，从大队长至驾驶兵全都由华侨组成，队部就设在芒市。

芒市是风景秀丽的边疆重镇，这里山明水秀人情好，兄弟民族的民风淳朴，尤其是傣族姑娘，美丽纯洁，热情大方。她们对于千里迢迢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怀着崇高的敬意，总愿意帮助“华侨先锋大队”的华侨机工做点什么，彼此关系比较融洽。有一次，蔡文兴开车驶过芒市附近的原始森林地带，被毒蚊咬伤，不幸得了恶性疟疾。由于运输任务紧张，加上年轻气盛，认为挺一下就可以挺过去。没料到，当汽车行驶到一座傣家村寨旁时，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打摆子”恶性发作，浑身冷得发抖。就在此时，一群傣家姑娘经过此地，看到这种情况，马上用当地一种秘方施行抢救。其中，有位姑娘特地赶回家抱来一床棉被盖在他身上，待到脱险之后，才让蔡文兴继续上路。对此蔡文兴非常感激。过后他带上一些礼物，特地登门致谢。蔡文兴这一行动，按汉族的习俗，是件正常的事。可是按当地傣族的风俗，送礼即聘礼之意，傣家便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蔡文兴却不知底细，大大方方地将点心吃完。此时，家长高兴地宣布女儿与他的婚事定了下来。蔡文兴非常诧异，连连解释说：“不是那个意思。”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在华侨先锋大队机工战友们的帮助下，蔡文兴了解到这位傣族姑娘确实是个善良可靠的人，便正式向华侨先锋大队部申请办理《结婚证书》（该证书保存至今）。大队部也愿意撮合这桩婚事，择个“吉日”（即抢运工作暂告一段落的休息日），在大队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全体机工战友欢聚一堂，痛饮欢庆一番。当年年底，蔡文光“升了一级”当了“爸爸”。

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为了赶在日寇入侵国门之前焚毁畹町、芒市一带的军火仓库，蔡文兴与几个机工战友奉派前往执行这一惊险、紧张的任务。当蔡文兴亲手沿途焚毁几座军火库之后，日兵已经尾随而至。他来不及进家门便驱车撤回，汽车被阻在龙陵808公里处时，惠通桥已炸断了。怎么办呢？他躲进深山避难。从此，蔡文兴就在龙陵、平达、象达、景坎一带流浪。几个月之后，有一名从日本留过学的土司代翻译了日本人的“安民告示”，告示说要让所有在外的人员回来“安居乐业”，蔡文兴才趁机潜入傣家。起初不敢露面，生活问题全靠妻子负责。后来，才陆续探头出来做点小买卖帮助养家糊口。

抗战胜利后，经过多方努力，蔡文兴于1946年办理了复员南返手续，当局给他发了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的“胜利奖金”。蔡文兴本来想返回

马来亚，但妻子、孩子不愿意离开芒市傣家，于是全家留了下来。他用这笔“胜利奖金”在芒市开了一间“闽兴旅社”。

1956年公私合营时，老蔡离开了旅社，重操旧业，分配到昆明汽车总站任司机。不久，又被调回边疆芒市，直至1979年退休。现在蔡老先生正和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

从一名热血青年至白发苍苍的老翁，蔡文兴将自己的大半生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当我探问他对此有何想法时，蔡老先生说：“回想四十多年前，年青力壮，血气方刚，目睹祖国处于危难之中，即满怀赤诚报国之心，毅然辞别亲人回国参加抗战，当年在滇缅公路运输线上和抗日前沿阵地的激情壮志，依然激荡着我的心怀。”

(1988年)

最年轻的机工

——谢川周回国抗战纪实

1988年元月2日下午，经德宏州侨联同志的引荐，我来到芒市跃进巷8号，拜访了海南籍南侨机工谢川周。这位当年仅17岁回国的热血青年，是三千多南侨机工中年龄最轻、个子最小的一个，近半世纪的沧桑岁月，已使他双鬓染霜，却仍透露出一股刚毅、豪爽的英气。当他得知我专程采访的来意后，情绪非常高涨，迅捷地取出珍藏在箱底的“侨务委员会奖状”。这张发黄的奖状，是抗战胜利时颁发的，上面写着：“华侨机工谢川周，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这是对海外赤子谢川周的历史评价，亦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文物见证。

根据当地同志的介绍，我得知谢川周是与哥哥谢森周一起参加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战后哥哥复员回新加坡，而他却一直留在云南，于是，就请他从家世谈起。

老人仿佛又回到了抗日的烽火年代，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谢川周于1922年出生于海南岛万宁县，兄弟姐妹7人，哥哥谢森周比他大5岁。谢川周是14岁时到马来亚太平埠落脚在伯父家的，起先给人当杂工，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当学徒，学会了修车与驾驶技术。

“七·七事变”后，祖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太平埠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浪潮。谢川周认为，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己虽然拿不出多少钱来，但年青力壮，可以为抗日出力奔波。于是他报名卖纸花，为抗日救国募捐，整天拿着花沿街叫卖。纸花本没有用处，但不少华侨同胞仍解囊争购，涓涓之水，汇成巨额筹赈义款，源源不断地汇往祖国。

有一天，一位卖花同胞跳上街道的高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号召华侨青年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战。听了演讲，谢川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迎上前去问道：“阿哥，你说参加机工团回去打日本鬼子，这要出多少钱？”那人回答：“只要你愿意回去，不用你自己出钱，费用由筹賑会负责！”于是，他便请那人介绍前往报名。一周之后，他就接到了回国服务的通知。这件事，谢川周是一直瞒着伯父的，怕老人知道后不让回国。离别的前夜，他辗转反侧，心想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伯父了，偷偷地流了泪，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他独自悄悄地跑到太平埠筹賑会集合，登上开往新加坡的火车。只见车站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有年老的父母来送儿子，有新婚妻子来送丈夫，有的机工含泪吻别襁褓中的孩子……情景实在令人感动。突然，有个小妹妹递上一束小花对他说：“阿哥，你回国要多打几个日本鬼子！”川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要多打胜仗！”各埠机工汇集在新加坡之后，乘轮船经安南转火车抵达昆明。

初抵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时，谢川周迫不及待地问队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前线？”不料队长却笑了笑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上前线打仗，而是搞运输。”队长解释说：“军队打日本鬼子不能没有武器，我们运送武器弹药给他们，军队有了武器，就能更好地打日本鬼子！”性急的谢川周又问：“那到哪里去运输呢？快点让我们去吧！”队长说：“你先不要急嘛！大家还要经过训练才能去驾车呢。”

经过短期的训练，谢川周结业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26中队32分队。大队部驻在云南潞西县三棵树。从此，他便开始了滇缅公路紧张的军运生涯。那时，沿海各地已相继沦陷，滇缅公路成为战时我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大批的外援物资由水运或空运至缅甸，再由该线运回国内。滇缅公路沿线分驻着几个运输大队，分段接力转运。起初，他先到遮放，负责往返畹町、遮放、芒市间的抢运任务。后来，行程更远了，差不多滇缅线都跑遍了。

西南运输处每月发给南侨机工的津贴是法币36元，出车费每天八角。比起海外优厚的待遇，这点补贴是微不足道的。但机工们凭着回国报效祖国的热情，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大家最大的心愿是：为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谢川周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是我最初在滇缅公路开的车，车上有一对特殊的标志：车灯两边各插一根小竹竿。”他最初开的是美国小道奇卡车，

载重两吨半，那时刹车装置还是油刹，应急刹车时往往一下子刹不住，下雨行驶时就更得小心。由于他当时个子矮，看不见车窗外近旁的路，为此，爱动脑筋的谢川周想出个办法，在车灯两边各插个小竹竿。很幸运，行车中没有出过什么事故。后来年龄大了，人长高了，这个土办法就不用了。

车队虽然有队部，但由于经常跑车在外，根本没有时间回去。一般是随车行至哪里就住在哪里，或者干脆在驾驶室里睡着。雨季，公路时常塌方，阻车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有时没带干粮，便饿得眼花身软，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实在忍不住，就跑到农民地里啃生包谷充饥。夜晚，则常常一个人蜷缩在黑洞洞的旷野里，四周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声，令人心惊肉跳。接受饿肚的教训，以后出车，他们干脆带上铁锅和粮食，一旦车子抛锚，就埋锅做饭，肚子不再受委屈了。

谢川周回忆说，自从1939年冬至1942年夏，他运载军火物资穿梭往返于滇缅公路的险路上，犹如坐在火山口，时时刻刻都得格外小心驾驶。他的车子之所以能保持安全，不出事故，这不仅仅是因为驾驶技术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非常爱护汽车，精心保养。每次出车前，总要先仔细检查各个部位，消除隐患，带齐零部件及机修工具，稍有故障便及时维修，因此，任务完成得很好，即使在难以意料的艰苦条件下，车子也很少出故障，以保证抗战物资按时、安全地运到前线。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小事，谢川周经常遇到路面冲坏或陷进泥浆的情况，车子像老牛拖犁走不动，有时要等救济车来拖，影响抢运任务。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在车厢里装上两块厚木板，每当路面冲坏或稀陷时，就把木板垫在上面，让车子顺利地从木板上开过去。这个办法还真的解决了不少问题。以后，这个办法还被推广到各个车队。有时遇上塌方，大家把自带的木板一起铺垫上去，还可以解决大问题。

当时出车一般没有太严格的时间要求，多数情况靠司机们的思想觉悟，若想在途中休息或在集镇上玩玩，不会有人知道，但他们从不这样做。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热情非常高，他们深知抗战时期“一滴汽油一滴血”，于是提出响亮的口号——“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有一次，谢川周车到下关染上了疟疾，只得住进当地医院。医生说至少要住一星期，可第二天他刚感觉好了一些，就悄悄跑出医院。医生追出来狠狠批评了一顿，非让他回病房不可。但他软磨硬泡，硬是不回去，最后

跳上车子开走了。

在滇缅公路国内路段跑了一年多，谢川周被调往仰光，每天负责将装卸军用物资的工人运到码头干活，并参加抢运军火，直至1942年初，日军占领仰光前夕，才撤回八莫，继续将堆积在八莫的物资抢运到畹町、芒市，并运送远征军入缅作战。局势越来越紧张，由于各种原因，远征军入缅失利，节节败退，日军则长驱直入。1942年4月底的一天，拉着一车军用物资的谢川周从缅甸八莫出发，刚翻过一个山坡，路就被堵塞了，前面的难民哭天喊地。原来勐汝已被日寇占领了！勐汝地处滇缅公路缅境一侧，是通往八莫和曼德勒的贫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退路已断，开车回芒市已不可能了，但总不能将这车物资留给日本鬼子。于是谢川周把汽车倒到崖子边，将汽车推下山谷，机工战友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毁车而逃。此时，身在异国，举目无亲，只好跟着大批难民向东北方向的山坡爬去。崎岖的山道，挤满看不见头尾的难民，惊慌喊叫着，向山路上涌去。

步行逃难回国，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历程。当他18天后摇摇晃晃回到腾冲时，体力几近耗绝，再也不能向前迈步了。身上肮脏不堪，形容枯槁，骨瘦如柴。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非亲身感受者是难以体会的，他回忆说：

“18天里，我有整整15天没粮食吃，只靠野果及凉水来维持生命。刚开始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一些罐头、面包、干粮，3天后就全部吃完了。偶尔经过一个山寨进去要点吃的，但村民早已逃光了，而且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难民去寻找过食物，哪里还有吃的！有一天经过一间磨房，碾槽里早被饥肠辘辘的难民扫清了。我仔细一看，哟！槽缝里还剩一点点碎米渣渣，便小心翼翼地收拢起来，放在空罐头盒里煮了吃。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吃到这一点点‘粮食’，真算是幸运极了。”

“为了抗日，这个强烈的信念使我没有倒下，忍着饥饿，昼夜兼行。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路旁歇一会儿，喝点冷水后继续走。一路上，亲自目睹多少惨绝人寰的景象：逃难的人们开始都带着不少东西，挑的、背的、抱的、挎的，什么都有，连日艰苦跋涉及粮食罄尽，再也无力携带沉重的东西了。为了逃生，只得丢弃。我本人也是如此，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的。一路上，到处都可见到扔掉的各种物品，草丛中、山沟里、遍地狼藉。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由亲人拖着拉着走，再不行，就只有被弃置道旁，听天由命了。最惨的是那些拖着婴儿的母亲。我并不是不愿去帮助他们，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可是，力

不从心，我连自己都顾不上了。记得到后来，许多父母不得不忍心将自己的孩子丢下了，路边树丛里，时常传出婴孩的哭声，听了真叫人心如刀割。”

“快到腾冲时，当地有关部门在路旁摆出一些米汤，救济逃难的人们，每人给一碗，我也要一碗，几大口一下子就喝光了。在腾冲时，还遇到几个机工队员。休息几天后，我们又走到怒江边。怒江天险隔在前面，江水湍急，汹涌澎湃，惠通桥已被炸断了，西岸也已被日军占领了，我们避开日寇的视野范围，来到一处僻静地段，出钱雇了一个筏工，冒险乘着竹筏渡到对岸，继续向保山方向艰难迈步……”

当他们回到保山时，这座抗战时期的滇西重镇已变成废墟一片。原来是日寇制造了“五·四惨案”，炸死了成千上万的保山平民，加上瘟疫流行，原来的部队早已不知转移何方了，只好搭车回到昆明。

在昆明，由于滇缅公路已被切断，南侨机工便失业了。谢川周到驻曲靖的一个辐重兵团那里，也没有车子可开了。后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从广东调来的一个石城炮兵总队，队长刚好是他的同乡海南人，名叫云昌贵，于是谢川周到部队找他，要求参加他们的远征部队到印度去，老乡同意了，就让他随这支部队乘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不料，他却被分到一个“骡马团”里，负责养马。他想不通，自己是开车的，为什么变成养马的？于是跑去问长官，但长官根本不理睬，只说这是上面决定的，他们管不着。以后他才知道，这是顶替一名逃兵的缺额，他甚至连自己的“谢川周”的名字也没有了，而成了另外一个连他都不认识的人了。点名时，叫到那人的名字，他还得大声答到“到”。不久，他跑到附近一个炮兵五团，但这里也相当艰苦，整日操练跑步，搞军事演习。印度的太阳特别炎热，晒得人们受不了，晒脱了皮后每人差不多都变成了“黑人”。他一心想开车操老本行，又跑到加尔各答，参加了英缅政府军的运输队，在那里继续开车运输抗日物资，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谢川周准备回国之际，恰逢加尔各答的中国领事馆陈总领事招募驾驶员，打算将一批“GMC”卡车送回国内。于是，他参加了送车任务，沿着新开辟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一直将车开到昆明黑林铺交车。

交了车，他便又失业了。此时南侨机工开始复员南返，国民政府发给每个机工一张“侨务委员会奖状”，并发给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的复员奖金，愿意回侨居地的由政府送回，不愿回去的自谋生活。谢川周因与芒市一

位傣族姑娘结了婚，不愿再回马来亚，就在芒市定居下来，靠帮人接送汽车维持生活，直到云南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川周在芒市街上摆小货摊过日子，其中有一阶段患病，整整在家休息了五六年。病好以后又继续摆摊，修理小五金。1960年，当地政府把他们这些摆摊搞小修理的人员召集起来，成立五金小组。经过数次变迁，几易其名，成了现在的潞西县五金厂。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很多东西都被颠倒了。华侨机工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被诬为“里通外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1969年3月，谢川周也被通知进“学习班”，失去了自由。他被强加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头子的“罪名”，还被诬蔑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当作“牛鬼蛇神”处罚体力劳动，罚挑砖瓦，罚扫厕所。关在“牛棚”的日子里，虽然他没怎么被打，但精神上却遭到严重折磨。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初明明是满腔热血，为报效祖国而从南洋归来参加抗战的，却被一口咬成“特务”。就连以前老岳父在缅甸腊戍送他的一件黑毛呢大衣，也被当成罪证，说是“当国民党团长时穿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最使他感到悲痛的是，除了对他个人的诬陷、迫害，还波及他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南老家。造反派说他曾用飞机运了三大篮大洋回去，硬逼他家里人交出来。他的一个弟弟因此而自杀了。得知这个噩耗，他悲痛欲绝。

1972年下半年，他才出了“学习班”，但没有做“结论”，只得到一句：“你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南侨机工的经历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机工们的冤假错案得到澄清与平反。谢川周老人虽然退休在家，但政府从各方面加以照顾及帮助，连家属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及就业，都得到妥善的安置。

尤为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人民政府还组织他们这批南侨机工的幸存者到首都北京参观游览。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前，谢川周老人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说：“做梦也难以梦到会有这么一天啊！我想起九泉之下的兄弟和曾并肩战斗过的机工队友们，若冥灵有知，也该笑慰了！”

（1988年）

为了父亲的嘱托

——记芒市南侨机工谢金标

“孩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爸爸支持你回国报效祖国，不当亡国奴。你勇敢地去吧！给我们全家争光，为我们华侨争气！”

父亲嘱托的这段话，始终铭刻在谢金标的心中，伴随他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

1939年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谢金标，是一位出生在马六甲的第二代侨生，虽然从未回过故乡，但从父亲的口中，知道他的祖籍是广东。与其他一些南侨机工回国要隐瞒家长不一样，谢金标要回国抗战，则是得到其父亲的全力支持与鼓励的。

父亲是一名修船工人，月薪不高，但爱国热情很高，坚持捐出10%支援祖国抗日。谢金标也是一位好样的爱国热血青年，令他至今难忘的是，当年他曾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提着一桶稀牛粪泼到几家日货商店的墙壁上，警告售卖日货的奸商。1939年，当谢金标打算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时，他刚一开口，父亲竟毫不犹豫地加以赞成。“给我们全家争光”、“为华侨争气！”这是父亲的教诲，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中。

谢金标登上轮船启程时，父亲以及亲戚朋友，还有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送行。当船开走了，只见父亲还在码头上摇着三角旗……

谢金标带着父老的嘱托，踏上祖国故土，在昆明西南运输处进行短期军训之后，便分配到下关11大队，开始其在滇缅公路的紧张抗战军运生涯。

对在南洋习惯平坦道路上行车的南侨机工来说，一下子面对这条举世闻名、惊险出奇的滇缅公路，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要征服这个难

关，不仅要靠娴熟的驾驶技术，而且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谢金标回忆说：

“当时，主要是靠一股爱国热情，为着祖国的生存而战斗。因此，产生了无穷的力量，甚至出现过奇迹，化险为夷！”初到滇缅路，他开着美制小道奇卡车，在昆明、下关、保山、畹町以及缅甸的腊戍、仰光几个站之间往返驰骋。滇缅公路的滇西路段，路面狭窄，凸凹不平，坡陡弯急，龙陵以下的南天门、芭蕉窝等处，不啻是一个个“鬼门关”。尤其是刚开始行车时，路况不清，应急反应能力差些，他曾在老鲁田那里翻过一次车，幸亏人未受伤，车子也仅受到一点轻微损坏，拉起来仍照常行驶。而另一个华侨机工李水师，则没有这般幸运了。有一次他拉着一车驾驶员到畹町接车，在半途就翻到山崖下，一下子死了28人，其中有15位是南侨机工，水师本人也为国捐躯。

来自天空的威胁则更不可意料，行车时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袭击。谢金标遭空袭的经历不计其数。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仰光抢运军火时，忽遇敌机来袭，炸弹就落在身边，他连忙翻滚着，躲进附近一座大金塔里，拣回了一条命。

南侨总会以及海外侨胞始终关心着南侨机工，时常从精神上、物资上给予援助。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慰劳团回国考察，亲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在保山南门街口，谢金标见到了陈先生，陈先生慈祥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回国抗战，辛苦了。你们肩负着南洋华侨的重托，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陈先生的话，更坚定了大家的信心。

1942年5月初，谢金标从仰光运载军火撤退回国，当时战局很紧张，听说日本兵从后面追上来了，可是滇缅路上到处是抢运的车辆和逃难的人流，根本无法快行。车子走了几分钟又得停下来，跟着前面的车辆一点点蠕动，有时比步行还慢。人群中，缅甸华侨难民最多。公路边随处可见到被遗弃的东西，有的还较贵重。可是这种时候，也无人去拣了。

5月5日下午，他好不容易将车子开到怒江边，可是已经晚了，惠通桥已于中午被炸断了！只见排成长龙的军车、商车被遗弃在桥西路上，无数人群挤塞在江边，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有的捶胸顿足，有的仰天哭泣，更多的则躲向山野隐蔽起来，寻找着脱险的途径。

滚滚的江水成了生命的分界线，仅仅是一江之隔，这里已是沦陷区了。四周不断地响起枪炮声，日军已混在人群之中，他们正向对岸炮击，并向那些试图渡江的难民们射击，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怒江！在混乱之中，谢金标碰

见机工队友邓奇，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找个隐蔽的地点游过江去，决不能落入日寇魔掌！

待到天色渐晚，两人便摸到断桥的上游岸边，只见江水哗哗地流淌着、撞击着，显得阴森可怕。幸亏谢金标自幼在蕉风椰雨的马六甲常与伙伴到大海中游泳，练就了好水性，还曾在水中救出过好几个人，邓奇的水性也不错。尽管如此，他们的心还是不踏实，一是不了解水情，二是担心被日军和汉奸发觉。

天黑了，他俩慢慢顺着陡岸下水了。江水刺骨，真能把人冻僵，他俩尽力划着双臂，朝着对岸游去。江水表面还平缓，但水底怪石嶙峋，犬牙交错，形成无数个强劲的漩涡，不一会儿，两人就被冲散了。谢金标独自一人搏击着，不时从上游漂过难民的尸体，不慎触及，令人毛骨悚然……

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拼搏，谢金标顺水漂至下游的地方，终于爬上了岸。不久，邓奇也游上来，他俩亲切地拍打着，庆幸着虎口脱险。同时，想到江那边的无数同胞，他们正在遭到日寇的摧残，心中充满了悲哀与愤怒！

他俩吃力地爬上江坡，沿着滇缅公路蹒跚而行。此时又冷又饿，只好在路边喝了点水，不幸却染上痢疾，一路上拉肚子，行至老鲁田时病倒走不动了，只好躲到一家姓杨的老百姓家中，经过治疗，仍未痊愈。后来，回到部队，机工队伍已散伙了，但谢金标侥幸地被留了下来，编入守军部队军运行列。此时，我军与日军隔江对峙，部队调动频繁，曾发生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谢金标奉命运载军队、武器到达指定的地点。

1943年底至1944年初，为了配合远征军即将进行的反攻，谢金标又开始从保山运送工兵团及其所需军备、器材到惠通桥，准备架设浮桥渡江。

在怒江东岸行车是危险的，常常遭到对岸日军炮火的袭击，许多汽车被击中毁坏。有一天，正在江边休息待命的谢金标，忽然听到一阵尖锐的呼啸声，紧接着就是猛烈的爆炸声，日军的炮弹落在不远处工兵排的宿营地，当即炸死十多个人，他的熟人李排长也同时遇难了。谢金标算是命大，又躲过一次厄运。

1945年抗战胜利了，政府当局给南侨机工颁发了奖状和一些安置费，不少机工南返回南洋。而谢金标失业后在保山拜著名雕刻家“神刻”李石痴为师，跟他学艺。1946年在保山成家，住在书院街，摆摊给人刻图章，有时也到畹町、九谷替茂恒商号接车、运货。

1956年4月，云南德宏自治州成立，谢金标任刻印社主任，带着一个徒弟到芒市，为刚建立的各部门刻公章，以后就留在芒市，在县五金厂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

在“文革”中，谢金标与其他机工一样受到迫害，被戴上“华侨地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在手工业系统办的学习班待了三年，强迫他承认“里通外国”的罪名……在逆境中，他时常回想抗战返国的经历，自问无愧于祖国。他还想到姐姐谢金水，为了抗日，回国参加新四军，最后牺牲在前线。拳拳报国之心，何罪之有？他相信自己的问题是会得到澄清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谢金标老人冰冷的心渐渐复苏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对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爱国举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谢金标老人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是他最感到欣慰的事情。

(1988年)

烽火运输线的回忆

——记遮放南侨机工沈治平

现居住在云南边陲遮放的沈治平，是第二批回国南侨机工队的一员。1911年他出生在广东惠阳淡水市东门街，14岁时与二弟随父亲出洋。在马来西亚，他做过橡胶工、裁缝小工、造船工，后又在联商巴士公司开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入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热潮之中，一次次地上街参与抗日示威游行，抑制日货，卖花筹赈。

谈及抗战往事，沈治平说：“国难当头，我们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定要支持祖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决不能当亡国奴！——这就是当时我们华侨的心愿！”他依然清晰记得，1939年2月的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位学生模样的热血青年站在人群中演说。那位青年用那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慷慨激昂地痛斥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大声呼吁：“目前祖国抗战正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服务，现在不怕没有钱，只怕没有技术人才！”沈治平听完演讲，犹如心底的一团火被烧上了汽油，熊熊燃烧。于是，他当即下了决心：回到祖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意一定，沈治平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团。为了表达抗日救国、维护中华民族神圣权益的强烈愿望，沈治平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沈护权”（该名字现仍留在云南档案馆的南侨机工第二批花名册中）。经过考核和体检之后，他于1939年2月，告别了父亲与弟弟，随第二批机工团回国。抵达昆明，他们马上进入西南运输处训练班，训练班的军事生活是很紧张的。由于抗日前线急需大量军需物资，而运输军事物资又急需大批汽车机工，因此仅培训了两个月就分配上岗了。沈治平被分配到第11大

队，大队部驻扎在保山，大队长是温天一，大队副是谢传胪，陈光强任中队长。

最初，沈治平奉命到遮放接车，把从美国买来的大卡车开回昆明，接着，将武器弹药运往贵阳。属他们中队运输任务的地段，山路险峻，路基很坏，道路难走，特别是雨季，路面泥泞不堪，形成烂泥路，还时常出现塌方。贵州的山路俗称“七十二弯”，加上当日被日机炸得坑坑洼洼，行车分外艰难。贵阳的冬天特别冷，车到那里，都要赶紧把水箱的水放掉，第二天走时再装上水。当时人们都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南侨机工车队，迎着困难上，满载着军火弹药，在艰苦的运输线上穿梭往返。

随着战局的发展，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迫封锁三个月之后又重新开放。为了加速抢运，沈治平奉调由贵州赴腊戍，加入“华侨先锋运输第一大队”，从事滇缅公路抢运工作。滇缅公路是当时唯一的国际军运线，被誉为“抗战输血管”。在该路上，南侨机工车队付了出巨大的代价，因车祸事故或遭受敌机空袭而死伤者不计其数。

有一次，沈治平与好友钟烈冒雨行车，因前面道路有险情，钟烈来不及急刹车，连人带车翻下山沟，幸亏果断地跳了车。沈治平连忙下山抱起身受重伤的钟烈，送到下关医院抢救，才把战友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钟烈翻车后，所在车队的人因找不到他，还曾报了死亡名单。而另一个名叫李禹的机工，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在永平翻车时当场死亡，尸体就埋在那里。更为不幸的是，还有人翻车掉进怒江激流中，则连尸体也找不到了。

还有一次，那是在支援广西前线的抢运途中，当时正值雨季，洪水泛滥，运输车队在漾濞桥受阻，等待过桥的车队排成长龙。突然，日寇飞机超低空进行空袭，连飞行员的模样都可以看清楚，沈治平连忙躲进路边的大石头洞中，幸免于难。而另一个机工临时躲进车底下，被日机机关枪射中油箱，引起爆炸，该机工即为抗战运输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疯狂南进。1942年春，日军由缅甸长驱直入，沈治平的中队在缅甸难以立足，便向国内撤退。先从腊戍退至木邦，后由木邦退回遮放。由于时局恶化，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眼看遮放也保不住了，沈治平等人还奉命焚毁留在遮放仓库的武器及汽油，以免落入敌手，然后撤回昆明。回昆明后，滇缅公路断绝了，南侨机工车队被解散了。

沈治平31岁时，经分队长的撮合，与遮放当地一个傣族姑娘结了婚，

妻子只有18岁。撤退时，他带着她一起到昆明，因机工队伍解散了，生活无着落，便来到下关，在朋友的帮助下，做卷烟买卖度日。后来，与几个机工朋友创立了一个小规模“中南烟草公司”，生产廉价的“钥匙”牌香烟。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南侨机工开始筹办复员工作，沈治平因成家立业了，便带着妻子和一岁多的儿子回到遮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干扰破坏，沈治平遭到迫害，被抄过两次家，也挨过斗。令人气愤的是，在批斗会上，竟有无知的家伙责问他：“帮谁救国？”尽管当时他不理解，心里有怨气，但总相信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现在家中安度晚年的沈治平，谈起近况，老人显得信心十足：我们的家庭生活宽裕了，子女也长大了，作为南侨机工的幸存者，亲眼看到这段曾被遗忘、甚至被颠倒过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可就心满意足了……

(1988年)

弃高薪，别妻子，热血洒在运输线

——记南侨机工楷模王文松

陈嘉庚先生在著名的《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其中在《华侨司机回国》一文中记载：“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岁月流逝，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笔者赴滇缅公路采访南侨机工史迹，查证出《南侨回忆录》记载的这位无名英雄，就是海南籍的新加坡华侨工程师——王文松。

王文松已于1943年在云南滇缅公路上殉难了，而当年的“同伴十余人”也大都陆续逝世了，目前尚健在的只有云南的韩利丰和海南的黄守琛、何启凤等人，也都年愈八十了。但回想起当年“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亲身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根据韩利丰、黄守琛等老先生的介绍，王文松原籍海南万宁县，早年在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任工程师，是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技术人才，深为陈嘉庚先生所器重。王文松的英文程度很高，技术精良，在海外工资待遇优厚（月薪二百多叻币折国币七百多元）。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可是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抛去安稳舒适的生活，告别了老母亲、妻子及三个孩子，带领十多个同伴，并带全套修理工具和机器回国效力。

1939年3月，王文松参加第二批机工团回国，全队207人，他任副总务。在王文松一行启程回国前夕（3月12日），陈嘉庚先生特地再次致函西南运输处：

迺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员，计有207人。其中……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一百元，其余每名月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奉达，谨希查照是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公章)

主席陈嘉庚

廿八年三月十二日

3月13日，王文松一行带着南洋一千多万华侨的嘱托，搭乘丰祥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踏上了抗日的征程。

轮船缓缓地离开码头，南侨机工队伍与送别的亲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声中依依告别。王文松站在甲板上，望着码头上不停挥手致意、越来越远的妻子儿女的身影，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告别南洋》这首歌。这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抗日歌曲，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战斗歌曲。当王文松深沉地唱起“再会吧，南洋”之时，全船的南侨机工战友们都合唱起来了：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王文松一行抵达昆明不久，便奉命率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海南籍南侨机工）前往西南运输处设在缅甸的仰光汽车修理厂担任厂长。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汽车，加强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能力。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组五天装配好一辆，而王文松与全体侨工积极努力，苦干加巧干，既讲高质量，又求高速度，终于创出奇迹，每组每天装好一辆，全队每天可组装十辆以上。这种惊人的速度，连美国工程师也连声赞誉“OK、OK！”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闻讯后，特地前往接见并嘉奖他们。

在仰光胜利完成装配任务之后，王文松又被调往下关任第八修理厂厂长，继续为抗战而抢修军运车辆，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前夕，1943年的一天，王文松不幸因车祸以身殉职。

王文松工程师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放弃南洋高薪职位，告别亲人，离开温暖的家庭，奔赴祖国的大西南，为加强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能力，贡献自己的技术才干，直至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是南侨机工的典范，是南洋广大华侨青年的典范，也是中国人民光辉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1987年）

抛妻别子赴国难 散而复聚乐晚年

——云南南侨机工韩利丰与两个妻子团圆的传奇故事

第一次见到韩利丰，是在云南南侨机工的联谊会办公室，那是1988年。这位当年与王文松“结伴回国”的第二批南侨机工老队员，是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简略提到的无名英雄中尚健在者之一。他的记忆力很好，详细地追忆了那已远逝的机工回国抗战历史，补充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根据他的讲话录音，我写了《青春作伴好还乡——王文松的老战友韩利丰访谈录》一文。转眼几年过去了，1993年我又赴云南补充修订《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的文稿，再次见到了韩利丰，尽管他已84岁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行动敏捷，毫无老态龙钟的样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机工联谊会来。

南侨机工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风趣地说：“小林，上次你访问韩利丰未完的故事，如今有了新的续篇啦！”原来，当年韩利丰不惜抛妻别子回国抗战，如今，经历半世纪沧桑的海外结发妻子终于回到昆明团聚了。这一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尤其是大团圆的美满结局，理应在南侨机工史上补上一笔。为此，我与南侨机工联谊会顾问刘宝全先生一起，再次来到位于潘家湾原西南运输机工训练所旧址的新宿舍区，登门拜访了韩利丰一家。

我们刚踏进韩家，两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婆热情地出来接待，原来都是韩利丰的妻子。新社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而韩利丰怎么会有两位妻子呢？这当然是半个世纪前抗日战争历史所造成的。这三位老人向我们诉说了一段既辛酸又动人的真实故事。

韩利丰是海南岛文昌县地灵村人，12岁就跟堂兄飘洋过海到马来亚投靠在柔佛谋生的父亲，起初在“宽柔学校”读书，小学未毕业就进了一间修理

厂学机修，掌握了一手修车技术，后来与人合伙在新加坡开了一间“明新汽车修理厂”，收入颇丰。在他24岁的时候，奉父母命，回国娶了海南家乡的姑娘周亚妹为妻室，随后，带着“过埠新娘”返新加坡。一年之后，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急需大量的司机与修理工，经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南洋各地华侨机工热烈响应。当时王文松已是新加坡著名的机修工程师，月薪二百多元坡币（折合国币七百多元），但他毅然带头抛弃优厚的待遇，与好友韩利丰、黄守琛、何启凤等一批海南籍机工结伴，报名应征。此时，韩利丰已有一个温馨的家，但为了抗日救国，他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妻子女儿，高唱“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救亡歌曲，并自带一整套的机修工具，离开新加坡到了昆明。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批机修工具已在抗战烽火中陆续遗失，可韩利丰却奇迹般地仍保留下了唯一的一把螺丝刀。该螺丝刀钢水很好，数十年了仍很坚固，最近已捐献给厦门华侨博物院作为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专题展览的珍贵文物。

韩利丰回国赴滇缅公路抗战运输线服务，成为“王文松队”的得力技术骨干，曾任“技术总检”，发挥技术特长为抗战作出贡献。不久，新加坡沦陷，韩利丰担心着妻子女儿的安危，想方设法联络，结果杳无音讯，他的希望完全破灭。多年以后，经机工战友的撮合，他与云南姑娘李瑞萱结婚，从那时起夫走妻随，跑滇缅、闯险关，抢运抗日物资，过着出生入死、颠沛流离的生活。

留居在新加坡的周亚妹，日思夜盼，希望韩利丰早日胜利归来。有一次，日军来搜捕，气势汹汹地问：“你丈夫干什么去了？”她镇静地回答：“几年前出去做生意，得病死在外边了。”而后来盟军问及此事，她则自豪地说：“丈夫回中国抗日去了。”她有个坚强的信念，生是韩家的人，死是韩家的鬼，为国效劳是光荣的，即使他不在人世，也愿为他守寡，再艰难也要把孩子拉扯长大。就这样，她守了半个多世纪的活寡。

新中国成立后，韩利丰被分配到云南一平浪矿山车队工作，为矿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和修理工。他继续搞技术革新，不断取得新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并在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汽车队长。李瑞萱也当了小学教师，一家生活得和和美。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中，韩利丰两口子也不能幸免。韩利丰这小小的车队长也被

打成“走资派”，要“靠边站”；李瑞萱因为出身于旧军人家庭，竟被打成“军阀”。1974年，韩利丰心灰意懒，携妻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海南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在家乡时，才偶然从一位华侨口中得知在新加坡的前妻还活着。回到昆明后，这消息他一直没有告诉李瑞萱。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老韩在新加坡的妻子还活着的消息，最后还是被李瑞萱知道了，开始她有意见，怪他当年没有告诉她。但随后，她认为这是抗战历史造成的，不能怪老韩。有一天，李瑞萱对老韩说：“你这个死老头，就忍心抛下她们母女，几十年不管，人家为你守了50多年的活寡啊！想必她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不知她生活得怎样？有没有人照顾？还不快写信去联系，把她接过来一起过晚年。”李瑞萱说出了老韩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老韩听了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1991年9月，八十高龄的韩利丰到新加坡探亲，和周亚妹白发相逢，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找到了前妻，悲的是他们的女儿却已过早辞世。老韩在他女儿墓前失声痛哭：“女儿，阿爸来晚了，原谅阿爸吧，现在阿爸看你来了，你能叫我一声阿爸吗？……”在场的亲友无不流下眼泪。周亚妹在新加坡除了有外孙，亲人并不多。老韩看到周亚妹孑然一身，十分难过，遂向亚妹提出：“跟我回国吧，瑞萱她希望我接你回去，我们都已七老八十了，也不图别的，让我们一起相依为命吧。”亚妹欣然答应，跟老韩一起回昆明。当周亚妹踏入家门时，李瑞萱满腔热情地迎上去：“老姐姐，你终于来了，欢迎你呀！你看，这是儿子、女儿，这是孙子、孙女，他们都很孝顺，会照顾你安享晚年。”亚妹早已热泪盈眶，颤抖着双唇，叫了一声：“瑞萱，阿妹哟……”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三位老人泣不成声。

从此，这三位老人相扶相助，相处格外融洽。特别是李瑞萱和周亚妹，好像亲姐妹一般。周亚妹经常对人说：“我福气真好，能遇到阿妹瑞萱，算是有缘份。”老韩一家人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人们看到都羡慕，都敬佩，在海内外的南侨机工中传为佳话。

（1988年初稿，1993年二稿）

情系中华赴国难

——南侨机工沈茂山的回忆

我刚20岁那年，就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曾有人问我：抛弃海外舒适的工作，回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滇缅公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回答说：情系中华，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

“情系中华”，并不只是一句寻常的口号，而是蕴含着我们家庭四代的艰辛经历：

我的曾祖父是太平天国的先锋兵。太平天国失败后，为躲避清政府株连九族的暴政，他带着18名族人，坐上一条木船，在海上漂流了四个月，才到达了新加坡。后来，我们这个家庭便在马来亚森美兰州芙蓉埠定居。我的祖父曾怀念祖国，怀念家乡，但他与曾祖父一样，客死异国他乡，连“魂归故土”的权利都没有。我的父亲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贡献了力量。我于1919年出生在马来亚，是在海外特定环境中成长的。可是，我的根在中国，祖辈、父辈与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驱逐日寇时，我得到父亲在同盟会的挚友沈汉初的推荐，瞒着我大哥报了名。就要离开相依为命的大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第二天一早我便不辞而别了。

我是参加第8批机工团的，在新加坡编队时，我被选为副秘书长。陈嘉庚先生在“南天酒楼”的露天台上设宴为我们饯行，大有“与子同戈袍，共赴国难擒敌酋”的古风。

船抵安南海防码头时，我们还未下船，便有一批汉奸走狗先挤到船边，散布谣言，妄图阻止我们回国抗日。他们的无耻行径激怒了我们，霎时间，

酒瓶、罐头瓶、汽水瓶横飞，砸得汉奸们抱头鼠窜。

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滇缅公路，把汽油枪支弹药等抗日军用物资从缅甸运回再送往前线。在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了短期山地驾驶技术培训后，我被编入第9大队26中队任班长。我们的车多数是六排档的“道奇”、“福特”、“万国”等牌号的大卡车。从昆明至缅甸腊戍，沿途要经过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区，地形险要，路况很差，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每跑个单边顺利时也需七八天。

后来成立了“华侨运输先锋大队”，我被任命为第2大队4中队中尉队副。有次车子方向盘失灵，一边前轮滑出公路，车子无法开动了。我拦住一辆车打算回队部救援，不料这辆车开出不远便翻了，我见势不妙急忙跳车，车子翻下山，我滚到半山腰抓住一棵树干才幸免于难。

不久，敌人发现了这条交通线，天天派飞机骚扰。我们车上装的全是汽油、枪支、弹药，特别是装有烈性炸药TNT，若有一辆被击中起火爆炸，便会波及一大片。有一次，我驾车运送18桶汽油去龙陵。车到怒江上的惠通桥就遇到敌机轰炸，我急忙刹车，停在一个石洞下面。这次来了9架飞机，轮番向大桥投弹，河水被炸起巨大的水柱，连大鱼都被炸上了岸。桥上铺设的木板着了火，伤亡情况惨不忍睹。我们被困在山上，没有粮食，只有采野果充饥。以后我们干脆白天休息，夜里行车。一到夜里，车灯一齐亮，盘山公路上便会出现一道道光圈，缓缓移动，十分壮观。

滇缅公路所经的深山老林和热带坝子，是疟疾流行的瘴区，许多侨工都因为染上了这种病丧了命。1940年底，我也患上了恶性疟疾。发起烧来，恨不得剥下一层皮，冷起来时几床被子也不顶用；肚痛拉白痢，折腾得我有气无力。虽然住进了西南运输处医院，但病员多床位少，又缺医少药，医院硬把我赶走让我自己求医。幸遇在生活书店供职的女朋友，征得书店经理同意，把我接到书店精心护理调治，我才再度战胜死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奋战在西南运输线的南侨机工，都是情系中华的英雄儿女。不少人已为国捐躯，长眠荒山。当时许多人连西南运输处的津贴也不领，完全靠海外汇款来维持生活。尽管机工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发怨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激励我们为抗战的胜利而拼搏奋战！

(1989年)

抢运，在敌寇机翼下进行

——昆明南侨机工黄友镐的回忆

我名叫黄友镐，是新加坡侨生，原籍广东。“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中国，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激起我们海外华侨的民族义愤。于是，我于1939年参加了陈嘉庚先生组织的第九批南侨机工团回国抗战。

我们这一批机工共有500多人，由新加坡乘船到安南，然后转火车到昆明。在昆明集训三个月后，我奉命前往芒市接运新车，专门负责运送军火物资。我在9大队27中队当驾驶员，大队部设在芒市。我们车队的主要任务是由遮放军火库运军火至保山，在滇缅公路最险要的路段穿梭往来。这条滇缅公路是世界出名的险路，我们许多华侨机工不幸翻车牺牲，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前仆后继，抢运快运，一心把军火和军需物品运往抗日前线，好让前线将士早日将日本兵驱逐出国境。

在滇缅公路抢运期间，我个人就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劫难：

第一次，我运载一车炸药，行驶在距惠通桥约二公里的地方，路旁一位养路工指着天空，叫我停车。此时，我才发现敌机在空袭，立即跳下车来，躲在大树底下。这次，敌机来炸惠通桥，炸弹落在桥的周围，弹片横飞，江面炸起水柱。如果不是养路工提醒，我那辆汽车正好通过惠通桥，要是中弹片引爆运载的炸药，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被炸死事小，惠通桥被运载的炸药炸断，所酿出的灾祸则是巨大的。

第二次，我满载一车汽油，刚通过功果桥不到三分钟，敌机又来轰炸，江面被炸得水柱溅起几丈高。幸好我的汽车与功果桥有一段距离。要是靠近些，车上汽油燃起来，我当然不能幸免。

第三次，我们车队尚未过功果桥，敌机在桥的上空轮番轰炸，功果桥被炸断了，怎么办呢？敌机再狂，炸弹再凶，也泯灭不了我们南侨机工救国的忠心。我们连夜将汽油桶扎成大浮桥，冒着风险，战胜艰难险阻，终于把军火运过澜沧江。这种奇迹般的运输，如果没有“抗战救国”火热的心，那是办不到的。

第四次，是我在保山的历险，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驾车回保山，由于患上了“打摆子”，便在车队休息。当时，敌机一批九架来轰炸保山，我一时无处躲藏，只好跑到老百姓的菜园子里躺着。敌机丢下炸弹，就在身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气浪卷着泥土把我埋了半截，我用力将盖在身上的泥土掀掉，望着飞机离去远远的，才回到车队，不知怎么搞的，“打摆子”竟也“忘记”发作了，也许是被炸弹硝烟“治”好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历险，但战争的洗礼使我“不驱逐日寇出国境，誓不回南洋”的决心更强。1941年，我调昆明受训之后，编入第五大队，主要任务是由曲靖运汽油到贵阳。不久，西南运输处改编为滇缅运输处，我们60中队部设在禄丰，运输任务更为繁忙。

1942年，我奉调回楚雄，还到畹町接过一批雪佛兰新车，并装运军火回昆明。不久，缅甸沦陷，日寇入侵国门，我们撤回黄土坡。当时，无车又无汽油，只能改装一批“木炭车”。1944年，我参加川滇东路运输局，地点在曲靖，负责在陆良机场装卸由印度运来的物资，一直至抗日胜利结束。

日寇投降了，被日寇侵占的大好河山又还于我大中华，海外赤子赴国难、救中国的壮志如愿以偿。我心里比在领取“抗日战争胜利勋章”时还高兴。

(1987年)

苦辣酸甜历沧桑 赤子之心永不泯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访谈录

杨保华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创始人、连任理事长，被云南侨界称为“国宝”。近几年来，南侨机工历史重新得到公正的评价，他和联谊会同志们的工作更加忙碌了。每当海内外热心人士来访，人们就高兴地通报：又有客人来看望“国宝”啦。因此，“国宝”也是人们对健在的南侨机工的尊称。试想：三十年代自愿从南洋回国服务的三千多壮士，在抗战中有一千多名为国牺牲，战后又有一千多人复员南返，留在国内历尽沧桑、至今健在的只有近百人了，出于敬重，人们便尊称他们为“国宝”了。

1993年10月，杨保华率领南侨机工联谊会代表团应邀飞往厦门，参加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80周年庆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福建省以及厦门市党政部门领导亲切地会见他们；陈嘉庚先生家族代表与他们合影；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李远哲教授与他们热情握手致意；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楚琨先生与他们一起座谈；印尼华侨李尚大先生邀请他们到自己创办的安溪慈山学校作报告。更难以忘怀的是，他们第一次瞻仰了陈嘉庚先生的故居与陵园，并荣幸地出席了华侨博物院专门新开辟的《赤子功勋——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专题展览》。这个专题展览，以大量的实物、历史图片以及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功绩，引起了海内外的热切关注。有关报社、电台、电视台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使这些幸存的南侨机工壮士们在有生之年倍感荣耀……

华侨博物院的同志们久闻杨保华深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是演唱《热心救国歌》，于是请他唱一唱。杨老酝酿一下情绪，便声情并茂地唱道：

一

热心救国是应该，
有钱出钱寄国内，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做了汉奸臭三代。
无钱出力“将伊剗”（杀日寇）。
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二

阿婶阿嫂阿姐妹，
当今国难的时期，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莫要日暝（日夜）抹胭脂。
应该为国做“大志”（事情）。
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杨保华是广东人，却用闽南话演唱，而且语音纯正。加上他身材魁梧，体高一米八，体重八十多公斤，原以为他该是声如洪钟，歌似海啸，可他却细声细调地轻唱，唱得那么有感情，唱得那么有吸引力。大家惊奇他记性好，他却说：这歌是半世纪前从我们心坎里唱出来的，道出我们的心声，当然终生难忘。

回昆明后，人们笑着说：此次南侨机工代表团厦门之行，可真正体现出“国宝”的价值呢！杨保华听后笑了笑，他说：“国宝”就是陈嘉庚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

在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办公室里，我们再次访问了杨保华理事长。下面就是访谈记录：

八岁当学徒

我的祖籍广东中山，父亲20多岁时跟同乡到马来亚吉礁谋生，当建筑工，母亲理家务，兄弟姐妹共八人（四男四女）。由于大哥被蛇咬伤，花去很多钱医治无效，后来蛇毒发作而死，大嫂改嫁，家境越来越贫困。我只读

了两年书就失学了，给一位银匠老板当学徒，每天天未亮就得起床烧水、扫地。老板娘生了个宝贝儿子叫阿狗，每天还得带阿狗玩，伺候他吃饭。端午节那天，我才八九岁，就要忙着杀鸡伺候老板一家。后来终于病倒了，发热发冷，躺在楼板上发抖。老板上楼，拿起鸡毛掸柄，噼哩啪啦地猛抽楼板，吓得我病更重了。母亲见我病成那样，瘦骨如柴，要接我回家。可是当学徒未满三年提前离开要赔伙食钱。母亲气愤地说：“病成这样还不让回去治病，走，赔钱就赔钱，人命要紧！”好在老板娘因我平时老实勤快而发了善心，说是治病走的，不用赔钱啦！

车场学方言

我在家养病约一两年，病渐好就闲不住了，到室外附近车场玩，熟悉了海外各帮人（闽南、潮州、客家等），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觉得蛮有趣。车站招徕乘客很热闹，帮忙拉一个乘客还可得20%的报酬，我也学着招徕乘客，被称作“带鱼头”。学着各种方言招呼乘客，一天可以挣几角钱。有一次，我招徕一位50多岁的妇女，很有礼貌地喊：“伯母、伯母……”可她就是不理，使我摸不着头脑。旁边一位大伯指点我说，妇女怕人家说她老，你应喊嫂嫂。我改口亲热地用客家话喊道：“阿嫂，您回不回去？”她随即回头笑着问我：“你的车在哪里？”我就带她上车了。我尝到了语言文明礼貌的甜头，从此，更细心地学说各种语言，不仅学华侨的各地方言，而且也学当地的马来语等。在车场学，在车场用，在车场挣钱，结果，越用越熟练。童年时代的艰苦磨练，还学会了多种语言，在后来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不同场合竟派上了用场，解决了困境中的问题。

悄悄学开车

我在车场帮拉客，和司机、售票员、老板都混熟了，就勤快地帮洗车、加水、打扫卫生等。有时，我坐在驾驶室里，学师傅的样子摹拟操作程序。师傅见了，顺便叫我来试试。我在13岁时第一次自己开动汽车，从此想开车简直入了迷，作梦也想当个驾驶员。

由于家里人口多，房子窄，我只好住到二姐家。二姐夫见我有礼貌，又

勤快懂事，便对母亲说，小鬼在车场这样混下去没出息，倒不如买辆车让他去跟车，将来学开车。姐夫果然买了车子，我高兴极了。洗车时，我把车开进开出。姐夫一见大为惊奇，问我是从哪里学的。我说是悄悄学的，他还有些不敢相信呢。15岁时，我已能熟练地开车了。16岁就领取了驾驶执照。

报名起风波

“七·七事变”后，南洋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画报，上面有一伙日本兵公然侮辱一位中国老太婆的照片，我气愤极了。日寇如此野蛮凶残，简直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我决心亲手杀死这群野兽，为祖国同胞报仇！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便积极报名回国打日寇。

报名的消息传开后，家里竭力劝阻，但劝不住我，就请来干妈帮忙劝说。干妈说：“‘唐山’很艰苦，抗日战场很危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好好想想。”我接过话题与她摆道理：“日寇打咱中国，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一旦国家被灭亡了，大家都变成了亡国奴。那时，你即使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家里一向对我好，但为了救国，我还是应该回去！”干妈一时说服不了我，却暗地里想新招。

有一天，干妈拉着我的手说：“你的金戒指有点毛病，我取下帮你修一修。”我虽舍不得，但还是让干妈取走。她还向我要了一张相片。我盼着戒指早日修好，可干妈却送来另一个戒指说：“这个先给你带上，那个等修好以后再送来。”过些日子，干妈说我车子开得好，她要买辆新汽车让我开，果然买来了一辆77型的“威力士”。

另一天，干妈带来一位中年妇女，我还不知该怎么称呼，那人却指责我：“没良心的，刚与姑娘订了婚，竟要一走了之。”我莫名其妙，连声说我不知道。干妈连忙示意制止，原来是她暗中替我“订”了亲。沉默了一会儿，老“岳母”通融地说：“你爱国要走可以，但这么办吧：今天先结婚，明天你可以走。”我想这不妥，过几天就要回国了，在抗战烽火中，万一有个意外，就会耽误人家一辈子啊。于是，我再三恳求：结婚之事还是等抗战胜利归来再说吧。

临出发前，未婚妻也来看我，使我很受感动。但为了抗日救国大事，我

顾不了个人私情，我不能动摇，我要坚决回国抗日。我们约定抗战胜利之后再相会。启程回国之日，未婚妻一直送到码头，我们登船了，她与岸上欢送的人群仍不断地挥手，久久不愿离去……

“山大王”得救

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路线，与前三批不同，不是经安南转乘火车入滇，而是搭船到仰光，再乘汽车沿滇缅公路抵达昆明的。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3大队37中队。中队的任务是在畹町、芒市至保山之间抢运军用物资。在此期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暴雨，道路被冲垮，车队被困在芒市附近的荒山野岭中，连续挨饿受困一星期，尝到“山大王”的辛酸。过去每次出车只带三天粮食就够了，而这次可惨了，粮食早吃完了，只得冒雨上山找野菜挖竹笋充饥。祸不单行，偏在这时候，我与几个机工战友又染上了疟疾病。这病忽热忽冷，有时热得像火烧，有时候则冷得像掉进冰窟里，即使盖上几件棉被仍然发抖。好不容易出了一会儿太阳，大家歪三斜四地靠在车轮边晒太阳。附近虽有傣族村子，但人家好像有意避开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亦无可奈何。

熬到第七天，终于有两三个傣族小孩慢慢走过来，惊奇地看着我们说：“车人为什么不吃饭？”我听懂了意思，因为我在马来亚时，学讲一些泰国语，就与这话差不多。我赶紧振作起来，用傣语和他们打招呼：“小孩过来。”小孩惊奇地问：“大哥是傣族？”我连忙回答：“我是广东傣族。”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过来与我们亲近交谈起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吃饭？我摊开双手说：“大米没有，菜没有，肉没有。”他们说：“等一下。”便跑回村去了。当他们回来时，各拿一小箴箩米饭说：“大哥您吃饭。”

一见米饭，十几个战友蜂拥而来，一人仅吃了几口。小孩同情地问道：“您没得吃啦？”我说：“我们个个都没得吃啊，你们回去跟爹妈说说好吗？”不久，村里就来人了，他们说过去曾被当兵的抢怕了，买米买肉不给钱，有时只给一些没用的纸币，还打人呢。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南侨机工，是从南洋回国来抗日救国的，买米买肉一定给钱。只是救济车未来，没有现金。于是，我从傣族村里借来了一些粮菜，断粮危机终于得到解决。后来当救济车赶来时，我立即把欠款送到傣家亲人手上，他们都高兴地说：“南洋

华侨机工好！”

事情传开了，南侨机工的车队在傣族村寨附近一停，傣家男女老幼就高兴地围上来。后来，还有傣家姑娘与南侨机工恋爱结婚的呢。

方言结友谊

有一次，我们车队到缅甸腊戍，每人可补贴几元零星缅币。可是，我去领回的却是一百元的一张，让我去街上换开再分发。起初未知当铺老板是什么人，我就先用刚学的几句缅甸语礼貌地说：“老伯，换点零钱。”没想到对方回答“没有啦。”我碰了钉子回头走，有个好心人指点说，老板是台山人，若讲台山话就好办。我想起在马来亚时，曾向一位家在白水老潭的友人学过一些台山话，就大着胆试试。我转回来亲热地说：“阿伯，帮忙换点钱。”老板一听到台山话，马上问我是台山哪里的，我说是白水老潭。接着老板又问：“你到过唐山？”我怕露出马脚，赶忙说是听我阿爸说的。老板高兴了，他说“难得他乡遇乡亲。你们从南洋回国抗日，真不容易啊。”不但立即换开大票，还热情地留我跟他吃一顿饭，并鼓励我狠揍日本鬼子，早日胜利回家团聚。饭后又送给我一个怀表，说：“跑车要准时，这个表对你更有用。”后来，这个表日夜伴随着我，成为我的亲密伙伴，一接触到它，耳边仿佛就响起了：“跑车要准时”、“狠揍日本鬼子”的话音！

赴印搞运输

1942年5月，惠通桥失守，滇缅公路中断，盟军供应中国的武器及军用物资，就只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这些军用物资必需从仓库运往机场。因此，印度丁江机场急需一批汽车司机，盟军便在昆明招募华侨机工前往印度。我们这些刚从滇缅公路撤退下来的机工们都踊跃报名，我与50名战友被批准第一批赴印，领队是李卫民，于1942年8月乘美军飞机抵达丁江机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跑短途运输。我们这些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开过车，技术很高，因而受到盟军的赞赏。当时在印度机场搞运输，时常遇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每当空袭警报拉响时，那些外国人都弃车跑到防空洞去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才响，日本飞机就已升到上空了，这时，一辆满载军用

物资的大卡车刚开进机场，情况非常危急，万一被炸，会对机场造成威胁，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们的这位南侨机工战友，并没有弃车逃命，而是调转车头往外直冲，目的是将敌机引往别处，以便保住机场以及其他车上的物资。车子加大油门呼啸向前飞奔，黄土尘烟滚像一条黄龙翻腾，敌机发现目标立即尾随追击。当飞机追上“黄龙”背后射击时，这位机工却来个急煞车，车停了，但“黄龙”却继续滚滚向前，飞机追着黄龙疯狂扫射，以为汽车已被炸个稀巴烂了。其实，司机又调转方向，把车开到路边的大树下，隐蔽起来。飞贼绕个大弯回来不见汽车踪影，以为得手了，就洋洋得意地飞走了。由于这位机工的英勇行动，机场上的物资和人员都安然无恙。许多外国人看到这种宁可牺牲个人而保住其他人的英雄行为，都连声称赞。

在昆明成家

我们在印度机场完成了运输任务之后，即乘搭美国空中霸王号，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回到了昆明。

春城虽温暖，我却举目无亲。我天天去找工作，终于碰到一位老乡，他正在美国陆军部队后勤部当采购蔬菜的站长。于是，我就与刚从印度回来的李卫民一起合伙经营蔬菜，总算有条谋生活路。李卫民对我说：你年近三十的人该找个女朋友啦。我说不行，我已订过婚了。他说“南洋沦陷，战乱多变，恐怕……”我则坚持待写信回家问问再说。不久，家中回信说，她已结婚了。李卫民一再动员我找对象，并介绍我认识一位小学教师，她叫韦碧茵，在重庆任教，正好放假在家。我登门去拜访她父母时，才发现韦老伯是熟人，在我去印度前就已认识了。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于1946年在昆明结婚，第二年生了大女儿。人多一口，我又失业，日子非常艰难。于是我帮一位老板开车去缅甸搞运输，积累了一些钱。后来，内战激烈，社会动荡不安，滇缅公路上土匪、强盗抢劫猖獗，车子难以行驶了。老板把车子卖了，回缅甸去了，我又失业了，留在昆明。日子熬到了1949年，物价猛飞涨，货币大贬值，喝一杯茶竟要几千元。我赴缅甸赚的钱，早已花光了，家里又添了小孩，生活就更困难了。南侨机工战友黄辉庭见我无米下锅，就叫我去他家拿一些米，一次又一次，老岳母还以为我在银行里尚有“存款”呢。

侨领再关怀

好容易熬到卢汉起义，昆明解放了，但南侨机工失业的问题一时还未能根本解决。在困难的时候，我想起了陈嘉庚先生，想起了抗战期间成立的华侨互助会，心里亮了，该给陈嘉庚先生写封信。

我走街穿巷，四处寻访联络机工战友们，还找到郊区村子，先后登记了40人，通知他们到原华侨互助会的会址——侨光小学聚会。开会那天，40个人都到了，真是一次南侨机工团聚会。难得的是缅甸归侨热心人士陈实甫先生，看到我们这么团结、这么齐心，他表扬我们，让我们以后开会就去他的“新厦公司”会议室。我们要给陈嘉庚先生写信，他就叫一位副经理帮我们写，直接寄北京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交陈嘉庚先生收。

我们没有想到，陈嘉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拍来急电给昆明侨务处。侨务处王一知处长到处找我。当时我仍忙于联络华侨机工，王处长三次没找到我，就让张同志再次到我家。我爱人看到背枪的军人来找，怕我已出事，不敢多问。后来见我平安回家，以为无事了，就没告诉我。过了一个月，她才问起：“你闯祸了没有？”“没有啊！”“那怎么有个带枪的军人来找你几次？”“咳！解放了，背枪的是革命干部，与过去不同了。”“人家说请你去侨务处，我怕你闯祸，才没跟你说。”“哎呀，这可是好事！”我哭笑不得，立即赶往侨务处。门岗说：别慌，先登记。当我写上“杨保华”时，他高兴地叫起来：“杨保华就是你！我们处长找你多少次了，不用登记了，快进去吧！”

王处长高兴地对我说：“一个月前陈嘉庚先生就拍电报来了，非常关心你们南侨机工，指示说云南任何单位需要司机，首先要录用南侨机工。”王处长接着说：“我看你们生活确实太困难，先给你们一些救济好吗？”我说：“我们要就业，不要救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就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建设争献力

为了修建滇藏公路，资源委员会来云南招聘司机，我们40个南侨机工全部应聘。1950年9月，我们先集中到小团山集训，考试全部合格，然后奔赴滇

藏公路工地。

我先被分配到大理以北的牛街地段，运石头，修涵洞，公路不断往北延伸。后来，调洱源，到剑川，修到石鼓，再推向中甸。

1952年，我们车队合并前往修建昆洛公路（即昆明至西双版纳的打洛）。从峨山修到澜沧，修到勐海，苦战几年没有休假。只是在送民工、石匠回家过年时，才顺便回一次家。昆洛公路修成后，改属第六公路工程局。

当进行肃反工作时，南侨机工遭到牵连。过去，侨务处常叫我们开会学习政策，讨论搞好工作。可运动一来，有人诬蔑，这是“开黑会”。于是，一顶“特务”的帽子突然从天而降，戴到我的脑袋上、我为啥突然成为“特务”了呢？原来是这样：有个南侨机工叫郭六成（与我同为第四批回国机工），听肃反报告，没有弄清政策，他想坦白一下，可以立功，免得人家说我们“开黑会”，搞“特务活动”。就在会上说：“我郭六成是一号特务、杨保华是二号特务。”于是，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没人肯相信我是清白的，就被送进“老虎队”，天天写交代材料，写了一叠又一叠，写了九个月，我的字也就练了出来。

九个月后，上级干部下来了解情况，看我写材料，天天写的都一样，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任何自相矛盾。找我谈话，说我记性真好。我说：我做的，我记得；没有做的，不能乱写。乱写会搅乱组织，反而给敌人钻空子。上级干部问保卫科长，经查问，严厉批评他乱来，万一出事，害人一辈子。最后，叫保卫科长给我扛行李，送我回车队。上级干部还说：阶级斗争很复杂，郭六成不懂，回去给他讲一讲，不要背思想包袱。

后来，我又被调到昆明总站八车队，司机都是华侨，队长是南侨机工林新李。他工作做得出色，成为云南省劳动模范。记得我们华侨车队热烈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家一心一意投入祖国建设事业中，干劲冲天。我们小组的竞赛对手是黄步云小组，他是省劳动模范，后来又成为全国劳模，出席北京群英会，为我们南侨机工争了光。

灾祸不单行

1958年10月，我出车到永仁，忽收家信说妻子生病住院，我立即赶回。我一家十几口，上有两老，下有七小，全靠她照料，她还要忙教书，而我四

处跑车，难以分担她的重担。她病倒了，这个家怎么办呢？我到医院，只见她在哭。她说：已住好久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当时搞“大跃进”，老师带学生下五家摊修路，冒雨苦战，她感冒、发烧，仍不下“战场”，终于得了伤寒病。老医生没敢告诉她，怕她急坏了。

为了赶任务，我不能多停留，交代老医生多加关照，就赶送一车货去芒市，然后装上空油桶回来。谁知道在最陡险的麦庄丫口突然抛锚，我迅速搭车赶回拿材料把车修好，继续赶路。车到羊老哨，实在太累了，车一停下，我就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天刚蒙蒙亮，我被修路工的泼水声惊醒，这时迎面飞来一辆解放牌带拖斗货车，我赶快让车停到路边上，来车却急转弧弯，车斗一摆猛击到我的车头左侧，大梁给打弯了，我踩车的脚负了重伤，下不来了。后经医院包扎完，我忍痛要去医院看妻子，老岳母说：“不能去，她看到你这模样不更急死了吗？”还说她病已有好转，能起来走动、锻炼身体了。我稍放心。没有料到才过几天，1958年10月24日晚上，老岳母突然从医院哭着回来，说“她死了！”天啊！我坐上三轮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她已被送进停尸房。无灯，漆黑，我只能摸着走，脚绊了一跤，擦亮火柴，是个孩子的尸体。掀开纱罩，又是个长满胡子的老倌。再摸进去，才找着她。她面色煞白，还睁着眼睛看我，我双腿一软倒了下去……

大姐赶来了，拉扶我回家。后经了解突然病故的原因：自从“反胡风”、“反右”到“大跃进”，老医生先后调离岗位去学习、接受批判、参加劳动，接手给妻子治病的年轻医生缺乏经验，说她卧床时间太长了，应该下床活动活动，去外面走走。她听医生的话，支撑着虚弱的身子下了床，到病房外面散步，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慢慢走向病房，走到床前突然昏厥扑倒，腹部撞在床角上，伤寒重病的薄肠子受此冲击断裂了，终于抢救无效。我的老岳母为女儿、为一群孙子里外跑，跌跤把脚攒瘸了。而我的儿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九个月，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想该给小孩买点吃的。想去富春街，却昏昏沉沉地走到了西站。恰好被一个朋友碰见了，他见我痴痴呆呆地，就把我送回家，叮嘱家里说：“以后老杨出去，一定要有人跟着。”

走出了困境

我家祸不单行，接下来又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那

可是艰难岁月。当时吃、穿全部定量，凭票证购买。我的脚伤养好了，头脑也清醒了，面对困难，想出办法，全家分工，共度难关。老岳父母总管家务，岳父的婶婶老太帮抚养最小年仅九个月的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上学去，老四带领老五、老六。我赶快去上班。车队长期补助我家30元。我是一级驾驶员，工资90元。全家同心同德齐奋斗。我的车跑山区禄劝、武定等地，拉活猪回昆明。屠宰站老板说，每次拉猪一头也未压死的，可奖七八元。我格外小心，从未压死过一头猪，得了一些奖金。我告诉老板，不用给我奖金，给些猪肉好了，老板一高兴，一刀砍了一大块，足有10斤重。当时每人每月定量肉只有2.4两，而我家吃肉却格外丰富。之后，家里渐渐走出了困境。

我苦难中，总希望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而看到他人处于困难境地，我也主动伸出援助的手，助人一把。南侨机工汤耀荣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其妻潘女士抚养三个孩子，力不从心，磨难多年，只好重新组建家庭。潘女士决定从云南赴山西结婚，她说：“杨叔，三个小孩无法带去，怎么办呢？”“送来我家吧。”“你家已有七个小孩，韦姐比他走得更早，你负担太重了，怎能再加重担呢？”“没关系，咱南侨机工是一家人嘛。 $7+3=10$ ，可以组成一个班呢。”潘女士和三个小孩从此走出了困境。汤耀荣之女汤小梅回忆在我家幸福成长的情景，激动地告诉大家：“杨伯父对我们真是太好了，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给我们小孩子喜欢的东西，首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然后分给他的七个孩子，他关心我们超过了自己的孩子。”后来，小汤恋爱结婚时，她告诉爱人说：“你真正的岳父老泰山，是杨伯。”

“文革”又挨斗

“文革”开始，我们南侨机工抗战时期在西南运输处的那段经历，被当成大问题，大揭大批。我扪心自问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人检举我，要我坦白交代罪行。他们天天审，天天问，就是要我交代“罪行”，查了一个多月，仍无收获。最后，他们抛出了我的“罪行”。说我1948年在空军招待所开汽车，有一天所长叫我开吉普车到南屏街拉进步人士去黄土坡枪毙，逼问我拉了几个，名叫什么。并说人证俱在，还不快坦白。我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能拿出证据来，该劳动，我自扛行李；该枪毙，我站着不闭眼睛。第二天，集中了几百人

开大会，会议主持人大声逼问我，要彻底坦白交代。我仍说我没有罪。他大声喊：“褚秦真出来！”当众问褚是否说过“所长派车拉人去枪毙之事？”“是不是杨保华送的？”褚说：“这事杨保华晓不得！”全场几百人都听到了，会议主持人气急败坏地把褚推了下去。

问题解决了，我回车队，但却不让我开车了。叫我钻在坑道里换车梁钢板。人家问我现在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在搞地下工作。”后来，见我工作细致，又叫我搞机务员工作。有人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在桌子上工作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光荣退休了，却又闲不住，车队留我继续工作，当教练指导。

重评赤子勋

1984年，我从玉溪车站回到昆明，与儿女、孙子们共享天伦之乐，经常与南侨机工战友们聚会。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张智源热心联络南侨机工战友，我积极参与活动，共联络了昆明20多人，举行座谈会。后来，张智源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故，我牢记他的嘱托，继续组织机工联谊活动。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共同问题，就是落实南侨机工的政策。我想昆明老机工多，生活有困难，认为应好好组织起来，于是写报告给北京全国侨联。1986年9月，“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机工云南联谊会”（简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终于正式成立了。

紧接着，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代表团访问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先生也从北京赶来接见我们，并与云南省领导商定建立“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1989年7月7日，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纪念，“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终于在昆明西山正式落成。

我们所有健在的南侨机工都感到无比欣慰。现在海内外许多热心人士称我们南侨机工是“国宝”，说句心里话，我们不是“国宝”，但我们心中确有“国宝”，名副其实的国宝是陈嘉庚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

（与刘宝全合作）

1989年初稿，1993年二稿

他的心永远年轻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王亚六访谈录

在云南南侨老机工中还有一位“年轻人”，实际上他也年逾古稀了。可为什么还称他“年轻人”呢？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幸存的南侨机工，大都年近八十或已逾八旬了，故战友们喜欢亲昵他为“年轻人”；二是他身体确实好，热情特高，思维敏捷，充满活力，联谊会的各种工作，他都义务抢着去做，干劲不输小青年，故荣获这一“美誉”。

这位“年轻”的老机工，就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副理事长王亚六。他祖籍福建莆田，现居昆明，我曾多次登门拜访，可是他每次谈得更多的都是机工战友逸事。他说，一些已故战友的事迹，如果我们活着的知情者不讲，无名英雄们的故事就难免失传了。当他将其所知的战友故事一一谈完之后，这次我出个题目让他谈谈自己“在滇缅公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终于开始谈自己了：

军训果然派上用场

我是参加第三批机工回国的。1939年3月27日乘“丰平轮”出发，4月3日抵达昆明。西南运输处派卡车把我们接到潘家湾司机训练所。初到训练所已是深夜，印象最深刻的是给了我们三个“下马威”：第一个“下马威”是当夜寒流袭击，令人冷得发抖。我们是从长年炎夏的星洲来到大西南的，一下子急剧降温，挨冻的滋味是前所未有的，确实难受。不过，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没人有怨言。因为大家明白，这次回国要到滇缅公路的深山野岭开

车，要上战场，为的是运输救国，绝不是回来享清福的。第二个“下马威”是睡稻草地铺。我们在南洋都有舒适的安乐床，初来到训练所却无床无帐，用稻草打地铺。但大家以苦为荣，还津津东道地评价说：这稻草铺并不比弹簧床差到哪里去！次日大早起床，就集合跑步到潘家湾稻田水沟里舀冰冷的水洗脸、漱口。面对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现实，我们彼此之间做做鬼脸，开玩笑称：新鲜味呐！当时大家想的是抗日救国，因此，早就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现在回想起来，“抗日救国”这四个字，字字千斤，真是战胜任何困难的法宝。第三个“下马威”是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们这群在南洋自由惯了的海外“游子”，一下子要从老百姓变成军人。要成为真正的军人，得投入严格而紧张的军事训练。军训从“立正”、“稍息”、“齐步走”开始，非常刻板，大家都不太感兴趣。接下来讲军事课，如战略技术、安全常识、伤员抢救及自救和防空知识等。记得教官说，碰上敌机空袭投弹时，应立即卧倒，两手曲臂放在胸前，撑胸离地面，同时张开口，这对于炸弹在附近爆炸，可以三防：一防被弹片杀伤，二防地面震伤心脏，三防声浪震聋耳朵。起初，我们讨厌军训，认为搞训练没啥用。但没料到，军训竟然真的派上用场。有一次，我开车到腊戍火车站装货时，突遇日本飞机空袭，我立即跳下车，冲向田坎趴下，按防空要领去做。敌机炸弹就在身边轰隆一声巨响，多少“弹片”往我身上落下，我以为这下子可完了，但镇静一下，分明还活着，原来满身覆盖着的是泥巴。我庆幸自己按防空要领去做了，确实好用，安全无恙。我领悟到，军事科学知识确实有用。后来，我曾在重庆亲眼看到防空洞闷死数万人的特大惨景，罪过当然是日寇的狂轰滥炸，但是当场的人们如果能多掌握些有关防空的科学知识，也许可以减少伤亡。

炸不断的军事运输线

功果桥与惠通桥是滇缅公路上最重要的咽喉。为了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减少损失，守桥部队在桥头悬崖上挂上红灯笼报警：挂一盏灯笼，预示敌机将来空袭；挂两盏灯笼，告知敌机已临上空；挂三盏灯笼，则警告敌机正在空袭。同时，守桥部队配备高射炮，严阵以待，以狙击敌机，保卫大桥。

1940年10月，日本侵略者专门设立了“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由安南河内频繁出动大批飞机，对滇缅公路的重要桥梁——功果、惠通两桥进行重

点轰炸。

同年年底的一天，我们分队驾驶着15辆满载军火的大卡车从保山返回下关，途经功果桥时即遇到敌机空袭。我开第一辆，刚行驶到桥头，宪兵阻止前进，我看到已挂两个红灯笼了，立即跳下车。猫着腰钻进路边石崖下凿好的防空洞。霎时，功果桥那边由远而近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短暂间歇之后炸声又响。原来是27架敌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炸弹爆炸溅起水柱高达几丈，连江中的鱼也被炸死，翻起白肚浮在水面上。功果桥终于不幸被炸中了，桥身一边的铁索断了，整个桥面吊板往下坠。江两边的汽车也有被炸坏的，我那一辆的车头盖板亦被弹片射穿。

这次空袭，造成桥断，江两边堵塞的几百辆车，排成了长龙。机工们十分焦急，个个义愤填膺，切齿痛骂日本强盗。为了尽快设法抢修功果桥，机工们与桥工们积极出谋献策，联想到橡皮艇打气在水中漂起来的浮力原理，提出利用空油桶顶替浮船使用。这个临时抢修渡江的施工办法很快决定下来了。同胞们个个奋勇，齐心协力，投入这场紧张的战斗，出现了一个沸腾紧张、激动人心的场面。保山汽车运输分处马上作出反应，派了一个伙食团赶来支援。

南侨机工和当地桥工连夜突击抢修，从附近仓库征集了几百只空油桶和大批板材，用钢索连结，捆成一只长方形大浮船，上铺木板，船两头用钢丝绳拉到两岸的滑轮上，由两岸汽车轮流对拉钢丝绳，浮船便来回把两岸的汽车送过江。前后仅花几小时便可通车了。这确实是一大奇迹。起初，每次只拉一辆车，太慢了。随即进行改装，多搞几个浮船，连成浮桥，汽车通行就快了。为了防止敌机，浮桥还搞成活动式的，空袭时可将浮桥左右分开，隐蔽于两岸树木草丛之下，避免暴露目标。欲通车时，再拉出来连成一条浮桥。敌机炸断功果桥那天，日本电台曾幸灾乐祸地广播：“功果桥已被炸断，滇缅公路国际孔道，三个月之内没有通车希望。”可是，日本侵略者哪里知道，南侨机工个个是英雄汉。他们都有颗火热的爱国心，用火热的心筑成的运输线，是炸不断的。

抗战不胜利 誓不回家

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铭记着追悼符气簪烈士的情景：符气簪是海南

岛文昌县人，他在国立暨南大学毕业后，曾任上海公安局督察，后来返回南洋，曾任麻坡中华公学教员、新加坡育英中学教员。1939年，他是第四批机工团的秘书，回国后任西南运输处第13队大队补充队少尉分队长。在拯救民族危难中，他一贯服务勤恳，工作出色，深为南侨机工战友所敬重，却不幸于同年11月在云南永平境内翻车殉职。

云南永平县筹赈会及各侨团的侨胞，特选定在1940年“五·九”国耻纪念日，为符气簪烈士举行追悼会。十四个侨团侨校的代表二百余人出席了追悼会，巴罗益群学校铜乐队吹奏哀乐，有关人士致了悼词。符气簪烈士73岁高龄的父亲符振弟老先生专程从南洋回国参加追悼会，他在致词中大声疾呼：“余生二子，俱为国牺牲，余希望各位侨胞应以国家为重，为抗日救亡而努力工作，出钱出力，打倒日寇，打倒汉奸汪精卫，争取民族的自由……”与会者对符老先生的爱国热情深表钦仰，纷纷表示，抗战不胜利，誓不回家！

“抗战不胜利，誓不回家！”这成为三千南侨机工的共同誓言与行动准绳，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上，镌铸了这一顶天立地的誓言，谱写了海外赤子的不朽篇章！

（与刘宝全合作）

1989年初稿，1993年二稿

执行特殊任务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邓文聪回忆录

南侨机工回国，奋战在滇缅公路上，不仅是抢运军事物资，有时还得执行特殊任务。下面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邓文聪讲述的一段经历：

1940年10月，我被抽调到新组成的运输队，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运钞票。队长是李卫民（南侨机工），驾驶员都是从各大队调来的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技术的尖子。汽车也都是崭新的道奇牌，车厢是经过改装的，像冷冻车一样封闭着。

车队运载钞票的行动似乎很神秘，当我们开到新腊戍仓库里装车时，见到民工队在荷枪实弹武装人员的严密督察下，将一箱箱钞票搬上车，清点完毕，立即严封起来，每辆车都配备武装警士随车押送。早晨，我们从新腊戍出发，当晚到达我国边境小镇遮放，停车场戒备森严。我到附近的馆子里吃过饭，夜里就睡在驾驶室里。沿途经过保山、下关、楚雄等地，也都食宿在车上。第五天即到达昆明。卸车时，武装人员如临大敌，逐一清点核对。卸车之后，我们当晚到西南运输处报到，然后很快装上一批出口物资，诸如桐油、水银、钨砂之类，于第二天大清早启程回运，再经五天才返回新腊戍。每趟来回历时10天。我一共执行过五次特殊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然后回国到第13大队继续抢运军用物资。

据邓文聪回忆，他是1939年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的，在昆明短期军训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3大队37中队。起初在遮放至保山地段，后在曼

德礼到畹町段运输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还接送过许多新组装的各式卡车。当时，任务紧迫，不管多苦多累，他都争先接受，出色地完成任务。在枪林弹雨的考验中，他的驾驶技术越来越高，滇缅公路上再险再难也阻挡不了。由于他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因此被选调执行上述的特殊任务。

(1993年)

一箱子子弹的惊险经历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翁家贵回忆录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从事军事运输，人人要闯过三个严峻的生死关——险路关、瘴疟关及敌机空袭关。此外，还有一个无形关口随时在考验着大家，那就是能否有自觉性、纪律性、责任心和警惕性。若稍有松懈，马虎了事，那可就要出大漏子，或者坐牢，甚至送掉性命。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翁家贵谈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

我是参加第五批机工回国的，分配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说起我在滇缅公路的惊险经历，尽管山路险峻，却被我一战胜，化险为夷；倒是一次被指责为丢失了一箱子子弹的惊险风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0年春，我任分队长。有一次，我负责带领六辆载着子弹的车队由保山来昆明。当车子开到楚雄时，队里张启麟的车子掉进路边沟里去了，进退两难。如果等待下关救济车前来救援，也许还得等一两天。六车弹药在此荒山野岭过夜，万一出事可不得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好将掉进沟底的那车子弹，平均分摊加到另外五辆车上，超载赶路，只留下一人看守着空车等待救援。

当我们五辆满载子弹的车队赶到昆明大板桥军用仓库卸货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清点弹药箱的人员突然说：子弹少了一箱。这还了得！我们早听说过因丢失子弹而被判坐牢的先例，横祸怎么突然即将降临到我们头上？可真令人不寒而栗。我再三回忆，这次发出一路上够小心的了，连在楚

雄盘移装箱时也格外谨慎，那箱子弹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们又仔细地清点了一遍，还是少了一箱。这可急煞人，但光着急又有何用？只有冷静地思考：从出库、上路、过夜到这里进库，都没有任何疏漏，会不会是卸货搬移时放错了地方，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我警觉起来，立即找仓库负责人说明经过，然后继续里里外外仔细侦察，终于惊奇地发现仓库那边垒得整整齐齐的弹箱上面，高出了一箱，会不会正是这箱？然而，就算是这一箱又该有什么根据呢？我走近认真察看后，心中有数了，这一箱果然是我们的。仓库负责人问，弹箱都一模一样，怎么能说这箱是你们的呢？我请他仔细看：仓库原来的弹箱面上都有一层灰尘，唯独上面这箱无灰尘，与我们新运进来的一样，正说明这一箱就是我们的。他信服地点点头。我理直气壮地把这箱搬了过来，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一场虚惊终于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难忘的。此后，我们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都保持了更高的警惕性和责任心。

(1993年)

它陪伴我五十多个春秋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秘书长罗开瑚回忆录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南洋华侨机工的爱国事迹，日益受到海内外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厦门华侨博物院等特派员赴各地征集南侨机工历史文物，将这批珍贵的华侨史料作为形象的爱国主义教材，开辟专题进行展览，南侨机工联谊会的老同志，都把此事记挂在心，常说：翻箱倒柜找到的当年实物史料，要赶快献出来。

不久前的一天，罗开瑚老人送来一件毛毯，展现在云南机工联谊会诸老面前：

毛毯呈灰色，上面有黑条格子，已经破破烂烂，四边的须条已磨掉了。当中破烂处，补上了一块块方形、矩形的白布、针脚整齐。但由于年久月深，整件毛毯已磨得稀薄，到处穿洞，补不胜补了。

在场的老机工看了之后，异口同声地说：“这确实是当年陈嘉庚、南侨总会赠送给南侨机工的毛毯！”

“对！我领到的也是这样的！”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说。我则好奇地问：“罗老，你是怎样保管到现在的？”

罗开瑚老人笑着说：“它，已经陪伴我五十多个春秋了。”接着，他饶有兴致地讲起了这条毛毯的特别经历：

1939年，我参加第八批机工回国。从长年如夏的南洋热带地区，一下子来到忽冷忽热昼夜温差很大的横断山脉高山地带，身体一时感到不适，时常感冒。正当我为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发愁之时，陈嘉庚、南侨总会及时送来一批慰问品，其中就有寒衣和毛毯。这条毛毯质量很好，我一见就非常喜

欢。从此，我开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时，每逢风雨交加，特别是霜雪袭人的严寒之夜，这条毛毯都给我带来了无限温暖。如果没有它，我恐怕早就冻坏了。我深感陈嘉庚先生与南侨总会考虑得周到，也很实用。这件普通的毛毯，在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中，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宝贝。我把它装在提包里，随车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1942年，我们车队奉命到仰光抢运，当时局势很紧张，日寇飞机日夜来空袭。由于那里没有防空洞，警报一拉响，人们只好跑进一座坚固的大厦里。这是一座政府办公大楼，钢筋水泥建筑，估计机枪射不穿，炸弹炸不垮。每次跑警报，我都提起装着毛毯的提包一齐跑，有时就在那座楼里睡觉。记得那天晚上刚躺下不久，突然有人催促大家起来，说日军已到郊区，新公路已断，只能走老公路，马上出发。我连忙将这毛毯提包带上车，与一位机工战友轮番驾驶着一辆军用卡车快速撤退。那位机工驾车过一座小桥时，不慎翻了车。幸亏我紧紧抱着毛毯提包，翻车时头部撞在毛毯上，安然无恙，而那个战友却负了重伤不得不留下住医院。我提起救命的毛毯，又搭乘另一机工的车脱险回国，而那留在医院的战友后来却被日寇杀害了。据说日寇屠杀南侨机工时，不问青红皂白，只看你风吹日晒的黝黑脸庞，如果额头上有一条因戴军帽而留下的白色皮肤，便立即枪杀。因为有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我更加珍惜它——南侨总会赠送的毛毯。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可算步入“小康”了，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家具，也都不断“更新换代”了。可是，我就是一直舍不得把这条毛毯扔掉，我把它装进皮箱置于衣柜里，因为它是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这次把它捐献出来，一来是响应捐赠南侨机工历史文物的号召；二来我想，我迟早是要去见陈嘉庚老先生的，故先与毛毯老伙伴告别，把它送往该去的地方——历史博物馆，这样算来，我俩就各得其所了。

（与刘宝全合作）

（1993年）

赤胆忠心 无私奉献

——记昆明南侨机工汤耀荣

战后留居在昆明的南侨机工汤耀荣，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十年代就英年早逝，可是认识他的人们仍在怀念他！

悄悄回国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救亡的热潮席卷南洋。为拯救民族危难，汤耀荣恨不得马上奔赴抗日前线，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国境。可是，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庚好友回国参战，自己却没能报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不忍心辞别无依无靠的年迈祖母。

汤耀荣原籍广东南海，三岁之时由母亲带往南洋，寻找在槟城谋生的父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病灾袭来，父母不幸相继病逝，小小年纪的他成为孤儿，幸得靠老祖母抚养成长。家庭的不幸变故和生活的艰辛磨炼，使小汤比同龄孩子过早地懂事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汤为了减轻祖母的负担，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由于他刻苦耐劳、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一手熟练的机修技术，十几岁就以熟练的修车技术远近闻名，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师傅招收学徒。

他一向尊敬祖母，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后，孝顺之心与日俱增，在南侨青年报名参加回国服务团时，他多么愿意把自己的开车与修车技术报效于祖国啊。但是，一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祖母需自己来伺候，他就不忍心断然离开这相依为命的老人家了。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到了第九批时，

听说这是最后一批了，再踌躇就报国无门了。怎么办呢？他悄悄地走了三步“暗棋”：一是悄悄地到筹赈会补办报名手续，并特别交代不能公开登报宣扬，以免让亲友们知道。二是悄悄地向几位好友与徒弟谈了心里话，请他们今后多关照老祖母，预计两年之后就胜利归来。三是悄悄地写下一封敬请祖母原谅的信，准备在启程前才留给老人家。

启程那天，他天未亮就悄悄地出了家门。忽然心酸起来，转身跪在大门口，长叹地说：“奶奶，忠孝不能两全，原谅我吧！”说完，悲郁地踏上了征途。

熟练地修车

回到祖国大西南，汤耀荣被分配当机修技术员。由于他有高超的技术，颇受机工战友们的欢迎。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回来个王文松，槟城回来个汤耀荣。在遮放，汤耀荣与伙伴们投入紧张的抢修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上级的表扬。对于汤耀荣的修车技术和为人，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仍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现居昆明的南侨老机工许年回忆说：“1939年秋，我与汤耀荣同在西南运输处第10大队，后来编为华侨先锋大队，我任第二中队的班长，负责督促全班车子的检修。有时候修理工解决不了，就去找汤技术员，经他检查、指点之后，原以为难以排除的故障，很快就能解决。当时，找他的人很多，从10大队到华侨先锋队，可说无人不识汤耀荣。因为只要找到他，再难的机修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巧妙地撤退

1942年，日军经泰国拦腰插入缅甸，局势紧张，汤耀荣与许年、朱松胜奉命一起开车撤退。为了避免新车及汽油，弹药落入敌寇之手，他们还肩负了破坏汽油库等特殊战斗。他们先猛力挥动长柄大斧头砍破汽油桶，让汽油流出来之后，再开车撤退出一段距离，然后回头开枪射击，结果一打就燃烧起来。当他们巧妙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之后，随即沿着滇缅公路撤至惠通桥。此时，桥的两边已布满炸药包，守桥工兵已将炸药引线安装完毕，情况十分危急。汤耀荣果断地与战友火速地通过了惠通桥。闯过不久，惠通桥就

被引爆炸断了。后来，机工队伍被解散了，汤耀荣才与战友们分了手。

默默地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汤耀荣调到云南汽车运输公司当驾驶员。他善于总结保养引擎的经验，总结了十条，在公司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应。据他女儿汤晓梅珍藏的1953年云南省生产竞赛劳模大会的《劳动模范手册》中有一文：《公司一级劳模汤耀荣——创引擎行驶里程新纪录》，专门记述他创造木炭车行驶里程的新纪录，超过中央指标175.66%的先进事迹。

汤耀荣保持与发扬了南侨机工的光荣传统和干劲，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他常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我要用实际行动争取入党。”他说到做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于他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被送入医院，因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仅四十来岁。上手术台前，他说：“我回国抗日，青春无悔，遗憾的是未能最后再见祖母一面！”

（与刘宝全合作）

（1993年）

滇缅公路上的难忘岁月

——南侨机工林福来回忆录

1918年，我出生在马来亚太平埠一个华侨小商人家庭里，我家祖籍是福建省厦门市。我在太平读书至初小，因父母早逝，我和弟弟无钱继续读书，18岁那年，我便进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橡胶工厂当学徒工，并见习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地。我们海外华侨无不义愤填膺。广大侨胞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焚烧日货。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号召海外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整个南洋。1938年，国内已开展了全面抗战，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战线内移，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军援断绝。抗战前线急需军事物资，然而，军事运输又急需大批熟练的汽车司机始能担此重任。

1939年，我已是一个21岁的热血青年，看到祖国遭难，心里很痛苦。我想自己虽然出生国外，但是个炎黄子孙，如果祖国亡了，对我们海外华侨将是个奇耻大辱，现在祖国面临危难，我应尽一个中国侨民的义务，报效祖国。心里想着我会开车又会修车，不是非常符合机工的条件吗？于是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在马来亚的太平埠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决心为保卫神州而战，为反对法西斯的侵略而战！

听说我要回国参战，亲戚朋友都舍不得我走。有的亲戚甚至提出，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我，条件是只要我留下。特别是与我相依为命年仅18岁的弟弟林亚水，更是哭着不让我离开他。可我回国抗战决心已定。我向他们表

示，等回国赶走了强盗，定将荣归故里，回报亲人。亲人和朋友们见我主意已定，也不再强留，便为我打点行装。

我把弟弟托付给了亲人，便挥泪告别了亲戚朋友，登上了运载第五批机工回国的轮船，从新加坡出发了。我们这一批共有200多人。

启程那天，码头上人山人海，送行的华侨和亲人们排着长队，夹道欢送我们这些穿着刚发的崭新机工工装的参战青年，我们迈着大步，踏上了抗战征途。岸上的人们摇着旗帜，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到如此场面，我们个个紧握双拳，热血奔涌，似乎要即刻与日本鬼子交手拼刺一般。

我们的轮船在辽阔的南海上航行了3天3夜。第4天，船到越南的海防靠了岸，经过交涉，我们乘火车到达昆明，便受到有关部门的接待。记得当时在云南当主席的龙云，还以他个人的名义设宴招待了我们。随后，我们便被送到了昆明潘家湾训练班受训。训练生活十分紧张。每天上午在室外上两个小时的军事操练课和两小时的驾驶操纵课。下午则是卫生常识以及战时护理等课程。大约只学了两个来月，由于战事紧迫，我们每人领了一套汽车修理工具就被分配到各个大队服务去了。当时我们被分去的大队建制是：1.华侨先锋队，驻缅甸的八莫、腊戍一带，开雪佛兰牌卡车；2.西南运输处第十三大队，驻芒市、遮放一带，开道奇牌卡车；3.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驻贵阳一带，开万国牌卡车；4.西南运输处第十四大队，驻下关一带，开道奇牌卡车。

我被分配在第十四大队服务。那时我们开车的叫做司机，我们穿的是连衣裤工作服便装。生活十分艰苦，在队部时，虽一日三餐，但早点却吃稀饭。出车执行任务，更是饱一顿、饿一顿的，有时还得自带锅米，途中停车，埋锅做饭。穿的工作服也是质地极差的布缝制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机工归国后，南侨总会曾多次给我们机工团寄来大批物资，可是多数都让那些腐败的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发到手的東西，又少又破烂。

那时候，美国的军援物资主要是由缅甸进入，经滇缅公路运往各抗日战场。我服务的第十四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下关把第九大队运来的军火和汽油等抗战物资运往昆明。战事紧张时，我们也直接到芒市、遮放等地装运。滇缅公路为战时抢修而成，路基很差，常常塌方，雨季简直无法通行，有时被堵在途中几天几夜，饥寒难忍，度日如年。那潏漾坡、瓦窟坡更是上下两难。当时就连从芒市到龙陵这三十来公里路，卡车也要走两天。一到旱季，运输特别繁忙，整个滇缅公路上，车来车往，事故频繁，不少机工死于车

祸，为抗战捐躯。记得有一次，我从保山抢运军火回下关，在永平至下关的路上，碰上一辆对头车，眼看两车即将相撞，如果引起军火爆炸，便会车毁人亡，我急忙向一边打方向盘，卡车失去控制，翻下山洼，连打几个滚翻，把我从驾驶室内甩了出去。幸未引起弹药爆炸，可我身上被倾翻的弹药箱重重地压住，幸得队友救护，我才免于一死，但我的脸、身和腿部多处负伤，小腿被剝去了一大块肉，至今还留下多处伤疤。新修的公路难走不说，还常常在半路上遇到空袭，一旦发现飞机，只得将车开到路边或树下隐蔽起来，随时都有中弹身亡的危险。

我们机工当时还有一怕，那就是疟疾。很多机工到了芒市、遮放等疟疾高发区后，便被染上，一病不起，甚至死于病魔之手。我们第五批太平埠的机工领队，名叫蔡世隆，回国后在遮放染上了疟疾，高烧不止，几天后死在芒市，时年仅25岁。他出身于马来亚华侨资本家，是个有文化、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当我们闻知噩耗，一个个不禁伤心痛哭，为了表达崇敬之情，我们选派代表来芒市将他的尸骨掘出火化，将骨灰护送回新加坡交给他的父母。我们的战友蔡世隆，是为祖国的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

就这样，我们在滇缅公路上面对种种困难，为前线运送着一车又一车武器弹药，支援着前方的抗战。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坚持运输多年。其间，我曾得到消息，知道弟弟继我之后也回国，受训后分配到贵阳的第十三大队服务。可是我们一直未能见面，后来我又调到华侨先锋队第九中队，驻守在滇缅的八莫、腊戍一带，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4月底，日军从缅甸长驱直入，我们在缅甸已难以立足，便向国内撤退，到处是一片惊恐。为了不让日军占领油库，军委下令将油库所有汽油烧毁。油库爆炸那天，只见满天火光，染红半边天空。日军的枪炮声渐渐逼近，大家奔跑逃命。汽车一辆一辆地向国内开。就在此时，原籍福建的许姓华侨一家五口，作为难民搭上了我的卡车。他们不愿当亡国奴，便与我们一同回国，谁知这一家的出现，竟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从缅甸的八莫经畹町的惠通桥，车子走了几天几夜，路上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逃难的群众成千上万。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坦克在后面追击，我们只顾奔逃。1942年5月4日早上10点多，当我开车刚刚驶过惠通桥，中国

守桥部队就奉命点燃了炸桥的引线。“隆”的一声巨响，吊桥从中间断裂，桥身坠入江中。守军炸桥主要是为阻止日军越过江桥向内地推进。当时在桥那边成百上千辆卡车再也无法前行，司机和数以万计的群众便纷纷逃命，有的跳下怒江，力图游到对岸，可江流湍急，一些人不幸被江水卷走。有的则在对岸百般呼号而无人答应，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候，有什么法子呢？

我开车继续前进，当天下午到保山东门外，保山刚遭到45架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只见城内四处冒着硝烟，墙倒屋塌，尸横遍街。有的血肉模糊，有的缺臂少腿，惨不忍睹。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我们不敢久留，在保山东门外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天明便继续驱车上路了。到了楚雄，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许姓华侨一家对我非常感激，硬要拿钱报答我对他们一家的救命之恩，可我执意不收。此时，许父看我与他的大女儿许水治有点意思，便主动提出将女儿相许。老人有意，我们俩小有情，就这样，我与许水治在楚雄结为患难夫妻。

那年我刚满24岁。婚后不久，我把许水治一家安顿在楚雄后，便开车至昆明，一到昆明，我们却被收了汽车，莫名其妙地被解雇了。一时间，我成了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失业者。我已经是有了妻室的人了，今后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不行，得找一个职业。正值此时，中美航空公司在昆明的代理人李维明要招收160名汽车驾驶员。为了生活，我报了名。不久，我坐上中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来到印度丁苏加的飞机场，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运输汽油、军用物品和大锡锭。在这个机场，我又度过了两个春秋。我时刻挂念着国内的亲人，每当月圆之夜，便仰望天空皓月，思绪飞回国内，飞到亲人身旁。机场的待遇比较好，工资报酬不低。我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1944年底，我以探亲度假为名，坐飞机到了昆明，终于与楚雄的亲人见面了。回国后，得知滇西一线的抗日战争进展很快，抗日将士在当地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下，与日寇展开了血战，整个西线节节推进，日寇且战且退。这时，我又到国民政府设在保山的交通部第四运输处开车，继续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为抗日战争服务。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我弟弟林亚水要求重返出生地新加坡，很快他办理好了一切手续，领取了两百美金安家费，准备出国。我因在国内建立了家庭，不能与弟弟同行。分别时，我们弟兄俩哭成泪人。真想不到，7年前，弟弟为我送行，7年后，我又为弟弟饯别。亲人别离的悲痛使我说不出半句话来，我把一只手表戴在弟弟的手腕上，算是分别礼物。谁知那一别至今已40

余载，却音讯杳然。

送走亚水后，许水治一家见日寇投降，缅甸已平静，便动了回缅甸之心。于是，我也就随着许家出国到缅甸，曾先后在九谷、瓦城一带居住。我帮一个车老板开车，常常跑腊戍、仰光等城市，以谋取微薄的酬薪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受雇于人，寄人篱下，那时一家人的境况并不太好。我时时想着回国谋生，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国内并不安宁，我只好打消回国的念头。

1953年，这我才坚定了回国的决心。我怕回国后找不到职业，便决定一个人先回国看看，等找个职业，安顿下来，再把全家接回国。我告别了妻子以及我那刚刚两岁半的儿子，再一次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我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办理回国护照，从瑞丽县入境，又踏上了阔别7年的国土。可是我到畹町才20天，便被逮捕了，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徒刑，投入劳改场。刑满后，我又被安置在湾甸劳改农场就业，一晃便十几个年头。这期间，我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79年，我与我现在的妻子回到畹町定居。1986年5月，在德宏州、畹町市侨联的帮助下，终于搞清了我的案子，经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审，宣告我无罪，撤消了原判，并落实了政策，享受职工退休待遇。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我的晚年，现在每月发给我30元生活补贴费，还支持我发展家庭养兔和经办代销店。我们夫妻的晚年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1985年，我光荣地当选为畹町市政协委员、畹町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同年，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40周年之际，德宏州侨办、侨联组织了原南洋华侨机工参观团赴首都参观游览，我也作为其中一员第一次来到首都。当我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遗容的时候，当我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漫步的时候，当我在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曾经蹂躏过这片大好河山，多少祖国的好儿女为了她的今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海外赤子、华夏子孙为她所做的微小贡献，党和祖国人民并没有忘记，在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我们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的抗战事迹。想不到，我们的业绩已载入了史册，名垂千古。在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泪水时常蒙住了我的双眼。

林晓昌 供稿

(1987年6月)

抗战时期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纪实

——南侨机工张智源回忆录

—

当日军大举入侵我国，华侨机工虽然身居海外，但皆怀有赤子之心。在南洋华侨救济祖国筹赈总会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3000多名分散在马来半岛、北婆罗洲、荷属东印群岛（现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华侨机工，毅然报名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纷纷云集新加坡，于1939年分为9批，先后由海路绕道仰光、西贡回到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昆明市。归国机工由当时的西南运输处安排在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然后分配到各个运输大队，投入抗日运输工作。从滇缅公路经贵州的毕节通往泸州的滇川路和滇黔公路，通过广西的河池、柳州桂林转入湖南的零陵至衡阳的公路上均有侨工流下的汗水。侨工们心揣赤子情，不畏严寒酷暑，不分昼夜地在崇山峻岭和陡壁悬崖之间的毛土公路上奔驰……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西南运输的“长官”们却对侨工的工作、生活漠不关心，相反还处处加以歧视（例如配给残破车辆；稍有怠慢，便施加辱骂，甚至强加罪名而关禁闭）。国民党当局的行径引起广大侨工的极大愤慨！侨工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南侨总会领袖陈嘉庚先生反映种种苦衷，并建议把归国侨工编为华侨运输队由侨工自己管理自己等。陈嘉庚先生得悉后，除直接向重庆当局提出意见和建议外，先后派刘牡丹（南侨总会交际委员）、林斌华等到昆明和各公路线探望侨工了解情况。

林斌华先生来昆的任务，除了代表陈嘉庚先生看望侨工和了解情况外，

更主要的是筹组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的工作。他代表南侨总会与重庆当局中侨委和西南运输处进行协商（当时中侨委派驻昆明的人物是侨委委员方之桢），经过多次协商和斗争，三方同意以归国侨工为主体组成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让侨工自己管理自己。

二

1940年3月间，我和张金炳二人同时接到运输人员训练所的通知（当时我们二人是西南运输处独立第一中队的服务员）：“即将成立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从各大队侨工中选拔一部份干部到训练所集中受训”。我于4月初携带通知至该所报到。从其他各队调来的侨工共有30多人，均编入军官队，受训的内容主要是讲解抗日运输工作的重要性等，此外就是学习操练，学立正、稍息、敬礼、还礼等一般性的几个动作，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就匆忙地结业了。当时任务紧急，南侨总会赠送的100辆福特牌卡车已运抵仰光，即将转运到腊戍。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力量接运上述车辆回国。

刘贝锦任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大队长，后调连文瀛为大队副，第一中队长吴福华、中队副蔡秀全，第二中队长黄守琛、中队副林熙庾；第三中队长□□□。大队部设车务三人（我任车务），总务组五人，技佐二人，出纳一人，此外有会计员二人，政训员二人。整个大队，从大队长到各中队长、分队长和大队部的干部，都是由运输人员训练所集训军官队学员担任的。而三个中队的180名驾驶员也都是从各个运输大队的侨工中选拔调来的。全大队200余人，除了大队部的会计、政训员和各队的炊事员外全部都是归国侨工。

1940年5月下旬，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全体人员由昆出发，直奔芒市驻地，安顿就绪后，遂于6月初旬，启程赴腊戍接运由南侨总会赠送的100辆卡车。这批卡车由仰光装火车经曼德勒运腊戍，每周只到达一两次，每次只运到10辆。我们接运的手续是逐辆检查验收后开赴仓库装货，再到英缅方海关办理过境凭证即运回祖国。

7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通知：“七月十八日下午六时封闭滇缅线，华侨运输先锋队留腊戍人员车辆必须在封闭前全部离境”。从接到通知时起，我们留腊戍全体侨工，废寝忘餐，全力以赴，抢修车辆，一辆接着一辆，装货、办过境手续，到18日下午6时前，全部离开腊戍。当时我已昏迷病倒在转运站

办公室里，经有关人员护送至医院治疗，住院十多天后，独自一人办理手续回到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部的驻地芒市坝大榕树左侧。本大队肩负着从畹町至保山的运输任务，特殊情况时也延伸至云南驿机场或昆明。

三

我于1940年7月由腊戍回祖国后，开始担起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队部的车务工作（我有两个得力助手：张金炳助理车务，曾腾光办事员）。在积极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们为全体来往过路车辆的侨工排忧解难，例如：为东、西行车的侨工填写运输凭证，协助领取行车津贴；对在本辖区内（龙陵至畹町）因故抛锚的车辆，代办申请救济车的手续，给予最快速的抢修；为需在芒市修车场停修的车辆及时拨货并办理进厂手续等，侨工都异口同声称赞：“侨工自己管自己就是好。”

1940年10月18日，英缅当局在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及苏美等国的反对下，经过中英会谈重开滇缅线交通。我大队又恢复了进入缅甸抢运物资的任务。滇缅交通线重开，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死不甘心的，从复运那天起，日军即派侦察机、轰炸机轰炸滇缅公路上的主要桥梁：惠通桥、功果桥、昌淦桥。我方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保证了公路的畅通。1941年2月，第二中队长黄守琛请准长假离去，该中队多数侨工要求调我接任，经大队部报上级批准，我即办理大队部的车务移交手续后赴龙陵接任。动手将三个分队的人员、车辆进行调整，对在途中抛锚和在厂停修的车辆采取相应措施，尽快修复，加强本中队的运力。我大队出勤均以分队为单位，自带炊事班，中队长、队副、分队长等虽然是带队员，但也是预备司机（途中有病员等则由他们补充为司机）。担负西段（龙陵畹町）运输任务的侨工要闯三关：第一关“疟疾关”（俗称打摆子），当时有个民谣：“要下芒市坝，先把婆娘嫁”。第二关是“险路关”，尽管东段的天子庙坡长近十里，惠通桥两岸崇山峻岭，盘旋曲折，嶙峋的峰巅令人生畏，但与龙陵至芒市之间的象滚塘、芒市至遮放的三台山的山峦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那蜿蜒而上的山路湿雾重重，稍不留意，便会滑进万丈深渊……现在回想起来，还胆颤心惊！第三关是“雨季关”，每逢雨季，山洪暴发，坍塌频发，路几乎被水冲跨。行车因滑轮而抛锚是常事，在泥泞而狭窄的路上行车，稍一不慎就有跌入峡谷、车毁人亡的危险，翻车而牺牲者时有所闻。1941年雨季期

间，我二中队第一分队由副队长林熙庾、班长罗开瑚等率队从遮放出发，行至芒市途中，路边上侧突然坍塌，当中一棵大树的主干不偏不歪地压在一辆车的驾驶室上，该车是先行的炊事班车，驾驶室内随车的炊事员二人受轻伤，一位侨工驾驶员壮烈牺牲。

四

1941年3月，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拼拼凑凑，又组成华侨第二大队（杂牌华侨大队）驻在遮放，参加国外段抢运。

同年11月，西南运输处被撤销，改组为中缅运输总局。后勤总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局长，亲临昆明坐阵，遂把昆明、下关、保山、遮放4个分处改为4个总站，当时遮放分处处长陈安润被任命为遮放总站的总管。同时，中缅运输总局下令将华侨运输先锋第一与华侨运输第二大队合并，改编为华侨运输第一大队，建立4个中队（原有3个中队增加1个补充中队）、其余侨工被送回昆明整训班。总局调走大队长刘贝锦，派詹忠浩（非归侨）接任，我任第二中队长，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至此解体。

改组后，遮放总管陈安润从遮放至保山沿途视察，途经龙陵站曾召见我，询问二中队车辆运输、运量、停修和侨工生活等情况，我如实作了详细的汇报，他感到满意，并面许我今后可以随时直接见他，随后中队部奉命迁至遮放。

1941年12月18日凌晨，日机偷袭珍珠港，美国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支援我国，进驻云南，但由于供应线遥远，能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1942年3月间，我中队接到紧急命令：“于当日下午调一个分队车辆，到畹町装飞机油，急运云南驿机场。”我随队出发，日夜赶程，至云南驿机场，恰好是深夜11时许，既无食堂，也无旅店。我们只能让随车炊事班煮白粥加盐巴充饥后，大家打开自带的铺盖，铺在汽车底下睡觉，天刚亮，即开车赴仓库卸货。侨工们在战胜重重困难后，完成了抗战物资的运输任务。

五

1942年2月，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逼近古城曼德勒，腊戍已处于岌

岌可危之际。4月初旬的一个中午，陈安润在遮放总站召见我，并命令我“在当天下午亲自带五辆车赶到叠允机场（今瑞丽县境内）装高射机枪子弹、医药、通讯器材运至腊戍，交中缅总局腊戍分处收。”当时，我的思想矛盾重重，既是艰难危险又是民族大义，终于受命。我即挑选2个分队长和5个驾驶员，他们均是驾、修兼优的侨工，由我率队，于当日下午四时许启程，沿畹、瑞路挺进，不久即抵目的地。经联系后我们在机场仓库装了物资，吃了晚餐，摸黑过南畹河桥，进入缅境木寨。为了安全过夜，我们在一个转弯角休息，天刚亮即开车前进，行不数里，即见缅军惶恐逃遁，老百姓也在混乱中逃难。行至腊戍郊区，又见我国远征军杜聿明部队的小坦克也纷纷后撤。

此时此景，同行的侨工，都劝我调头回程。我向他们晓以民族存亡大义，要求大家同心协力。我们冒着极大危险，小心翼翼向腊戍前进，终于在下午5时到达腊戍，在恐慌万状中交卸了物资，取得接收凭证，于兵慌马乱的街边吃了晚餐。我们本想在腊戍就地休息，等候天明启程回国。可是从当时的情景看，当晚腊戍是否保得住，已成了大问题，因此，我决定立即离开腊戍。过了桥行数公里找了个隐蔽点休息，是夜11时许听到剧烈的爆炸声，翌晨传来昨夜缅军炸了腊戍桥的消息，我们似惊弓之鸟，飞奔回遮放住地交差。

4月30日，腊戍沦陷；5月3日，日军侵入我国后门畹町；4日，连陷遮放、龙陵。

六

华侨大队全体人员车辆早在5月1日晚9时先行撤离遮放，连夜赶程比较顺利地经芒市到龙陵。从龙陵起，老百姓要求搭车逃难的不计其数，沿途人慌车乱，道路阻塞，车辆行行停停，到腊勐时，已是风声鹤唳的景况。卖食品的小摊子，被围得人山人海，人们为购得一点食物来充饥而争执。街边路上，车挤着车，结果汽车变成“气车”，无法行驶。经公路监理人员和群众代表临时组成交通维护队，进行动员、劝告后，道路勉强可以通行，但又有少数人不听指挥，抢道挤车，路又堵塞了，如此反复数次，费了一个多小时才通车。过了腊勐，我们才松了口气，但越接近惠通桥越乱，人人惶恐不安，无不期求先一步过桥。车至桥头，秩序大为好转。国民党宪兵第13团的

一个排，严阵维持秩序，只准一辆车顺序进入桥栏。过桥后从桥东至保山的路上，仍有因车辆抛锚而阻路的情况，但与桥西相比，使人感到稍为宽心，我们至保山城郊，见房屋倒塌，死尸遍地，这是日机野蛮轰炸的罪证。我们进入保山城不久，即传来敌军于5月4日占领遮放、龙陵的消息。腊勐危在旦夕。5月5日上午8时左右，俞飞鹏下令炸断惠通桥，在桥西仍有约500余辆汽车和大批物资。我方人员全部牺牲，损失惨重。

我们又接到紧急通知：“保山已成前沿阵地，全部车辆、人员立即启程，开赴下关待令”。在惶恐不安中我们急忙行车，抵下关，奉命驻在下关至大理公路旁边村子里的一个破庙里。当时下关市及近郊霍乱流行，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死亡达3000多人。仅我二中队受传染而死亡者就有3人。

在破庙度过了两个多月，我们利用待命时间，各班自由结合，修整车辆，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使从虎口抢出颠簸数百里行程的残旧车辆焕然一新。

1942年8月，滇缅公路主管部门三易其主，中缅运输总局撤销，改组成立滇缅运输局，随即下令华侨运输一大队的4个中队编入第16运输大队为补充中队，一切听从大队长杨纪龙的指挥，华侨运输先锋队第一大队至此不复存在。

七

华侨运输大队解散后，侨工再次陷入被歧视被压迫的境地。杨纪龙露出了狰狞面目，企图强令四个华侨中队就地移交车辆，人员就地遣散。我全体侨工闻之，义愤填膺，纷纷提出抗议说：车辆是我们历尽艰险抢运出来的，最近又不辞劳苦修整完好，准备继续为国效劳，绝不交车！家乡（闽粤）及南洋群岛均被日寇占领，我们已成了走投无路的孤儿，难道要我们去当汉奸吗？办不到！我们全体侨工团结一致，拒不交车。杨纪龙无计可施，只好赶赴昆明向主子告急救援。滇缅公路运输局局长葛沅（原任后勤总部参事，是俞飞鹏的亲信）、副局长陆振轩等三人，邀约我们4个中队长到下关饭店协商，经过几番交锋，最后达成协议：保证不就地遣散侨工，先发当月和过去扣发的工资，加发由下关至昆明旅费，然后交车，全体侨工调昆明受训整

编，听候另派工作。

八

全体侨工于9月初由下关抵昆后，滇缅公路运输局把我们编入“整训班”（设在东郊石塘山）。由于杨纪龙的密告，当局把我视为眼中钉，企图强行遣散我。我不服，和他们多次交涉，均无结果，后来经陈安润出面调解，当局才勉强派我为马龙站（山沟）副站长，派给两辆残旧的木炭车，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工作。我即挑选了两个好助手和三个技术优良的驾驶员（全是侨工），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完成了多年积压在鸡头村火车站的各种物资的运输任务后，立即主动请长假另谋生活。

侨工们进入整训班，实际是被赶入集中营，受尽了歧视和折磨。他们纷纷出走，到处流浪。

是年冬天严寒，有十多位老弱侨工在贫病交迫中冻死在昆明旧城墙边的地窖中。想当年侨工怀着满腔热血投奔祖国，参加抗日运输工作如今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令人思之万分悲痛。而国民党反动派是难辞其咎的。今天回顾起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仰望南天，愿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含笑九泉……

也许，由于年龄的缘故，以上史实的回忆，可能有疏漏，愿全国同胞，海外侨胞和幸存的同行们共鉴。

张云鹏 供稿

（1985年）

第三部分

南侨机工史料选



一、南侨机工大事记

(1937.7.7~2015)

1937年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8月13日 “八·一三淞沪抗战”。事变当天，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元电，翌日发出寒电，呼吁全世界华侨紧急行动起来，支援祖国抗战。

●8月15日 新加坡华侨召开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

●8月24日 云南省主席龙云赴南京参加国防高级军政人员紧急大会，从抗战时局发展的需要出发，首次提出即刻着手修筑滇缅公路的建议，为国民政府当局所采纳。

●10月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属准军事机构，在国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新加坡、仰光、河内、香港等地设有分处，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该处主任，后由宋子良接替（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大部分编入西南运输处从事抗战军事运输工作）。

●11月20日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称为陪都）。

●12月13日 南京沦陷。日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达一个多月，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消息传开，激起海外侨胞的极大民族义愤。

1938年

●元月 滇缅公路西段开始动工修筑。

注：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中国境内960公里，由畹町至腊戍186公里）。全线分东西两段，东段从昆明至下关，长412公里，原是中缅交通骡马古道（俗称“毛路”），1935年由云南省政府改为

公路；西段由下关经保山、芒市至畹町，仅有缅甸华侨梁金山1933年出资修建的惠通桥（吊桥）及一些毛路，此时应抗战急需而动工赶修公路，该段长548公里，仅8个月即竣工。

●8月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路段建成试通车，全长960公里。

●9月 由于日寇进攻广州，西南运输处由广州迁至昆明。

●10月10日 南洋各属45埠华侨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南洋八百万侨胞要“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作后盾。

●10月27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发来“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电报提案。尽管会议主席汪精卫“议长”饰词狡辩，但大会仍以大多数赞成而通过这一提案（惟将文字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名记者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评论说：“这寥寥的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

●1月10日 滇缅公路正式全线通车。

年初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同时还特派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专程南往新加坡向陈主席面商事宜。

●2月7日 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

●2月10日 新加坡机器行响应南侨总会号召，特发出通告：“窃思我星岛机工不少忠贞爱国之士，具此两项技能者，实繁有徒。际兹国族凌夷之日，正好男儿报国之时，况吾侪平时每感向往有心，请缨无路者，对此国际需才孔亟，当可联袂而起为国服务，共肩民族复兴之责，以尽国民之天职也。本行为此特行通告，凡是机工同业，具有司机或修机之技能，而愿为国际服务者，请来本行报名，以便进行也。机工乎，良机勿失，盍早来乎！”

●2月17日 陈嘉庚主席在怡和轩接见第一批回国服务机工（80人），并

发表演讲：

“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辛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而无愧。”

●2月18日（农历除夕），第一批南侨机工“八十先锋”由新加坡搭乘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启程回国。这批机工是由新加坡（32人，白清泉为领队）和峇株巴辖（48人，廖国雄为领队）两地机工合计80名组成，即由南侨总会统一组织遣送的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2月22日 陈嘉庚致函各埠筹赈会征募机工并随函附送《组织及其手续》及《登记表与介绍书》。

《司机回国服务之组织法及其手续》

甲、组织

一、每队以五十名为限（如不足队数可来星洲凑足之）。

二、队内举正副领队各一人，文书一人，财政一人，宣传一人，负责管理全队事务。

三、正副领队须具有相当学识及判断能力、服务精神者，方可领导全队为国努力。

四、队员训练须注重忠诚为国、肯牺牲、能耐劳、有恒心等精神教育。

乙、手续

一、每名队员须拍照像八张，两张贴于入队登记表（一表存于当地机关，一表交新加坡西南运输公司，转缴国际运输处），三张贴于护照，另三张用于华侨登记证（如已有华侨登记证者可免）。

二、各埠队员来星之前，（一）须先派人将名单登记表及护照应用之照片等，先于五日内来星办理；（二）并于事先十日内通知总会，以便向中国旅行社接洽船期。

三、回国航线概由安南河内登岸再转祖国，旅费以散舱票及火车输送，约费叻币五十五元，另队员每名给予需用五元，制服一套，雨衣一套，御寒卫生衣一领，牙刷、嗽口杯、毛毯、面巾各一件，约合叻币计八十元左右

(由内地来星火车费概不计在内)。

丙、本队之简则

一、须具有熟练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者。

二、须体魄健全略识中国文字。

三、须热诚爱国具有牺牲精神者。

四、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

五、无不良嗜好如烟酒等类。

六、须有相当店铺代为介绍。

七、每埠暂以□□名为限。

八、旅费悉由各埠机关负责供应。

●3月13日 第二批南侨机工207人搭乘丰祥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钟运熙为总领队。

●3月27日 第三批南侨机工594人搭乘丰平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刘贝锦为总领队。

●4月5日 由于接到昆明西南运输处来电，第四批部分机工决定经仰光入滇，以便他们到缅北筹设机厂及在仰光装新车。由仰光登岸的机工（首批）一行于5日由新加坡搭乘丰祥轮启程，黄锦坤为总领队。

●4月10日 第四批经安南入滇的机工一行由新加坡搭乘丰祥轮启程，连文瀛为总领队。

●5月22日 第五批南侨机工535人由新加坡搭乘丰祥轮启程，钟椿祥（五峰）为总领队。

●6月19日 第六批南侨机工124人由新加坡搭乘丰祥轮启程，经安南入滇，叶子英为总领队。

●7月3日 第七批南侨机工117人由新加坡搭乘丰祥轮启程，经安南入滇，廖萍为总领队。

●7月16日 第八批南侨机工335人由新加坡搭乘丰祥轮启程，黄景镇为总领队。

●8月9日 陈嘉庚主席派出南侨总会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回国视察机工生活并考察滇缅公路与运输情况。随行的还有《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张楚琨与陈戈丁。

●8月14日 第九批南侨机工507人由新加坡搭乘丰祥轮启程回国。

●10-12月 一批南侨机工参加南宁战役、昆仑关战役的火线军运工作。

●12月 南侨总会为改善南侨机工生活待遇，购置了蚊帐、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奎宁等慰问品，平均每个机工可得九件，于12月底备齐送至昆明。据了解，部分南侨机工未能如数领到或领不到应得的慰问品。

1940年

●2月1日 “华侨机工互助社”在昆明成立，直属西南运输处，社长由宋子良兼任。

●3月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并两次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

●3月 西南运输处组织“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该大队人员200多名，除了大队部的会计、政训员和各队的炊事员外，全部是南侨机工，刘贝锦（麻坡华侨）任大队长。

●4月12日 下午9时许，遮放军火仓库发生强烈大爆炸。其时，经南侨机工从滇缅公路抢运的军火物资已积存日多，仓库暴满，4月初又遇交通部运来筑路用的烈性炸药数百吨堆放在露天，突于是日发生爆炸，守库员工和附近居民被炸死伤者为数众多，损失惨重。

●4月26日 南侨机工代表张达等三十人前往慰劳八路军负伤将士，并在《新华日报》公布发表华侨机工《慰问八路军负伤将士》的慰问信。

●7月16日 “华侨运输先锋第二大队”正式成立，詹忠浩任大队长，连文瀛（莆田籍南侨机工）任副大队长。

●7月18日 英国执行绥靖政策，在东京签订英、日协定，关闭了滇缅公路的缅甸段通道。

●10月18日 滇缅公路关闭三个月（1940.7.18—10.18）之后，重新开放。

●10月 日寇侵占安南之后，专门组成“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以河内机场为基地，重点轰炸滇缅公路。据不完全统计，自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1940.10.18），至日军入侵缅甸前，日机共出动60批639架次，还有29批架数不详，对云南各交通要道进行狂轰滥炸。仅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惠

通桥和功果桥，就各遭炸坏20次以上。

●11月底至12月初 陈嘉庚在结束“南侨慰劳团”考察工作后，不顾劳累，亲自再沿着滇缅公路进行视察并慰劳南侨机工。同行的有李铁民、庄明理以及交通部的二位工程师。陈嘉庚对改善滇缅公路军事运输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

●12月中旬 陈嘉庚视察滇缅公路后到达仰光，任命庄明理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的代表，交涉实施滇缅公路等事宜。

1941年

●1月 “皖南事变”发生，在国内外引起强大反响，各地华侨掀起了反对分裂摩擦运动。

●2月5日 国民参政员陈嘉庚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全体参政员并转国民党中央，痛陈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恳切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

●3月 南侨总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嘉庚再次被选为主席，庄西言、杨启泰为副主席。大会特发出包括改善管理滇缅公路在内等九项通电。

●11月 西南运输处被撤销，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中缅运输总局”（简称“中缅运输总局”），由军委会后勤总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局长。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致电林森、蒋介石请迅即对日正式宣战，以示与英、美、澳及其他同盟国共同对敌。

1942年

●1月14日 中国国民政府令第5军入缅支援英缅军作战。从此时起，由第5、第6、第66军共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陆续进入缅甸对日军作战。南侨机工奉派运送远征军入缅。

●2月 新加坡沦陷，陈嘉庚辗转避难于印尼玛琅等地，前后长达三年多（1942.2—1945.10）。在避难期间，陈嘉庚冒着日寇搜捕的危险，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以惊人的记忆力，写出30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

●3月8日 日军占领仰光。

●4月30日 滇缅公路缅甸境内段终点站腊戍沦陷。

●5月3日 日寇攻入云南国门畹町，并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

●5月5日中午 日寇沿滇缅公路攻至怒江咽喉——惠通桥。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毁惠通桥，将日军阻止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断绝了。

●8月 盟军在昆明招收第一批南侨机工50人，赴印度机场从事军事运输工作，李卫民任领队。

●12月15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救济回国华侨机工》，陈述华侨机工失业流浪的悲惨处境，要求政府救济机关及赈济团体，应该认真地使归国侨胞各得其所，万万不能敷衍了事，推诿延迟。

1943年

●年初 又一批南侨机工（200人）奉盟军派遣，参加远征军赴印度从事抗日军事运输工作。

●5月 中英两国政府商定组成敌后工作队，由林谋盛、庄惠泉负责，隶属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所统辖的一三六部队，在马来亚日占区从事地下抗敌工作。部分南侨机工参加一三六部队。后林谋盛在马来亚被日寇逮捕，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944年

●1月20日 “云南华侨互助会”假昆明福建会馆举行成立大会，推举侯西反为理事长，理事会下设总务、文书、救济、交际、教育、设计、调查、编辑等八个组。该华侨互助会着重于收容失业南侨机工及救济难民等。经侯西反呼吁，得到有关单位和人士同情，拨款50万元救济难侨。

●2月 贵州交通公路总局运输人员训练所设立“华侨机工整训班”，收容华侨机工110余人。维持至年底，该训练班被撤销。

●4月 盟军总部从南侨机工中选调部分精干人员，派遣潜往东南亚日敌占区从事地下抗日情报工作。南侨机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新贡献。

●11月10日 南侨总会常委，云南华侨互助会理事长侯西反，为救济南侨机工事，由渝飞滇，不幸在昆明市东郊九门里坠机罹难。

1945年

●1月4日 我军攻克畹町，收复滇西失地，打通滇缅公路。

●1月27日 滇西中国军队攻克芒友，与缅北的中国远征军会师，中断两年多的中缅公路恢复贯通。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亲身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与国内各地民众一起欢庆胜利，狂欢达旦。

●9~10月 抗战刚一结束，为南侨机工复员事，庄明理曾向政府当局提出八项要求：1、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2、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3、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4、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5、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6、发给南返机工服装；7、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可作为奖励，另一方面可作为南返生活费；8、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该提议经侨务部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后方勤务部等举行联席会议，即席通过。但迟迟未能得到落实解决。

●10月~11月 10月6日，陈嘉庚结束避难生涯（1942.2~1945.10），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各界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赠送条幅，赞扬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6年

●1~2月 南侨机工进行复员名册总登记，计登记1203人，而后来获准遣返、享有奖金及服务证书的实为1114人。

●3月 华侨互助会特派常务理事白清泉、总干事邱新民携带总登记后的华侨机工名册前往重庆交涉办理复员事宜。

●5月 华侨互助会派了白清泉、邱新民、袁阿喜、龙历文等“四机工”代表前往新加坡交涉办理复员之事。

●6月初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雪兰莪福建会馆举行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初步联席会议，商议机工复员之事。

●6月16日 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假吉隆坡福建会馆召开，陈嘉庚任会议主席。会议作出5条议决，协助解决机工南返。

●6月19日 陈嘉庚、庄明理、陈可用、蔡伯祥与何炽祥等5位代表会见了伍伯胜总领事，提出机工南返的三点具体办法，伍总领事当场表示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现。

●8月30日 陈嘉庚再次致函伍伯胜，指出“倘国内政府未能急切遣送，或至遣送徒成具文，应请阁下代表侨民回国交涉”。

●10月 经过多方交涉，特别是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和云南华侨互助会的努力，战后拖延了一年多的南侨机工复员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云南省华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每人200元美金，分别在重庆侨委会办事处、昆明侨务处及贵阳侨委会登记站分发。

●10~11月 南侨机工胜利复员南返。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以昆明为“大本营”，抗战胜利后机工复员也是轰动昆明的大事，云南各界举行热烈的欢送大会，并向全体机工赠送了“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会后，第一批复员机工219人，眷属202人（共421人）由昆明西站出发。接着，第二批机工74人，眷属85人和第三批机工177人、眷属129人，分别于11月15日和11月29日启程。机工南返，既有整批的，亦有零散的，据不完全统计，陆续有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属）几经辗转返回南洋，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至此，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这一壮举，总算有始有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华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 *

●1955年11月 陈嘉庚在庄明理、张楚琨等陪同下，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南侨机工。看到留居西南的南侨机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已安居乐业，陈嘉庚甚感欣慰。

●1986年9月3日 “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服务机工云南联谊会”在昆明成立，推选杨保华、王亚六为正、副理事长，邓文聪为秘书长。

●同年11月4—14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嘉庚之侄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考察团，在全国侨联、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陪同下，赴滇缅

公路访问南侨机工。在此期间，陈共存、庄明理与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等商议在昆明建立“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事宜。

●1989年7月7日 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纪念之际，为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在海内外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人民政府特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建立起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赤子功勋”，这是对南侨机工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历史评价与高度赞誉。

8月 全国侨联给予每一位健在的南侨机工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章。

●2001年7月 中国侨联将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定为“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后，国务院侨办对健在的南侨机工定期发放生活补贴，数额不断增加。

●2005年 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云南德宏州人民政府在滇缅公路中国段之终点——畹町建立“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南侨机工后代，恒昌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为继承发扬父亲的爱国精神，捐资三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兴建此纪念碑，以表心志。碑上题词：华之魂、侨之光。

●2007年8月 以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何添发为组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张伟超，中国侨联副主席、党组书记林明江为副组长率领的全国政协侨联界委员赴云南省考察，对南侨机工遗孀生活困难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以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侨联名义向中办、国办反映。

●2008年3月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南侨机工后代、侨联界委员林晓昌作为第一提案人，林明江等20多位侨联界委员联名提出解决南侨机工遗孀生活困难问题的提案。

●8月21日 国务院侨办下发了《关于对生活困难的南侨机工遗孀给予专项补助的通知》，切实解决此实际问题。

●2009年12月 为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70周年，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成立暨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精神研讨会在云南畹町召开。

●2013年1月18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修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纪念雕像在海口落成。

●2015年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

二、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服务机工名册

〔作者按：本名册系在《云南省志·侨务志》（1992年版）附录南侨机工花名册的基础上，笔者特地到云南省档案馆复印机工档案名单，逐一核实，恢复了按原始档案的机工名单顺序排列，并对《侨务志》中机工名册的若干错漏（上百处）作了补正。各批机工档案名单之后所附的带队任职职务，是根据当时《南洋商报》公布的名单。本名册可说是迄今为止综合海内外最完整的南侨机工名册，但仍难免有缺漏，望知情者提供资料，以便补充。〕

关于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人数，据《星洲十年》一书所刊录，1939年共分九批回国，总数达3192名，这个数字是历来被普遍接受的，兹将统计数字列表如下：

表-1 1939年马来亚回国机工一览表

一、由马来亚经越南回国者

类别	派回日期	人数
第一批	2月18日〔按：档案记载，廖国雄、白清泉为“八十先锋”领队〕	80
第二批	3月13日〔按：档案记载，钟运熙为总领队〕	207
第三批	3月27日〔按：档案记载，刘贝锦为总领队〕	594
第四批	4月10日〔按：档案记载，连文瀛为总领队〕	158
第五批	5月23日〔按：档案记载日期为5月22日，钟椿祥为总领队〕	530
第六批	6月30日〔按：档案记载日期为6月19日，叶子英为总领队〕	124
第七批	7月19日〔按：档案记载日期为7月3日，廖萍为总领队〕	118
第八批	7月31日〔按：档案记载日期为7月17日，黄景镇为总领队〕	336
第九批	8月14日〔按：档案记载第九批机工为507人，但名单缺〕	507
小计		2654

二、由马来亚经仰光回国者

类别	派回日期	人数
第一批	4月5日[按：档案记载，黄锦坤为总领队]	344
第二批	7月28日	87
第三批	8月9日	62
第四批	8月25日	34
第五批	9月22日	3
第六批	《星洲十年》原载日期不详[按：档案记载日期为4月21日，曾火舜为领队]	8
小计		538
总计		3192

[作者按：1938年前后，南洋各埠筹赈会、行会组织回国的服务团，这里只列四批。其中三批名称是根据当时南洋报纸公布的名单，一批是根据一些在昆机工回忆提供的名单，资料不全，亦望知情者提供资料，以便补充。]

表-2 1938年前后南洋名埠组织回国的服务团一览表

名称	批 次	起程日期	人 数
士乃回国服务团	第一批	1938年9月26日	12
	第二批	1939年2月13日	15
	小 计	27	
槟城机器行回国 服务技艺工程队	一 批	[按：档案记载，该队于1939年2月20日由槟城起程，2月26日经香港乘法邮船利奥士赴海防转滇，3月31日抵滇编入西南运输处，梁煜棠任领队]	32
其他渠道回国者	——	——	8
总 计			67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名册

第一批机工名单

廖国雄 刘谭福 陈梦秋 叶基福 余晚元 周学双 黄运生 赖玉光
 吴 漳 叶修青 王川十 林宝治 何再添 赵文龙 陈瑞坤 许万卦
 庄 盛 叶亚味 钟天保 陈金榜 陈善全 徐元镗 陈文华 李亚卦

丘左发	丘九泉	熊志良	冯亚发	程瑞芬	陈两兴	谢日光	符明德
刘仲芬	郑世强	黄丁富	黄义忠	叶运清	刘进茂	吴亚兴	黄金钟
郑广泉	林明月	胡来双	蔡秀全	廖友朋	郑文珍	林亚霖	张君胜
董紫金	程亚梅	杨天赐	苏亚芳	王作仔	蔡亚昌	蔡沙添	林成宝
刘亚双	陈天赐	傅瑞生	黄清成	徐钟佛	林庆龙	林亚同	柯鸿宾
白清泉	郑经潘	黄祖于	郭地进	黄九水	蔡亚蚶	何洋海	陈福财
余番仔	林少衡	洪传咸	陈致训	谭长和	吴荣善	张少山	李天成

附 录:

峇株巴轄机工团

团 长 (正) 廖国雄 (副) 刘谭福

秘 书 陈梦秋

财 政 叶基福

干 事 余晚元 周学双 黄运生

新加坡机工队

队 长 (正) 白清泉 (副) 傅瑞生

财 政 (正) 李天成 (副) 陈福财

文 书 林庆龙

宣 传 郭地进

干 事 洪传咸 陈致训 郑经潘 董紫金 程显梅

第二批机工名单

蔡仁德	苏圻来	蒋水狮	陈金生	梁琼珊	陈光明	王亚峇	李世容
温谭佑	梁定湖	陈汉成	翁玉书	刘亚济	钟来发	江天成	朱传英
郑明德	卓高隆	洪通兴	陈 鲜	莫泰奎	张子清	李珍荣	王锦来
岑天佑	李 林	李成继	王有福	黄广源	邓玉成	阮奕利	王金福
胡寿鸿	任青松	林汉初	何锦培	龚亚才	郑林康	陈 享	王日苑
林鸿经	林明位	庞道光	郭远揖	林家积	符和瑋	方是雄	刘衍富
陈中印	方亚兴	钱亚九	吴墨河	李金发	林光英	关玉麟	陈亚九
黄九清	许志光	张 球	许源达	赵绍麟	胡德华	林裕泉	朱国清
吴寿亭	吕昌锦	李畴荣	郑亚清	关曾三	邓 炳	龙德儒	陈闻叶

郭亚德	施清泉	陈 恩	吕福来	陈嘉森	吴乾深	韩廷光	王蕓安
符祖桂	吴乾进	伍文吉	郑馨云	黄守琛	许家烈	谢超然	詹开平
符瀛桥	王文松	张家雄	陈生智	韩利丰	王蕓宣	林家发	陈昭藻
吴家玉	王兴吉	符鸿兴	沈代成	何启凤	黄有益	林明珍	韩耀丰
邓震峰	叶亚邦	郭越福	曾天生	詹亚兴	王业宣	陈家万	陈天成
杨玉兴	甘锦寿	叶湛恩	王锦发	林汉兴	王福源	周 旺	邝庚沛

以上星洲队计120名

姚裕禄	曾清标	陈宋儒	黄春才	钟金水	陈天赐	吴新雷	吴来廷
沈维国	钟运熙	胡作史	郑亲敬	黄九英	邹 康	林清金	王家旭
李金凤	郑金玉	黄体铁	尤垂美	杨亚坤	胡仕宁	莫泽春	陈云基

以上麻坡队计24名

黄仔闽	陈学忠	邓培根	卓志明	陈焕章	温其芳	王禄昌	李贞才
孙棠文	黎家明	肖盘寿	阮照伟	李庭玉	李大勋	陈锦元	李 成
肖仕元	李大林	廖达生	罗运桂				

以上柔佛队计20名

江金瑞	陈耀驹	王东进	陈 安	叶 检	沈护权	陈章霞	李 儒
钟 贵	刘亚才						

以上彭亨队计10名

杨海清	刘万渊	胡万豪	陈成基	廖英豪	王朝阳	黎庆仪	戴亚九
吴亚吉	陈开德						

以上马六甲队计10名

林茂盛	张 明	林炳南	柯生贵	江马兴	黄世苏	廖国才	陈 金
柯德守	赖 牛	张亚美	蔡尤雄	蔡世监	罗亚明	黄钟湖	黎安和
邱水发	李光荣						

以上太平队计18名

谢耀南 何纪良

以上吉宁丹2名

谢云辉

以上邦加文岛1名

另补柔佛1名符福南，补太平1名马亚森（巫人）

总合计207名

附录:

领 队 (正) 钟运熙 (副) 许志光 何纪良
财 政 (正) 李光荣 (副) 张 球 温其芳
文 书 (正) 甘锦秀 (寿) (副) 陈中印 谢耀南
宣 传 (正) 沈代成 (副) 林茂盛 黄广源
总 务 (正) 陈开德 (副) 王文松 江金福

第三批机工名单

林清炎	陈进新	郭 业	林思作	梁 枝	谢 容	叶观胜	刘顺廷
林 顺	刘伯光	卢炳护	陆汉初	李 金	张 财	林有才	杜启长
丘汉良	梁观平	黄凌友	罗 连	卢颂楷	曾杰南	蔡长安	古孟兴
周瑞意	陈介文	张子霖	廖锦泰	徐天仁	邓 祺	冯 渠	林东珠
陈全题	刘玉麟	潘光荣	郭 利	林 坤	李松进	黄 祯	容子权
王振华	梁国照	林锦成	杨 基	钟金树	曾官贵	何 国	谭金源
张炳旺	梁 林	蔡慧华	肖水康	钟 兰	李兴旺	杨 新	李 炳
林政朝	杜银来	张永成	徐长政	刁天保	李吉梅	黄广源	刘伯全
周金水	倪枝祥	张胡王	胡全芳	曾炳才	姚祯全	许永吉	辜鸿铭
袁颂明	陈 顺	郭远鉴	钟 明	冯炳权	黄志强	陆 炜	邹 杜
汤伟志	黄仁敦	林逢荣	方文标	张 森	李 九	邓叶永	王 润
梁 珠	杨 全	潘 益	吴宗万	冯 庚	陈成意	陈 贤	郑锦荣
李新安	陈齐开	黄 和	曾树腾	郑源水	方金树	林荣传	王永炳
刘 伙	周 金	柯耀宗	杨传宏	蔡光明	林守五	俞 卦	黄进德
潘德清	季德来	任作成	黄 来	范福森	卢鸿运	郑 声	曾添丁
甄文烈	刘 满	姚成德	彭对茂	杨金水	吴以泰	陈连当	齐兆昇
陈春香	黄 宗	许春宝	马焕寿	颖成声	黄冰心	黄春式	陈芳业
陈文全	周阿钜	林德全	庞杜唐	黄其典	章侍基	邱亚容	谢 祥
黄 生	陈水木	曾山安	黄天祥	李亚九	黄金水	陈志怀	黄少卿
陈荪才	林友雄	王明新	黄敦禄	刘诚忠	王明歧	苏金火	李乌狗
蒙亚进	洪华民	叶 亚	戴新菊	李运晓	方九十	刘金御	翁诗贵
陈瑞霖	郑正友	王水云	吴河州	林亚池	郑心奕	刘南山	严芳明

洪传珠	叶建德	林兴州	刘 才	黄 旺	李顺安	高 兴	郑金榜
刘 才	杨育昌	陈金榜	苏 蓼	陈家干	蔡亚喜	李源铜	洪慎思
林国才	黄重水	林成文	陈升雄	颜金推	方连烟	黄 林	韩书丰
黄桂林	邓东仔	叶禄基	梁华照	陈承奇	邢诒发	符大文	黄石克
符世林	苏锦标	李成益	吴玩成	鲍明发	许礼丰	林鸿裕	许世河
黄亚康	龚 勋	房帝光	余子明	林珍松	张真光	郭坤龙	陈金水
张海安	林茂成	王禄凤	林亚田	朱章万	陈清培	林亚刘	李流水
黄文和	林金针	丘照发	颜金钗	陈亚霖	卢景光	陈宋清	邢诒青
曾源成	陈亚钟	杨亚福	陈杰松	黄玉琨	龙道文	吴狗治	余鸿宝
杜振波	戴玉明	林昌基	洪德芬	张荣生	李亚洙	颜亚财	杨九云
孙耀明	黄九黎	黄良正	辜文德	蔡鸿发	张金琨	姚金成	王亚六
施天生	陈荣耀	唐昇培	翁金鑽	黄启福	陈亚俄	林积生	彭亚根
郭春田	陈伯万	王金牙	王清渊	吴 九	康文凤	吴英雄	沈吉龙
郑流芳	林春法	林文贵	吴振兴	谢财寿	刘青山	卢凤飞	陈亚生
黄清潘	薛亚尊	刘敦仁	陈阳明	钟亚沛	何瑞明	方诗水	朱金来
周开定	蔡德水	钟金成	温炳新	林汉光	黄亚添	陈成沅	李家敦
杨炳茂	戴银水	龙历文	詹汉英	余亚水	韩相丰	吴水晶	张天赐
黄锦洲	叶狮狗	陈素磺	严宗钦	陈文水	钟亚笼	郑有三	黄铭隆
颜文焕	庄耿波	赵若瑟	王成沧	刘坤泉	肖灿文	邱河荣	吴锡兴
吕 福	杨金清	林英豪	陈坤和	田煌荣	林已茂	陈 根	黄凤舞
何镪显	林亚簪	林上梯	张福根	陈剑如	陈回文	许成瑞	严亚甘
李泰锋	陈发泉	林进兴	冼亚汉	黄润才	邓潮昌	苏联贵	李添福
林大琛	李 算	李兴培	李新容	杨亚池	孔繁犹	陈庆裕	王称金
林飞鸿	陈彭芳	张 达	黄和安	徐元斌	黎 胜	吴再春	徐 堤
黄明安	关正锦	黄根奎	陈猪仔	朱亚标	林志华	黎 荣	钟 应
陆义德	黄锡平	吕荣吉	陈志勇	张 烈	颜金猜	陈家清	梁汝梅
卢从贵	刘 开	郑兴燮	何 有	贝进福	黄 水	王细九	周 才
梁 祺	谢 梅	庞登财	钟振辉	梁耀基	罗 生	李 宽	何世英
陈有民	陈 泗	伍 牛	许观庆	陈福安	张 牛	符廷海	刁福光
徐顺浩	黄 清	陈治楷	蓝赞祥	郭玉蕊	李增喜	蓝州举	吴金兴
梁 苏	张寿松	詹行嶷	管凤祥	邓木荣	符治修	李创增	符正禄

陈水心	林志民	李 泰	郑兆权	叶仕球	彭家庆	谭趣生	钟伟兰
赖应发	邓美良	邱开泽	唐隆生	黄吉旺	何锐祥	戴金水	郭喜民
冯昌林	杨继森	梁 顺	符修锦	方玉明	侯天送	陈飞龙	黄抱德
鲍瑞林	曾泽安	冯贤生	黄水清	章华生	李亚狗	周彩庭	王德森
李耀文	黄日安	赖帮辉	钟均祥	赖昌元	范木兴	陈 琼	郑伯仲
林 椿	卢礼泉	云昌桂	颜赐进	刘贝锦	周 保	谢愈千	李为梁
张 福	林成兴	黄应龙	郑多光	王亚能	吕乌栋	吴天华	麦志瑞
刘 全	陈让如	刘金福	雷亚佳	陈心仕	林熙庚	曹信其	肖炎章
潘 岳	林国龙	莫 才	颜章约	谢之炜	卓瑞芳	林贵奇	黄直飞
黄金宽	林亚山	李志祥	钟 烈	陈连安	叶泉汉	张恩华	陈茂林
伍兴华	谭 礼	丁 发	林长寿	严德松	郑继盛	周金生	林 钦
邱 佃	刘德舜	何师美	陈兴队	黄 挺	郭亚苏	卓云南	容 裕
黄鉴如	吴美洲	龙学先	郑细汉	陈泉来	高 九	黄福和	黄 明
吴多柳	李 华	黄 来	林光辉	陈亚峇	黄 鹏	柯德福	苏福星
陈源水	蔡德航	林经光	梁居珍	李亚林	林生福	钟启良	朱伯昌
林德才	黄 贵	黄亚山	曾文振	黄谭生	郭峇财	符福锦	陈定来
谢广敬	黄世福	董建华	吴清源	叶礼迁	马瑞麟	林永南	蔡大头
黄亚仔	赵木松	徐启华	郑大成	何亚荣	冯茂树	叶新彩	廖亚来
陈大名	骆金良	邱振通	游仁家	黄文瑞	谢有才	赖锦堂	周剑青
骆万寿	林柏祥	温仁和	郑发才	陈郁星	陈炳亮	莫琼福	王亚能
黄冰心	黄春武						

附录：

总领队	(正) 刘贝锦	(副) 许成瑞	袁颂明
财 政	(正) 林清炎	(副) 徐顺浩	翁诗贵
文 书	(正) 林上梯	(副) 林顺安	钟伟兰
总 务	(正) 王成沧	(副) 黄直飞	叶新彩
宣 传	(正) 姚禎全	(副) 陈素磺	洪华民
干 事	黄抱德	钟贵禄	张天赐
	黄金宽	林经光	张 福
	杜思作	李运晓	章士基
			龙历文
			严宗钦
			陈剑如
			王细九
			谢 梅
			郑 声

第四批机工名单

由安南入口机工

梅百明	王藩生	洪亚兴	吕亚狮	黄 富	陈亚山	陈开全	蓝保源
吴子庙	黄茂华	黄永伟	黄会卿	张清河	谭佐元	黄玉田	陆劳有
简亚苏	高成基	刘耀华	劳荣耀	何期卿	莫长培	蔡春芳	彭和尚
林天成	江清福	吕金狮	黄亚通	梁瑞春	陈德祥	连文瀛	刘必成
陈庆余	李亚松	龚清华	黄金定	黄则泉	王亚文	符文珊	蔡和春
卢 钦	陈德保	薛勇地	陈 吉	蔡乌春	郭润才	陈家佩	邓炽棠
胡 陆	黄亚仔	郑光昌	陈玉湖	林容长	李 成	陈耀辉	陈亚赞
方亚九	陈治生	陈炳春	黄回裕	吴恒堂	洪意德	叶清渊	黄流水
林庆同	王嘉春	陈金顺	陈清霖	沈亚柯	林金铨	何亚佛	王志成
何贤德	王振益	吴玉清	庄宗祥	洪福泰	黄文发	关 祥	易金海
张炳坤	陈瑞堆	陈福全	招永饶	梅国雄	黄世铨	丘桂生	张善宜
杨汉生	戴水生	刘传授	李尉五	黄壬贵	黄炎宋	金振和	孙来春
李明山	巫添祥	杨炳明	王大民	符气簪	龙学章	郑 辉	王家富
林 於	吴金昌	黄衍长	吴武政	符和明	王辉源	黎科泰	刘其青
郑 威	魏 苏	陈玉莲	朱远祥	殷华生	植卓奎	陆文富	邓 义
赖为学	辛木坤	黄谷养	陈景岳	王晋育	戴金宝	吴亚佛	郭开美
金全福	林明川	龙历蕴	郑金福	林鸿英	李正扬	符 万	符国璧
黄昌轩	林英保	吴积梧	潘先英	孙文琳	吴应民	蔡华露	符祥琼
赖耀清	曾金祥	黄春荣	杨年旺	张廷森	李 三	叶友来	古来兴
郑庭椿	符亚盛	林兴健	李 鸯				

附录：

总领队连文瀛

总 务 （正）洪福泰 （副）黄茂华

文 书 （正）陈德祥 （副）蓝保源

宣 传 （正）陈金顺 （副）梅国雄

干 事 郭开美 李 三 黎科泰 魏振明 赖耀清 符国璧

第一队队长 （正）刘传授 （副）王藩生

第二队队长（正）黄玉田（副）陈赞

第三队队长（正）符气簪（副）陈景岳

由仰光入口机工

司机

（一）吉礁

陈红虾	杨宝华	符气文	王家才	徐德	陈赞成	林记亮	伍玉春
郑基	黄礼由	黄君谅	林振成	许文银	叶成业	陈亚德	杨境南
杨美美	许文西	杨再兴	王运东	谢文荣	谢福荣	沈斐文	游九
陈三仟	顾生	洪金发	黎良	蕉谷	陈九佛	李天云	

（二）雪兰莪

李锦兴	甘谭胜	何金泉	李柏	钟的才	黄乐转	梁恒喜	林观元
吴家庭	刘仕乾	张群芳	刘福	陈永德	庄恭	冯顺昌	蔡耀南
谭耀森	肖耀南	李生	陈继明	邱勇华	杨世昌	贝友胜	黄生
叶福如	李仁	罗仪	廖在发	柯玉彬	张才	杨式佛	戴鏢奎
林亚材	陈荣	傅木生					

（三）霹雳

张华	侯炳新	刘成	纪亚坤	杨朗贤	彭最年	郭伟泉	陈裕福
陈金水	陈世鲁	伍耀	卢亚钧	郑世雨	张敬流	叶依歹	黄汝益
罗梦贤	卢荣新	张观生	陈发新	江生	陈南风	吴来福	吴亚扁
彭海	钟亚生	余金	冯森	郭木贵	冯仁	林国兴	陈杰
李观裕	黄天惠	曾瑞彝	卢芬	彭海	万钟荣	李烈	

（四）新加坡

梁仕新	黄锦波	卢润强	谭云彪	陈振辉	陈布		
-----	-----	-----	-----	-----	----	--	--

（五）檳城

颜振德	苏水腾	许其章	饶友谅	傅祥发	邢汉清	林瑞傅	黄忠成
黄吓才	柯荣发	林荣顺	邱明通	陈创孙	杨峇棋	黄三伯	黄福喜
高起南	林德和	林鸿儒	洪文星	陈炎	施君辉	吴其生	林犹汉
郭吉良	王裕祥	胡培	曾庆发	刘亚九	陈普元	陈友添	叶承基
吴兆发	陈福生	王典	陈成美	周义彪	许万顺	陈添赐	余亚三

陈英凤 张顺源 黄享炳 陈中兴 林森裕 刘亚福 王炳煌 黄金成
陈伙祥 施进宝 林水银 曾金水 林进珠 梁于南 潘 容 蔡亚九
林宗木 杨森基 谢峇福 林来发 林宝顺 蔡 达 罗玉才 陈来成
邱建和 黄有祥 邱亚妹 洪源贵 刘真端 洪金忤 罗 祥 余成宗
林 玉 林亚福 刘顺发 苏亚明 张协记 何金成 苏得时

(六) 荷属

蓝亚尧 吴耀辉 黄锦元 曾火舜 黄添荣 詹云珍 罗荣清

(七) 仰光

吴焕炽 (当地考取)

机工

(一) 吉礁

周隆厚 洗梦斌

(二) 雪兰莪

刘剑良 符家鹳 (电器) 张起汉 雷伯辉 (电器) 黄 培 杨志明
谭 志

(三) 霹雳

朱民盛 梁玉珊 关如萱 钟伯海 潭耀良 冯国佑 梁伯添 郑国材
谭富民

(四) 新加坡

赵 明 (电器) 胡锦芳 陈良荪 陆余熙 陈衍江 许亚露 方祖泽
潘植发 梁伟君 吴添福 赵炯霖 冯福胜 叶亚牛 曾满国 岑顺昌
江亚权 陈 培 郭成珠 徐仕麟 麦 荣 邓荣基 (电器) 莫庆朋
余 梓 黄昌运 王仁忠 李异良 袁文熙 符亚兴 冯增耀
温庆先 (电器) 许亚谋 (修胶) 温南勋 温荣庆 钱忠天 罗积猷
邓镜泉 郭六成 (电器) 李新文 郭南平 林天锡 邓赛伦

(五) 檳城

林亚苏 陈业龙 (电器) 李接祥 (无线电)

驾修两能者

(一) 吉礁

李卫民 郭荣林 陈成添 梁安国 曾祥奉 林英侨 古 权

(二) 雪兰莪

陈亚培 庞业煌 郑 昌 何润荣 李 云 唐达文 罗铭伟 叶 青
朱福寿 范云美 严福星 利汉平 陈 基 钟保运 区子雪 杨思洪
张松恩 何国安

(三) 霹雳

林孝凑 叶 九 吕金富 廖三福 潘春秋 翟绍武 许文福 黎承宗
登 钦 吴 富 廖 娇

(四) 新加坡

刘树培 伍 林 温亚强 陈时群 姚炳全 陈锦泉 林永合 邝 标
何锦成

(五) 檳城

林鸿钧 骆金基 董天送 杨清德 陈丰顺 肖学在 李佩尧 杨成辉
骆炳金 林贞云 苏亚桐 肖耀汉 林亚九 龙道福 朱 清 王福临
邱木山 包亚细 林清池 阮事成

留仰新加坡机工名单

陆绍权 陈文炳 郑亚才 英子壮 黄党成 冯克钊 陈继芳 陈辉烈
黄锦坤 杨炳辉 陈 好 陈德傅 卢业炳 潘兆棠 庄金凤 邓永来
陈文陶 关会昌 黄乐星 王书盛 刘家汉 符国霖 陈禄全 许任重
孔宪楨 彭春生 郑贤忠

附录

总领队 黄锦坤

文书股主任 (正) 邓永来 (副) 陈良荪
宣传股主任 (正) 陈振辉 (副) 陈时群
总务股主任 (正) 刘树培 (副) 李异良
第一队队长 (正) 冯克钊 (副) 刘家汉
第二队队长 (正) 黄乐星 (副) 温庆先

第五批机工名单

蔡世隆 谢金福 林文龙 王 为 吴憨九 林金水 钟金水 梁广昌

陈朝宗 李毓芬 刘春泉 郑子福 方金水 陈振坤 杨翼粟 黄振来
 谢展云 林明存 吴乌峇 陈明发 洪朴玉 刘耀胜 陈 有 杨赐发
 苏美远 黄金福 蔡长平 梁柏祥 欧添福 林金狮 郭廷玉 甄容光
 许才林 叶福来 林成基 谢楚云 吴亚峇 刘 清 林福来 郑德昌
 李寿民 黄奕允 王仓萍 郑启瑞 黄清兴 廖桂添 周配南 张亚九
 王振春 叶应福 陈宝祺 张亚良 胡亚来 黄华才 朱留香 欧文华
 郑国全 曾金河

以上太平队计58名

余魁昌 钟 财 陈嘉仁 钟椿祥（钟五峰） 曾顺溪 李 生 赖锦堂
 黄奕发（黄 奕） 黄昌文 吴世光 张贵兴 黄宝春 林书华（林事华）
 叶柏青 蔡金胜 黄汝南 李亚德 罗玉成 张惠明 林绍纲（黄绍纲）
 庄肖兴 张记先 梁居俊 王国光（黄国光） 邢定珍 毕广生 曾信发
 许桂明 符和林 吴祺清 李 义 李声养（李先养） 邹治元（邹昭元）
 赖其瑞 谢良和 冯茂树 罗志通 吴声玉 周 木 周乃熙 游仁家
 陈天明 黄家木 郑德畏 陈 开 林成就 刘亚六

以上新山区计47名

吴秋云 陆 貳 蔡永基 廖立本 冯 福（冯和福） 陈文宁 蔡南华
 朱南彝 王和松 林熙育 罗礼塘 梁荣耀 陈体元 翁文助 刘灶昌
 林清安 曾 文 伍悦棠 蔡德富 魏亚依 陈 苏 梁东成 吕金祥
 陈亚清（陈如超） 黄 苏 陈家才 王裕桂 陈清乐 高铭赐 林荣川
 洪阮成（洪允成） 李宗生 陈锐聪 黄业坤 吴亚清 符 晟 孙其文
 赖木星 刘亚泉 李邓合 曾荣福 邓文聪 林成就 张亚明 冯 生
 马金生 李绍存 郑永福

以上星洲计48名

吴文区 叶其平 石朝春 郑文尾 李金凤 邓福才 黄水火 汪天生
 叶南川 梁金顺 陈携安 符和地 陈亚水（陈亚珠） 刘亚兴 陈秀碧
 黄顶兴 颜乃九 侯运成 陈重庆（陈仲庆） 谢元芳 陈文凤 黄亚涛
 叶在华 潘桂标 严进华 洪安心 姚文贵 刘怡淡 黄文开 吴秀峰
 曾腾光 林 友 陈亚清 辜昭才 颜永隆 周天河 刘 根 黄亚发
 李德盛（李得胜） 吴叔庆 黄亚清 陆昌隆 符亚树 叶玉富 孙加油

以上星洲计45名

黄仁全 徐汉润（徐汉陶） 林文龙 梁邓才（梁登材） 陈福拔
刘亚兴（刘亚发） 吴来资 廖荣耀 黄 根 陈恩仁 郑世泉 林光德
卢克发 王振家 黄汉文 黄修炳 陈友乾 曾南祥 曾柏添 黄成光
陈天福 庄清海 黄耀明 李禄泉 胡润成 刘春成 陈登寿
江瑞龙（江小梁） 林明志 颜亚大 黄桂炳 张培发 谭 根
方子元（方正元） 李睡文（李垂火） 雷运宝 刘 峇
李玉良（李玉梁） 石荣贤 王心广 刘伟才 苏仲利 翁荣华（翁英华）
王金凤 高清贤 王宗汉 李 兴

以上星洲计47名

叶振怀 钟兢生 彭叔夜 冯少儒（冯少如） 黄富昌 叶国旗 陈乾坤
林亚裕 黎元利 梁 浩 冯 选 丘德祥 黄汉荣 赖春来 林亚仲
叶寅整（叶寅正） 陈文迪 林亚龙 黄亚狗 林漳省 陈武烈 姚向葵

以上22名（先达马乞）

陈杰雄 郑逢时 陈文峰 陈永泉 罗伟焜 邝金源 方景云 陈金凤
潘正福 高金城 林宗方 刘焯睽 苏世成 陈亚凤（陈亚丰） 余纪荣
宋杨材 戴葵生 林薪仪（林新李） 吴 训 林清顺 陈忠明
刘修济（刘攸齐） 郑清德 吴进步 邓亚开 王亚平 戴炳川 温江河
郑天赐 郑锦来 何知才 林兆兴 陈桂河 张玉贵 陈来福 刘钜科
梁炳泉 林金成 陈亚礼 杨珠森 李壁林 岩福镇（严福镇） 彭子安
黄金宗 陈文火 吴振南

以上吉打、吧双计46名

冯 恒 黄昌林 林燕诒 杨志贤 陆 泽 杨水辜（辜水杨） 谭松强
黄锡坤 潘福生 黄茂元 张连培 黄金玉 陈福铨 黄亚朗 林廷玉
肖 滔 白昌泰 梁 枝 黎俊良 林 生 杨观火（杨观伙） 蔡子强
梁金水 王鼎耳 吴清扶 蔡 罗 吴 仕 胡 先 王运锦 张杰荣
施文礼（施文水） 罗 华 林亚玉 江儒富 郑始万 赖 谭 罗 祥
姚锡文 许 福 江亚年 吴 闻（吴 开） 蔡 带 吕承广 邓 衍
梁福全

以上怡保队计45名

侯西晋（刘西晋） 叶子源 叶全祺 叶 灿 叶连泉 卢 诏 吕觉基
侯元文 邢亚兴 叶观林（叶冠林） 杨 发 王日明 王亚新 王伦光

霍 九 赖举芳 林建发 颜 汉 丘武杰 杨亚良 洪金挺 林 安
林时焕 邓 九 邓铭昌 (邓 铭) 邓 带 卢 权 黄永业 黄火胜
黄 水 谭仲苟 (谭中九) 丘岳兵 张 苟 李 思 李运星 李 福
高满堂 李松坤 刘振雄 刘仕祥 刘 丁 许 益 戴水春 李 源
许福才 韩高元 陈鉴明 陈亚仕 翁家贵 冯维春 冯辉锡
冯耀基 (冯耀枝) 梁耀春 梁泰邦 翁德民 曾负重 郑佛芳 何 水
何 润 王亚成 陈 烘 邓佩莹 林天生 李金辉 魏烈光 方蔡初
曾康兴 郭 汉

以上雪兰莪计68名

饶成才 柯荣隆 李荣竹 林峇舌 陈亚刘 李福明 林清来 刘在旗
钟定古 许书传 谢清九 陈 爵 林树容 黄荣发 林海松 郑秀发
符和则 王海南 陈清山 王亚狗 谢允和 陈乾发 (陈绸发) 陈蚝鱼
叶原宝 陈金隆 陈 容 郭炳丰 梁绢育 许天禄 李少如 袁亚泰
黄海秀 周鸿裕 林猷川 (林猷川) 梁达豪 曾天庆 (曾友庆) 陈亚九
许福鸿 谢新美 柯天和 黄文达 游嵩开 陈焜存 李亚三 陈初得
詹金成 陈大华 陈亚九 (陈亚久) 吴其来 陈振美

以上檳城队50名

林水咸 纪兰花 张泽美 薛定祥 刘志明 叶富华 张永发 王天德
陈光远 陈秉林 方九才 (王九才) 李 颀 潘德良 王宁鸭
李福生 (李福星) 张源光 (张添兴) 温成开 陈英位 周春文 李添福
洪恭扁 林猷兴 (林猷兴) 邢绍鋈 朱亚泰 高满贵 黄 汪 伍仕添
蔡长世 陈猷江 伍任华 陈木枝 吴永光 蔡进昌 肖瑞兴 胡昌薪
阮润松 王有信 郑镇水 陈亚基 殷亚越 林亚起 林振元 (林进源)
符鸿庆 刘有记 庄王清 (庄玉清) 刘志仁 方明吉 林峇结 陈树森

以上檳城队计49名

附录:

总领队	(正) 钟椿祥	(副) 陈树森	姚向葵
总务主任	(正) 陈登寿	(副) 王宗汉	林燕诒
宣传主任	(正) 陈文峰	(副) 谢楚云	丘武杰
第一队队长	(正) 蔡世隆	(副) 谢楚云	

第二队队长	(正) 钟椿祥	(副) 赖其瑞
第三队队长	(正) 罗礼增	(副) 刘亚泉
第四队队长	(正) 吴秀峰	(副) 曾腾光
第五队队长	(正) 陈登寿	(副) 王宗汉
第六队队长	(正) 陈武烈	(副) 姚向葵
第七队队长	(正) 陈杰雄	(副) 郑逢时
第八队队长	(正) 林燕诒	(副) 郑始万
第九队队长	(正) 丘武杰	(副) 王伦光
第十队队长	(正) 陈树森	(副) 谢清光
第十一队队长	(正) 林永成	(副) 郑 链

第六批机工名单

(后勤部托招机工名册)

范锦山	徐孝友	李永炳	温贵华	陈金满	曾玉龙	李兆洪	林耀荣
王亚福	陈永胜	谭启萍	许再传	林子伟	梁安伯	王安澜	王炳运
蔡明士	黄金堆	蔡成贵	叶国清	黄辉廷	符大新	何子昶	许锡昌
吴亚贱	何亚太	张友仍	卢亚秀	李 世	蒋照德	郑心喜	李炽光
林瑞发	雷永成	邓满谦	文满棠	李照临	杨锐庭	蔡有荣	吴青年
谭亚明	全亚吉	苏若民	陈 坚	王焕光	郑金春	庄玉水	林炳钧
邬珍元	谭润贞	雷 葵	吴清吉	吴良顺	林育才	陈玉芳	徐伯祥
张连发	张国权	黄艺民	徐启新	徐海发	王宝塔	陈亚良	杨奋求
陈谭友	林亚良	林亚九	陈少葵	何俊平	钟恩照	谢 海	陈带祺
陈振华	叶子英	李亚留	陈志生	李炳文	江祥源	秦林旭	陈亚阶
邓森庆	叶金辉	邱坤华	陈金生	陈新贤	徐念汉	关天赐	倪玉顺
林明珠	陈文新	梁文叙	苏用球	王吉成	叶文扁	郑景训	蔡添发
吴楞栋	马加列	钟裕财	周福生	黄运庭	蔡石生	兰纪昌	莫添安
赖文华	邱辉明	甄启华	陈添发	郑光前	马祖庆	翁世进	谢金田
余延彪	陈来兴	郑亚妹	郑金来	陆 衔 (陆 衡)			

附录:

领 队 叶子英

第七批机工名单

林清会	管杨森	黄春福	胡建文	许奇光	余文禄	陈永源	刘承组
袁伟发	吴吉	李乌番	姚玉墀	谢火炎	李敏	何洪和	张天赐
陈国才	冯增标	苏红毛	郭龙波	赵来顺	林文昌	吴上标	陈玉水
黄铁魂	叶富	陈亚虾	陈存老	洪世璋	范高峰	林悦德	彭贵美
黄明福	黄礼归	黄一江	黄鸿照	黄文龙	吴济	黄登铃	王奕富
林亚九	陈天海	田清越	颜庚郎	周朝福	周英杰	谢世悦	邱松意
许宗和	欧世光	邓建贤	刘源	刘亚昌	李文生	郭天隆	刘德庆
郑恣生	黄保兆	杨世琦	林斌	陈梧琴	陈加尧	叶仲英	林崇萱
林木祥	李天祥	张天赐 (同名)	王尧欣	何敦友	谢钦华	赵长桂	
陈寿全	许丕勇	梁廷远	杨国钦	王祝金	林渊元	陈家傲	陈亚九
张西水	翁庆灿	唐建族	彭云鹏	张章胜	黄亚水	廖亚研	李中
张福枝	傅财起	朱兆	谢成	关华福	陈俊浩	吴荣华	陈焕章
方亚力	廖萍	陈金运	陈存坪	黄迎风	温金水	符利华	罗文彬
罗锦瑞	曹长久	符勇	张金水	钟金华	谢福龙	何启富	吴鑫渺
廖钦文	司徒仟	李昭乃	周学桐	黄水景	叶寿		

附录:

领队 廖萍

第八批机工名单

周崇挺	伍百旺	温二	胡荣	陈保基	吴亚治	朱义光	马金彪
薛杜	熊水华	林福建	钟亚佳	杨景检	王晋升	钟永安	曾应梨
何境林	冯运林	康鹏福	曾华聚	陈寿全	毛天成	张亚广	许亚裕
陈波伦	陈铁铮	徐志雄	陈昌雄	黄广祥	李棋万	林钦进	何应芬
陈升赞	陈添发	陈广云	王松团	黄东成	岩文江	温水福	余享
梁毛	叶玉彭	刘善哉	罗德辉	杨端文	李则权	赖询和	何兴
梁年	谢燥芬	徐亚省	邓耀光	张剑雄	陆路	余文达	黄景镇
陈鸿仁	黄良书	李极荣	韩志丰	陈佛炎	李孝为	黄号龙	蔡文彪
张维祥	谭自强	蔡福	丘才	丘有	李生	钟树清	陈朝栋

赵 轩	张 荣	许 枝	王猷福	周永通	曾 明	何万轩	王 苏
汪清福	冯法克	符致霖	陈达道	符文山	林叶波	刘桂华	陈献太
陈如旭	符致琼	何启风	陈在琨	张家蕃	叶守富	李家锦	李华扬
胡凯军	陈□□	朱崇年	符和亲	陈邦兴	何福强	林 相	郑廷财
翁绍仟	王大护	罗豫江	陈应顺	谢森周	罗开瑚	吴毓琼	王振美
翁绍结	刘其晃	杨美馥	罗豫川	符首根	何明和	谢川周	陈金福
王秀球	符昭勋	关炳南	杜家汉	李居鹤	李锦容	史业秀	黄合成
张天送	黄 帆	黄 轩	易生成	张兴禄	聂有成	张瑞伦	李觉文
黄振书	陈家发	王春茂	黄彩欢	何干炯	施玉水	陈如辉	林珍星
刘润球	周学锦	凌一齐	陈容宽	朱植庭	黄 蜂	吴铁民	温 山
尤竞雄	周英石	叶润权	蒙家裕	陈裕星	李金章	吕 寿	梁 锦
蔡民生	周金生	何 珠	司徒悦	李 林	章永平	林文怀	陈 巧
苏 拿	余连盛	黄和东	卓福昆	陈鼎盛	邱玉笔	林 铁	颜世国
罗章兼	林 财	刘瑞济	王瑞同	谢朗生	罗寿康	陈晋富	张锦昌
沈茂山	符树养	韦宣耀	陈世清	刘浩济	张勋和	潘国喜	李苏吓
香德和	潘先源	陈志平	郭茂东	吴开进	郑振仟	李芳香	冯友华
李 晋	王木利	翁世彬	陈 钊	杨大琮	盛云梯	林传芳	曾春和
颜 义	李度虎	洪国树	符致光	李文光	许成玉	苏圻琴	庞国器
符国连	颜金炉	陈世充	陈大培	翁飞龙	王亚尧	赖昌德	王修甫
韩谓元	陈文牛	胡 牛	黄 佛	钟志明	黄祖耀	钟国光	余半农
汤福记	浣锦树	陈钟榜	黄应心	黄德祥	黄裕新	袁荣生	张同辉
翁祚炳	彭倡仔	黄 玉	叶心才	庄劳吉	刘亚连	曹岳生	冯硕福
游杏芬	田观进	朱学海	林亚甫	赖 明	陈仁泉	符气郁	王春毛
谢来发	蔡元兴	洪金山	伍清庚	黄耀武	黄提明	刘 财	曾颂尧
柯亚福	陈 正	陈 弟	徐锦广	方亚辉	林有恭	张金友	郑克丰
张明德	潘春秀	高仕昭	刘志华	陈瑞浪	林亚包	卢汉昌	陈钦生
张亚坤	林汉升	李申民	章应希	叶吉兴	田穗九	庄霖助	陈儒仕
黎琼尹	陈清麟	邓作宁	谢丕川	李大河	林妈元	胡荣丰	邢保河
曾建基	黄川水	邱文乌	李德文	叶阿连	曾清华	杨发生	朱活水
孔阿仔	陈昆来	戴有吾	邱衡祝	林亚才	谢龙河	邱德才	李顾彦
蔡美桂	陈子忠	麦瑞祥	邱武广	杨文裕	李文海	余和俊	曾 忠

吴亚临 骆连和 陈日初 林鼎来 许宗忠 温娘接 陈家锦 曹进才
谢永富 徐清海 丘梦熊 吴家香 吴 珠 江广福 苏由天 陈亚习

附录：

总领队 (正) 黄景镇 (副) 曹岳生
总务长 (正) 庞国器 (副) 黄 玉 谭自强
文书长 (正) 符和亲 (副) 罗德祥 沈茂山
宣 传 (正) 黄 峰 (副) 周崇挺 曾应梨
干 事 (正) 李孝为 张同辉 叶玉彭 蔡 福
第一队队长 (正) 章永平 (副) 李棋万
第二队队长 (正) 刘善哉 (副) 周英石
第三队队长 (正) 林广怀 (副) 符国连
第四队队长 (正) 胡凯军 (副) 李锦容
第五队队长 (正) 罗豫川 (副) 洪国树
第六队队长 (正) 洪金山 (副) 邓作宁
第七队队长 (正) 蔡元兴 (副) 田穗九

第九批机工名单

[作者按：档案记载第九批机工为507人，但名单缺，以下系根据抗战胜利后1946年复员机工总登记表中注明为第九批者所辑录而成，显然尚不完整（牺牲者及漏登记者未包括在内），有待今后补正。]

伍松福 黄友镐 杨志忠 林中生 陈亚丕 叶桂成 张万森 陈昌明
陈番信 陈德华 陈成发 吴进明 沈冰生 林肇坤 廖志云 □亚华
李祥发 彭发陆 杨峰兴 陈梦深 颜日辉 陈亚基 同春荣 叶德甫
蔡亚求 陈进忠 徐杏初 辜 开 林金德 吕和昌 李 发 何启元
杨大胜 陈秋新 陈开钦 陈志宏 李元道 李文献 谢金才 王日波
颜耀彬 王集贵 陈潮海 林国民 胡亚明（槟城） 王冠时 余德峇
黄和平 胡亚明（吉打） 罗锦云 翁炎兴 邹良琴 蔡汉良 邝天祥
卢 梅 杨运广 张天接 王声椿 黄玉章 陈业贤 张漫舟 余汉洲
罗 年 辜 发 邢貽椿 宋 昌 王声桐 黄金声 黄杰满 曾文书

江咏源	谢之元	王书森	李瑞池	蔡长梨	符云山	张天习	林亚九
孙根成	杨妈富	周远芳	叶云照	林春才	李茂书	林鸿玉	韩瑞丰
张修隆	陈炳居	黄良才	邹新茂	黄富强	陈梧琴	洪诚继	吴明波
莫宏钦	谭 耀	孙玉泉	邱仁聪	华景学	华开国	韩士元	朱 华
陈 九	冯亚书	何天平	颜松美	黄金喜	黄亚成	杨木生	张敏文
何荣耀	蔡忠经	唐炎川	肖水强	梁水金	黄大新	张 庆	吴亮水
罗百基	陈亚福	张连胜	彭荣基	黄园丁	林亚老	赵福登	蔡玉辉
陈源缓	普开勋	贺麟光	陈南发	方炳兴	杨木深	冯国英	罗豫川
林 英	陈如潮	陈廷鼎	谭醒觉	王汉雄	马 明	黄伯秀	林皇泉
文保昆	邢福秀	符其昌	陈学钦	朱喜年	张法权	陆汝金	赵买兴
陈国光	王云峰	丁洪贵	余玉田	彭海涌	张智源	陈德军	梁 牛
吴奋前	苏昭安	莫泽林	杨德静	熊兆棉	侯合意	颜旭升	曾渊如
张生祥	朱 和	朱松胜	简允康	陈杰生	文永丰	沈世成	张亚通
符信初	蔡三如	钟祥基	邱树华	郑亚央	黄拔如	张金炳	郭坚忍
李山河	杨运光	林柏生	杨德昌	许 年	吴世钦	林水根	丘 想
林家景	庄亚南	王以石	刘林泉	陈庆云	赖文华	黄心堆	钟远谋
吴振初	欧阳东	王诗伟	陆汝金	邓焕祥	钟祥基	梁元亮	贺天宝
吴振林	庄军星	巫俊生	崔明珠	何满祥	林遵廷	魏 平	李金水
谢秀忠	张星辉	李廷燕	□家琫	符鸿庆	陈 豹	华明潘	吴福华
黄克白	林炳祖	梁镇华	王家杰	谢金标	刘 源	杨良伴	邹绍锦
蓝丕昌	陈绍昌	许 添	陈友国	陈美学	陈聪明		

第九批机工（代军政部招募）名单

翁辉春	陈春年	卢文山	林明芳	吴惠民	周云锦	李棋香	傅尧民
林运江	何启卿	莫则林	冯裕琼	钟 高	张永隆	郑兰春	祝朝端
何声三	卢松深	钟积杰	严亚国	张 坚	陈玉初	何 华	黄林桑
黎良骥	张修降	邢福昌	冯尔旺	邢谷德	孙 民	符德伟	张光日
黎长江	罗裕早	马汉成	冯裕庆	林猷杰	刘添利	关 标	吴正秋
林鸿钰	曾渊如	蒋伟泉	冯汉深	许道何	王多喜	张木隆	伍书汪
杨培基	汤振藩	莫国儒	黄 荣	江泳元	杨国辉	梁振邦	黄金星
林 炎	梁朝贵	伍亚伦	陈云露	黄庆初	伍亚再	王连石	故亚明

邱树孚 曾杏存

1938年前后南洋各埠组织回国的服务团名册

一、马来亚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名册

第一批机工名单

团 长 彭士馨

团 员 余 枝 黄国光 李文玉 郭 嘉 丘乾冰 陈 全 郑 苟
林文秀 李 苟 彭士钦

第二批机工名单

团 长 马连裕

财 政 陈定青

文 书 李文观

监 督 徐新准

团 员 蔡明训 蔡 三 刘亚你 蔡伟明 陈荣翔 郭育楼 黄光睢
王廷汉 孙永旺 余 安 黄武哉

二、槟城机器行回画服务技艺工程队名单

队长 梁煜棠

队员 余国胜 邓炳祥 王弗兴 廖家祥 周文贵 伍添生 范荣辉
梁锦鸿 叶清全 罗伙桂 郭灿章 薛 伟 伍瑞添 周瑞荣
吴福吉 黄任大 林文福 陈金有 许荣安 黄金福 曾庆舜
石颂尼 陈炳吉 管启明 洪茂科 卢新保 刘 新 邓文波
徐 九 李宝林 李月美

三、1938年前后通过其他渠道回国参加抗战的机工名单

李英才 蔡东原 马铸华 张家发 谢再华 马 仕 李伟庆 黄亚如
王克平

三、南侨机工档案选编

1.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新加坡分处 关于第一批华侨司机等回国事宜呈 (1938年2月18日)

案奉主座二十七年十二月渝艳代电第六项内开：华侨如有志愿回国驾驶汽车者，应尽量罗致。等因。遵与本埠华侨筹赈会几经洽商兹由该会派送第一批回国司机六十八名，修车机工十二名，共八十名，由廖国雄、白清泉率领，于本月十八日由新加坡启程，经海防转昆明赴钩处报到，听候分配工作。查该司机、机工等均系身世清白，意志纯洁。所有回国旅费均由当地筹赈会供给，服务待遇，暂由筹赈会规定各月给国币叁拾元，自在新上船日起算，此后视服务成绩再行酌加。理合开列全体名单，备文交该司机等，赍呈钩处，谨祈鉴核示遵。谨呈

总经理处

附名单一纸（略）

新嘉坡分处处长陈质平（公出）

总务科科长夏日校（代行）

2. 陈嘉庚告第二、第三批华任机工日期起程电 (1939年3月10日)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梗代电悉。修驶员第二批二百二十名，元日起程。第三批二百多名，感日起程。余续募共可一千名。陈嘉庚

叩。蒸。印。

3. 陈嘉庚介绍王亚龙（能）等前往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函

（1939年3月12日）

径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人员计有二百零八名，其中有印籍王亚龙（能）一名，马来籍马亚生一名，均由太平埠筹赈会转派前来。查两个外籍人均能操中国语言，又能初识中国文字，因其从幼即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故此次亦愿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经由该地筹赈机关详细调查，除同情中国抗战外，并无其他企图，如不许以前往，未免使其失望。又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壹佰元，其余每名月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奉达，谨希查照是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4. 新加坡分处关于第二批机工回国事宜呈

（1936年3月13日）

案奉主座二十七年十二月渝艳代电第六项内开：华侨如有志愿回国驾驶汽车者，应尽量罗致。等因。查华侨机工第一批业于上月十八日趁轮回国外，第二批共二百零七名，内修机九十名，司机一一七名，由钟运熙、许志光及何纪良率领，定本月十三日乘轮经越转昆赴钩处报到，听候分配工作。查该机工等亦均身世清白，意志纯正。所有回国路费，仍由当地筹赈会供给。司机月薪仍定国币三十元。惟本批内有修机领队王文松及修机八十九人，技术优良，经验丰富。国此次回国并携有修理工具数箱。兹接筹赈会本月十二日函云：查修机工王文松等技艺特优，招募时曾面允回国后王文松月给国币壹佰元，其余修机各月国币五十元，请贵处转呈等由。查该会所述与技术特优人员薪金另行规定一项符合，拟请钩处准予所请，以维筹赈会信誉，借利今后招募。又，查此次回国司机，内有马籍马亚生一名，同情我国抗战，自愿投效，前经电呈主座核示，奉灰电开：外人司机暂不需用，希转

放。等因。当经致谢。惟昨接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来函开：查马籍司机一名投效意志坚决，戎装待发，其志可嘉，其情可感。今由太平埠筹赈会派送来新，并经该会调查，该外人能谙中国语言，精通中国文字，同情我国抗战，矢志投效，并无其他企图。倘再谢绝，则深负该外人诚意，请转呈录用。等因。查陈主席所述，均系实情，拟请钧处准予录用，理合开列全体名单，备文交该司机等赍呈钧处，谨祈鉴核示遵。谨呈

总经理处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质平（公出）

总务科科长夏日校（代行）

5. 宋子良请告续募人员起程日期电

（1939年3月14日）

新加坡译转陈嘉庚先生勋鉴：蒸电敬悉。先生领导侨胞热心救国，薄海同钦。此次协助本处罗致修驶员回国服务，充实抗战力量，尤深感佩。续募人员起程日期仍乞电示。谨电申谢，请祈察照。宋子良叩。寒。滇。

6. 龚学遂等报代募华侨修驶员二第三批情况电

（1939年3月14日）

香港宋主任：心密。兹接陈嘉庚先生致钧座蒸电开：梗代电悉。修驶员第二批二百二十名元日起程，第三批二百多名感日起程，余续募共可一千名。等语。除复电致谢外，谨电钧察。弟遂、琢叩。寒。滇路车。印。

7. 陈嘉庚询问添招机工名额电

（1939年3月16日）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寒电悉。第三批四百多名感日可起程。贵处应需驾驶车修机修电池各若干名，乞电示，庚当积极鼓励精熟工手志愿投效者急往。陈嘉庚。銑。

8. 宋子良请再添招机工电

(1939年3月21日)

新加坡陈嘉庚先生鉴：铣电奉悉。查司机除第一二三批外，请再添招驶车300名，修机工100名，修电工30名为荷。弟宋子良。马。印。

9. 陈嘉庚询问第四批华侨机工可再往否电

(1939年3月23日)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马电悉。第三批五百八十名决感（廿七）日往。第四批一百五十名，可再往否？此次募一千名，乃陈质平君所诺，如何？急电复。陈嘉庚。梗。印。

10. 宋子良复陈嘉庚梗电

(1939年3月25日)

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梗电敬悉。第四批仍请派来，马电请续招机工100名、电工30名，并请速募，径赴仰光与陈质平接洽。弟宋子良。有。印。

11. 新加坡分处拟请录用投效印籍司机呈

(1939年3月28日)

顷接筹赈总会陈主席嘉庚来函开：本会此次派遣第三批机工计五百九十四名，业经于本日上午乘轮赴越转昆，内中有印籍王亚能一名，系第二批机工，因手续关系，故延至此次始行参加，敢请贵公司迅即航邮呈报昆明运输处。等由。准此，查第三批机工回事事宜，已于昨日备文交机工带呈钧处在案。查该印籍司机投效，业经婉谢，此次该会又再派送，实难坚拒，拟请钧处准予录用，理合呈请鉴核示遵。谨呈
总经理处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质平（公出）

总务科科长夏日校（代行）

12. 新加坡分处报第四批华侨机工回国情况呈

(1939年4月11日)

查奉命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业已先后遣派三批经越转昆赴钩处报到在案。兹因仰光分处急需机工，屡电函催请去仰。第四批机工决改经缅甸回国。第五批机工约一百六十余名，约于本月十日起程，仍经越赴昆。前奉主座梗日港秘第五七二〇号代电节开：“据河内分处呈，以机工经河内因食宿不便，车辆缺乏，请飭每次以五十名为限等情。仰即知照，并婉请筹赈会照办等因”。当即函请筹赈总会知照。惟该会以第五批机工定期回国，已请星埠总领事馆并托中国旅行社将一切过境及轮车票等手续办妥，并已函托越领馆及旅行社照料，一切可无问题，决按期起行。待离星时再行详呈。查第四批机工，为便得起见，分由星、槟两地于四月六、七两日先后登丰祥轮起程，经缅转昆赴钩处报到，听候分配工作。其中星埠八十二名，吉隆坡一百余名，槟城一百六十余名，合共三百五十余名。计机电及修补车胎技工共约百名以上，余均为司机。吉槟两地机工，因径在槟上轮，名单迄未送到，故确实人数尚未知悉。所有星缅船费仍由筹赈总会支給，每人并发给叻币十三元作为缅甸路费。至于薪金，仍照前三批所规定数额发给。理合将星埠机工名单乙份，寄呈鉴核备查。吉槟两地机工名单，待送到后再行呈奉。谨呈
总经理处

附星埠机工名单乙份（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13. 陈嘉庚关于第四批机工（赴仰第一批）

由仰入滇事宜致宋子良电

(1939年4月13日)

昆明宋子良先生鉴：蒸日第一批赴仰修、驶各半，共三百四十四名。除星、仰船费外，另汇仰运输公司助滇缅旅费每名二十盾，计六千八百八十盾。特闻。陈嘉庚。元。

14.陈嘉庚关于第四批机工（赴仰第一批）

由仰入滇事宜致宋子良函

（1939年4月13日）

径启者：查本会所募机工共四批，统由安南入口外，另一批承仰光西南运输公司陈质平君嘱，专选修机者赴仰，经于本月十日由槟启航，计三百四十四名，因程途邻近关系，其中修驶各居其半，陈君请另外助由仰至滇一段旅费。经决定，每名助以缅币二十盾，共六千八百八十盾，即日由中国银行汇去。除电陈君外，经另电尊处告闻，想已达尊览矣。以上所有办理经过情形，相应函请查照并盼惠复。又，各地侨胞应募机工自愿投效者，仍风起云涌，如尚有所需，亦请电示，当代续募，俾资效用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子良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15.仰光分处关于第四批机工留用及处理回滇旅费呈

（1939年4月14日）

昆明总经理处钧鉴：查星洲华侨筹赈总会选送第四批司机、机工共三百四十四名，业于本月十二日乘丰祥轮抵仰，现暂寄此间华侨中学校。膳食由本处供给，计每名每日膳费缅币五安托，由商会代办。现腊戍、仰光两装车厂亟待开设，须工殷急，该项机工拟即留缅使用。业经电奉主座核准。其余司机等拟俟日内新车装竣一部分，即行驾驶入滇。复查该批司机等由星至仰船票、护照等费已由筹赈会代办。另由该会拨汇六千八百八十盾（每名二十盾），交由本处转发，经充自仰光赴滇旅费。届时如感不敷，拟由本处酌量资助，当否，理合检同该批司机、机工名册报请鉴核示遵。仰光分处。
呈。

16.仰光分处处长陈质平报告星侨司机抵仰日期电

（1939年4月18日）

昆明总处：密。星侨司机等三百四十四名文（十二日）抵仰，内机工

(150)名，奉准留缅甸余驾装竣新车回国。该员等抵滇后愿先受训。乞核夺。职平。巧。

17.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告承招修机人员王文松等抵昆函

(1939年4月18日)

据本处新加坡分处转来贵会三月十二日大函敬悉。贵处领导侨胞返国服务，增强抗战力量，热心爱国，良深感佩。此次承招修机人员王文松君等二百零七名，已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昆明，经送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编队，稍事训练，即行派任运输工作，相应奉复。即烦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印

18. 新加坡分处报仰光第二批机工八名出发赴昆呈

(1939年4月19日)

呈为呈报事。

查第四批机工共一百五十八名，由总领队连文瀛率领，于四月十日乘丰庆轮经越转昆。所有一切详情，业经于四月十日坡发字第311号呈文呈报在案。兹有仰光第二批机工八人，定于本月二十一日搭丰平轮经仰转昆赴钩处报到，听候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总会发给，月薪拟请仍照前数批所规定发给，理合开列该批机工名单，并行备文交邮呈寄钩处，敬祈鉴核备查。查职处委托筹赈会招募机工，先后已派送经昆四批，共计为一千零三十九人。又经仰转昆一批计为三百四十四人。此间现已停募。惟此次第二批经仰转昆机工八名，均系由荷属来星应募，筹赈会以该工人等热心为国，又以人数不多，决予遣派，特将派送原因，一并呈明，敬备鉴查。谨呈
总经理处

新加坡分处处长 陈清文

19. 龚学遂复宋子良寒港代电

（1939年4月20日）

海防宋主任钧鉴：密。寒港电敬悉。归国华侨司机待遇一律国币36元。除径复后勤部外，谨复。弟遂。哿。路车。

20.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录用印籍技工王亚能指令

（1939年4月26日）

令新加坡分处。

呈悉。第三批技工已到昆人所训练。印籍技工王亚能经予录取，仰转知录用。此令。

21. 海防分处请经越赴滇侨工分多批送来电

（1939年5月5日）

密。星洲司机过境，越政府以治安关系，每批不得多名。经迭电知照，闻本月将有五百名赴滇，西贡登陆转车及河内住宿均无办法，若有意外，职处不能负责。恳迅电星洲，务必分多批送来。（0011）。支。印。

22.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请将回滇经越华侨司机分多批送滇电

（1939年5月5日）

新加坡分处陈处长：越政府限制大批司机过境，且在西贡登陆，转车河内住宿均无办法，嗣后务分多批送滇。（1111）。歌。滇总。印。

23. 运输人员训练所报送第四批回国华侨编队情形及花名册呈

（1939年5月6日）

窃查第四批回国华侨（按：由安南入滇）一五八名，除五名点编时未

到场，迄今亦不见来所，实到一五三名。经于四月二十日点编为第六大队第十七、十八队。第十七队七五名，第十八队七四名。内赖耀清等四名调教务科工作。原领队连文瀛、黄玉田、刘传授、符气簪等四名分别擢升为队附、分队长试用，以示激励而资熟手。又，刘金祥一名，有三十五岁及二十七岁者。已将后者改名为刘必成。以上各缘由，理合检呈各项名册，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第四批回国华侨花名册一份，第六大队新编第十七、十八两队学生花名册一份（略）

24. 宋子良对招募侨工回国服务深表谢意函

（1939年5月15日）

接奉大函，敬聆一是。查本处目前所有机工暂敷分配，容俟将来不足或须增补时自当电请再募。迭函贵会代募回国服务之华侨机工，技术俱臻优良，并能遵守纪律。现在各地侨胞复能踊跃自愿应募，足征热心祖国，国家大有可为。抑亦征诸先生之力不□此。本处令人感佩之余，并为国家前途庆幸。相应函复，藉布微悃，即烦察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嘉庚

宋子良谨启

25. 运输人员训练所第三批回国华侨编调情形呈

（1939年5月17日）

窃查第一、二批回国服务华侨编队情形业经呈报备案在案。至第三批回国服务华侨五百九十六名，除二名留星未来，二名半途潜逃外，实到五百九十二名。经于四月五日连同庇能返国机工三十一名合编为临时大队。第一队二百十一名、第二队二百零五名、第三队二百零六名，调编第六大队一名。旋以临时大队各队人数过众，管教困难，乃于四月十五日改编为第七、八大队。计第七大队二百二十一名，第八大队二百十一名。奉命遣赴腊戍工作者五十名，遣派各运输队工作者五十名，遣赴保山工作者三十四名，

调属所教务科工作者二十七名，调路运组工作者一名。又于改编时先后潜逃□名。以上各生编调情形理合造具清册，备文呈报鉴核备案，指令祇遵。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十二册（略）

26. 新加坡分处报第五批机工经越转昆呈

（1939年5月22日）

呈为呈报事。

前奉钧处本月歌电，飭将回国机工分批遣送，以免经越时发生困难，当即将该电抄送筹赈会查照办理，尚未得复。兹有筹赈会交来返国机工名单五百二十四人，定于今日下午二时乘丰庆轮经越转昆赴钧处报到，听候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月薪拟请仍照前数批所规定发给。至于该批机工名单，本应交该批机工总领队钟五峰带呈钧处，以备鉴核，但因筹赈会送来名单乙份，势须暂留职处抄录后另行邮寄，理合呈明，敬祈鉴核。谨呈

主任、副主任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27. 陈嘉庚告第五批华侨机工出发电

（1939年5月23日）

宋子良主任：第五批五百廿九名昨出发，经越，希准备。又，谢侠逊与征募机工无关。中央社电传昆明将开会欢迎，殊可异。陈嘉庚。漾。

28. 运输人员训练所第四批（由仰光入滇）侨工编队情形呈

（1939年5月23日）

窃查第五批（按：应为第四批，由仰光入滇）回国华侨一百十九名，除甘潭胜在下关失踪，郑昌因病留医腊戍，陈锦全（泉）病留保山外，实到

一百十六名。经于五月十六日分编为第二十五、二十六二队实施训练。为此，附呈原来名册及编队名册各一份，呈请鉴核备案。又，萧学在一名，系随队前来，携有畹町分处乘车证，现着编入二十六队受训。理合一并陈明。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四本，乘车证一纸（略）

29. 陈嘉庚询问可否兼收修机人员电

（1939年5月25日）

昆明宋子良先生：后方勤务部托招汽车司机二百名，修机可否兼收？电复。陈嘉庚。有。

30. 宋子良转陈嘉庚询问电

（1939年5月26日）

桂林、贵阳探转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樵峰兄：准陈嘉庚电，以贵部托招司机200名，技工可否兼收？转请电示。弟，宋子良。宥。滇密。

31. 陈嘉庚再询是否兼募修机工电

（1939年6月1日）

宋子良先生：请复有电，修机兼收否？陈嘉庚。东。

32. 宋子良复陈嘉庚有、东电

（1939年6月5日）

新加坡分处转陈嘉庚先生：有、东两电敬悉。俞部长复称：优良技工可兼收。弟宋子良。歌。

33. 宋子良请嘉奖陈嘉庚先生电

(1939年5月25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本处经陈嘉庚先生介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先后到处者，计一、二、三、四、五批共1397名。现第六批529名，不日又将到达。陈先生热心爱国，不辞劳苦，诚属难能可贵，拟恳钧座电令嘉奖，以励来兹。是否有当，敬候钧裁。职宋子良。有。

34. 运输人员训练所报马来亚华侨一〇一名编队情形呈

(1939年6月3日)

案查马来亚回国华侨一百零四名，除萧学在系于五月十六日随第五批侨生先到，并经派往路运组第十一大队工作。又，余亚三因病留医腊戍未来，林德和在腊戍奉调他处服务外，计实到学生一百零一名，经于本月二十三日编为第二十七队，理合抄呈编队名册一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乙份（略）

35. 运输人员训练所报陈锦泉等到所编队受训呈

(1939年6月10日)

窃查第五批（按：应为第四批，由仰光入滇）回国华侨第一次到一百十六名，第二次到一百零一名，第三次到九十四名，均经分别呈报在案。查前因病未到学生陈锦泉已于五月十五日到所，编入廿六队受训。甘谭胜于五月廿六日到所，编入第廿五队受训；余亚三于五月廿七日到所。编入第廿七队受训；王家财、彭海于六月二日到所，编入第卅一队受训。理合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36. 运输人员训练所报第六批〔按：应为第五批〕

返国华侨机工编队情形呈

（1939年6月12日）

案查第六批〔按：应为第五批〕返国华侨计五百三十一名，经于五月三十日莅所。除李濂、李福霖、陈有儒、石毓才等四名，另女性陈娇珍、白雪娇、朱雪珍等三名因不谙技术，未予编队外，余分编为第廿九队，计百名，属第一大队。第三十队，计百名，属第二大队。第三十一队，计百名，属第五大队。第三十二队计九十八名，属第六大队。第三十三队六十二名；第三十四队六十二名，属第九大队。理合抄附名册六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附名册六份，共一帙（略）

37. 俞飞鹏请西南运输处托陈嘉庚代招修理工、电工电

（1939年6月14日）

西南运输处：虞滇路车电奉悉。承示华侨技工待遇与本部所定略同。除前托招收司机二百名外，请转恳陈嘉庚先生代为招收修理工四十名、电工十名。并赐复为禱。筑。俞飞鹏。已寒。管甲。

38. 宋子良请陈嘉庚代招修理工、电工电

（1939年6月17日）

新加坡分处转陈嘉庚先生：俞部长来电，除前请代招司机200名外，并托代招修理工40名、电工10名。请惠办电复。弟宋子良。筱。滇秘。

39. 新加坡分处处长清清文关于第六批机工回国呈

(1939年6月19日)

呈为呈报事。

兹由星洲筹赈会交来代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所招机工名单一份，共计机工116人，并声称该机工定于六月十九日下午乘丰平轮经越转昆，由总领队叶子英率领赴钩处报到，再由钩座转咨俞部长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另有学生七人同行赴昆。除另备呈介绍该生等晋谒钩座外，理合开列该批机工名单，并行备文交该机工等带呈钩处，敬祈鉴核备查。谨呈
主任、副主任

附后方勤务部所招机工名单一分（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 陈清文

40. 陈嘉庚告124名机工皓日搭轮返国电

(1939年6月21日)

昆明西南运输处：机工一百二十四名皓搭丰平轮来越。陈嘉庚。

41. 何应钦请洽办交通机修厂所需技工电

(1939年6月27日)

西南运输公司宋处长子良兄勋鉴：前奉委座三月感川侍参代电，抄交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并电示：如需用此类技士，可与宋子良商办可也。等因。当经转电各机关学校去后，兹据交通司案呈交通机械修造厂五月寄代电，附呈需要技士类别，数量、待遇简明表三份。等情。相应抄同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修造厂表二份，电请查代洽办理并见复为荷。渝。何应钦。巧。交汽。印。

抄附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

（衔略）西南运输处宋子良君托募驶汽车修机、修电计一千人，资送到昆明。经募足数，而热诚赴义之人尚多，未悉军用处有未需否？倘待遇可

如昆明，各需若干人，由何处入口，抑仍委宋君办理，乞电示。庚当鼓励应命。陈嘉庚叩。敬。

42.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关于第六、七批华侨机工回国情形呈
(1939年7月3日)

呈为呈报事。

查星洲筹赈会代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所招机工一百十六人，已于六月十九日乘丰平轮由总领队叶子英率领，经越转昆前赴钩处报到。业经坡发字第585号呈文呈请钩转咨俞部长，遣派工作在案。兹由筹赈会送来代招机工名单一份，共计一百一十七人，由总领队廖萍率领，定于今日下午乘丰庆轮经越转昆。据筹委会声称：此次所招机工内，一部分为代后方勤务部所招，其余机工系代钩处所招。敬祈钩处于该批机工到昆后，即由钩处转咨后方勤务部将其所招机工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除电知海防分处给予照料外，理合备文并检同是批机工名单面呈钩处，敬乞鉴核备查。谨呈

总经理处

附机工名单一份（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 陈清文

43. 运输人员训练所报第七批
[按：应为第六批] 机工编队情形呈
(1939年7月7日)

案查第七批[按：应为第六批]华桥机工一百二十四名经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所，其中温贵华、陈文基、陈平波、王云锋、叶文来、苏邵耕、余学慈、古乾贤、李永炳等九名，原系归国投考大学者未予编队，其余一百十五名编为华侨第六队，隶属第六大队，理合抄附名册一份，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一份（略）

44. 陈嘉庚请接待第八批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函

(1939年7月17日)

径启者：现本会征募之第八批机工三百四十名已于今日搭丰祥轮起程赴越返国。查此次机工具有特殊技能者计有两位。一为总领队黄景镇，一为槟城队田穗九。黄君在此间马来亚摩多车厂任技师职，月薪二百元，其人与前批王文松同一具有优良技能，今次亦弃职回去，请特予拔擢，以资鼓励。田君系热血男儿，富有机器电器常识，曾于广九铁路、粤汉铁路、香港汽车工厂、太古船厂、北婆罗洲火车工厂历任装置火车修整机器电机各职，经验丰富，皆有任职证明书以资验证。今激于爱国热诚，情愿弃职自备资斧返国服务。如此热诚，实属难能可贵。敢请贵处甄别选用，以展其才，而遂其愿，实为至望。此致

西南运输处处长宋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45. 陈嘉庚代招第八批华侨机工电

(1939年7月18日)

昆明西南运输处：筱(17)由越第八批机工三百三十七名。陈嘉庚。巧

46. 运输人员训练所报第七批华侨机工到所编队等情呈

(1939年7月18日)

窃查第七批华侨机工一百十七名，业于本(七)月十一日抵所，着由第六大队接编为华侨第七队，经由该批华侨领队廖萍交来新加坡分处嘱转呈钧处之坡字第六七四号一件，附名单一纸。籍悉该批华侨内一部分亦系后方勤务部请代招取者。除将名单抽存备为编队参对之用外，理合检同原呈一件暨编队名册一份呈请鉴核备案，并恳转咨后方勤务部迅来接收，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新加坡分处原呈一件，编队名册一份(略)

47. 陈嘉庚为解侨众疑虑遣派 刘牡丹回国考察滇缅公路运输设备函

(1939年8月7日)

径启者：本总会数月以来，募应祖国机工二千余名，原以责在征募，其他事项全未参与。乃其中有少数意志薄弱不堪部勒，竟复潜逃南返，以惧社会罪责，反而造谣惑众。浮言所及，难免影响续募。查此辈恶劣分子，有方在受训者，有甫出服务者，遽尔潜逃，深恐以后散遣各地工作，效尤更甚。又查滇缅公路，开辟未久，长途千里，设备容有未周。海外侨胞关怀祖国，对此抗战国际运输关注更切。为此种种，不能不作实际考查，俾得依据实情，公布侨众，以释疑虑，而利征如。用特遣派本总会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由仰回国，沿途考察滇缅公路一切运输设备状况，以至昆明访问运输管理待遇各情，回报本总会，籍资考镜。相应据情函请执事于刘君抵谒时，赐予面洽指导为荷！此致

陈质平先生

主席 陈嘉庚

48. 陈嘉庚为招募机工由越前来训练备用函

(1939年8月8日)

径启者：案查贵总处托募机工，除各批募往外，尚需一百七十名。兹经决定于本月十四日搭丰庆轮由越前来，其中尚加有百余名，原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托募，要由仰光入口。此间认为长途跋涉不便，故概由安南入口。请贵总处兼收训练备用，就此批截止，以后贵总处无再委募，便不复遣派。其他军政部所委募修车各种机工尚欠数十名，待募足后再行遣派回国。相应函达，即希查照是荷。

此致

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49. 陈嘉庚告华侨机工四百余名赴越电

(1939年8月10日)

昆明宋子良先生：寒赴越机工四百余名，希准备。陈嘉庚。蒸

50. 俞飞鹏为代招华侨机工致谢电

(1939年8月13日)

昆明宋主任子良兄：(2814)电敬悉。密。承代招华侨机工226名已于东日到筑，由本部汽车管理段点收编队，谨电奉复，并致谢忱。筑。弟俞飞鹏。未元。轻管甲。印。

51. 陈嘉庚告征募(九批)华侨机工经过情形函

(1939年8月14日)

径启者：此次军政部托募机工八十三名，截至今日止，仅募得□□名。兹列一单呈览。其他欠额待后续募。但能否足数，未敢预定。第九批返国机工(连同军政部所募在内)已于今日(十四日)乘丰庆轮首途由越北返，总计五百零九名。除贵处嘱募外，约加二百到三百名，此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托募，因各处筹赈会事前多未来报，迨至近日始行参加，故其名额突涨。务希贵处尽量收纳，以应他处可也。至此批机工约有百余名，平昔系司机助手再加训练者，经验不甚丰富，论理不便派往。无知从外埠集合而来，且爱国热情可嘉，故特声明，请为注意训练。查蒸日曾电告此轮有四百余名，请预备一切，计邀台察。现此间对于征募机工事，若国内各机关无再来征募，从此已告一段落，实行结束矣。以上所有经过情形，相应备文函达查照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52. 陈嘉庚复宋子良寝电

(1939年8月28日)

昆明宋子良主任：寝日电悉。第九批508名请全收训。贸委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经转募仰复兴300余名。陈嘉庚。俭。

53. 陈嘉庚询问是否尚需华侨机工函

(1939年8月29日)

径启者：昨由本坡西南运输公司转来台发寝电，询第九批机工五百名有无贸易委员会所募之额在内，曾立复一电云：寝电悉。第九批五百零八名请全收训。贸易委员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经转募仰复兴三百余名各情，计承察照。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六月间来函，托募五百名，由越南往广西明江受训。此间方着手征募，旋又来函嘱转由仰光前往，时适仰复兴商业公司亦来托募，系欲就地驶车入国。鄙人以入广西明江者，应由越南入境为宜。仰光路程遥远，长途跋涉需时耗费，诸多不便。终因其办法游移不定，故即取消。而将已募来者悉数遣赴贵处受训耳。仰复兴所募，计三百五十名左右，因到地立须工作，故所遣派皆为多年经验之工手，约九月尾可以全数派完。至本月止已往半数矣。敝处尚有半熟技手，再经训练毕业者二百名。其他有执照而富经验者，虽未来报，谅亦不少。如须征募，每月或一百名至二百名，大约必无难事，至少或可至三百名。未悉贵处尚有需要否，即希惠复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子良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54.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关于第九批机工请全部收容的训令

(1939年9月1日)

令运输人员训练所。

查由新加坡来昆第九批机工五百余名内，本为贸易委员会托代招募。

惟该会现不愿接收，经本处询，准陈嘉庚先生电复：该第九批机工请全收容，贸委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等由。准此，合亟令仰该所，即便将该批机全部予以收容训练，仍将名册列报备查为要。此令。

55. 运输人员训练所报第九批返国机工入所情形呈

（1939年9月2日）

案奉钧处滇路字第九零二六号训令，以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函告第九批返国机工五零九名已首途返国，特饬知照。等因。复奉钧处转示海防分处马电开：“星机工五三八人马午由河内慢车到昆，请派接。”等由。奉此，职所当即从事准备，并逐日派员赴车站接候。兹该批机工已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经接运入所，计共五三七名，其中贸易委会托招之机工，曾经职所派员前往接洽，请其派员接收。该会以缺乏设备关系，未予接收。现由职所一并收容考核技术优劣，分别给以短期训练。奉令前因，理合将该第九批华侨机工回国入所情形备文呈请钧处鉴核备案，并请转函筹赈总会，人数已足，毋庸继续募送，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56.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复西南运输处函

（1939年9月4日）

案准贵处滇路字第八七三四号公函，以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来函，此次搭乘丰庆轮来华机工，内有百余名系本会托募，囑于该项机工到达时派员前往贵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收等由。准此，查本会复兴公司前因驻缅运输工作处需要司机、机匠，经委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司机三百六十名、机匠四十名，共四百名，并应请随时分批送仰以便派赴工作，据报现已多批到达仰光各在案。此外，并无托募机工经安南来华之事，或恐系他机关所委托。除转函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陈主席外，相应函得道，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处

主任委员陈辉德，副主任委员 邹秉文、卢作孚

**57.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关于
第九批华桥机工到昆日期及训练情形函**
(1939年9月12日)

案查前准贵会八月八日及十四日两函，经续募第九批华侨机工二百余名，及贸易委员会托募百余名，于十四日搭丰庆轮由越返国，嘱查照接收训练并转批各等由。当经令飭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遵照收容，并请贸易委员会派员届时赴所接收在案。兹据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呈报，该批机工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共计五三七名。其中贸易委员会托招之机工，该会以缺乏设备，未予接收，一并由所考核技术优劣，分别施以短期训练。请鉴核并转函筹赈会等情。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58. 何应钦对代招机工表示谢意电
(1939年9月21日)

昆明宋处长：虞路车电敬悉。密。除飭交通机械修造厂克日派员前往接收外，特复并谢。渝。何应钦。马。交汽。印。

59.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复陈嘉庚函
(1939年9月23日)

接准八月廿九日大函，详示代贸委会招募技工及取消情形，并以现在尚有半熟手及富有经验技工征募非难是否需要，嘱查照见复。等由。准此，查第九批技工到达后，业经本处遵嘱接收训练。现在各修车厂及运输车队机工均已满额，目前暂不需要补充，应请停止征募。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烦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嘉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60. 公路运输组成立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总队第十五大队签报 (1939年10月)

查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总队第十五大队已由运输人员训练所编组完成，并派杨碧湘为大队长，于十月一日正式组织成立，所辖两中队，已先于上月二十九日出发同登接运车辆。兹将该大队官佐士兵名册另行签报外，理合将该大队组织成立日期先行签报，敬祈鉴核备查。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公路运输组兼组长吴琢之、副组长 饶竞群

61. 陈嘉庚为华侨机工第一队队长翁辉春请派遣重庆函 (1939年11月19日)

径启者：兹据华侨机工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队长翁辉春自昆明函称：本队自星洲选编为军政部重庆队于八月廿三日抵昆明西南运输处人员训练所，瞬息两月余，尚未有派赴重庆消息，曾数次呈询本所长官，均复以须候重庆军政部派员接领。等语。本队以在所等候，遥遥无期，曾开会议决，由春呈函重庆军政部请求外，并请赐示进止办法，俾资遵循。等情前来。查该队既经编为军政部重庆队，似应派赴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以遂其回国服务之志。据函前情，未知为何延搁，相应据情转为函请查照，希即迅予遣派，前往重庆，以资国用。倘有其他缘由，应俟何日即得派出，亦希径告该队，并即惠复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62. 陈嘉庚先生致翁辉春队长函 (1939年11月19日)

径复者：十一月三日来函据称：到昆明已两月余，尚未奉派开赴重庆服务，请转函查询缘由等由。已悉。查此间已即日据情函请西南运输总处从速派往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矣。据函前由，相应函复查照为荷。此致

华侨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队长翁辉春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63.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告 处理华侨机工重庆队延搁赴渝情况函 (1939年12月21日)

接准贵会十一月十九日领字第六一三号笺函，以据华侨机工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函告；该队留昆明运输人员训练所已两月余，尚无赴重庆消息。在所等候军政部派员接领，遥遥无期，请示进止办法等情。转嘱本处派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以遂回国服务之志，并嘱将延搁情形见复等由。准此，当即令飭运输人员训练所查复并电军政部及军政部交通机械修理厂迅派员来昆接收各在案。兹据运输人员训练所呈称：查该队学生六十六名，云云。抄至——但该厂派员何日到达，尚难预卜，究应如何办理，迅赐核示。同时复准军政部机械修复厂函复略称：云云。照抄至——现已抵筑候车转昆等由。除指令训练所转知重庆队外，准函前由，相应函达，敬希察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

64. 南洋队领队马牛关于第一批侨工回南洋的报告 (1940年2月19日)

窃职队第一批一行22名经定于今天下午动程赴星，第二批57名约迟数天亦可南返。至所余7名中，除黄华才一名因病留腊及陈荣、阮润松二名自动呈请留仰外，尚有许礼丰、福记、钟金水、李添福等四名因护照问题须较迟方得南返。又附队七名除贝友胜、詹行巖、柯玉彬、郑大成四名径先回南。朱南舜今天亦随队南返。此外有苏振怀因病留医，吕金祥因护照未妥，故须稍待。惟该附队各员之船票护照等费概经职先行付与中国旅行社，是以特此具报，恳请钧长察核，准予第二批动程后，即着孙同志克镛回滇。至所余三批数名，因护照未能同行者，统祈代为办理遣送，俾节公费而利国家，是为公便。谨呈
仰光分处副处长陈

南洋队领队 马牛呈

65. 西南运输处华侨机工互助社为第二批南返机工请予协助函 (1940年3月30日)

查第二批南返三十二人经奉批准南返，并派本社助干李卫民率领于四月一日首途，由仰光转口南返在案。诚恐沿途发生困难，敬希赐洽指导予以方便，或因特殊情形需要费用之援助者，得由该员陈明理由亦请准予酌借。相应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仰光分处

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华侨机工互助社

66. 西南运输处重庆分处报欢迎南侨慰劳团情形呈 (1940年4月24日)

窃职处于本月二十二日欢迎南侨慰问团参加车队检阅，业已马电简报在案。兹将是日欢迎情形及该团主席陈嘉庚、团长潘国渠、海外部部长吴铁城演词另纸录呈。敬请钧察，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陈

附呈欢迎南侨慰问团记事乙纸、陈嘉庚等演词三纸、答词一约

重庆分处处长 汪英宾

[附] 陈嘉庚先生训词

(1940年4月22日)

本团此次回国慰劳抵渝，承蒙贵处两次热烈招待，前两天因时间关系未能与诸位谈话。至于说训话，实不敢当，不过有此机会需要与各位说两句。

第一点要向各位提出报告的就是此次侨胞组织慰劳团之意义。本团五十余人系南洋各属一千二百万侨胞推选之代表，回国向各长官致敬，并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及后方努力抗建以及出钱出力诸同胞。二、去年二月间南侨方面得到宋主任函，知滇缅路完成通车在即，嘱代招侨胞返国服务，前后陆续自愿抛去原有的优美生活以及父母妻子，热烈返国参加抗战工作者已达三千余人，均系抱抗战热情而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无工作无办法借此返国而求生活者。

而且前数批均系技术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及经验者。虽则后一二批略有少数经历差点的，而大多数的技术还是精良，惟对于军事训练较为缺少。因在海外生活安定，无所拘束，故在人数众多中难免无一二品行不端的分子夹杂在内。希望国内同胞决不可因少数不肖者影响到多数，对于侨胞便发生不良印象，那就决[绝]对错误了。要知道滇缅路在抗战时期各路国际线多被封锁之际，确为最重要的国际路线，在该路中有数千尺以上之山岭，道路弯曲，陡坡特多，行车不易。服务此路者，若非有精良技术，特别胆量，决难负此重任。现在侨胞机工既有数年或十余年之丰富经验，胆量亦大，始有绝对的把握到滇缅路去服务，确属得当。故一年来成绩颇好。现在本人可以代表各华侨机工尚有数种要求。因为他们一向在国外，生活是很优美的，每月所得之金钱亦很多，回国是为抗战救国，决不是金钱的问题。所以要求国内管理者对于他们衣食住以及医药问题要特点注意。其次则为新闻报纸应多多的供给他们阅览。但是我提出者决不是过分的要求，是求其适当，就是衣能暖，食能饱，居住地点能合乎卫生，使他们白日工作，夜间可以安息，则他们工作自可发挥莫大的成绩。今天在贵处所看见的队伍，服装、排列、精神均极整肃，惟今日参加侨胞不多，我希望在滇缅路服务之多数侨胞都要与今天所看见的一样，我们要大家抱定爱国热心，努力完成抗建目的，以求达到最后胜利，则可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再有一点，希望各侨胞要知道我们中国是很贫穷的，此次回国我所知道的可向各侨胞报告。现在前方抗战士兵的生活是更苦，每月所得的只十元，除去六元伙食，只得四元。少尉官长亦只有二十八元。还有青年服务团团员多系国内外大学专门或高中毕业生到前方去服务，每月只有十五元。现在我们回国侨胞最少者都有三四十元，比较他们已经好多了。由此我们应认清国内对我们的待遇实在是提高不少。我们回国服务是为抗战，不是为金钱。所以我们收入只三五十元就应该节省，要抱刻苦耐劳的精神，不要浪费金钱。如果不知节省，就是三五百元亦属不够。

总之，侨胞之回国服务，首先要看清，目标是抗战救国，民族复兴，不是来享福过优越生活的。再有一点报告，就是此次回国晤见冯玉祥先生问本人，此次对于战时首都的感想如何？后来晋謁蒋总裁时亦是同样的询问。当时我很诚恳的答复，本市市政建设种种均极满意，惟感觉有一缺点就是不问大卡车、小包车、黄包车等等多是不清洁，一方面既不卫生，一方面又不经济。我们知道，此项车辆多系用外汇购来，如果保养不得法，则机件易于

损坏，寿命减短。希望负管理之责者，对于清洁保养应多加注意。外国城市里对于交通上如发现一部不清洁车辆就要立刻扣留，必要清洁者才准在路行驶。当蒙蒋总裁记下，近数日来重庆市内不清洁车辆已少发现。今天最后希望在此数十位侨胞将本人所说的转告贵处。其他三千侨胞都要抱定回国参战是为国家是为民族增加抗战力量而来，不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来。

67.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关于 接收第十大队官兵编为华侨先锋第二大队的训令 (1940年6月26日)

令运输人员训练所。

查运输第十大队业经撤销，所有官佐士兵已饬向该所报到，薪饷至六月底止。仰即接收编为华侨运输先锋总队第二大队，自七月份发给薪饷。除分令外，仍仰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此令。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68. 陈嘉庚荐侯西反、庄明理住滇缅公路协同兴革电 (1940年12月15日)

蒋委员长钧鉴：支庚两电均经奉悉。庚一行业于文日抵缅，关于滇缅路视察结果，谨陈如次：公路工程，近已多处改善，殊堪满意。惟一部分路面狭窄，转变未顺，坡度过高之处，鄙见仍宜改进。近有载重五吨卡车比前加大，路面狭处，失事颇多，须加宽至一等标准九公尺为度。功果桥、惠通桥经各于上下流添造便桥摆渡，敌机来炸，亦不虞运输有阻。政府禁令，在紧急时期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不许车辆通行，原属安全策划，惟实际上在此六小时内，将来往车辆停塞于两桥前后，如遇轰炸，牺牲更巨。桥之两旁危崖数千尺，如非白日行车，其危险性殊大，得失比较，似以照常开放为宜。又此路交通重要，沿途未设电话，情报难通，非常时期，相需益急，故电话亦应赶设。至于运输管理方面，松懈如前，毫无改进。车辆失于保养，开运仅一年余，业已近半损坏，经常停修，现用只有半数，运量自难增加。鄙意拟委华侨侯西反、庄明理二君暂住该路，协同兴革，藉收臂助。侯、庄二君对此略有经验，

可尽义务。西南运输处陈代主任体诚在缅晤谈，欣然同意。如蒙钧座核可，请另电飭各主管机关遵照办理，并予侯、庄二君以事权上之便利。所有上陈各节，运输统制局刘组长传书，交通部赵工程司履祺此次偕行，所见一致。回渝复命，必较周详。谨祈钧夺施行为荷。陈嘉庚叩。删。

（仰光）

69.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电请径电陈嘉庚先生设法开导侨工电

（1941年2月20日）

重庆陈代主任：密。据陈质平寒电以据腊处潘其武电称，据报华侨司机因不满改编遣散事。认为本处不要华侨，并派至腊煽动，拟就星洲南侨总会四月东日大会之前，派代表携案赴星报告，以致人心浮动。除由潘副处长向各队长负责解释外，转请妥为安置等情。兹事关系重大，似应切实声明，以正闻听。除电复并分飭腊、遮、保各处妥为解释外，敬祈迅赐径电陈嘉庚先生设法开导，以释疑虑为祷。弟吴琢之。巧。秘。

70. 蒋介石令注意华侨机工动态电

（1941年3月21日）

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勋鉴：据报，该处华侨司机因不满改编遣散，曾倡西南不要华侨服务之口号。芒市华侨先锋第一大队长刘寒〔贝〕锦曾派分队长林清会赴腊戍，致电陈嘉庚并怂恿驻腊华侨司机响应，嗣以电费过昂未果。现驻腊之第二大队亦奉令再行缩编，人心不免更形浮动等情。持电知照，即希注意。中正。马。川侍六。

71. 运输编制局请具报华侨司机失业情形电

（1941年3月25日）

蜜。奉军委会办四二养代电开：据西南华侨司机谭荣耀等三月十一日由昆明新村华侨互助社报告略称：窃侨等无故奉总处命令退回训练所，该所复以未奉总处命令，不予收留，致流浪昆明，无家可归，食宿一切难以维持，

恳请设法解释或送返南洋以免漂流异乡等情。兹据前情，特电希迅将该华侨司机等失业情由查明，并妥筹救济办法具复。等因。奉此，特电查照，仰即将上项实在情形查明具复，以凭转报为要。运输统制局。寅有车。印。

72. 陈嘉庚请解答华侨机工填具志愿书之原旨函

（1941年4月19日）

顷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三月十九日来函（上略）据称：贵处近有令饬所属华侨机工重新填具志愿书，按其表格似有令华侨机工离职或中途解职之举。该会为华侨机工服务前途计，函请本会核办等由。准此，查军委会嘱托，本会募集机工原为服务祖国，帮助抗战事业早日完成义举，倘有临时更调，或着其离职时，应先通知本人，以便通告各机工家属知照，兹准前由，相应函请贵处着各机工重新填具志愿书之愿旨见覆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处昆明总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73.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顾树立 护送南侨慰劳团代表蒋才品南返呈

（1941年4月24日）

窃职此次奉命护送南侨慰劳团受伤代表蒋才品先生南返，并代钩座慰问，等因。谨将护送经过及与南侨会接洽情形缕陈如左：

查蒋氏于二月一日乘中航机离昆，次日抵仰即送往当地中央医院，并电新加坡南侨筹赈会派员来仰会送。准电复，仍请职护送，并经钩座电准在案，即于二月二十七日趁轮，三月八日抵新，当即送入南侨会延医诊治，惟病势颇剧，恐难获痊愈。

关于南侨会捐款事项，经与陈嘉庚先生多次洽商，据称：1、捐本处卡车百辆、救济车拾辆，约值叻币二十余万，惟目前英政府编制外汇，无法将上项价款汇出。

2、关于滇缅路铺设柏油事，经与交通部张部长电洽，是项价款估约需叻币贰百万元，款经筹妥，亦以编制关系，无法汇出。

3、南侨会尚有捐款伍百万叻币，亦因外汇统制，无法汇出。

以上各项捐款，除陈嘉庚先生已电请中央与英政府洽准汇出外，并嘱职将所述情形报告钩座暨陈处长质平，再电呈政院设法将上款汇出。

关于职此次出差旅费另案答呈核销。

谨呈

主任、副主任

职顾树立 谨呈

74.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顾树立南洋见闻呈

（1941年5月10日）

谨呈者。职此次护送蒋才品先生返新，谨将此行见闻分陈如左：

南侨对于政府之印象：查陈嘉庚先生此次返国观光，似不满闽政，曾在报端公开批评指摘。又此次解决新四军事件，侨胞认为系内部分裂，内战之开端，舆论界均表不满，责难政府。推其原因，似系共党活动及侨胞认识不清，我中央又未派员至该地作下属工作所致。据新总领事高凌百先生面告，以南洋商报本系陈嘉庚先生之机关报，目前似已左倾……

对于本处之批评：南侨会招待席上公开责问三点：

车辆问题：捐赠本处汽车，行驶不及半载已毁大半，所存者虽可行驶，惟已破旧。

运量问题：本处系唯一西南公路最大之运输机构，而其运量适成反比例，牵至车辆保养问题及管理问题。

管理华侨问题、司机管理问题牵至不爱护华侨司机，据问以：

身亡之司机直至一年后南侨会始得消息。

机工互助社之调查工作成绩毫无。

司机之待遇不足。司机每日奔走于公路，膳食皆无定处，每餐皆至饭馆，至少平均二元，则每日伙食费须五六元，又杂费等均须二、三元，每月每司机至少须二百元左右始能过活，而目前待遇过低，皆质当其行装以求生活，或行法外之事，而行收获。故出走之司机颇多（职出差滇缅路时，司机不满意者颇多）。推其原因，事实上本处应负之责亦有……

查马来亚侨胞占该半岛人口总数之五分之三强，经济权亦操纵于我侨

之手，惟我国过弱，国际地位不均等，我侨胞受殖民地政府之压迫，无法反抗，深望祖国日强。故革命之完成与此次抗战，侨胞尽力筹赈……抗战以来，回祖国服务之华侨多在本处，又捐赠本处车辆亦多。本处除负有军运之责外，尚应注意及侨胞问题，盖本处系与华侨发生直接关系之机关也，故似应注意及下列问题：1、司机的教育。2、司机的管理。3、司机的待遇。

又查华侨机工互助社似应普遍成立分社，注意及调查统计及福利诸问题。至福利社之组织亦属重要，似应请拨专款组织之。福利社包括下列数种福利事业：1、浴室，2、膳堂，3、宿舍，4、图书室，5、康乐室，6、储蓄，7、其他。

又查本处既系与侨胞发生直接关系之机构，供职本处之华侨多系由星洲而来者，故新加坡分处已撤销……与华侨接洽事项，并可协同领事馆作调查工作及宣传工作。

以上各点谨请核夺。谨呈
主任宋，代主任陈、副主任吴

职顾树立

75. 侨务委员会请核办华侨机工请求救济函

（1941年6月30日）

案据本会昆明侨务局三十年六月五日呈略称：近据服务西南运输处之华侨司机多人来局声称，因奉令缩编，致无工作，加以生活压迫，不得不脱离原有职务，请予救济，或资助重返南洋。等语。当于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函请西南运输处将编余司机名单，及编遣待遇办法查明见复，旋准函复，此次车队改编，并未遣散华侨司机一人，仅编队施以短期训练，一俟新车到达，即可分派工作，请代为开导着至指定大队报到。等由。复查华侨司机到该大队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一，余皆散处各地，迹近流浪。其所以不愿报到之原因，实由待遇太低，不足维持生活。今若不详加调查，指导及救济，则风声所播，诚足影响侨胞内向之心，而为敌伪所快。恳请准予转函西南运输处交涉，除机工原有薪饷外，应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给予生活补助费。其无意重返工作者，宜给予南返川资，另谋职业。等情。查华侨司机，抛弃原有职务，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其拥护党国之热诚，至深且切。乃近常发现华侨机

工，衣履破烂，困苦堪怜。此种不幸现象之所以造成，实因每月所得，不足维持生计。当此抗战已达最后关头，凡属国民，固应各尽所长，为国家努力服务。但服务机关亦宜顾全其生活，俾可安心工作。如人浮于事，不感需要，似当资遣南返，俾得归宿。本会前据陆军辎重兵汽车第三团第三营第八连全连华侨驾驶兵呈请救济，亦经转函军政部请酌予加给生活补助费在案。诚以华侨机工系属专门技术人才，似不宜以普通士兵看待也。除令行昆明侨务局详细调查流落各地之华侨机工，予以抚慰，晓以大义，婉劝前往预备大队报到受训外，据呈前情，相应函请查照核办，并希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此致

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侨务委员会 陈树人

76. 仰光分处转陈嘉庚八月十六日函电

（1941年9月30日）

昆明总处钧鉴：案准陈嘉庚先生八月十六日函开：接六月二十一日大函暨名单乙纸谕悉。乙是华侨司机回国服役，原属服务报效性质，与资雇不同，且回国期间已逾两载。当时系彼等爱国情殷，踊跃投效，原无约定在役年限。如贵处有相当待遇，料不至有他图。间有一二自由向他公司任职或系为生活问题，贵处应委婉劝其继续为国效劳，似不可加以逃走之罪，致远道传闻，滋生误会。等因。查六月二十一日函并非本处所发，理合电请鉴核示复，俾便转复陈嘉庚先生，并恳妥善处理，免伤侨望为禱。仰光分处陈质平叩。陷。总午。

77. 郑琦拟《华侨机工状况》函

（1941年6月23日）

慎余吾史大鉴：华侨机工人数统计训练所与前公路组所列颇有出入，互助社成立在后，无案可查，难得确数。弟向各批回国华侨查询，参考各方名册，得三千人之数，亦不敢言确实也。近日编余若干人，向预备大队报到者若干人亦无案可查，请就近向管理组一查可也。专此祇颂

公绥

华侨机工状况一稿遵命拟就，不知足供参考否。附呈。

弟郑琦叩

【附件】：

西南运输处之华侨机工 本处华侨机工之起源及来源

本处之有华侨机工，起于民国二十七年。当抗战开始，南洋侨胞激于爱国热情，多自动愿回国服务。当时槟城机器工会，曾遣送侨工两批回粤，其中一批三十二人，即服务于本处。同时本处既感于侨胞之热诚，且正在需用驾驶修车及电工等技术人才，特请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代在南洋招募此种侨胞回国服务。于是马来亚各地华侨，闻风而起，纷至新加坡请求参加，为国效力。遂于二十七年十月遣送第一批，以后继续办理，至二十八年冬，计共遣送十批，约二千九百名——第一批八十名，第二批二百零六名，第三批五百九十六名，第四批一百五十五名，第五批五百三十四名，第六批三百四十九名，第七批一百一十七名，第八批三百三十二名，第九批五百零九名。时该处殖民政府禁止南侨筹赈回祖国，故是批只得十二名，十批合计为二千八百九十名。又有暹罗华侨多人，原于抗战以前自动回国服务，及抗战后，本处组织成立，彼辈又向本处投效，以及抗战后自费回国，由海外各地帮会专函介绍来处，请予考试收容者，约计百名。总计此三千华侨，均先后在本处司机训练所及运输人员训练所分组训练，毕业后皆分派在本处各运输队及各厂站等担任驾驶或技工等工作。

本处华侨机工之现状

三千华侨机工服务本处，三年以来，不独平时多能忠于职务，对于历次抢运，如广东、广西、同登、滇越、滇缅诸役，尤忠勇奋发，不畏艰危。在敌弹射击轰炸之下，冒险工作，间有深受重伤，仍不退缩，终能达成其任务者。其劳绩尤足纪录。惟近年以来，因内地物价飞涨，本处因限于经费，

对于员工薪给，未能增加，待遇莫由改善，生活日感困难，少数不良分子及志气不定者，不免有犯法之事。适值各处商人经营运输事业者日多，即以腊戍一地而言，新组运输公司多家，需用司机至二三千名之多，尤喜用华侨机工，其待遇均较本处机工高至数倍，颇多招引本处华侨机工者。加以本处为军运机关，员工犯法，当按军律处置，不若商民之宽纵。以故此辈华侨机工，内受生活之压迫，外受种种之引诱，渐生外向之心。又值本处因车辆日少，司机太多，为求撙节计，乃将各运输队加以改编，责令各队对机工加以甄别，另设预备大队收容编余机工，着在队听候，俟有车时再行编队，另派工作。编余机工，心益外骛，颇多至腊戍方面为商车司机者。查本处此次缩编，编余华侨机工计□名，现向预备大队及送赴训练所重施训练者计□名，离开本处者已有□名，虽经本处严令，以后不得擅自离队，否则以弃职潜逃论罪。但对于业已离处者，因限于经费，不能增加其薪给，既与商车及其他机关司机待遇悬殊，若此，欲一时将彼等招致来归，办理殊感困难也。

特殊情形

华侨机工皆闽粤人氏。南侨筹赈会遣送回国者，第一批至第五批，对于驾驶或修车等技术，十九有相当经验。以后各批，收容较滥，但亦多技术精良。言其性情，则爽直而热烈，言其举动，则活跃而放浪。且久居热带海岛之地，又因殖民政府但求供其劳作，此外不加苛求，平时故与放纵，不加管教，文化水准因之低落，久习于放浪自由之风，多有好勇斗狠之气。性情习惯言语生活，皆与国内不同，以视国内近日曾受本党及新生活等严格整齐之训练，更相枘凿。一旦归国，为国服劳，与内地军警人事自不免时生齟齬，互相摩擦。但彼辈回国初衷，确为激于卫国抗敌之情，牺牲其职业，离别其家庭，万里归来，为国效力，其热情至堪嘉尚。各队长官，倘能知其习性，略迹原情，赏罚严明，甘苦与共，言行以身作则，使其心悦诚服，则一旦有事，激发其忠勇之天性，信能慷慨赴义，视死如归，诚可用之材也。

（作者按：以上档案选编系根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国民党云南侨务委员会》等档案选编的。特此谨向时任云南省档案馆顾金龙副馆长、张文芝等同志敬致谢意！）

四、南侨机工重要文献辑录

（一）《南侨回忆录》中有关南侨机工史料（节选）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

第六号

——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

为通告事，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修机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修机者按数十人），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会或分支各会接洽，并注意下列各条方可。

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粗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以不嗜酒者），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者。

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算起，如驾驶及修机兼长者，可以酌加，须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处，概由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凡应征者，须有该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方合。

本总会经函达各地筹赈会负责征募，各筹赈会如经征取考验合格者，计有若干人数，须即列报本总会，至应募者前往安南路程。如能由所在地筹赈会办妥手续，直接出发，固妙，否则可由本总会设法办理。

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是要，此布。

中华民国廿八年二月七日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86页）

华侨司机回国

我国抗战后，海口概被敌侵占，外货可入口者，只靠香港、安南两路而已。滇缅路甫在开创尚未通车。及广州失守后，香港存积货物军火二万余吨，我政府乃将西南运输办事处移设新加坡，名曰“西南运输公司”，总机关设在昆明，主事宋子良君。香港存积货物大半移往仰光，由滇缅路入口，其余则由安南入口。滇缅路将通车时缺乏驶车机工，且新路多崎岖，驶车者非老经验必多蹉跌。宋君来电托代雇司机及修机工人等回国，往滇缅路并西南等省服务，除薪水外膳宿衣服医药概由政府供给。南侨总会乃出通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属会鼓励，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三千二百余人。经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经仰光者三百余人。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诸机工到昆明须经军训两个月乃出服务，其训练多属军式礼节。实行服务后有少数人逃回。寄来之通讯亦云，“待遇甚劣，不依照所约办理，如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乏精神，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云。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85页）

派员视察西南运输

余闻悉滇缅路办理及待遇司机不善事，难免寝食不安，乃举派代表由仰光入口往昆明，沿滇缅路视察事实。且度所传如不虚，或由路甫开竣未暇设备，或限于经济因陋就简。若限于经济，南侨总会可以代筹。余按滇缅路由宛町至昆明九百余公里，可分作六段，每段一百五十余公里，当设七个停车站。每站建几个停车亭，可容货车三百辆，面积五六万方尺，每方尺建筑费国币一元半共约八万元。工人寄宿舍伙食房阅报室医院二万方尺，每尺以二元半计共五万元，两条合计需十三万元。七个车站共九十一万元，再加零费九万元。合计作一百万元，申坡币二十余万元。就使再加十万八万元，亦容易办到。乃详列此项计划交代表带去，并嘱沿途考察，逢站特别留神履勘，

作事最患乏金钱，金钱如便何事不成。如此设施非但为华侨司机工人计，亦为抗战军运成绩计。该代表于民国廿八年秋起程，沿途来函报告果如前闻，“所经各站设备极形简陋，并不敷用，所遇各华侨机工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迨至昆明急向龚主任提议，将余所计划条件呈交，请其赞同从速兴工，并交涉改善他事，该主任答伊无权主张，待备文往重庆请命。代表不能久待归来，余函电昆明均未得确实消息，并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告以滇缅路车站设备不周，办理不善，请速改妥，虽屡蒙覆电嘉奖，第不过官样文章敷衍而已。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87页）

军火货车损失数

七月卅一日，余往西南运输办事处，见主任裘学遂，请备一辆汽车，后天早为余坐往下关医院，看前慰劳团员蒋才品翻车受伤事，蒙应承准备。余问“敌侵安南海防，闻我国损失军火原料七万左右吨，是否事实？”答“实情，但有一部份赶运往新加坡约一万吨，又一部分在机房，请美商挂牌作其货物，如能保亦有一万余吨。”又问“前日在滇缅路某路栈房爆炸，损失军火甚多，并死数十人有是事否？”答“亦事实。损失价值给港币二百余万元。死伤五十余人。”又问“为何因炸发？”答“中央已派专员查勘，结果认为自行爆发，非被人有意来炸者。”又问“滇缅路我国界内等站，计积存有若干军火原料未曾运往内地？”答“连昆明合算有五六万吨。”又问“自英禁止后，有无再从缅甸运出乎？”答“未有。然自前月未禁时，日夜极力运出缅界有两万多吨。”又问“未禁以前逐月可运若干吨？”答“四千左右吨。”又问“汽货车现存可用者若干辆？”答“原置三千辆，现可用者约一千辆，两三百辆在修理，余者概已损坏矣。”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3页）

滇缅路捐资亦无效

八月一日，为昨天龚主任约往参观运输车栈，余复到其办事处问“前敝代表曾提议滇缅路各站，应添建货车停宿栈，又司机工人宿舍膳所等，如政

府欲节省此费，南侨总会可以负责，后来如何解决？”答“当时计划预算须三百多万元。财政部不准，故尚搁置。”又问“余当时预算六七站，至多不上一百万元，何须加许多倍？”答“报告财政部时，系连贵阳桂林各站合算故须许多。”余云“如此误事，实出我意料之外。”又问“华侨司机数月来服务工作如何，疾病减少否？”答“工作较前顺利，且在此设有华侨司机互助社，俾可联络感情，遇事容易通融，拟待日后复设分社于各站。至疾病事比前减去不少，各站均设有医院，如较重者则移往下关总院，因设备较为完全。”余云“互助社如有精神办得好，医院能多设，则运输受益不少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3页）

司机多礼节

龚君导余参观车栈，在该栈办事处楼上座谈。一华侨司机前在新加坡任某医生司机者，入门见余等即举手立正行礼，又向龚君亦然。辞出后，少顷因事复来，见坐中有续来某君，复向他举手立正行礼。此种礼节之繁，为在洋及回国后未曾见。延安无阶级固勿论，便是重庆及各省县亦未见过。岂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所特有者乎？又一华侨司机告余，伊是新加坡李某（与余久相识）之孙，“为爱国服务而来，在此再受训练数月，毕业后已经半年，终日赋闲无工作，虽政府供膳宿及半薪，然非我志愿。”托余向龚主任疏通，早给伊工作。余问毕业无工作者若干人？答百五十余人。余转询龚君，答“三四个月未有工作可给，又逢滇缅路封禁，现正查询别条路有无需要，料不久便有缺可工作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3页）

西南运输费

余问龚主任，“华侨回国诸司机，多系久有经验，来此须再训练何项？”答“军人化管理法及其他等。”又问“若久卒业？”答“两三个月。”问“全校学生几多？取何程度？”答“二千左右人，除华侨外，国内多系小学毕业，初高中生亦有。”问“教职员及经费若干？”答：“教职员及工役计五六百名，经常费每月廿二万余元。学生现分两校，一校一千二百

左右人，又一校八百左右人。”又问“贵机关及分处，逐月经费若干？”答“二百余万，多从香港汇来。前日因国内汇出不便，某处又汇来不及，由宋子良君私人向香港汇丰银行担保，借七百万元来接济。”又问“宋君现在何处？有来此否？”答“现在香港。前月为调查爆炸，及英国封禁事，曾来监督赶运十数天，已回去香港矣。”（前日李宗仁君在老河口云，宋子良被蒋委员长扣留不确）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4页）

下关腐败主任

余不向筵中诸人辞别，即戴帽执手杖先行，侯李杨随后亦来。出门再行半里许，方到停车处，登车即行。余告杨君云“运输安能有成绩。以下关站之重要，而委此腐败主任。昨晚余辞医士设宴，彼已闻知，早间又吩咐简便午饭，彼乃复设三酒席，骗余为大理绅商所备。已食两点钟久，尚再购来两瓶酒，再迟一点钟或未毕席。余原按午饭后，往市店参观各贩卖店之石器，兹为赴筵所误竟不得往观。昨晚与交通部长订约午后参观其工厂，西南运输工厂亦须往观，现虽赶往，恐到时多已停工，晚后各机工又将开会，岂不迫促乎。西南运输委此腐败之人，有意如此开消，彼必呈报昆明机关，欢迎某某费去至少千元，其实为他舞弊，且误余工作。回到昆明可向龚君言之。”杨君云“均是一丘之貉，如昆明机工互助社，专为华侨而设，理应任华侨司机妥人为主任，他则不然，委用其私人月薪至三百余元，社内职员卅余人，每月费款八千余元，无裨华侨司机实益，其腐败如是，所云欲继设分社，不外增委私人已耳”。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6-197页）

运输不统一之错误

近晚到下关，参观交通部，及西南运输等停车场，及修机厂，尚有其他如中国红十字会、经济部、银行、及别机关，统计汽货车客车等，有六七部份，各自立门户，如添油站、办事所、停车场、修机厂，各独立创设，若货车少者，则未有修机厂。均为政府公用车辆，而机关林立，不特多占地方，

多用许多人员，多加费用，且各部份人员互生意见，如某部份缺何物品或汽油，别厂虽存许多，亦不肯借用。甚至医院亦如是，除西南运输处车多人众设有医院，其他均未有。西南运输处货车有一千余辆，交通部货客车数百辆，其他百余辆或数十辆。机关愈多，设备愈简，损坏及停修者亦愈多。运输成绩当然减少。此概为不统一所误，若能统一主持机关，不但逐月可减许多用费，设备亦可完善，损失定可减少，运输必较有成绩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7页）

前赠机工物领不足额

晚餐后，赴华侨司机及修机等人之会，到者百余人。多有问客年南侨总会惠送机工等衣被鞋每人若干件？余答由仰光入口者有洋毡被一千八百件、蚊帐二千件、棉背心二千件、卫生衣二千件。由香港寄安南转昆明者有卫生衣一千二百件、纱内衣三千二百件、胶鞋三千五百件、袜七千双、二南衣裤三千二百套。洋毡被按分送第一批至第四批为止，若第五批起自新加坡已有购送。蚊帐与背心，系分送在滇缅路服务者。计每人多者九件，少者六件，即减蚊帐、背心、毡被三件而已，诸司机云：“余等亦略知应得数额，然多领不足，领得九件者只有极少数人，如重要之洋毡被，甚多人领不到，蚊帐亦然，其他亦多领不足。”余在洋时曾闻被公务员取去不少，今日闻诸人言始信之。有人问缅甸经禁出口，现虽有我国界内可转运工作，若运完将如何？余答封禁只限三个月，到限英国定必开放，可免介怀。并勉励努力服务，敌人气力已衰退，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7-198页）

滇缅路最高处

昆明至下关四百余公里，此段路线未抗战前已开辟，但稍狭，未铺石子。按世界路政阔度分三等，即七公尺，九公尺，十二公尺。滇缅路为九公尺，抗战后开足尺数，路面加铺石子。沿路多高山。今日行时，见中间路边树立一碑名“天子庙坡”，高由拔海算起，八千二百余尺，为全滇缅路最高之处。时虽初秋，见不远之高山上白雪如云，满罩半山之上。沿

路石山虽不少，然能生产之土山亦甚多，水田农园到处多有，远胜西北及贵州诸省。若日后政府能改良农业及水利，则云南此一部份之生产，定可增加数倍。如由滇缅路再开无数支路，则由可生产之山地及矿物，更可获无穷利益。且气候温和，不甚寒亦不甚暑，雨水颇足，在西南诸省中，实不我得之乐土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8页）

车路管理仍腐败

八月三日，余等四人离下关，乘汽车回到楚雄，约下午四点钟，仍寄宿中国旅行社，嘱车夫明早六点起程。车仍驶到西南运输站寄停，时货车尚未来。越早余待至六点半，车夫尚未到。侯君亲往探视，回报被后到各货车数十架阻塞不得出，而最后到之货车夫，不知寄宿何处，车之钥匙被带去，现方派人寻觅。待至八点余钟，各车夫来始将货车驶出，乃得起行。车站陋习如此，西南运输安有成绩可言。如非余急需汽车，则数十辆货车，俱须待最后到车夫来开车，方得驶出，一日之中已空费两小时矣。自去年派刘代表来视察。便知货车停栈无秩序，不但阻碍运输，连修理及清洁咸都不便。车夫无宿所，任其散处外间，难免嫖赌怠工等弊。精神既差，危险易生，此为必然之势。当此军运紧张，而当局冥顽无知如此，可胜叹哉。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9页）

一月内改善三事

余等由楚雄回昆明，日尚未晚，顺途先往某温泉浴室沐浴，及到，见其设备甚简陋，且秽杂不洁，大失所望，即回旅行社。越日往见龚主任，告以沿途各站所见以及楚雄汽车遇阻事情。自前年刘代表报告，迄今经年绝无改善，汽货车安得不多坏，运输安得不寡少。龚君答伊虽负责主持，然重要机关人员，多是宋子良君委派，逢有不法当革辞者，虽屡告亦无效。余见龚君是诚实人，非狡诈圆滑之流，所言可信为事实。然余不得不再进忠告，冀可挽救多少。“（一）货车到站栈，段排列有秩序，留空路使各车可自由出入。（二）货车到站栈排列后，须雇定工人洗净泥污。余曾见放在车身底下

之副车胎，染泥土如燕巢，足知许多或始终未洗除。若南洋司机之管理法，日日必要洗净。（三）货车到站后，若机器稍有不顺，司机人应即报告修机司，立即修妥，明早方可出发，如此可免途中停顿损失。以上简单三件事，普通管理人都晓得，只在当局命令监督实行而已。非挟泰山超北海做不到之大事。”余又言“余至渝无多天，蒋委员长问到此观感如何，余答政治原不晓，工厂尚未往参观，唯见市中人力车汽车甚不洁，满涂秽泥，令人憎厌，不但其车易坏，而观瞻上亦不好，影响所及，即有不卫生之弊。若南洋市政管理甚严，各车日日须要洗净，否则科罚。蒋君立登记随身手折，后十多天便见人力车大异前日，多已洗刷清洁。”龚君云“决接受君所言三事，一个月决实行改善各处车站。”又约余明天赴西南运输训练校，及司机等联合欢迎会，余应承之。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9-200页）

安危及薪俸比较

八月八日，西南运输训练校及司机等，开欢迎会，主席龚学遂致词毕，余答谢，并言“我国为世界最落后，及最贫穷之国家，故敌准备侵略之初，仅按数月便可吞灭我全国。然抗战于今三年余，敌人不但计划失败，而最后胜利且当属我。余此次往首都，及西北河南湖北各省，亲闻各战区司令长官、参长总司令等报告，我国民气日旺，军力日强，而敌则气力均退降，故咸都抱乐观景气。虽然如此，仍要靠万众一心，耐劳耐苦。如在前线与敌人赌生死之军兵，每人每月薪金伙食合计只十一元半，排长仅卅二元，上将原定八百元，现仅领三成二百四十元，中将原六百元，现领二百元，少将原四百元，现领一百五十元。又如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多系中学毕业，或修业者，大学生亦有，多自动参加，有步行两三个月而来者。训练期间不定，二个月至四个月，便往战区服务，向军民宣传联络感情，鼓励合作团结，并教士兵识字，或代写家信。每月薪金伙食仅一十五元，近因米贵津贴多少米价而已。自抗战迄今，毕业往战区服务者已有四万余人，成绩堪称满意。以上系白副总参谋长，及陈政治部长同时告余者。又余至青海省，该处厅长薪俸每月经仅卅八元，闻贵校人员，及司机等，薪水百元以上至二百三百元者不少。比较上言诸人工作，安危及劳苦相差甚远，而薪俸则更优。应当如何努

力，和衷共济云云。”其勉励与褒奖各项，与在重庆西南运输会所言略同。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00-201页）

视察滇缅路委员到昆明

廿八日早，余离贵阳将往昆明，是早在途中觉甚寒冷。越日午后车机忽坏，不能再行，幸距离西南运输车站不远，延至晚后乃坐运货车来昆明。来时已近午夜，仍寓前之旅舍。越日为十二月一日，往西南运输处，询政府所派有委员到未，龚主任答，重庆派来两位已到，一为造路工程师赵君，一为统运局委员刘君，而西南运输处要派一人未到，大约今明天可到。乃约定再三天同行，余即通知昆明同乡会，约定明晚开会，又往见建设厅长张君，问云南对田赋有无增加，答前月省参议会，接主席提案开会，讨论结果决议，待新年增加，要加若干待春季决定。又问数月来对省内运输，有无统制，答无有。又问有向民众派买军米，及兼营贸易货物乎，答亦无有。余乃告以闽省可苛政，张君言此间概无有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86页）

辞行复献议

十二月三日，余与中央所派两委员及西南运输所派一委员，会议此次沿路进行视察等事，并订明早同车起程。而西南运输所派之人，即前下关主持人李某，余以此人前次欺弊浪费，心甚不满，不可与共事。乃告龚君另委他人。答现无别人可委，拟电保山主持人，待余到保山时参加，余应承之。余即定明日早将起程，则再发一电文与蒋委员长云“余明早将同委员沿路视察，从此出国敬辞。前日在赣州、泰和、桂林呈上三电文，想均收览，迄今未蒙覆示。查黔、滇亦无如闽苛政，是则南方各省，独闽民最惨酷，故不能忍心坐视。至战时统制虽需要，如有好公务员则有益，若我国人窃以为有害无益。故不论何省，万祈勿轻施统制，只须严禁囤积，及平安物价，要视官吏肯否奉行。谨贡愚诚，希良裁。”余虽明知屡言无效，然爱省爱国之心不能自己，再尽最后之忠告，成败均不之计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87页）

敌机炸两桥

滇缅路运输，自十月十八日英国开放后，敌机时常来轰炸，闻两个大桥多被炸坏，军火减运不少，每天仅可行半日而已，余甚为忧虑。适龚主任请往其家午饭，遇陈君体诚亦在座，他系代理宋子良君之缺。宋君为西南运输主持人，因告假往美国医病，故全权付陈君负责。余问陈龚二君，两桥被炸损坏如何，答一功果桥，一惠通桥，功果桥较无紧要，惠通桥则甚有关系，因用钢索吊造，若该钢索被炸断，则不能通行，然已被炸断两三条，眼前尚可维持。余问钢索有余存可续否，答恐无之，经电美国办买，但敌机尤注意惠通桥。蒋委员长已下令，每天自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三点钟止，均禁止通过。余闻后亦以为甚严重，因敌机时常来轰炸，非达目的安肯干休，陈君云渠近日将往缅甸。余问乘车或乘飞机，答乘机。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87-288页）

功果桥无妨

四日早余等与两委员，坐两汽车由昆明起程，余及赵工程师李秘书同一车，侯西反庄明理及刘委员同一车，余告庄君等注意沿路，如见某处欠阔或弯不妥，抑或有危险性，均要登记，待停车或到站互相查对，是否相同，并告知赵工程师。然沿路所记载，须改善者大都相同，赵君亦承受修改。是晚寓楚雄中国旅行社。越早复启行，午后至下关。余复往医院视蒋才品君，仍不能起床，乃与议定不日由医车运送至仰光，经医院长应承，并要派一医生同行。余等复起行，是晚到永平，寓旅舍。越早复启行，近午至功果桥，该桥长二百余尺，系用钢索吊造，其江水颇浅。自敌机来炸，已在上流距离半公里，江水更浅，江面更狭之处，再造一新桥，将竣工，以作预备。此桥免用钢索吊造，系用桥柱，工程极容易，故不惧轰炸也。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88页）

敌炸惠通桥

十二月八日，鸡鸣时离保山将来芒市，因惠通桥上午九点钟起，禁止通行，故须赶早起程。至桥时八点半，余等下车步行桥上，详细视察桥之两端，近处俱是高山，大约高可五六百尺，敌机来炸许多次，因山高不便低飞，所下炸弹不下千百个。桥边屋舍尽行倒坏，山下各处炸弹痕无数，桥中虽有炸坏，然非要害修理一两日便竣。唯钢吊绳在右桥头，炸断两条，计该桥两边各用二寸径钢绳九条，虽断两头，尚有七条，据赵君言，如有四五条尚足通行。桥长仅八十公尺，桥下江水缓流不急，自水面至桥板，高卅英尺。余问赵君江水涨落相差多少？答终年如是，相差少许。又问流水急慢如何？答亦不甚急激。自敌机来炸之后，交通部经鸠工从两桥头开斜路至水面，拟用渡船运货车，可免专倚靠该桥。以卅尺高之斜度，便至水面，路途不过半公里外。若有渡船可通，该惠通桥纵或被敌机炸坏，亦无关紧要。而敌人极力轰炸许多次，尚未甘休，亦是愚笨，所可怪者，西南运输处两要人，但知桥坏有运输不通之危险，竟不知虽炸坏，绝不至阻碍运输，有何危险可言。而身负抗战军运之重任，不曾到地履勘，昆缅往来只坐飞机从天上过，安能知晓实际状况乎。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89-290）

惠通桥之禁令

惠通桥两边均立碑揭示蒋委员长严令，禁止各车辆非时过桥，每天由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三点钟止，并说明该时间防敌机来炸，故须停止通行。距离桥头两端数百步，并设有闸架，查其原因，为恐敌机常于该时间内来炸，货车适运到桥上有被炸之虞。然该桥长仅八十公尺，运货车瞬息即过。且车夫如闻机声，定驶往树下可闪避之处，何致在桥上被炸，此乃普通人所能晓，兹乃禁止该时间内通行，未免致使两端货车连接许多辆在路上等候。如敌机来炸，岂不更觉危险，无乃安危倒置乎。况该段路程甚崎岖，夜间不便通行，日间又减少半日，阻碍军运不少，真乃一举两失。我国人学识浅陋，而负责人亦如是，妄报上峰下此禁令，可胜叹哉。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90页）

滇缅路应改善之事

昆明龚主任，前次对余应承，改良运输三件事，准在一个月內各站实行。余此回沿途所见，仍旧腐化绝无改革一件。是晚在芒市，与中央两委员，及保山运输主持人等开会。余言沿途视察已告终，明天将离别，对于改善路政，若干处路面须增阔，又若干处弯曲，亦须修妥，及某某处有危险性诸项，赵工程师逐一接受，云当积极改善。至管理运输腐化事，此条龚主任既食言，希望刘委员回渝报告，设法改善。余待到仰光，电请蒋委员长，如获同意，则留侯西反庄明理二人，尽数月义务帮忙改妥。又各运输处各立门户，同为政府服务而不统一，不但人多费大，所需各物不相周转，甚至互生意见。车夫亦无一律牌号，由各机关自编号码，如西南运输之车，自行列号，交通部之车亦然。凡途中相撞触，发生争执无从裁判。车夫既乏相当惩戒，更任意不守路线，故翻车冲突损伤等事，无日或免，损失之巨何只数倍。西南运输两年间，置新货车三千辆，现仅存可用者不上一千辆，每辆平均仅用六个月而已。若南洋货车，每辆至少可用五六年。虽无乌油路面，亦不应如此速坏，此完全由管理无方所致。予并将管理腐化各亲告知刘委员，请其回渝报告当局。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91页）

华侨机工非罪禁暗房

有一华侨车夫，非其罪而被西南运输处拘禁暗房已三天。侯君闻知往交涉，始放出来见。乃潮州青年人，系新加坡华侨，为爱国而来。时天气寒冷约五十余度，余重裘尚觉冷。该车夫似非劳动界，身上只穿一领单布衣，余问“你衣何如此单薄？”答“前在南宁服务，衣服一切均在南宁，失陷时适赶运军物在外，致所有衣物尽行失陷，当局云要赔补，迄未见赐，数月来衣服甚贵，无钱可买。”又问“禁在暗房，有被席给你否？”答“无有。”余伤感之余几为下泪。因余在南洋多方鼓励诸机工三千余人回国服务，今亲见些景况，并忆其他类是者，不知凡几，故不免自咎，且代为伤悲。乃送他五十元为买衣服费。又问“被禁因何罪？”答“有某司机是余朋友，余因暂

停未有工作，帮助该友驾车，该友犯罪逃走，故当局捕余往禁耳。”侯君西反将回昆明，与余握别，余付他千余元，托其沿途到医院，慰问华侨车夫，每人赠一二十元。后余回新加坡，接侯君来函报告分赠完毕。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91页）

“华侨先锋队”货车何处去？

十二月九日上午，余离芒市来宛町，入市午膳。见西南运输车场，有数辆货车，均名华侨先锋队。视该车甚陈旧，似乎已用过数年，然该车系本年春初，始由西南运输处请求，并电行政院同意，由南侨总会捐买一百辆，费新加坡币二十余万元，对英政府声明系在缅界内需用，故免由逐月义捐汇款内抵扣。四月杪在仰光交车，添造车斗至六月间完竣，开始运货。迄今仅五六个月，何得如此陈旧。至先锋队之名，乃西南运输处所编号，前曾函渝告余，故知之。该车后来多有运至昆明者，不但行缅甸而已。庄明理君同余至仰光，即将回昆明，余嘱其沿途调查此华侨先锋队，一百辆车现存若干辆。一月后接庄君自昆明来函，云仅存可用都廿三辆，其他七十七辆有损坏者，有乏附属品可修理者。又其年秋间复买赠货车一百辆，计是年共赠二百辆，而后来之一百辆不知下落如何。南洋华侨募捐款项，多由零星凑集，如百数元，或十元八元一元两元，辛劳工作积少成多，非是同资本家一呼便集之容易措办。而彼辈公务员，则视若泥沙，上峰复委任不晓事，不负责之私人主持此抗战重要之军运，可胜叹哉。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92页）

在仰光电蒋公报告路政事

十二月十二早，余离缅京来仰光，近晚已到，仍寓曾君和衷行内。越日即发电蒋委员长云：某日两电均悉，余与委员视察滇缅路已毕，路中凡太狭及弯曲危险者，经与赵工程师酌妥速改。近来新到五吨货车，比前三吨者加大，故非速改不可。西南运输管理无方，车机易坏，运输减少。前龚主任许速改善，迄今数月仍旧腐化。经与刘委员商酌，留侯西反、庄明理在各站三数月，帮助改妥，以尽义务。如蒙赞同，请电示昆明龚主任，俾两人有权可督促各站负责人。至其他各运输，多设机关，各立门户，而不统一之害，经

详告刘委员，希待改善。路中功果桥、惠通桥，任敌机如何轰炸均不能阻碍我运输，因免经该桥，尚有车船可渡。现每天禁半日不许通车，实极错误，不但减少军运，且反使货车均停于桥之两端，更觉危险，希取消勿禁较妥。余再五天往槟城。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293页）

（二）华侨机工在滇缅路

——西南各省实地视察记

《南洋商报》特派记者 楚琨 戈丁

抗战的炮声，使海外数百万中华儿女，渴一般地惦记他们的祖国，那些没有看过祖国的侨生，尤其急于回到“祖家”，看一看锦绣的河山，并为保卫锦绣的河山而奋斗。

滇缅公路需要大批熟练机工，运输军火去，这是华侨青年投效报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从槟城、怡保、太平、马六甲、吉隆坡、芙蓉、新加坡、砂朥越、泗水以及马来亚许多角落，涌出了数千个热血的机工，在筹赈会的号召下，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些热血可嘉的机工，有的丢了职业，有的离开了新婚未久的妻子，有的和家庭大闹革命，有的变卖了个人的私产，因为他们可以到可爱的祖国了，他们将运输军火打鬼子去！

于是从今年（1939）春起在西南的山国里，在高黎贡山与澜沧江之间的高原上，开始出现无数英勇的华侨机工，以熟练的技术，驾着载满了军火的汽车驰骋！

短期的训练

这些华侨机工，无论从海防登陆的也好，从仰光登陆的也好，一律要送到昆明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受短期的训练。

这一个训练所，设在市郊，原是昆明师范的校址，有幽雅的花园，广大

的操场和高耸的洋楼，我们的华侨机工便是在这里受训练的。

他们的生活是很紧张的，五点钟就得起身，训话、吃饭、上讲堂、操练。下午也不得空。午饭完了，又是上操场，又是训练。

科目有政治、驾驶、军训、修理、驾驶实习、军事学、构造、供养。

出操自然是苦的，一向过惯了自由主义的生活的华侨，忽然要受军事训练，起初不免有些那个。然而当他们知道自己所负的运输责任和普通运输并不相同，他们是“驾驶兵”，而不是普通的司机，他们必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负得起这个大责任，他们就积极地学习了。

训练所有一间涂满血迹的房间，最能激起华侨复仇的情绪。那是去年（1938）的事了，敌机狂炸昆明，一百多个广西学生，正在受司机训练，住在训练所的一个宿舍里，二三颗炸弹就把这些热血的学生的生命毁灭了。他们的眼睛多半没有闭，他们的血溅在墙壁上，溅在木柱上，老洗不掉，华侨机工每一次看到这些殉身者的血，他们仇恨敌人的心便加强了一分。

第一间血房，现在是干部训练班学员的宿舍。

第一、第二批的华侨机工训练了两三个星期就出发了，因为许多军火待他们运，第五第六批也是很快的。

他们出发的时候，长官送他们旗子，上面写着“保卫祖国”。同济大学、西南联大来慰劳他们，因为他们将负起保卫祖国的重担。

他们多么高兴啊！一辆辆从美国买来的新车在遮放、腊戍等他们接收。他们唱着出发歌，高呼口号，坐在数十辆大卡车走了。

车在我们的手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奔赴沙场。
统一意志，集中力量，
冲，冲没了一切恶势力，
干，干澈了领袖的主张。
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
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

“道路为乡车为家”

离开训练所的机工，便过着“道路为乡车为家”的生活。

云南的山是高的，水是深的。高黎贡山、雪盘山、点苍山，海拔都在六千公尺以上。她们的山峰往往隐在云雾里。澜沧江、漾濞江，奔流于崇山峻岭之间，峡谷之深达数千尺，人跌下去是找不着尸体的。

然而滇缅公路就绵亘在高黎贡山、雪盘山、点苍山的山岭之下，就蜿蜒在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的急流的旁边，而且横截了它们。

车整天在荒山里奔跑，越过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层峦叠嶂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车路沿着数千尺的悬崖峭壁前进。这一条黄色的长蛇，穿过无数的密林，越过数百个桥梁与涵洞，有时且消没在白云里。倘若司机没有耐性和毅力，到了目的地说不定会发神经病。如果精神差一点，眼睛看不准，随时便有滚到山下与水中的可能，而这些山与水，用句机工同志的形容词，它的深是“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

车常常是数百辆一起出发，像一群灰色的甲虫，在高山里悄悄地爬着。我们英勇的华侨司机，镇定的操纵这些甲虫的方向。他们的眼底永远是无尽止的山，是无边限的树木，是无尽头的路。这些山、树木、路，便是他们的家乡。

现在我们的机工同志，对于这条蜿蜒的公路，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知道跑了几百里路可以到某一城市，跑了几十里路可以到某一分站；转了那个弯，便有某一条水，越过那一道山，还有某一个高峰；那里有大石头，那里有崩溃的坍土；什么地方路狭，什么地方路宽，他们全明白，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有没有宿舍？有的，腊戍、遮放、芒市、龙陵、保山、永平、下关、楚雄，都设有宿舍。有的用竹盖的，有的就庙宇改造的，但是我们的机工同志们，大抵不睡在宿舍里，而睡在车厢里，因为如果所载的军火没有卸，他们夜里必须照顾军火，如果军火已卸，他们也得防备零件被偷。

机工同志对于车是很爱惜的。他们不能忘记那条标语：“汽车是我们的生命！”正如士兵珍惜枪一样，每一个司机有空便揩他的汽车，揩得雪亮，汽车如果损伤了，在他们是顶伤心的事！一个司机告诉我：“汽车是用民众的血汗换来的，国家相信我们，把民众血汗换来的汽车交在我们的手里，我

们不加爱惜，怎对得住国家和自己呢？”

“一等驾驶兵”

每一个机工同志，都穿着运输处所颁给的制服，而最引人注意的是，胸前一律挂着“一等驾驶兵”的符号。

“一等驾驶兵——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二等和三等驾驶兵？”我问一个司机同志。

“技术熟练的，才能当一等驾驶兵。技术差一点的，就够入二等或三等驾驶兵。华侨差不多都是一等驾驶兵，而‘辣椒头’（华侨称外省人的号）却几乎全是二三等驾驶兵！”

华侨机工技术的高明，确很使国内同胞惊叹。他们靠着丰富的经验，常常把自己从危险中拯救出来。半年来他们驾车失事的只有二人，而国内同胞失事的却不下五十余人。滇缅公路确实很难走，全路有三分之二是沿着悬崖走，路宽不过二丈，狭的则仅容许一辆车通过。路又是环山筑成的，有许多地方，在一分钟内，要兜五六个大圈子，在转变时候，处处只能看见深谷和峭壁，等到回转过去，这才发现并非绝路。在这样险的路上，华侨机工却十分从容地行驶着，他们极富有机动性，偶有不幸翻车，往往能够随机应变救活自己。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曾腾光，是第十三大队的驾驶兵，驻扎在遮放。他在离保山二十公里的地方（那是一个有名的悬崖）翻了车，但是他死抱住方向盘，任汽车翻筋斗，滚到了底下时，他抖一抖身上的泥土、碎石和草刺，开了车门爬出来，一点没有受伤。陈克己，十四大队的驾驶兵，驻扎在下关。他在功果桥附近来个倒栽葱，当时曾有两个“辣椒头”，人和车滚到澜沧江中，什么也找不到。可是，他滚到半路，即从车内跳出来，让自己跌倒斜坡上，结果只闪坏了一条胳膊而已。我们到下关时，他的胳膊已经复原，第二天就驾着车走了。黄顶兴，那个十九岁的潮州少年，他同我们由遮放一起出发，在龙陵附近他不知怎的忽然“左倾”，幸得刹车刹得快，车撞在一棵树上，没有翻筋斗！

不但华侨机工的驾驶术高明，就是修理术也十分熟练。他们修理汽车，不必看书，在极短时间内，可以把极难的工程完成，训练所的讲师和教官，学历大抵很高，理论有余，经验都比不上华侨机工。腊戍装车厂，有二十个

华侨机工，六人可以装置四辆车，被宋子良主任称为“模范机工”。

滇缅路的汽车，分新旧二种，新的是□□牌，机器好，修理工具也完全，旧的是□□牌，机器差，工具全丢了，大家自然都喜欢驾新车啰！可是公司却把旧车交给华侨驾驶，为什么？因为华侨技术好，旧车在华侨手里不会出岔子。

有一次，芒市华侨机工和储藏库库员发生冲突，吴琢之副主任对库员大加训斥：“你们要知道，国家要培植一个机工是不容易的，请一个库员马上就有，你们如果再有对不住机工的事发生，我一定不宽恕！”张炎元教育长亲自对我们说：“滇缅公路如果没有华侨机工，过去半年几乎通不成车！”由此可见当局如何重视华侨机工了。

“当我们做‘山大王’的时候”

我在遮放碰到十三大队的一个班长，叫做陈恩仁，他是个执性的少年机工，要回国的时候，他的母亲老放心不下，不让他走。他却躲在同济医院一个月，坚决地走了。

他看到我们很高兴，他报告许多他们的生活状况，在他心灵上印象最深的，是十三天“山大王”的生活。

“山大王”这名词使我想到绿林好汉，我很奇怪我们的司机同志怎样会做起“山大王”来。

“喂，好好的司机怎么会做起山大五来？”

恩仁知道我误会了，他对我解释：“山大王并不是做绿林好汉的意思，在我们的行车中，有时路崩，有时车坏，不免在荒山里抛锚了，没有房子，没有同伴，偌大的山，只有我们一个人，所以叫做‘山大王’。”

“那一次，一百多辆车从遮放出发”，他开始叙述那最可纪念的十三天，“走到距芒市一二十里的地方，忽然发觉前方的桥断了，我们的车停住，大家都很着急，前进既不能，退后也不得，那样小的路是无法转弯的。我们希望救济车来，可是救济车来也没有用，它不能修桥。我们又希望交通部公路局赶快派飞班来修，可是那时又碰到雨季，桥一时不能修好，我们知道绝望了，只好准备做‘山大王’。我们没有带米、带盐，只好向老百姓买点盐。一百多人在荒山里要找饭真不容易，我们要跑几十里路才找到一顿饭

吃，一百多人要分几次出去觅食，因为不能一块儿离开车辆，车上放着军火，如有半点差错，谁也担不了责任，因为种种困难，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雨下得讨厌，白天愁坐在车头里，夜里也睡在车头里！我们过着很寂寞的生活！”这位执性的孩子，说到这里，眼眶里有点儿湿。

“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消遣呢？譬如在夜里，月亮上来了，你们可以围在一起，开座谈会，或举行一个小小的音乐会，会唱歌的唱歌，会吹口琴的吹口琴，那不是好得很！”

“不知怎的，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大家只想快点通车，早上醒来，希望今天桥会修好，可是失望了；我们希望明天，然而明天又失望了，明天复明天，这样我们一直等了十三天。”

“当我们听到桥修好时，我们的喜欢是不能形容的，我们像飞脱出了笼的鸟，像遇到大赦的囚犯。自然，我们为国家吃苦，并不怨叹谁，只是救济工作实在做得太差，路实在修得太慢。”

“做山大王的事常发生吗？”

“怎么不常发生？我们的机工同志几乎有半数以上做过‘山大王’，成群的还不算苦，独个儿那才要命！一个人，又要看车，又要找食，冷清清在山里住他三天五天，你道那味儿是怎样的？”

啊，英勇的机工们，你们是无名的英雄，你们为民族忍受了最大的痛苦。

一个缺点——李逵性格

华侨有一个普遍的性格：就是刚强鲁直，如同李逵一样。机工同志当然不能例外，他们好打抱不平，到处闹事。三句不对劲，便用武力解决——打！

华侨机工的刚强，在昆明、下头、保山、芒市、龙陵是很出名的。市民和警察大都对他们存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最轰动一时的是今年六月金碧路的事件，一华侨机工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甚至把军士机关枪都缴了过来，幸得及时解决，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保山也因华侨机工和饭店、理发店闹别扭，停市了好几天。至于和老百姓的事，在芒市、下关、遮放，更是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当地人把华侨当成“蕃客”，普通人买盒香烟四

毛便够，华侨却非五六毛不卖，故意涨价，加上语言不通，于是全武行便常常演出了。

在演全武行的时候，机工是非常团结的，他们只要一个人喊道：“某某被人打了。”大伙儿便涌出去报仇，弄得警察、商人听到华侨二字便头痛。

这自然是我们的不对，即使当地人如何可恶，如何不讲理，打绝不是“好方法”，这只有使他们怕和恨，而不能使他们觉悟和了解。开导民众，自然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被一般人看做“革命之母”的华侨，却不能不负起这艰苦的责任。

对内，要“避免摩擦”，要“动口不动手”，怎么愚蠢，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我们沿路对机工同志这样说。

浪漫的插曲

华侨机工有不少漂亮的青年，他们体格好，富于情感，会唱动人的英文歌和马来歌，此外有一张棕色的健康的脸。

摆夷女郎，这些多情的女郎，就往往把我们的机工当作丘比特的对象，那些未出嫁的“菩拾”，有一条梳得发亮的辫子盘在头上的，最高兴和华侨机工眉来眼去，在泼水节，有若干机工被泼了水——被泼了水，就说明你已被爱。

在黄昏时候，遮放、芒市的女郎，纷纷到小河边洗浴，神情十分活泼。而我们最爱冲凉的机工，往往同在那里洗浴，于是虽非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泼水的热闹不减泼水节的盛况！

听说芒市的土司养着许多美丽的女郎，其中好几个爱上华侨机工，甚至和机工恋爱，可是我调查了好几个人，此说尚未证实。

那些好女郎虽然美丽，终究是异域的花草，也许我们的机工同志如此想吧。

几张剪影

我们到腊戍，便看到侨胞机工，踏进祖国的境界——畹町，便更多了。

在路上，在荒山里，在茶馆里，在各分站的停车厂内，每一角落，都有他们的活动。他们以极快乐的神态欢迎我们，如同见到久别的兄弟一样，亲切极了。在荒山里，他们停车，跳下来和我们握手；在每一站，他们攀在车旁，坐在轮盖上，问长问短；在旅馆里，他们黑压压挤了一房间，争先恐后报告生活状况。

我喜欢他们，他们是热情的，豪爽的，鲁直的。

王亚能，太平的孟加里，现任十一大队的分队长，在遮放我碰到他。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他会说福建话、广东话和国（华）语，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中间写王亚能，下面是“印度班邑”。

“王亚能，是你原有的名字吗？”

“不是，这不是我的名，这是我最好朋友的名。”

王亚能在队上很能获得上下层的好评。他肯干、苦干。有一次，坍路下来，大家都懒洋洋不大理会，独有他拼命搬土填路。他是中国最好的友人。

张天赐，工商校友会校友，在遮放修车厂当机工。他是一位耿直的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训练所的时候曾干过一桩轰轰烈烈的事。四月十四日，同济大学慰劳团到训练所慰问华侨机工，演“放下你的鞭子”，他提议从伙食钱节下三十元，丢上台，作为献金，大家同意了。结果所献的金，除了三十元外，还有许多自动丢上去的，达四百余元。他和我们一块儿到昆明，他对我发表了若干对人对事的批评，我觉得很中肯。

“修理机器的生活，是否苦一点？”

“苦没有关系，回国就是准备吃苦。”他答。

在若干机工中，我觉得许成瑞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他是第三批的副领队，现在保山十一大队当副官。他最好抱不平，常常挺身而出，替人说话。在路上，他老问我应该看什么书，他说他正在看一本“思想与训练”。他很勇敢，常常把长官的腐化行为报告上峰，这使若干长官又怨他，又怕他。

他喜欢表现自己，他是英雄主义者。

甘锦寿（现名甘锦秀），表现得不错。他是新加坡一个富家子弟，英文念到九号，生活舒适极了。可是他不愿逸乐，他离了家庭，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我们在下关附近碰到他，我问他“想回家不想回家？”他耸一耸肩头笑道：“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对于陈亚来和郭成珠有着极温和的印象。他们见了人，老是笑笑的，

成珠还只结婚了两个月就自动回国啦！他们已渐渐学会了国语，他们准备说国语说得像福建话一样流利。

我们碰到马来人马加森，是在保山的招待所。他到招待所来，对于长官的傲慢态度表示不满。我们安慰他一下，牡丹拿四十块钱给他。

他是个出色的武士，下关徐站长告诉我，他常遣派马加森抓那些偷东西的人，勇敢而且迅速。

洪传咸，是晋江会馆的会友，我们在星常常碰头。这个硬汉子，在昆明为打抱不平，被关了四十天，可是他，还是一样快乐安闲。

在龙陵合作社，我遇到南洋商报的排字工友陈秀碧，他亲切称呼我，他算“投铅从戎”了。

蔡仁德的脚踏车表演在昆明轰动一时。北平有一个冠军斗不过他。每逢各界举行游艺会，准有他的份。西南运输处当局为着便利他的表演，特地到河内买脚踏车。他现在和陈桢万（他表演大力士）等四人代训练所体育助教。

有许多学员升为长官。刘贝锦、林贵奇、林己茂、钟伟兰、陈剑如等十余人均升为分队长。

在这里薪水最高的是王文松（昔为新加坡某公司工程师，每月约叻币二百五十元，他自动回国服务），现任总厂的工程师，每月仅一百四十元。我们在下关的一个小酒店看见他，穿着一条虎皮短衫，很有礼貌地招呼我们。后来他又带队到昆明来，他没有李逵性格，他是有知识分子那种文质彬彬的风度。

——《南洋商报·晚报》1939年9月28日-10月2日

（三）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陈共存

组团的动机与目的

笔者在大学时期专攻修历史，因此对有关历史史迹特感兴趣。1937年“七·七”抗战后，陈嘉庚先生组织南侨总会，领导全南洋华侨支援抗战，并号召以星马为主的海外华族组织总数三千二百人的卡车司机，在1939年分九批前往滇缅公路赶运军需品支援抗战。

由1939年至今已四十七年，此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尚未有正式的记载，成为抗战史上的一段空白。时过境迁，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竟被遗忘。吾人认为这段历史事实是一个最宝贵的历史教材，可以矫正年青一辈颓废的思想，教导海内外的华族，各为其个别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组团的缘由

1939年春，笔者前往昆明继续升学，时值第一批华侨机工抵步，特往访问。当时看到这批机工既无寒衣，亦乏住宿的设备，以稻草席地为床，苦不堪言。当时曾写一信向陈嘉庚先生报导实际情况。笔者在那年一月到达昆明，四五月间离开，以后的详情即不甚了解。但是当时的印象，虽事隔数十年犹历历在目，未能忘怀。抗战胜利后由各方面得到片断的报导，但不完善。《南侨回忆录》虽有述及，可是也甚为简略。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记载海外华族创业的历史及抵抗日本侵略的史迹。由此动机乃引起笔者对这一段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工作历史的重视。于是就与我国多位历史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经过共同研究后，认为初步的工作须组团前往昆明，到滇缅公路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因此乃致函当时曾代表南侨总会在滇缅公路工作的庄明理老先生，跟他取得联络，并且得到庄先生热烈的支持，代为安排在昆明会集。考察团的新加坡方面是以魏维贤博士为首，团员包括林孝胜和崔贵强二位先生及我

四人。中国方面是庄明理老先生及他的秘书牛石林先生。会集的日子是1986年11月4日。庄老亦预先安排云南省政协、侨办、侨联、机工联谊会等有关单位协助。

考察团的行程

1986年11月5日全团十多人，包括医生及保安人员等，浩浩荡荡由昆明出发，中午在楚雄午餐，当晚到达下关，行程四百公里。六日与三位机工会谈。七日续程往保山，行程约二百公里。下午六位机工会谈。八日由保山出发，凭吊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然后往松山参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傍晚六时许到达芒市，行程均二百公里。九日由芒市出发往畹町，随后继续往瑞丽，一直到达中缅边境。当日赶回芒市，来回约二百五十公里。十日由芒市出发，在保山午餐后，赶往下关。十一日由下关出发，当晚到昆明。前后六天，总计来回行程约一千八百五十公里。

与机工会谈的概要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在一年半之间，沿海各省均告沦陷，军援断绝，因此乃抢修滇缅公路，这是美国军援的唯一途径，山路险峻，军事运输非有熟练机工不能胜任，一时要训练这种人才，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乃由西南运输处宋子良去电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要求派遣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因此在1939年三数月期间内即派九批，约三千二百名机工往滇缅公路服务。

当时宋子良所提供的条件：衣、食、住、医药等一概由西南运输处负责，月薪三十五元。筹赈总会根据这些条件宣布招募机工，限定年龄为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除了要有卡车驾驶证或维修机器证明文件外，并须征得家庭同意，始适合资格。

考察团此次的访问，除了在大理和保山访问九位机工外，十一月十二日在昆明再与三四十位机工开座谈会，综合要点分为八段，概述如下：

1. 当时青年爱国热忱，极为高涨，报名参加者至为踊跃，有些青年实际年龄仅为十八岁，乃虚报为廿二岁而报名参加，有的瞒着父母秘密参加，有

的已经结婚有妻儿者，亦抛妻弃子而投奔祖国，有的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业而参加队伍，形形色色，不能尽述。

2. 1939-1942年间，热爱祖国的机工夜以继日，在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的滇缅公路来往奔驰。当时由于山高路窄，深谷万丈，而致翻车丧生，或因敌机轰炸扫射，饥寒交迫，瘴气患病而为国殉难者不计其数。但是这些机工却前赴后继，绝不畏缩。他们的生活虽然千辛万苦，险象环生，但是为了抗敌，精神上有所支持，心理上亦有所寄托，尚能度过。

3. 1942-1945年太平洋战事发生，缅甸失守，日军攻入云南，直达惠通桥。滇缅公路交通断绝。西南运输处保留小部分机工外，其余全部遣散。这些机工突然间成无业游民，不但生活困苦，加上精神上的空虚，身心都受打击，有的机工甚至沦为乞丐。在些段期间，因生活无着、贫病饥寒两相交迫，而致死亡者为数不少，总计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期间中，为抵抗侵略战争而牺牲性命成为无名英雄的机工约占三分之一，人数在千名以上。

4. 1945年-1949年抗战胜利后，这批参加抗战工作的南洋机工，政府当局理应负起复员责任，但却无人理会。当时陈嘉庚先生曾向政府交涉，并宣称如果政府不愿负责的话，南侨总会将派船只前往中国口岸迎接。陈老因恐怕原本为参加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机工被迫参加内战，所以据理力争。但当时政府方面却为了避免这批机工回南洋以后宣扬他们所遭受的惨痛经历，有损政府的声誉，因此不甚合作。不过由于陈老的力争，有机会复员回返南洋者，据闻只有九百多人。其余因种种原因流落国内者达千人以上。在此段期间内，内战烽火再起，遗留国内的机工流离失所，无所适从。其经历的苦难，唯有身受者始能了解，并非吾人所能想象者。

5. 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重建家园。遗留在国内的南洋机工认为有机会参加重建祖国的工作是一件光荣和有意义的工作。物质生活虽然苦，但是精神上重新得到鼓舞，把前程寄托在建国事业上。

6. 1956-1966年期间，机工们在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暴中，彷徨困惑，无所适从，所受到的冲击，不减当年。

7. 1966-1976年期间，南侨机工们更因海外关系及参加抗战工作被红卫兵认为是国民党的走狗、反革命分子。他们精神上多受打击。

8. 1976-1986年，遗留在国内的机工逐渐得到照顾，但是仍有部分尚被忽略者，亦在所难免。我们希望他们全体都能安度晚年。

上述八点在此次访问昆明和滇缅公路的简略报告。所接触者不及五十人，晤谈中有的人涕泪交流，泣不成声，有的怨气膺胸，慷慨陈辞，甚至有的埋怨陈嘉庚先生当时发动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以致连累他们遭受数十年的苦难。这种怨言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

据闻除流落在云南的数十名机工外，在四川及贵州也有数十名。南侨机工的原籍绝大多数是闽粤，据说有一小部分已回返他们的原籍地了。据估计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留在国内的千名机工，经过四十年漫长的岁月，尚侥幸生存者恐不及四分之一。他们的年龄最小的也近七十岁，而大多数已经七八十岁了。这一群被历史所遗忘的抗日英雄，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突然间得到海内外关心人士组团探访，其心情的冲击和感受，悲喜交集的表情，诚非笔墨所能形容。

最后笔者要对北京和云南主管的领导及干部们的衷诚协助，表达万分的感谢。假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次的考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有了他们的合作，这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才不致被埋没，不致永远成为历史的空白。

(1986年12月1日)

（四）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河山。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沸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病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烽火赤子心

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何在？
当一个没有祖国的侨民，怎能立足于世上？

责任编辑 张 谦

封面设计 肖东
投稿邮箱 xinhua_maggie@163.com

投稿信箱: xinnida_maggie@163.com

ISBN 978-7-5166-1895-0



9 7 8 7 5 1 6 6 1 8 9 5 0 >

定价：88.00元